



# 教授妈妈 亲子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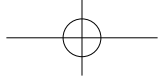
我家走出四博士

李振霞◎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家走出四博士 / 李振霞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  
（教授妈妈亲子三书）  
ISBN 978-7-121-24749-1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8566号

出版统筹：李朝晖  
责任编辑：刘娴庆  
文字编辑：任婷婷  
责任校对：杜 皎  
营销编辑：王 丹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6 字数：22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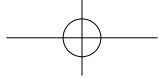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 目 录

自 序 我家走出四博士	1
第一章 童年的欢乐与苦衷	1
放弃妙龄的潇洒与风姿	1
顶风冒雨寻奶妈	3
母乳送去安康与亲情	6
舍得生命保孪生	11
孝母之心沉甸甸，挥泪传给下一代	17
匍匐冲锋的小战士	22
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25
当病魔与孩子纠缠的时候	27
幼儿演出后的不安与哭泣	29
不把孩子庇护在父母羽翼下	32
拾取爆竹尾巴的小长兄	34
先礼后兵，该出手时就出手	37
第二章 少年的烦恼与督导	41
“读书无用论”撞击着小小心灵	41
围起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	45
欠债与还债中的哈哈趣闻	49
循序渐进，不“跳级”	52
更名改姓使不得	56
黄帅究竟“帅不帅”	58
苦度四壁虫鸣之夜	62
再苦也要教育好孩子	66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笃实的信念：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67
“孩子王”变为班上“好带头羊”	71
个个捧着大砖头静静阅读	76

## 第三章 青年的求索与拼搏 80

让孩子“闯出成功的悟性”	80
锻造一副能够保护自己的盔甲	86
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90
智慧启蒙，培育小天使	96
右手骨折，左手握笔	101
妈妈不要怕，“脑浆出来了”！	103
无疆的爱，如夏花般绚烂	107
“痛痛”才成长	112
宁愿伤着自己	115
真正的美与不美	119
赋予时间独有的价值	122
清纯的爱	125

## 第四章 离开妈妈的羽翼搏击长空 129

瞄准世界高科技	129
架起东西方文化交融桥梁的赤子	143
孪生弟兄双双攻克高科技	158
对祖国的眷恋与日同辉	176
身在异邦，根在中华	190

## 第五章 做父母，我们实现了双赢 202

有播种才有收获	202
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213
妈妈的事业并没有苍白	220
新腾起，新生命	229

## 后 记 245





我家走出四博士

## 自序 我家走出四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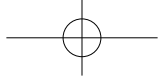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被中华民族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毕生为国为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是这样，他在病歿前却没有忘记写信给儿子诸葛瞻，这就是著名的《诫子书》。他在信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信中充满了诸葛亮作为父亲对儿子的舐犊深情和热切企盼，也是他本人一生修身养德、广才成学的经验之谈。诸葛亮告诫儿子：品行高尚的人，要以沉静来修身，用简朴的生活来养德。如不能淡泊富贵，就不能立大志；如不能安定沉静地思考，就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学习必须心静，才干要靠学习，不学习就不能扩展才能，不立志就不能学有所成……

不论是历史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希望子女成才，这是天下父母心。我和我的先生也一样，含辛茹苦地哺育自己的子女，期望他们学有所成，从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业。

我有四个子女，他们分别为：

长女金莹：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后，现为基因与冠心病研究方面的著名研究员。长子金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博士，现为雪佛龙石油公司的首席地球科学家。次子金侠：剑桥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现为生物学与免疫学方面的权威专家、博士生导师。三子金延：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博士后，现为四博士高科技公司的总裁。



## 我家走出四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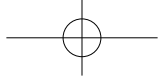
一次，我和几位女友相聚，她们说我有一个“家庭博士群”，并问我：“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你培养出那么一群好孩子？”我说：“我要好好想想，以后再对你们说。”这是我第一次承诺谈论自己的家庭，但后来我们没有找到机会再聚，所以这也成了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而在中央党校大院里，甚至有一部分人竟然研究起了“李振霞家庭现象”。

1994年，我到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工作不久，一个炎热的夏天，有两位《家教博览》杂志的记者找到我，要写我的家庭、家教以及子女的成长。他们其中之一的明光同志就是该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们告诉我是他们的主编吴月珍同志（当时是海南省教育厅副厅长）讲：“要写家教的好典型，一定要找李教授。”而我却认为自己的四个子女虽然都获得了高学历，成为博士或博士后，但我并没什么特别值得他人借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所以，我还是以工作忙没时间为由推辞了。

没想到，明光同志非常执着，似乎不弄清传说中的“李振霞家庭现象”就不肯罢休。在屡次打电话来被我婉拒后，他转而向我的同事以及周围的人了解情况，又在此基础上多次约我当面“谈话”。没办法，我只好挤出极少极有限的时间接待他们，谈得不多，主要是请他们看了几个孩子从国外写回来的信、寄给我的生日卡、大量的照片，以及相册上孩子们为妈妈写的生日祝词等。后来，明光同志发表了文章，即1995年3月《家教博览》第4期上的《一个家庭博士群的崛起》。他依据从各方面了解来的情况写出的“我的家”，篇章华丽，夹叙夹议，文笔生动，而又不失情节的真实。文章的主旨不是在宣扬某一个家庭，而是在宣扬一种精神，即当前搞好家教、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来许多电话与书信，更多的人要求我介绍“家教”的经验，我都没有应允。直至后来，中央党校一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博士生江英同志提出建议，促使我下决心写了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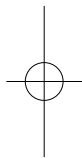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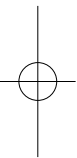
可是，几十年的往事，从哪里着手，又怎么写好呢？我陷入了困惑中。在一次写作间隙，我一口气读完了法国18世纪伟大思想家卢梭的《漫步遐想录》，似乎从这本书中找到了信心、力量和写作宗旨。卢梭在谈到自己写回忆录时说：“我发现要从事这样一项工作，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让我的头脑无拘无束、让我的思想纵横驰骋，把我独自进行的漫步以及漫步时涌上心头的遐想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忠实地一一记载下来。”

我不知道以这种“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写出来的东西，是否会带给读者某种需要的满足，但我按照这种办法做下去，自己却写得很愉快。因为这也是一种自我需要和自我满足。像卢梭那样“满怀喜悦地追忆发自我心的一切感情，追忆它那如此亲切而盲目的眷恋之情，回顾几年来在我头脑中产生出来、予我以慰藉甚于悲哀的那些思想”，这是来自史诗般的真实生活的“思想”。在平静的、甜蜜的心情下的回顾，带给人的只能是“一颗对人怀着深情的温柔的心在沉思之中所得的欢畅”。





## 第一章

# 童年的欢乐与苦衷



### 放弃妙龄的潇洒与风姿

哺乳是让初到人世的孩子走向身心健康的第一步。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来到人世，他的第一个需求就是母乳。母乳是婴儿的美味佳肴，是他生命的源泉，是增强免疫力的最佳滋补品，是医治百病的“神丹”、“仙草”。

我家的四个子女，每一个都是我亲自哺乳的。我总觉得这是做母亲的神圣天职。

记得婚后生第一个孩子（长女）时，我二十二岁，正带职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怀孕后我凭借着毅力，努力使读书、学习不受影响。但因为当时我爱人也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师资训练部进修，两个学生很难在北京安家，更没有能力养育下一代。无奈，在一个金秋季节，我请假从北京回到美丽的松花江畔哈尔滨市我母亲的身边。当时生育子女，不论是否“独生”，都只享有五十六天产假。生下我那可爱的女儿后，来探望的亲朋好友，包括家人，都劝我不要给孩子哺乳。有经验的老人说，在家待不到两个月，就得去北京学习，断奶时，大人太难、太痛苦。我那些年轻的女友也都直言不讳地说，喂奶时间再短，也要多吃、多喝，体形就会随之改变，还说我会因此失去原本健美、潇洒的风姿。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一直是校女子排球队的队员，此前曾是党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校的篮球队队员，我还酷爱滑冰、游泳、打乒乓球，所以当年我的身材还算得上健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哪个年轻女子不爱美呢？可当看到那个可爱的小宝宝嗷嗷待哺时，我的心中就只有她了，完全忘却了自己，什么美丽的身材、优美的体形，也通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孩子是我生的，就应该由自己喂奶，能喂一天是一天。第一次做母亲，没有经验，生育初期，坐着腰疼，孩子嘬着“瞎奶头”，吮不出乳汁，哇哇地哭，我也急得满头大汗。母亲心疼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装着热乎乎牛奶的奶瓶送到我手里，说：“不要再喂了，让她吃牛奶吧，不然等断奶时，因为胀疼，你也得哭。”我笑了笑，把妈妈递过来的奶瓶放在一边，说：“吃母乳的孩子健康、聪明。为了孩子，我不怕疼。”由于我的执拗，后来谁也不再劝了。而我可爱的女儿好像深深懂得了妈妈的心，同我配合得越来越好，一个多月她就吃得白白胖胖的了。

上面的一段回忆，已经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而我却总是难以忘怀。特别是每当听到一些年轻妈妈谈论起“哺乳”时，总会勾起心中的往事。她们有种种的担忧与害怕，我也很能理解。

不过，在我看来，做母亲是要有所牺牲和奉献的。即使“哺乳”真的会把母亲变胖、变丑、变老，也应该义无反顾地去为子女哺乳。在哺乳期，不论别人怎么说“喂奶会使你改变体形”，甚至有人直接说“你胖了”，我还是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当抱起亲生骨肉、看着他紧紧依偎着自己吮吸自己饱含着爱与营养的乳汁时，做母亲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欢乐，没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由于母乳中含有一种能够促进智力发育的营养物质，所以母乳喂养能够促进婴儿智力发展，且母乳喂养时间的长短更会影响婴儿日后的智力发展。如今看来，我当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用母乳喂养孩子，的确为我的孩子们在今天拥有的智慧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顶风冒雨寻奶妈

没有健康的体魄，孩子难以成材。身为父母，当那脆弱的小生命一落地，就应该想到对他应有哪些帮助。这些帮助当然会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子女的健康，顽强克服困难，付出执着的爱。

我非常爱自己的女儿，真想一直由自己哺乳。可是，产假要结束了，必须回单位工作了。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应准时回校报到，尽快补上耽误的功课——要知道，当年我是在炎热的夏日连续三天奋战考场，在诸多的竞争者中，凭借合格的成绩，才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录取的，机会实属难得；而另一方面，我又实在舍不得小女儿。据说，因为母乳含有免疫球蛋白，有利于增强婴儿的免疫力，而婴儿不吃母乳，免疫力就会降低，易得病。此外，我还非常心疼我那从二十六岁就开始守寡的老母亲，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和哥哥养大，现在又要让她哺育第三代。每当想到这些，我便夜不能寐。看着甜睡中的女儿可爱的小脸，想到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而停止母乳喂养势必影响孩子的健康，我的眼泪不禁扑簌簌地往下掉。

就这样想来想去，终于有一天我顿开茅塞——好，给孩子找奶妈！

可是，天地之大，上哪里去寻找奶妈呢？产生这个想法，已是女儿满月后的第十天了，时间到了11月下旬。此时在祖国的南方，依然是百花盛开，群芳争艳；而在北国的冰城，却已是草木凋零，风雪交加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她老人家坚决反对：“上哪儿去找？这么冷，刚满月就往出跑，会生病的。”

我劝妈妈：“放心，我多穿点儿，坐汽车去找。”妈妈深知我执拗的性格，不再多说了。

第二天，我戴着哥哥的棉帽，穿上哥哥的那件棉大衣，就出发了。

上哪儿去寻找？我首先想到了医院，足足跑了十天。其间还要在小女儿哺乳时间赶回家给女儿喂奶。幸亏女儿满月后，吃奶间隔的时间长了，从两三小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时一次改为四个小时一次，中间饮水就行，这才容我在外面跑。

记得那一年哈尔滨在 10 月 20 日下了第一场雪，清晨从窗户往外一望，比我们楼低一些的楼房的房顶上积了有一寸多厚的白雪。到 11 月下旬，已是大雪纷飞了。我在街上跑的时候，常常是顶风冒雪，回家时又冷又饿。

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就在第十一天早晨，我再次造访哈尔滨道里第一人民医院时，终于得到了一个消息：产科病房的值班护士告诉我，前几天有一位年轻母亲，所生婴儿由于脐带缠颈，导致窒息，经抢救无效夭折。当时产妇哭得很厉害，现在已经出院了。我问清楚住址和姓名，当即往她家飞奔而去。这是一段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路程，跑了一阵就累了。我放慢脚步，心想：倘若真能如愿，我真要拜谢苍天了！当然，我同时也深深地同情这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终于，我找到了她家，敲开大门，迎面出来的是一位老实憨厚的男人。听我说明来意后，他请我进屋坐，与他爱人商量。进屋后，我环顾左右，房间不大，却整洁明亮。在东北人习惯睡的火炕上，脸朝墙躺着一位妇女。听到有客人来了，她急忙起身，擦掉连珠似的泪水，可眼泪还在止不住地流淌。

她爽直地说：“已经有几夜没睡好觉了，想孩子，奶又胀痛，打针也回不去。”

当我向她说明来意后，她说“有孩子吃，奶就不会这么胀痛了，这倒是一个解决办法”，并问我：“什么时候去？”

我说：“越快越好，可能要在我们家待得久一些。”

她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指着自己的爱人说：“他在工厂做工，厂子离这儿不远，这点儿家事他都能做，我出去多久都行。”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我就来接她。

我一踏进家门，就高兴地喊道：“妈妈，我找到奶妈了！”

妈妈似乎又开心又有几分抱怨地说：“老天有眼，保佑着你。再找不到奶妈，你非病了不可。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听说过有谁刚一满月就跑出去顶风冒雪地寻奶妈。你这是头一个。都当妈妈了，怎么还能干什么事都不顾命的！”

我抱着妈妈的脖子说：“妈妈，您看看，我这不是很好吗！”妈妈笑了。事后，我也感到很可笑，自己已经是做妈妈的人了，还搂着自己妈妈的脖子撒娇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去接奶妈了。她梳洗得很干净，穿戴得朴素整齐，高高的个子，身材十分匀称，脸上的皮肤白白的，透着红润。我心想，难怪护士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说她身体健康。我十分满意。路上她告诉我，她出生于工人世家，只读过小学就没钱上学了。她爱学习，自己在娘家时边做家务边看书，到了婆家也是这样。可能正因如此，她显得很善良，温文尔雅，十分有教养。她到我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我母亲允许她洗个澡。妈妈说“很方便的，你每天随时都可以洗”，并带她进了洗澡间。浴后她反复用酒精棉擦洗乳头。当奶妈给女儿哺乳时，我还担心女儿会有异样感觉，拒绝吸吮，可是，小家伙好像根本分不出奶妈和妈妈，大口大口地吸吮着香甜的乳汁。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精神才轻松下来，多日来郁积在心中的浓重的忧虑顿时云开雾散。



当时哥哥寄来的小萤的照片

我的嫂子下班后看到此情此景，说：“振霞是一旦下了决心，不达目的不罢休。奶妈历来是非常难找的。”我说：“这可能就是《全唐诗》中王昌龄所讲的‘一片冰心’吧！我这纯洁得像冰一样的母爱，终于感动上帝了！”

之后，我观察了几天，这位奶妈非常爱我的女儿，

她好像把对自己失去的爱，全部倾注在眼前这个小生命的身上了。她的奶水很多，人也很坦诚，说话却不多，待孩子一睡觉就急忙帮我母亲干活。

生性善良的母亲告诉她：“奶妈不是保姆，需要吃好的，少干活。”

她却说：“多干活，多活动，奶才多。”

看着她俩和睦相处，我的感觉是：两个善良的人聚到一起了。我的兄嫂也很欣赏这位奶妈。我那个可爱的小女儿，也总朝她笑。好像我这个黑皮肤的妈妈换成了一位白皮肤的妈妈，她感到格外满意。就这样，一切都安顿好了，我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才放心地回到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了。

人大专为研究生准备了专业阅览室，每天早 8 点开门至夜里 12 点关门。我和同室的一位女友，经常在夜里阅览室关门后才回宿舍休息。当时，我们真像《诗经》中所说的：“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在请了奶妈之后，我虽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但是明显感觉生活负担增加了许多。当时我和爱人都是带职学习，每月工资合起来一百五十二元。每月给母亲寄去一百元，请她按照当时哈市奶妈的最高工资酬谢人家，其余的留作家用。我们夫妻二人在北京每月的支出总共只有五十二元，必须非常节俭才能生活下去。虽然生活清苦一些，但我们心中却充满欢乐，一是专心学习获得的乐趣，二是经常接到哥哥寄来的家信，信中愉快地谈及小女儿的情况，时而附有小女儿的照片，带给我们无穷的欢乐。

当时的照片和现在不同，黑白的，非常小，可是，我们却爱不释手，而且在每一张照片的后面都写上了许多形容她如何可爱的字。真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 母乳送去安康与亲情

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呐喊——“救救孩子”。这当然是说要为孩子们着想，提倡新教育。我在这里则借用一下，希望社会要特别关爱哺乳期间的母亲，因为她们正在以自己的乳汁哺育着社会的未来。

我和我的先生非常爱孩子。家中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外号叫“小胖”，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最小的儿子。在这一节中，我要说的是长子。

长子出生于国庆前夕，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新中国的诞辰，我们给孩子起名叫金煜——“煜”是照耀、光辉盛大的意思。

金煜小时候肩膀宽宽的，虎头虎脑，圆圆的脸，身上和脸上全是肉，带出去人们都很喜欢，说孩子胖乎乎的很可爱。惹得人们总是问：“这孩子怎么养得这么胖、这么水灵？”



当年我和我先生工作的地方——沈阳已进入困难时期，胖孩子在当时着实不算多。所以，金煜在同龄孩子中就显得特别突出了。

孩子的胖和可爱是怎么来的呢？谁能知道父母为做到这一点经受了多少辛酸和苦难？我们从来没有向孩子倾诉过这段历史，可是，他自幼一直对我们特别好，似乎什么都知道，可能是我们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给予孩子的爱，产生了一种“心灵感应”吧！我很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感情磁场。

那一年，沈阳定量供应的大米白面已经很少了。面条、面包、饼干等白面制品，很少出现在商店的货架上。东北人的习惯是，妇女在产期只能吃小米，不能吃其他粗粮，如高粱、玉米等。于是，我的产期口粮只剩一种小米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哥哥知道沈阳的情况后，想方设法从他们那里用木箱寄来了挂面。哈尔滨当时的情况虽然好一些，可再也买不到别的东西了，我至今还非常感谢哥哥的倾力相助。可是，产期一天三顿面条营养也不够啊，虽然我们想尽了办法，却还是买不到鸡蛋、鱼和肉，连蔬菜也很少，“喝鸡汤”已成了一种根本不敢想象的奢望。没多久，面条就吃腻了——一天三顿都是用咸菜把面条送进去，确实难受。后来，我不得不打破产妇不吃粗粮的常规，把小米、玉米、高粱米与面条交错食用。为了有充分的奶水进行哺乳，让“小胖”吃饱，在没有肉食、蛋，蔬菜也很少的情况下，我还是尽量多吃饭，吃不下就强吃，咽不下就硬往下咽。不过我确实觉得，我们的处境要比缺粮的人家好多了，孩子总算还有足够的奶吃。

可是，等我产假期满一上班，一系列的困难就都来了。首先是工作，我当时是沈阳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组组长。当时还没有哲学教研室的编制，组相当于室，我们组七八个人要负担全校两千多名学生的课程。但是，有的教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登台讲课。我作为教研组长，又是老教员（虽然才二十五周岁），只好多承担教学任务。当时我负责讲授全校文史四个系和数理五个系共九个系科的哲学课。每天上午几乎都有课，下午和晚上，会又比较多，只好熬夜备课。

工作已经令人十分疲惫了，却还要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我母亲特意从哈尔滨赶到沈阳来照顾产期中的我和煜儿，同时还带来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长女，另外就是一个侄女、两个小侄儿。侄女六岁，侄子一个四岁、一个三岁，而我的长女也只有三岁，再加上煜儿，一共五个孩子。下了班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一跨进家门，简直像进了一个小小的幼儿园。我很心疼自己的母亲，可当时收入少，根本请不起保姆。所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一下班，不论中午还是晚上，都会竭力帮助母亲干活。我的先生当时被调到中共辽宁省委调研室工作，省委机关地点接近南湖，而家在北陵，上下班均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还经常出差。虽然他一心想帮忙做家务，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务重担全都落在母亲和我的身上。由于每天起得早、睡得晚，整天疲于奔命，我从这时起落下一个头疼的毛病，有时犯起病来，头部剧烈疼痛。就是在这种艰难情况下，我还是坚持给儿子哺乳，开始是早、中、晚三次，外加上下午课间休息。后来从五次改为三次，慢慢地可以加一点儿米汤与稀粥了。

本来我已经感到精疲力竭，腿也肿得很厉害了，却不料又出现了更大的负担。一天晚上，在去学校开会前我对母亲说，如果回来得太晚，就只好先请她试着给孩子吃些牛奶了。可是，会议 10 点多钟还不散。这时，我先生推开门闯入会场，说：“你们怎么还不散会？怎么还不放李振霞回家，孩子都饿得翻白眼了！他拒绝吃牛奶，几次三番打掉奶瓶。”

老金当时年轻、火气旺，主持会的人这才宣布散会。我回到家看到煜儿不喝牛奶又不肯睡觉，一副眼巴巴的可怜样，不禁热泪滚滚，心疼不已。

大家本不愿“交心”，可又受不了天天又挤又压的会议，就陆续都谈了。我谈了四条：第一，报上天天宣传取消按劳分配，提倡供给制，我认为不合适；第二，农村中劳力强的人都上山大炼钢铁去了，造成秋收缺人，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导致丰产不丰收；第三，学马列的书，不让学生在学校读，而到工厂和农村读，这不是荒废学业吗；第四，批判赫鲁晓夫，不应当和苏联断绝关系，苏联人民和我们还是友好的。

每晚开会的这段时间，老金刚好没有出差，我回家晚他都来接。当晚在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不交心，就天天来开会，大家顶不住，每人都谈了。我谈了四点……”随即向老金陈述了这四点内容。

他说：“糟了，你要挨整了。”

我说：“这些想法没有错啊，我说的是‘交心’，不是检讨。”

老金说：“你是没错。但是别人说你有错，你就得挨整了。”我果然还是太天真了，不出他所料，第二天下午，教研室支部书记来找我：“你交心讲得真实，汇报时，校党委书记说，让你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讲讲，做个样子。”



当时外号叫“小胖”的金煜

我不肯上大会，说：“我那不是检查，是‘交心’，我还没有发现我的想法有什么错，不能上大会讲。”

他说：“已经全校的支部书记汇报会上定了，党委书记拍了板。”

隔一天，当我在大会上刚一讲完，“机关枪”、“迫击炮”全来了。说我“没有一句认错的话”、“继续在会上散布右倾观点”、“不是在检讨，而是在继续进攻”，等等。我发现自己上当了，这哪是“做个样子”，分明是在开批判会嘛！

会后，我感到自己心和手脚都凉了。从此，再开会我一言不发。开会一般都晚到，会上早退是固定的，理由是给孩子喂奶，有时则借口“明天上课，我要备课”。当时，全校的哲学课我讲的是最好的，课又多，所以，别人没话说——大概这也是一种群众心照不宣的关爱吧！我的煜儿由于妈妈对这类会议的消极态度，再也没有出现过饿得翻白眼的情况，每次开会前我都给他吃得饱饱的，晚上回来得早继续吃，因而他睡觉也安稳了。待他睡着，我站在床边，久久地看着我这可爱的小宝贝。心想：我困难重重，心绪又不好，可孩子仍能白胖而又安康，真是上帝保佑！

那段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到来了，本来就每天饥肠辘辘的，上面又提出搞教学改革，学校让教师到工厂和农村上课。我是师院政教系即将毕业的班次四年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级的任课教师，又是班主任。因为学生年级高，所以被分配到距学校很远的机械厂。从学校到工厂，走路需用一小时三十分钟，一天来回正好是三个小时路程。虽然那条路通公共汽车，但由于当时国家汽油短缺，汽车只能靠车上面背的大煤气包来开动。而且车很少，有时一个小时也等不来一辆。我认为提倡接受劳动人民教育、知识分子学习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在原则上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在连饭都吃不饱又没有必要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还要以政治来强制执行，不仅无益于学习，更有害于健康。但无奈，我和学生只好每天长途跋涉地来回奔波，又吃不饱，十分疲惫。

我比别人更加饥饿。因为此时煜儿已满周岁，可以吃饭了，但是定量粮只有几斤，孩子又很能吃。我只好尽量压缩自己的饮食，从自己每月二十一斤的定量中，给他节余一大部分；孩子的爸爸也节约口粮给他，在省委食堂就餐，食量也压缩到最低限度，经常是每顿一碗粥和一个馒头的伙食，只喝粥，把馒头拿回家给孩子。我经常是早、中、晚各一顿稀稀的小米粥。如果坐在办公室或在学校里上课，三顿小米粥还可以维持，但每天还要走上三个小时的路，很快就得了浮肿病。头疼加浮肿，身体很差，确实是透支了。然而每天到工厂后，还有三个小时讲哲学课的任务，其他时间则是同工人一起劳动，完成“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任务。这双重“任务”使我每晚从工厂回来，总是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到家看到向我扑过来的可爱的小宝宝金煜，心花怒放，却已经无力抱起孩子了。

此时，我妈妈已经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哈尔滨，只有长子小胖一个留在我们身边，家庭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于是我们请了一位很善良的老保姆。她对我很好，时常关切地对我说：“你脸真黄啊，把粮都省给孩子吃，你吃得那么少，又累，病了可怎么办？”

我对她说：“小胖不病就行，请你把他带好。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你能把他带得这么好，我真的很感谢你！”说完，我喝了一碗稀粥，就躺下了。我思绪万千，心想：天天工作这样累，又吃不饱，真的病倒了，可怎么办呢？国家人多，党内人多，少一个不十分明显，可是小胖少了妈妈可怎么办呢？每当想到这里，只能用被子蒙上头，暗暗流了很多眼泪。最后我想：再困难，我也要挺住，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党中央从各地调一批理论骨干来京，充实几个理论部门。我和老金



有幸一起调来，同时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教。煜儿上了党校幼儿园，吃得比较好。我们的少许定量，不用再留给孩子们了，大人可以吃饱。老金又属于“糖豆”干部（当时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给一点白糖和黄豆，更高级别的干部则供应一定的肉和鸡蛋，戏称“肉蛋”干部。据说是陈云同志为保护干部身体而向中央建议的，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好作用），每月有一些补助，街上也可以买到一些高价食品。同年冬，由于严重浮肿，我和一些人还被中央党校送到北戴河疗养。虽然整个国家的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但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 舍得生命保孪生

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关爱，是一种“天职”，是大自然赋予父母的历史使命，也是无上光荣的社会责任，为人父母，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恪守职责，不辱使命。

“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原载 1942 年 11 月 20 日《解放日报》）周恩来总理的这些话，讲得多好啊！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这种光荣感、任务感、永恒的“天职”的信念，在我心目中交织着升腾起对子女的至亲至爱，时时准备牺牲自己，保全孩子。

金侠、金延是我们的次子和三子。在排行上，他们的上面是姐姐金萤、大哥金煜，所以，家里习惯称他们为小三和小四。中央党校大院的一些老人，记不住他们学名，却都知道小三、小四。他们一来到人间，就在中央党校的校园里出了名，主要因为他们是孪生兄弟，而且生于虎年除夕。年末我们这个大院来了两只“小老虎”，口口相传，十分引人注目。

可是，大家却不知道这两只“小老虎”尚在母腹中时就向自己生母发动了三次“攻势”，令人忐忑不安、心慌意乱。我们当时的公费医疗关系在海淀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医院，也不知道这两只“小老虎”为什么总是和医生“捉迷藏”——在怀孕七个月之前，我去做妊娠检查，医生都说这是一个较大的婴儿，一切正常。到了第八个月，医生却又说“婴儿不大，腹围过宽，可能羊水太多。羊水过多，浸泡时间长，婴儿会出危险”，并让我回家每天吃三次泄水药。于是，我回到家，就开始老老实实地吃药，每晚起夜四五次，半个月内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没过多久，我又去做产前检查，怎知这两只“小老虎”还不肯告诉医生他们是小哥儿俩，继续“捉迷藏”。当时医生检查过之后，说：“摸起来有两个硬度像头颅的东西，可是听起来是一个心音，难道是畸形儿？”当时没有超声波和CT等先进的医疗检查仪器，只能靠耳听和手探，医生的怀疑吓坏了我。回家后，刚好党史教研室的一位老大姐给老金送来工资，我把这个可怕的消息跟她说了，还告诉她，自己因为吃泄水药睡不好觉，身体难受、乏力。这位老大姐曾经生过一对双胞胎女儿，颇有经验，她对我说：“不要怕，再去大医院查查看，妇产医院比较好。”

我听了她的话，很快就去了北京妇产医院。刚开始，有两个女医生也是认定：“心音只有一个，但像是有两个头颅。”随后又叫来几位医生检查，都这样说。当时我的心里又难过又恐慌，几乎连一点点希望都失去了。后来，他们请来了妇产科的女主任。但这位老大夫并没有立刻检查，可能是为带徒弟吧，她又叫来了几个学生模样的医生来对我进行探查并用听诊器进行探诊。至此，我身边已经围了一群医生。他们检查后的看法都一样：“一个心音，两个头颅。”这让我几乎哭出声来，近乎绝望地想：莫非真是一个畸形儿？于是，妇产科主任开始用手探查，她在我的腹部上左按右摸，又让我右卧、左卧，翻来覆去地听诊，为此她一直弯着腰低头操作。后来，她终于挺直身，郑重地吐出四个字：“是双胞胎。”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被打破了，不少人都笑了，无疑，他们也在为我担心，生怕是畸形儿。我的心里当然比谁都激动，急忙追问：“那还用不用吃泄水药？”主任说：“不要再吃了，生育时，水过少，会出危险的。”

主任让医生们都靠拢些，对他们说：“为什么听起来是一个心音呢？两个头部都在前，好触摸，可是，因为婴儿身体蜷曲着，一个躯体

在前，一个靠后，因此，一个心音压住了另一个心音。”她慢条斯理地指着听到和抚摸到的部位，讲得有根有据。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她，这位名医加专家，可算是搬掉了压在我心上的巨石啊！我真诚地对她说：“谢谢！”她笑了





笑，说：“起来吧，没问题，是双胞胎，放心回家去做准备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真是高兴得无与伦比。虽然当时是严冬季节，而且已近年关，我却感觉春光明媚，春和景明。回到家，我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爱人和母亲，他们也异常兴奋。母亲赶紧把小棉袄、小棉裤、小棉被等又加做了一套，这已经是临产前的两周了。

在得知是双胞胎之后，我又去了一次海淀区医院，转告了妇产医院的检查结果，并要求临产转院，再拿单据回来报销，回答是：“双胞胎我们可以接产，不必转院。”可是，以前多次检查都结果错误，已经使我对这家合同医院的医术丧失了信心。为保证两个小生命的安全，我们夫妻反复商量，宁愿日子过得再紧一点儿，也要挤出钱来准备临产时去好医院。最后，我们自费到北京妇产医院，平安地生下了这对双胞胎弟兄。

为了就近、方便，产前的最后一次体查，我还是在区医院进行的。医生告诉我：“你还有一周生育。”在回来的路上，我放心地买了一些我能提得动的年货。回到家中又给长子金煜和自己洗了澡，把衣服也都洗了。没想到，两个小老虎居然又同妈妈开了第三次玩笑，急不可耐地想要在虎年来到人间。当日晚，即虎年除夕夜里 11 点，我破水了。住在楼上，平时像亲姐姐一样关怀我的傅玉琴医生，听到家人告急后，急促地跑下楼来，在检查了我的情况后果断要车，说：“如果让水流干了，生育就会有危险。”她亲自与老金送我到医院。我躺在产台上，医生检查后说：“双胞胎，胎位不正，是难产，赶快做好手术准备。”旁边的人一边准备刀、剪等手术器械，一边打电话，请产科主任和另外两位医生尽快赶来。

当时，我的头脑特别清醒，一切都清清楚楚。心想这两个小生命为什么这样惊吓自己的母亲，也不知是顺产，还是难产，只好祈福了。难忍的腹痛并没有让我停止思考。

产科主任一来，我就什么也不愿想了，只听到她吩咐了一声“请配合”，我就老老实实配合，又听到她说：“好，再配合。”这种话，她反反复复说了很多次。在我感到已经疼得快晕过去的时候，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还没等我喘口气，产科主任又叫我配合，于是在我疼得死去活来中，又一个小生命出世了。这时，医生告诉我：“中间隔有七分钟，一个六斤三两，一个五斤七两。”

我母亲常说：“生孩子时，女人的生命像窗户纸一样薄，一捅就破，说死就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死。”我在生头两个孩子时，就听到过这些话，但没有产生共鸣，因为那是两个单胎的顺产婴儿。而这次却是一对孪生儿，胎位又不正，难产。我好几次感到“疼痛得要死了”、“自己活不成了”，但还是凭借母亲的天性，自己在心里跟自己说：“要好好配合医生，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这两个小生命降临人间。让我用自己的一条命，换来两条生命吧。就算自己没命了，只要能保住这对小双胞胎，也是值得的。”意外的是，医生并没有用任何手术器械，两个孩子就相继诞生了，而且母子平安。时隔多年，至今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从心底在深深感激当时挽救了我们母子生命的医生、护士和产科主任。

产后头三个月还算顺利，只是吃不到多少有营养的东西。因为天灾、人祸，情况还没有大的好转。由于大家普遍缺肉吃，所以不少人家开始养兔子，我家也养了。产后买不到鸡，主要是吃兔肉。记得老金骑车到乡下去花高价买了一只鸡，这是我生双胞胎后所吃的第一只，也是唯一的一只鸡。不知为什么，我吃兔肉后腹泻，所以只好停食兔肉。当时就主要是吃粮食，有时还吃粗粮，各样粗粮吃得很多。奶也多，供两个孩子吃，居然还有富余。

那一年，我二十八岁，之前已经生过两胎，这次又怀了双胞胎，加上工作又忙，经济负担也过重，于是决定做绝育手术。如果在生育后立即做，顶多二十分钟，可由于在家破水感染，产后高烧不退，不得不过不了四天才做的绝育手术。这之后的三个月，我一直腹泻不止，医生说：“可能手术时，肠子暴露时间过长，着了凉。”三个月内，我一直腹痛、腹泻，日子很不好过。但这比起生产时的痛苦要好多了。特别是没有影响到“小老虎”的哺乳，这是最使我欣慰的。

但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三个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我得了乳腺炎，左侧乳房出现红肿、硬块。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而且日益严重。医生告诉我，不能再给孩子吃奶了。这之前，我的两侧乳房不知不觉有了分工：小三食左侧，小四食右侧，他们向来不肯交换吃。因为左侧乳房患上了乳腺炎，侠儿的奶就没有了。不过，侠儿比煜儿好，饿急了，他可以吃牛奶，虽然量少，但不会像煜儿用小手打掉奶瓶。

我的乳腺炎日益严重，高烧节节上升，直到 40℃。躺在床上，看一切都在动，天旋地转。老金将我送到医院，医生说需要立即开刀。在这之前，我听说过党校里有两位女同事因患乳腺炎开了刀，其中一人的一个乳房还开了两次



刀，且不再有奶。想到这里，我拒绝开刀，请医生给开些消炎药。

医生说：“太严重了，吃药已经无济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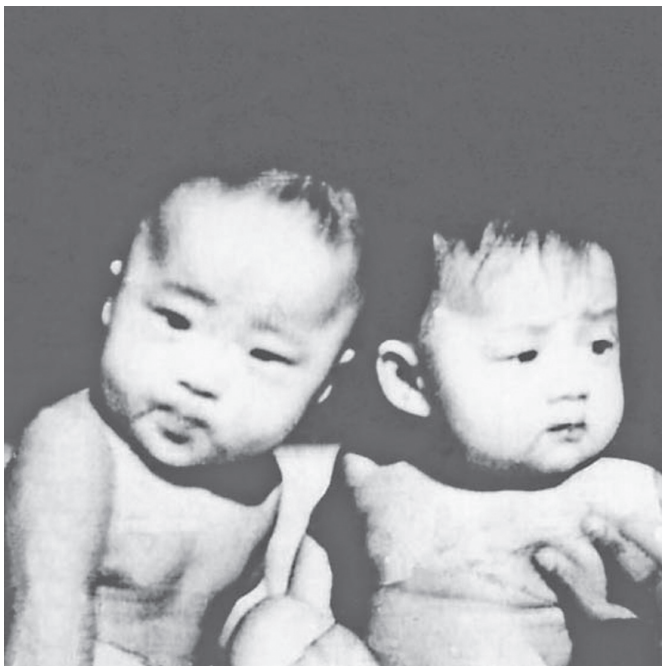
我对医生说：“我不是怕开刀，我刚做过绝育手术，以前还做过其他手术。我只是怕双胞胎没奶吃，只养活一个，多难过。”

医生说：“乳腺炎的病毒会随血液流遍全身，得了败血症，就很难治了。如果保不住你，家人该多难过。”

但我还是不让老金签字开刀，于是，医生很生气，在病历上写了两行字：“本人拒绝手术，一切后果本人自负。”还让我在这两行字下签了自己的名字。老金也奈何不得，只好搀扶着我上汽车回家了。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当晚，我们的老邻居——一位姓王的食堂管理员来看我。老金见到老熟人，忙把今天看病的情况告诉了他。这是因为老金看我不肯听医生的话开刀怕耽误病情，内心十分焦虑，像是走投无路了。

老管理员说：“她不愿意开刀有什么办法，也不能硬按着她开刀啊。试试中药和偏方吧！如果出头、流脓后，兴许能保住奶子。”于是，他让老金买来大红枣，还有红色的高级人参，另加两味中药（名字记不住了），每天晚饭后，他都亲自来我家帮忙熬药。妈妈觉得太麻烦老管理员了，就想自己接过来熬药，一进厨房见他正在往药锅里放一块像指甲般大的黑东西。妈妈便问这是什么，他说是祖传秘方。从此，他不再来我家熬药，都是在他家熬好了送过来。即便是下雨天，他也会照样打着伞送过来。



喝了药，我周身

小李生兄弟——金侠（右）和金延（左）越长越胖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发热，血好像都沸腾起来了。乳房上的硬块越来越集中。后来，炎症集中的部位越来越小，在最集中的地方出了头，脓一点一点地流了出来。没出两个月，病就好了，侠儿可以吃母乳了。他虽然能吃牛奶，但每次吃得不多，消瘦了不少，一吃到母乳，便喂住不放，吃得那么香甜。我妈妈担心孩子饮食过量，每回都是一见他小肚皮鼓起来，就立刻把他的小嘴从我的奶头上揪下来，直接抱走。很快，侠儿胖了起来。后来，这两个孩子越来越胖。

有一位同我差不多同时生小孩的女同志来问偏方的效果，我说“效果很好”，她也看了看侠儿吃奶的情形。过了一阵，她才告诉我：“王管理员说：‘我们同老金、李振霞是老邻居，深知他们的为人，其他任何人也不敢给吃这种药。’”她还说，“我当初是不得不开刀，现在奶子废了，不能再给孩子吃奶了……”

没过多久老管理员病逝了，我们全家感到异常悲痛，他给了我们母子康宁，可以说是我们母子三人的恩人，怎能不让人万分感激！

过了一段时间，见到老管理员的女儿，我问：“你父亲治乳腺炎的偏方，是否留下了，传给了哪个孩子？”

她说：“走得急，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对于子女来说，没有接过这份遗产，真可谓“抱憾终身”了。我在对王管理员这位老恩人充满了怀念的同时，也对这份秘方的失传深感遗憾——祖国有多少宝贵的遗产，不正是这样失传的吗？

生育一对小孪生弟兄，很不容易，他们多次带给自己妈妈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险情，甚至令我想着不惜舍去生命来保住这两个小宝贝。而他们所报答给我的，用古人的话讲是“虎啸风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为豪杰，奋发有为。

《北史·张定和传论》曰：“虎啸生风，龙腾云起，英贤奋发，亦各因时。”这已经是我的最大满足了。



## 孝母之心沉甸甸，挥泪传给下一代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积淀，紧扣着父母的心弦。但问题是怎样在家教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者将原有的戒律，赋予新的内涵。“孝道”流传了数千年，除去对封建帝王、封建家长的“愚忠愚孝”，在当今的家庭中，对处理与长者、老人、父母的关系，还是意义深刻、饱含智慧的古训。

为人父母，在家教中，切不可忘却将这一信念传给下一代。我们的四个子女，都是我母亲带大的。其间虽请过奶妈，在母亲有病或需要回哈尔滨处理急事时，也请过保姆，但时间都比较短暂。四个幼儿基本上都是在姥姥的精心呵护下日益成长起来的。

我母亲是一位非常勤劳、聪颖能干，虽没上过学却能够识一些字的家庭主妇。像无数东方女性一样，她温柔、善良、能吃苦、节俭、话语不多、深思沉稳。

在我生第一个女儿前，妈妈已为兄嫂带了三个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一岁，中间的四岁。繁重的家务劳动，使她在家没有停歇的时候，从不知什么是午睡。孩子的睡眠时间，正是她干活最多的时间。由于缺少必要的休息、睡眠及营养，她得了血管性的头疼病。我亲眼看到，她注意孩子们的营养，对自己的饮食却很不介意，有时急急忙忙吃几口，放下碗筷就去干活了。为了给她补充营养，我自参加工作后，每月省吃俭用，回家时将节余下来的工资，除乘火车等极必要的费用外，全部交给妈妈，请老人家吃点儿好的，或者喜欢什么就给自己买点儿。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老金了。我十九岁、他二十一岁时我们订了婚。在结婚前那几年间，我没有为自己攒下一分钱的嫁妆。每次寒暑假都要回家一次，回来后就会告诉他：“存下来的这半年的工资，我到家后全都给妈妈了。”或者说：“看来到结婚时，我是存不下钱的，也买不了什么东西，干脆从俭吧！”每回他都笑笑说：“没关系，全都由我来解决，你放心吧！”他非常理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解我，因为他知道我出生后十个月大的时候丧父，母亲自那时起便开始守寡，独力抚养我们兄妹长大，我和她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母女深情。

每次寒暑假回家，除了将钱全部掏给妈妈，我还拼命帮助她老人家干活儿。这本来可以聊以自慰了，但每当假期结束，我都会十分“上火”——不是嗓子哑就是嘴破了，总是依依不舍地告别我的母亲。有时，老金写来信，希望我假期能早点儿回去，我们能利用假期多在一起玩一玩，可是我没有一次满足他，因为我不能兼顾两边。这也是我终生对老金感到抱歉的地方。每次寒暑假一到家，我就会围着母亲转，碧波荡漾的松花江和美丽的太阳岛，也同我无缘了。家乡老同学不少，但也只是他们来我家看看我，我是很少出去与他们聚会的，因为我要陪妈妈。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当时的思绪，怎么也不愿把自己的头生女儿送给她姥姥带，再增加母亲的劳累和负担了。我同老金多次商量，总是感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因为我们是婚后来北京学习的，他在中央党校师训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周末只能临时借住在党校为我们提供的自家不能烧水煮饭的招待所。这里哪有容得下婴儿和保姆的空间？当时号称拥有万名师生的人民大学，已是拥挤不堪，哪里还有这种养育幼儿的栖身之所？最后，无可奈何，还得劳累我的老母了。

前面已谈到，孩子放在母亲身边后，我那么拼命地找奶妈，一是为孩子健康，二也是为减轻她老人家的负担。每月我们将夫妻二人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寄回去，也是想使母亲和家人不要太拮据，以便让老人减少一些烦恼和忧愁。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一毕业，我就急着回家了。考试、鉴定、毕业典礼的时间加在一起也没有多长，可是，我却感到是那么漫长。头一天举行毕业典礼，第二天就起程回家接孩子。因为是定向培养，我们在沈阳一直保留着一个“家”。在哈尔滨，碰巧嫂嫂的母亲来了，他们那里是由姥姥代替奶奶接管孩子，我的母亲这才得以脱身。我和母亲带着九个月的女儿回到了沈阳。而此时老金所在的中央党校，因为搞“反右派”斗争，不让大家按时毕业，所以他尚未回来。姥姥、小女和我这个三口之家，虽仍有些困难，但母亲显得轻松多了。虽然她的话还是不多，但脸上经常绽放微笑，一副安居乐业、心旷神怡的样子。

5 月份，因为被下放，我们母女只团聚了十一个月，我的妈妈也只轻松了



不到一年，此时她不得不满脸愁云地被哥哥接走了。妈妈又要去重复她那繁重的家务劳动，继续做四个孩子的“保姆”了，其中还包括我的长女。

当年的金秋时节，一天，主管我们“下放”干部的原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突然跑来对我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回去，主持开全校哲学课，由你做负责人。”他还说，“人事处去人民大学了解了，说你没有什么问题。”

我问：“没有问题还给处分，那个决定怎么办？”

他讲：“人大说学生支部已经解散了，决定只好放一放。”

我哭笑不得地说：“没问题竟然给处分，而且处分的决定不能改变，这算什么事呢？”心里反复想这叫什么“正义”和“公道”。但是，不必再继续劳动改造，能够回校教书，毕竟是一件好事，我还是愉快地服从了这一决定。

回来后，我又立刻把女儿接回沈阳。这次随我母亲来的不是一个，而是四个——兄嫂的三个孩子也来了。

后来，我发现母亲具有“神奇”的本领——她竟然能把四个孩子带得不哭不闹，高高兴兴，活泼可爱。而且，她还让孩子从当时仅有的媒介工具——“收音机”中学了许多歌谣、童话故事，她还把家里收拾得整齐干净、井井有条。有时，我下班时，她已经把饭都做好了。这要付出多少艰辛和劳动啊！我经常告诉妈妈：“卫生搞马虎点儿，差不多就

行了，活儿留给我回来干，等我回来一起做饭……”可她总是笑笑，也不说什么，还是默默地按她自己的计划行事。她常说：“和孩子们在一起，累也愉快！”

那时好像也没有什么避孕的概念，9月份，我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不让妈妈过于操劳，生完孩子的第十天我就开始洗尿布。热水不方便，只好用冷水。这个时候看得出妈妈十分疲惫，特别是冬天几个孩子同时得肺炎时，刚强的妈妈落了泪，我也流泪了。我和老金的工资月月花光，连兄嫂寄来的那些钱，也花得分文不剩，实在没有钱请保姆了。当时保姆月工资只要三四十元，可每月我们连三四元的剩余都没有。我心疼母亲，又没有办法为她解脱，就利用上班之外的时间，极力帮助妈妈干活。直到给排着队的五个小宝宝洗完澡，我才去备课，夜里两点以前从没上过床，长此以往，养成了夜里入睡难的习惯。

后来，嫂嫂得了肾炎，要接我妈妈回去，于是我妈妈又带着四个孩子回哈尔滨了。她走后，我们只留下一个煜儿，三口之家，开销相对减少，有点儿余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力，于是我们请了一位保姆。没过多久，女儿到了三岁可以上幼儿园了，我立刻去哈尔滨把她接回来送进幼儿园。这时，妈妈的身边从五个小孩变为三个，兄嫂的孩子也渐渐大了起来，令妈妈轻松许多。可是，因为当时人们吃不饱，妈妈在哥哥家患上了黄疸性肝炎。知道这个消息后，我边哭边怨恨苍天，妈妈刚刚解脱一点点，怎么又如此来折磨她！

后来，我和老金因工作需要被正式调至北京，妈妈在康复后也很想来京，我们便把老人接到北京。为使她老人家更好地休息和疗养，我们将一岁半的焜儿送进幼儿园整托。

妈妈经过两年时间的康复，精神和身体都好多了，这时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两个小生命的诞生。这对孪生兄弟的到来，似乎为她增加了无穷的欢乐。

母亲在带两个孪生兄弟的过程中得了阑尾炎。我们去请保姆，谁都不肯来，说两个孩子一起带，易摔、易碰，责任重大。无奈只好请一人带老四，而将老三送至大有庄一位阿姨家委托人家带。后来妈妈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坚持把老三接回家。这时，我和老金各提一级工资，家中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充满了幸福、和睦与安康。

然而没过多久，麻烦事又来了。全国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教研室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组织上决定让你去通县‘四清’。”我一听，心中一惊，脱口而出道：“我的孩子还很小啊，才一岁半，又是双胞胎。”

“还有老金在家嘛！”

“你别忘了，他是男同志。”

“你快做准备吧，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了。”

“我要去找校领导谈。”

“找谁也没用。这是校长夫人、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在全校选的。副主任是女的，去当队长，需要一个既管生活又管书写的女秘书。”

于是，我只好克服种种困难，尽可能地安排好四个孩子，并嘱咐好老金，又一次挥泪向母亲告别：“实在对不起妈妈，又得让你老人家加倍劳累了。”

在我去参加工作的半年时间里，首先是我的爱女金莹得了黄疸性肝炎。工作队给了我三天假回家探望。当我赶到日坛医院的传染病区看望女儿时，按照医院的规定，只能互相隔着玻璃门说上几句话。而我带去的東西，就由护士转交。看到爱女面黄肌瘦的样子，我心里难过极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当我





走下楼梯、来到庭院里时，从三楼的窗口传出了女儿的声音：

“妈妈，我没事，你放心去工作吧，让姥姥带好弟弟。”

我抬头看着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泪更是扑簌簌地落下，半天才喊出一句：“要按时吃药，注意休息，听医生的话。”

她只有八岁啊！我当时心都要碎了，爱女命运未卜，与患病的她朝夕相处的三个小同胞手足，又将怎样？我真是不敢再想了。而当时死死地禁锢着我头脑的“纪律”，使我虽然深深感到母亲和老金的难处，最终还是带着揪心的忧愁归队了。

爱女病愈回家时，全家欢乐，经检查，她的三个小兄弟肝部无恙。可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一封老金的来信，让我整夜哭泣不止。信上说：“小四得了败血症住院了。”信是晚上传到我手的，当时回北京只有一趟9路汽车，已经停开。夜里，与我同屋的女队长见我不住地哭泣，对我说：“你明天回去看看吧！”

第二天，我赶到了医院，也是隔着玻璃看望。医生对我说：“他每晚都哭闹找家人，不睡觉，只好给他吃安眠药。”小四在我走时刚学会叫“妈妈”，此刻可能是安眠药的作用，竟然什么也不会说了，只是伸开两只小手让我抱，可是隔着玻璃我也抱不到他啊。于是，他在里面哭，我在外面哭，我们都哭出了声。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母亲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后来，我又从通县南关镇回来看过他几次，同样只能看着他，根本摸不到、抱不着自己的儿子，每次都是在失声痛哭中回到通县。

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使我的母亲更劳累更受苦，使我的孩子们深受病痛的折磨。我也非常恨自己，当时怎么那么没有骨气，如果硬不去又能怎么样？我这一走为这个幸福的家带来了多少苦楚！我总觉得对不起妈妈，一种负重的、沉甸甸的“孝敬之心”，使我在母亲故去后，时常向孩子们念叨姥姥带他们时的苦楚、劳累和心酸。特别是他们还在国内时，清明节一起去扫墓，抑制不住对母亲的怀念以及心中的歉疚，种种思绪一起迸发，我往往会在母亲的墓前向孩子们哭诉，要他们记住姥姥的恩情，挥泪把对母亲那深切的爱与中国的传统美德——“孝道”一起传递给孩子。孩子们现在以同样的真挚的“孝道”对待我们。可能这就是“一辈传一辈”吧！

孩子们出国后，时常会邀请我们到国外探亲，一切费用由他们支付；有时他们会轮流回国探望我们；2007年，金煜作为雪佛龙石油公司驻北京地球科学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家商务代表归国后，常常借圣诞节等假日去美国和姐弟团聚，并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儿子，之后，又代表几姐弟匆匆飞来三亚陪父母欢度春节，给我们带回来居住在国外的孩子们的问候与爱意。这一切，都让我们共享了亲情的极大温暖与快乐。

## 匍匐冲锋的小战士

我很喜欢鲁迅在《热风》中所说的话：“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和我的先生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会读书，又不成为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为此，我们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密切关注孩子的乐趣，因势利导。

我们一直希望：在男孩子的身上，有一种阳刚之气，一种浩然之气，一种凛烈之气，一种“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之气。

然而，这种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培养出来的，而是需要父母自幼培育，像给小苗浇水一样地精心扶植与浇灌。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四清”时，有一次从通县回家，一位称我为“大师姐”的中国人民大学老同学同我一起回北京出差。他说：“正好到你家看看小孪生兄弟。”我这位师弟很喜欢小孩。

我们到家后，已经是晚上9点了，小孪生兄弟洗得白白净净，换了干净衣服，正准备睡觉呢。姥姥看到叔叔很喜欢他们，就提议让兄弟俩为叔叔表演，最后还让他二人做匍匐动作，表演达到高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当时，金侠和金延的年龄都还很小，不大愿意和大人对话，但很听话。站在他们身边的是大他们三岁的小哥哥金煜，是管发号施令的。一声“卧倒”，两个小弟弟二话没说，听命而行，立刻卧倒。小哥哥又一声命令“匍匐前进”，他俩立刻扑地，一手侧卧在前，一手在后，向前进，很逼真。因为小哥哥没有喊停止命令，两人就一直匍匐向前，直到钻进用两张单人床合搭起的大木床下的角落里。这时



小哥哥下了回转令：“转回匍匐前进。”二人从床下钻出，继续维持原来的姿势前进。从床下钻出，不仅身上是土，小脸在床下急转时，可能碰到墙了，还沾有少许白灰。因为哥哥没有下“停止”的命令，他们俩还是严肃认真地像前面真有敌人一样地匍匐着前进。直到哥哥下令“停止，起立！”，这两个小李生兄弟才站起身来。大人看着三个孩子的表演，都笑得前仰后合，俨然看到了一位军官和两个小战士。



匍匐冲锋的两个小战士：金侠（左）、金延（右）

“这三个人的口令和动作怎么都这样像？”师弟问。

姥姥说：“这几个小兄弟天天都去看解放军在操场上练兵。他们还会很多动作，都是从警卫连的军官和战士那里学来的。每天他们在外边摸爬滚打，回来总是像泥猴似的。”

我想到妈妈和阿姨为他们每天洗衣服、洗澡够辛苦的了，就说：“看来这一阵子匍匐前进，衣服又得洗了，我今天回来了，就让我来洗吧。”

三个儿子每天满身泥土回家。那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每晚都由妈妈照看孩子，阿姨洗衣服。我从工作地回来后，阿姨正好因为家里晚上有事就只能白天来了。我考虑到妈妈和阿姨每天照看孩子很辛苦，于是晚上给孩子洗衣、洗澡的任务，我就自动承担起来。完成了这些任务后，才坐下来备课，一直到深夜。虽然很辛苦，但心里仍有数不尽的欢乐。

为了让衣服好洗些，或少洗些衣服，而让孩子少一些匍匐和滚打，这样的母亲是有的，可是，我们从没有向孩子提出过这种要求。可能是因为我酷爱鲁迅著作，在孩子们还很幼小时，每当抱起一个儿子，我都不禁会想：我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一个个好男儿，一个个全身正气的男子汉。当时，我脑子里的“男子汉”形象，就是：有鲁迅那种“硬骨头精神”；遇事不惊恐，不慌张，临危不惧；不懂得什么叫“低头”、“弯腰”、“屈膝”；在困难、在任何艰难险阻面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前，都能够挺直身子走过去。

中央党校的警卫连，天天训练摸爬滚打等。每当训练或表演时，孩子们能够在不远地方看，跟着学，回去练。我有时看到了，就对我先生说：“这是孩子多好的课堂、多好的学习机会啊！咱们每天要上班，职业又不同，教不了他们这些，警卫战士和军官是他们的好老师。这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意志的磨砺。”我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告诉妈妈和阿姨：“多带他们去看警卫战士练操，让他们学着练习。衣服脏了，我来洗。”我们从不会因为孩子的衣服脏了而抱怨他们，衣服脏了我就心甘情愿去洗，坏了就默默地缝补好，一心想让男孩子们自幼培养起男子气概。

到了“五七干校”，他们的天地更广阔了。哥哥带着弟弟和一帮男孩子爬树、打鸟、摸鱼……一天下来，身上的泥土更多了。我们照样允许他们这样做。室内没有管道，不能洗衣服，不论冬夏我都抱着一大盆衣服去外面的水管龙头旁洗。冬天手冻得僵痛，我也从不向孩子和老金诉苦。老金在干校迟迟不给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夜里不断地写自我检查，一次又一次不能过关。每天掏大粪，一个书生，掏了一天大粪，劳累一天，回到家中能够帮助做饭，已经很不简单。我母亲和阿姨在我们去“五七干校”时陆续走了。我默默忍受着劳累的艰辛和“接受改造”的委屈，期盼孩子长大了不再经受这一切。当时我就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被整得弯腰低头，裹着小脚，难以走路，绝不能让孩子再像我们一样了。

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到后来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长子金煜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前，初到美国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因发给的生活费较少，不得不每晚外出打工，曾遇到坏人抢劫，他都无畏地予以自卫还击，并安然脱险。1995年，我们去美国探亲，他深情地对我们说：“我在国外，爸爸妈妈不必惦记，你们教给我们的男子汉气概和做人原则，足够我们用来对付各种困难了。”听了这话，我十分感动，心想作为父母，我们终于无愧于孩子们了。

其实，仔细一想，这并不是我们个人的操守问题，而是我们依据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格教育了子女。这种性格不论孩子在国内还是在外国，永远是他们的内在气质，是无价之宝。关于这种阳刚气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曾说过：“鬼神泣壮烈。……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我认为，男孩的阳刚之气，



一定要自幼培养。我们的三个儿子没有辜负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一个个都成长为充满阳刚之气的好男儿了。这种“男子汉”的凛烈浩然之气，不能不说是他们每个人成才以及事业成功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气质。

这种气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我国人民最为珍贵的内涵。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也常背给孩子们听，并教他们背诵，虽然孩子们当时年龄还小，可能懂得有限，但却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根据我们的经验，父母不在这方面花心思是不行的。对待孩子们平时不妥当的举止言谈，要特别留意，在心底自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但千万不要急于表态和妄加批评，而要找出症结所在，对症下药，耐心引导。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孩子尚且幼小，还不懂自己“善养”，这就需要有大人的耐心帮助与培育。

## 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父母对孩子自幼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节约”、“省钱”的问题，而且是培养他们的一种终身受用的精神。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对享乐“趋之若鹜”，那么他长大后在事业上、生活上也就很难做到艰苦奋斗，奋发向上。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父母首先要做到节俭。“一个邪恶的父亲只能造就堕落的儿女；一个腐败的社会所能提供的榜样只适于腐化心灵和精神。”这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霍尔巴赫的名言（霍尔巴赫：《社会体系》，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45页）。现代日本教育家井深大也指出：“‘孩子是反映母亲形象的一面镜子。’从孩子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父母的人品如何。”（《怎样教育婴幼儿》，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为人父母的整天想的只是怎样让孩子吃饱、穿暖，为此花费了许多心思。当时，在那种“今天最革命，明天反革命；今天台上坐，明日阶下囚；今天造别人反，明天被别人造反”、黑黑红红变幻莫测的岁月里，人们如履薄冰，惶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惶不可终日。今天谁也不知道明天的自己将会是什么样子。既没有心思，也没有权利展望未来、设计自己的人生。

然而，人毕竟是人，都有着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头脑和血液中不可能只有一些生硬的语录和“最高指示”，总是免不了会偷偷地想一想自己和全家人的命运。当时我们的工资取消了，只有靠我们两个人的双手，养活四个在泥土里跌打滚爬的小宝宝。虽然我们长着的是双一直写字的手，但是种地得来的粮食，总可以糊口。然而，没有工资，买不了东西，孩子穿什么呢？这是我每当想到未来生活时，总会遇到的一个十分苦恼的问题。

在较长时间的苦闷中，我下了决心，要自己做衣服。可这恰恰是我的短项。因为我的母亲有一手好针线活，我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衣着操过心。她老人家也不肯向我这个唯一的女儿传艺，理由就是“学会针线以后要受累的，长大多挣些工资买着穿吧”。此刻迫于生活，我只好下决心从头学起，学着纳鞋底、做棉猴儿和单衣等。衣服做好后，正值寒冬。我把棉猴儿絮得很厚实，棉鞋则是用我的旧呢子大衣裁下来的下摆做鞋面，再加上棉花。给孩子穿起来一看，上下圆圆的，但却十分暖和。两个小孪生兄弟早晨穿得暖暖和和，高高兴兴地上了幼儿园。

但是回来后，小三金侠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早晨阿姨问他：“你们的棉猴儿和棉鞋是谁做的？”他说：“是妈妈做的。”阿姨说：“真难看！”听了这话，我的心凉了半截，倒不是由于阿姨的评论，因为我刚刚学做针线活，深知自己做得不好，只是生怕影响孩子的情绪。看着外面飘着大雪，寒气逼人，我想：如果孩子不肯再穿，明天可穿什么呢？心中不禁有些焦虑。

我问侠儿：“那你明天还穿着它们上幼儿园吗？”

侠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儿子小四在旁边一直听着，此时也急忙跟着说：“妈妈做的，谁说难看我也穿！”

从表面上看，小四金延好似在重复小哥哥的话，实际上，他是用相同的语言，表达了共同的决心。看得出他说的是那样认真，同小哥哥一样诚恳。当时他们只有四岁，却能够这样理解妈妈的心情，我真是感动极了。我当即一手搂住一个亲了又亲。我为全家设想的将来谋生的试验，得到了两个孩子的配合，怎能不让我动情？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经常给孩子缝补衣服、做衣



服穿，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们养成了不讲究穿着，不同别人比穿戴，专比学习的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 当病魔与孩子纠缠的时候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有父母在孩子生病的时候，不会感到痛苦、焦虑，甚至寝食难安？实际上，孩子身体所受的病痛折磨，同父母心灵上所受的痛苦折磨，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后者常常更甚。问题是怎样正确对待孩子的疾病。

我家孩子的爸爸是比较理智的。在他的影响下，我在通常情况下也比较理智。我们一方面为孩子积极治疗，细心观察孩子的病变情况，悉心护理；另一方面又极力约束自己，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惶恐不安，因为这样会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在那个与疾病斗争的时刻，孩子需要的是战胜疾病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力。而能够给予他们这一切的，没有人会取代深深地爱着他们而又被他们所完全信赖的父母。

孩子一旦康复，我们虽仍细心照料，但却尽量不让孩子觉察。这样，才能使他感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如此做的好处：一是使他们的幼小心灵在学习上，能够具有同别的孩子一样的竞争勇气与积极进取的信心；二是不依赖父母，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永远需要父母照顾的病孩子，这对于他们长大后独立闯荡事业，具有很大的有利的影响。

我们的长女金萤得过黄疸性肝炎，小儿子金延得过败血症，病得很严重，而我们都是按照上述的方式进行护理与关爱的。

这里特别谈一谈我家老三金侠。

他幼年时心脏有毛病，现在是完全好了。可当时看了许多医生，都说他患有慢性心脏病。

女儿、小四患病，以及小三得病，我都非常难过，夜里哭泣是经常的事情。因为我毕竟是个女人，不是圣人，作为女人的弱点我都具有。但是我从不让孩子觉察到我爱哭的弱点，绝不当着孩子的面哭泣。我向来入睡较晚，有时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备完课就坐在熟睡的孩子身边，一个个地看着孩子，而当视线一落到侠儿的脸上，我常常会扑簌簌地流下眼泪。这是因为，女儿和小四得的都是急性病，治好了就能让人放心了。可是心脏病却是慢性病，总怕拖下去会后患无穷。

后来，我背着孩子，想方设法地求医问药。直到后来，我从地处河南省西华县的“五七干校”，被临时抽调回北京参与编写六本经典

著作辅导读物。趁此机会，经人介绍，我找到了阜外医院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胡旭东。在说明了情况之后，胡医生提出要当面看到病人。我赶紧又托人把孩子从河南带来北京进行诊治。此后多年，我们就是一直按照这位名医的医嘱，治疗和护理着侠儿的疾病。

后来，孩子进行了心脏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心脏完全正常了，考大学时也顺利通过了体检。其后他在上大学期间还成为校篮球队队员，至今还经常进行打球、游泳、滑雪等体育运动，身体一直很好。这都是后话。在当时，为了不使孩子有任何心理负担，我虽然已在北京找好了给侠儿看病的医生，却还是让他和孪生弟弟一起进京，只说是来玩玩。

在带着他俩玩了几天之后，我就说要给两个孩子一起检查身体。所以，整个过程中，金侠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紧张。而真正感到紧张的却是我这个妈妈，但表面上我还是极力控制住自己，表现得泰然自若。因为两个孩子都聪颖、机敏，他们很容易看出情况不对。我平时总是教育孩子要诚实，但在当时我却需要深深地掩藏住内心的苦痛和忧虑，面对孩子需要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需要时时对他们呈现笑容。演这种戏让我感到十分痛苦，也很艰难，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长期精神上的负担，我又不能不这样做。



小四金延（左）和幼时心脏有杂音的小三金侠（右）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那种为了让孩子老实、听话地静养，而在孩子面前刻意夸大孩子病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的。当年对孩子疾病的检查和治疗详情，以及我们的种种安排，至今我们也没有向孩子们倾诉过。记得那时小三刚刚六岁，如果当时我们不是这样做，而是经常在孩子面前哭哭啼啼，势必给孩子造成“自己患有严重的慢性病”的心理负担，那么很可能就没有今天这样勇气十足、睿智灵活的金侠了。他的气质很不一般，因他性格内向，做任何事都是沉稳、缜密、机智，却又信心十足。记得在高考的第一天，他发烧到38.9℃，在打了退烧针后，他仍然满怀信心地去参加考试了。

从考场回来后，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我在即将进门时，在门口停了一下，往里面望了望，心想：我若是考不上，你们都考不上。”

我说：“这岂不是太骄傲了吗？”

他笑笑说：“不，我这是在给自己打气。别人头脑清醒，我刚发过烧，头还晕，得有点儿精神啊！”

他就是这样带病却充满信心地通过了高考，并取得优异成绩，考上了八年制的协和医科大学。当年，协和医大只招收三十名学生，而且是面向全国，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作为一个中学生，许多人不敢报考协和医大，而他不顾父母担心他考不上的顾虑，勇敢地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大学，而且一考即中，一直读到毕业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出国继续学习，在剑桥大学医学院继续攻读并荣获博士学位。后来，他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跨大西洋，到美国同他的专业对口的世界上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去开始了博士后的训练，做了一名研究员。现在，他已成为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副教授。

## 幼儿演出后的不安与哭泣

怎样对待孩子的自尊心？这是值得每位父母深思的。自尊心是要求受到合理的、正当尊重的情感，是激发孩子积极向上的内驱力。满足孩子这种精神上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的需求，他会产生欢乐的情绪，能够正确接受和对待教育。不随意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而是小心翼翼地培养，像园丁栽培心爱的花木一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一种艺术。

记得一次中央党校全校性的节日晚会，好像是一次“红五月”联欢会。各教研室、行政单位以及小学和幼儿园，都上演节目。金侠和金延所在的幼儿园中班，演的是很多孩子参加的大合唱。金侠和另外一个女孩站在队前的麦克风边领唱和领读。现在身高一米八四的金延，自幼就是班上的大个子，站在排得整整齐齐的合唱队的最后一排。金侠和小女孩有声有色的清晰领读和高声领唱，以及孩子们的合唱队发出的悦耳清脆的童音，显得十分协调、动听。这凝结着老师们的心血和孩子们的全身心投入训练的成果，精彩的演出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而金侠的一个动作显得那么惹眼：他在完成领读和领唱时，常常会把两只小手合在一起，放到腹部下方，轻轻地动一动。我们教研室那些熟悉金侠的阿姨和叔叔为此笑得前仰后合，不住地叫我：“快看你儿子的那个小绅士风度。”

但是，作为一个熟悉孩子的母亲，常常会看到自己孩子身上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金侠的这个动作不止一次地出现，自然也就不止一次地获得了叔叔阿姨们“聪明、伶俐、大胆的小绅士”的赞誉。可我却发现了问题，并深深地感到内疚。原来，演出前在家里换衣服时，金侠曾说过“罩裤的松紧带松了”，我们忙着给金延换衣服，却把金侠会遇到这种情况的事给忘了，不得不让孩子在舞台上采取这种应变措施。虽然这证明孩子非常机敏，却也说明了妈妈粗心，没有尽到责任。

按照事先的约定，孩子们演出后，要到后台去等家长来接。因为演出十分成功，掌声阵阵，我本以为去接时他们会高兴得欢蹦乱跳。可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的情景却是：他们一个在哭，一个站在旁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赶紧问：“怎么了？”

金延说：“爸爸批评我了。”

金侠说：“我差一点儿掉裤子。”

我忙对金侠说：“那是妈妈的责任，妈妈忘记给你系紧罩裤的松紧带了。你觉得自己演得怎么样？”

金侠说：“不知道。”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我诚挚地赞美道：“演得很好。领读得清清楚楚，一字不错；唱得清脆好听。”金侠的自尊心一向很强，此次演出前就一再问我：“妈妈，我能不能演不好？”听到我这样一说，他终于笑了。

与此同时，孩子的爸爸也正在后台和一些年轻人说着话。等他转过身来时，我问他：“为什么批评小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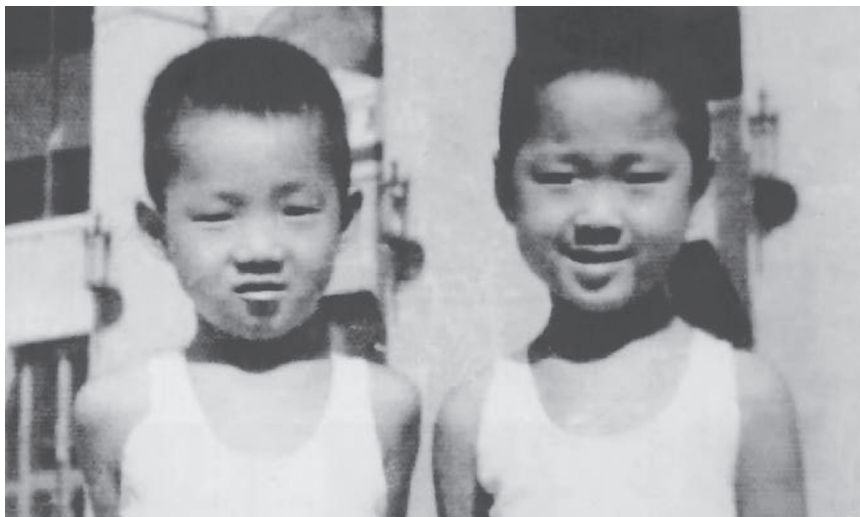
他说：“演出得很好，我们到后台慰问一下。可小四还没等演完，一转头看见了我，就叫着爸爸往台下跑。”

我没有抱怨爸爸批评孩子扫兴、煞风景，而是对金延说：“爸爸批评得对。他是校团委书记，上后台来慰问大家。你们合唱队还没有演完，怎么一个人就往下面跑？我坐得远没有看到，看到了也得批评你。”

爸爸也对他说：“我也不是批评你演得不好，你哭什么？”

我也忙说：“你演得也很好。合唱队唱得很齐，没有人出错，说明你也唱对了，一点儿也没有走调。”金延最爱听这种话。因为他平时唱歌常走调，哥哥姐姐一说他唱得不对，他就会不好意思。这次上台前，他也曾问过我：“妈妈，我会不会唱走调？”我说：“肯定不会走调的，老师已经带你们练了好些天哪。”

当时我想，几个孩子的自尊心都很强，他们做得好就应该多鼓励，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于是乎，我一再鼓励他们，那个晚上真是走一路夸一路。等回到家时，孩子都显得十分高兴和快活了。



这张照片，很像当时小李生“破涕为笑”的样子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这件事虽然不大，可说是一桩小事，但给我的印象却十分深刻。这包含着一个对待孩子们比较适用的普遍道理。须知，孩子们都在成长中，正在追求上进，所以好的表现总是多数的。家长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会伤孩子的心，因此家长们要多多鼓励、夸奖、赞美和表扬孩子。当然，鼓励也要掌握适当的方式和分寸，不能将错的说成对的，该批评时不能以鼓励来代替。而这可能就是我和老金时常采取的“恩威并重”的教育方式吧！

## 不把孩子庇护在父母羽翼下

勇敢精神特别是大智大勇，是孩子克服一切困难、通向成功之路的盾牌。做父母的一定要随时随地培养孩子的这种精神，不要总想着把自己变成一块盾牌，去保护孩子在家或学校里免遭不测。那是把孩子变成懦夫、胆小鬼，甚至奴才之路。

“文革”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破坏了人们平静的生活，这场大灾难大破坏的强烈冲击，波及了每个家庭，波幅之大很少有幸免者。我们的四个孩子，也没有幸免。怎样让孩子在不平静中求得平静，使他们的幼小心灵在强烈的冲击下不受更大的损伤，仍然能够勇敢地站立和顽强地生活，这是我们头脑中经常萦绕的问题。讲抽象的道理孩子们很难理解，也难以付诸行动。所以，我们就注意抓住具体的事情，帮助孩子们逐步培养起优秀的品质。

我家孩子的爸爸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作为中央党校的第一批揪斗对象被揪出来，在一段时间里，接连挨批斗、写检查。又过了几个月，我们组里又专门给我召开了所谓“反康生反动组织”的交代会，使我也处于被批判的逆境中。

一天晚上将近 11 点了，我和老金从各自的单位出来，在校园内不期而遇。两人会合到一起，默默地走着。到家打开门锁，一进屋就看见长女和长子躲在桌子下面，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两个孪生兄弟则趴在大床的下面，看到我们进来了，这才爬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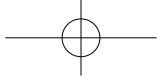
我们抱起两个小孪生兄弟时，他们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们的姐姐和哥哥从桌子下面钻出来，告诉我们，整整一晚，外面的孩子一直在往窗子上甩泥巴，边甩边叫着“打黑帮崽子”。

听到这个情况，尽管我们的心里很难过，也很担心，但却掩藏起这种情绪，而是告诉孩子们不要怕，要有胆量，勇敢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只是抽象地这样说，是不能解决孩子们的根本问题的。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们：“你们看，窗户上只是些泥巴，没有谁敢扔砖头的。扔砖头打碎玻璃、破坏公物，就会有人去抓他们。不扔砖头，玻璃碎不了，谁都进不来，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们的，不要害怕。”



可爱的四姐弟：金萤（后中）、金煜（后右）、金侠（前右）、金延（前左）

尽管当时全国一片混乱，破门、破窗而入的情形屡有发生，我们也非常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不能跟孩子们说这些，否则带给他们的只能是惊恐和胆怯。由于我们经常说的是如何勇敢地应对困境与危险，孩子在后来又遇到此类情况时，就显得从容多了。



## 拾取爆竹尾巴的小长兄

“温馨、和睦、幸福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不仅疼爱自己的父母，还疼爱自己的姐妹和弟兄。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笼罩着全家；一把永不生锈的‘爱’的金锁，把全家不分天南地北地永远锁在一起。所以，一个幸福家庭，首先是充满着爱。”这是我经过对我的家、身边的同事朋友的家，以及异地他乡远隔千里的亲朋好友的家的长期观察，所得出的结论。

但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的建立，以及使孩子具备爱的素质，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要经受现实中数不清的酸甜苦辣的洗礼和锤炼。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父母在参与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不好心情，一定不要带回家迁怒于孩子或借题发挥以泄愤。不论自己在外遇到多少不幸，都要多想想孩子，尽力理解孩子。“敦聘诸君多看看孩子的现状，听听孩子的声音，想想孩子的将来，要一切想着孩子，一切为着孩子。”因而，身为父母者在最艰难

的处境中，也不能忘记，要用爱来建设自己家庭的幸福氛围。这种爱，就像太阳的光和热都聚集在玫瑰花般的孩子身上，帮助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并将成为自己的孩子爱他人、爱朋友、爱社会的美好道德的基石。

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夜晚，天上的月亮很圆、很亮，可是我的心底却暗淡无光。因为我接到造反派组长的通知今晚开会，议题就是要我



金延（右）不高兴了，小哥哥金煜（左）忙来哄他





揭发我深深爱着的丈夫，我告诉我的爱人：“今天要参加一个特别‘晚会’了。”他已经知道此次会议的议题，当然心领神会。

一散会，我赶紧下了楼，正见我的先生在月光下徘徊，那早已熟悉的身影、那被“文革”运动整得有些驼背的身姿，让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每次晚上开会，不用事先约定，他都会来接我。我们一起默默地走回家。

当我们在离家不远处时，只见从我家住的门洞里蹿出一个小小的人影，蹲在地下，好像用手从地上拾起了什么，很快又钻进门洞里。我们打开锁着的家门，进了屋，看到其他孩子都睡了，只有七岁的小金煜，正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地上，高兴地数着刚刚拾来的、别人已燃放过的爆竹尾巴。

当时，因为心情不好，我们根本没有心思欢度节日，所以连一根爆竹或一挂小鞭都没给孩子买。而金煜又特别喜欢两个孪生小弟弟，平时，有一个不高兴或哭泣，他都哄来哄去。这次因为生怕他们看到别人放鞭炮而不快乐，他居然可怜兮兮地在寒冷的黑夜中出去拾取爆竹尾巴，不就是为了给弟弟们带来欢乐吗？

可是，心情极度糟糕的我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呢？我对孩子的爸爸说：“刚才在外面看到的原来是他啊。”爸爸问他：“你拾这些干什么？”沉浸在喜悦中的金煜根本没有看出父母脸色有什么不妥，还笑呵呵地回答：“明晚带小弟弟们去放鞭炮。这些一点着，还都能响，弟弟可爱听了！”接下来，却是父母的一顿呵斥——“快上床睡觉去！”我说。

“这么冷的天，穿着背心裤衩往外跑，回来还坐在水泥地上，你不想活了？”爸爸说。

“冻病了怎么办？只想着自己玩。”我看到小姐弟们都已入睡，又补了这么一句。

金煜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急忙钻进被窝里，合上了眼睛。我坐在他身边想：“我们的话说得都很重，尤其我最后那一句‘只想着自己玩’，显然是委屈了孩子。他不是‘只想着自己玩’，而是想带好小弟弟，给他们放放鞭炮，好让他们开心。我们自己的心情再不好、家里的钱再紧张，也应该在节日里给孩子买点儿鞭炮，哪怕是只买几挂小鞭也好，何必搞得孩子这样可怜，半夜去拾取爆竹尾巴，还挨训斥。”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开会时，听到那么多关于我和丈夫的“不实之词”，我都没有一滴眼泪。可这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件小事却不知为何引起了我心里深处的酸痛。也许，这是由于对孩子进行了无理指责后所产生的一种愧疚之感吧。从那时起，我就总是想弥补这种愧疚。

不久，中央党校的干部全都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了。学校规定：不许带孩子。大家的孩子只能留在北京请保姆照看，或者送到亲友家，托别人照顾。此时，我哥哥也从哈尔滨市被下放到黑龙江省通河县了，我的母亲随同前往，于是，我们就把四个孩子送到了那里。后来由于备战，黑龙江省变成“反修”前线要疏散群众，我只好又去通河县把孩子们接到河南。

去黑龙江接孩子之前，我从河南买了不少爆竹。“爆竹之乡”的鞭炮做得特别好，放起来五彩缤纷，又有各种美妙造型，腾空绽放。虽然按规定火车上是不允许携带这些的，但我还是蒙混着带上了。那几天，哥哥的三个孩子和我的四个孩子，每晚去结了冰的松花江面上燃放鞭炮，回来后都高高兴兴的，年纪最小的孩子还蹦蹦跳跳地告诉我：“鞭炮好看极了，有大船、有火箭、有降落伞、有……”他们的欢快让我感觉到无限温暖，平复了我内心的愧疚。

写到此，我联想到鲁迅在《风筝》中记述的故事：他不让弟弟放风筝，还用脚踏破了弟弟亲手糊起来的风筝。后来，他感觉自己对不起弟弟，颇为惭愧。但弟兄俩一起长大了，没有办法再补偿。每当想起踏破风筝一事，他的心里总是感到难过，不是滋味。我的心情很像当年的鲁迅一样。幸亏时间还是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了过失，平复了不安，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当年，金煜这个小哥哥为了维护两个孪生弟弟，有时候在外面挨小朋友打，回家后又受到父母对他打架的斥责。而当我们得知实情后，那种对不起长子的内疚心情，也会久久不能平静。幸好长子金煜为人忠厚、善良、大度，对父母充满理解，爱得深，对小时候的事从不介意，一直对我们非常好。

我们的长子金煜对两个小孪生弟弟也爱得很深。只比他们大三岁的他，从没有打骂过弟弟，更没有申斥过弟弟。从小到大都是他带着弟弟玩，哄着弟弟玩，长大又一起学习，至今还像当初那样，深切地爱护着两个弟弟。

我们夫妇在家经常鼓励孩子们相亲相爱。不论是弟兄之间，还是姐弟之间，每当发现他们之间互助、互爱时，无论事情大小，都予以表扬。同时，我们也鼓励在外面大孩子做小孩子的“保护神”。因而在“文革”期间，孪生兄弟少挨了很多打，而孩子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我们告诉孩子们：“在外面不要



忍受欺侮，该反抗就反抗，有事我们顶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告诫孩子们不许无端出去惹祸，更不要欺侮别人。孩子们虽然年纪小，但都懂得爸爸妈妈深深地爱着他们，也非常明白“有事父母顶着”是什么意思。他们从不在外面惹事，对人很有礼貌，而对于那些故意打人的孩子也知道如何回避、保护自己。

一把爱的“金锁”在那种极为困难的时期，把全家的心紧紧地锁在一起，而这还是一把永不生锈的“锁”！

## 先礼后兵，该出手时就出手

教育孩子分清是与非、对与错、优与劣，是家教中的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课题。对于这个课题，任何有责任心的父母都不会回避，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好。

依据我的体会，关键是把握周围所发生的具体事情，从具体的人和物入手，把道理讲清楚，使孩子慢慢学会认识清晰、处理得当。而要做到这一步，前提就是要教育孩子有敢于分清是与非、对与错、优与劣的勇气。父母不能让孩子怕这怕那，养成一种逆来顺受的奴隶性格，而是要懂得做人的尊严，要以一副豁达大度的气概去对待矛盾。而且，首先必须教育孩子要懂得讲道理、讲和谐。

我们平时经常向孩子们进行“齐鲁英豪”的性格教育。在他们刚刚能看电影和小说的时候，虽然字还认不太全，我们就引导他们看《铁道游击队》、《红日》、《沂蒙颂》，还有《水浒传》等影片及文学作品，而这些都是描写和歌颂齐鲁英豪的。

他们的爸爸还常常向孩子们讲述家史：他那世代生活在山东的祖辈，因灾荒背井离乡，到北大荒寻找生路。靠着两个肩膀和一条扁担，一路打工，后做店员，又给人家做管理山林的“经理”，这才挣扎着活了下来。苦干苦拼，经济上有了点儿积蓄，成了亲，又有了自己的七个后代。接着就是克勤克俭地供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一个个孩子念书。令人欣慰的是七个第二代皆已成才，“齐鲁英豪”的性格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闪耀着金光。

我们让孩子记住祖辈的过去，教他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退缩、不怯懦，不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要精神硬朗，永远做个“齐鲁英豪”。

也许正是这样的教育，给孩子小小的心灵打上了烙印。当年，金侠就在一个小本子的扉页上抄录了鲁迅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这种勇气，在“文革”期间，是难能可贵的。当时，许多父母自身难保，孩子真需要有一种“自我前进，什么也不怕”的胸怀。我校有的孩子，因为承受不了“黑帮崽子”的叫骂声，令人痛心地去寻了短见；有的女孩还患上了精神疾病。而作为“黑团委书记”、“三反分子”、“反革命黑帮”子弟的我家的四个子女，学校只要不停课他们就go上课，他们大踏步挺起胸膛去图书馆借书、阅览；照样和小朋友一起打篮球、乒乓球。当然，他们其实也在默默地忍受着各种叫骂声，有时甚至还会无缘无故地挨打。

不过，具有齐鲁英豪气概的他们，是不会一味忍让的，在一忍再忍最终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采取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击，彰显自己的正义感。

记得有一次，长子金煜对我说：“我们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了。”

我听了不禁一愣，脱口问道：“什么问题那么严重？”

他说：“张××已经用皮带抽了陈××好几次，陈××现在都不敢出来玩了。”

“为什么抽他？”我问。

“为了要烟盒。张××非要让陈××在一周内交他多少多少烟盒，交不上就用皮带抽他。我们都帮陈××找烟盒，也凑不齐张××要的数。”他说。

“张××果真这么霸道？”我又问。

三个儿子异口同声地说：“是！”

我打电话询问陈××的父母：“陈××为什么这几天都不出来玩了？”

他父亲说：“不知道。只见他整天在家背历史书，看地球仪，记各国地名……”看来，陈××没敢把这件事告诉父母。



当时，孩子们都没有什么玩具，“烟盒”是他们的重要玩物。主要是向大人要那些抽完烟的空烟盒，叠成三角形，手心手背地来回翻着玩，不落地，就算赢；或在地上拍打，玩法很多。

陈××是我的长子金煜从幼儿园入整托时，就床挨着床睡在一起的好朋友，至今，他们俩的关系还非常好，陈××出国留学，回国后就应聘到公司工作。现在，金煜从国外回来时，还经常去陈××家里玩。

张××是中央党校卫生所一位老护士的儿子，比陈××大好几岁，长得比他结实。他们住的楼很近，这个大男孩常常欺侮小孩子。我的长子见自己的好朋友受到欺侮甚至是被张××用皮带抽打，决定再联合几个小朋友一起揍张××一顿，教训教训这个小孩子。

我听到这个“计划”后，告诫他们：“不要动手，要想别的方法教训他。”

孩子们问：“有什么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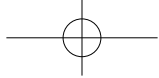
我说：“晚上再告诉你们。”

傍晚吃过饭，我给卫生所的老护士打了个电话，说：“请你到我家来一下，你儿子在外面惹祸了，请把他也带来吧。”这位女同志很有素养，立刻把孩子带来了。当着这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以及坐在一边旁听的我的儿子们，我客观地讲述了她的孩子所犯的错误，然后直接问他：“张××，你做了这种打人的事情没有？”

张××态度很强硬，头一歪，答道：“做了，打了，怎么样？你管得着吗！”

我说：“你做了坏事谁都能管，我今天先同你讲理，以后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我对他讲了不少“不该打人”、“大哥哥不该欺侮小弟弟”的道理后，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如果再打人，我会采取三个办法：一是告到派出所；派出所若是不管，就用第二个办法，找一群大哥哥揍你一顿；你如果还不改，我们家的大人和陈××家的大人，再联合几个叔叔、伯伯一起揍你，揍到你改了为止——这是第三个办法。张××，你今后不许再打陈××，也不许打别人。”

张××的妈妈是位老同志，历来待人和气、温厚、善良，可就是管不住儿子。张××在党校是出了名的淘气孩子。那天晚上，他的妈妈同我配合得很好，一方面严厉斥责儿子，另一方面也当面表示感谢我帮助她教育孩子。后来，我经常看到陈××到我家来玩，有说有笑的，也敢出门了。我听说张××此后再也没有打过他。而老护士有一次见到我时说：“过去经常有人跟我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说我的儿子在外面打人，最近，来我家里告状的人少多了。那次在你家的谈话，好像对他震动很大。”我虽然始终没有告诉她我三个儿子的“计划”，但也明确地告诉她：“大人可以教孩子们忍让，不要去打架，但是小孩子的忍让是有限度的。经过一忍再忍，直到忍无可忍时，他们就要一起用武力解决了。可是，打坏了谁家的孩子都不好啊。”这位妈妈很同意我的看法，再一次向我表示感谢。





## 第二章

# 少年的烦恼与督导



### “读书无用论”撞击着小小心灵

掌握未来的人才，需要有知识。而有丰富知识和创造力的人物，不会从天而降，他只能生长在我们人间的知识沃土上。他要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就必须博览群书，向社会学习。

“文革”期间，成才的劲敌是“读书无用”的歪理。突破这种阻力，是开启孩子的智慧，引发其好奇心、求知欲，引导其热爱学习的唯一门径。

孩子要想读书好，首先要懂得读书有用，即为什么而学习、学习后能干什么。只有明确了读书的目的，才能在学习中有毅力，才能百折不挠地面对困难，也才能迎难而上、孜孜以求。

“文革”开始的那年夏天，学校就停课了。“读书无用论”严重地撞击着正迫切需要学习的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一天，两个大孩子背着书包回来说：“老师说从明天开始不再上课，要停课闹革命。那我们今后每天干什么呢？”本来天天上学，已经形成了习惯，现在学校突然停课了，孩子们自然不知所措，心绪不宁，有很大的失落感。

孩子们的爸爸和我虽然理解他们小小心灵所受到的撞击，但对他们提出的明天“干什么”的问题，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接着又问：“老师说‘停课闹革命’，那要怎么闹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更不知如何回答。其实在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当时，大人们对“文革”也是很理解的。但不管理解还是不理解，大势所趋的局面让所有人都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口号就是：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长子金煜有点儿着急，催促道：“爸爸、妈妈快说话呀！”

爸爸说：“拿不准，看看再说吧。”

我说：“可这一下子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默默地将长女和长子的书包挂在门后的挂钩上。接连几天，只要一关门，看到门上孩子的书包，我就总会联想起八年前我被下放到农村时，看到农民们“挂锄”的情形。但是，那是夏锄过后，“挂锄”也只有一年，第二年就要开始夏锄了，可如今孩子的书包要挂多久呢？真是天晓得！

一开始，只想随着孩子玩吧。当时从哈尔滨来北京“串联”的孩子们的小表姐、小表哥有时带他们出去玩。

此时幼儿园还照常开班，因为党校的大人们都还在上班。不过，整天也是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大游行、大辩论、看或写大字报等。于是，我们将两个小儿子照常送幼儿园。而两个大孩子每天都不知该干什么，于是：长女就喜欢在房间里描绘各种宣传画与图书的插图，或是找她仅有的一两个小女朋友在一起玩；长子金煜喜欢球类，党校的张叔叔后来还教他打篮球。

孩子们有时也会出去看看大字报。然而，令他们震惊的是，党校内一些令孩子们崇敬的叔叔、阿姨被贴了大字报。

孩子们心目中的几位活生生的爱读书、爱学习的偶像，一一被打倒了。特别是那位“自学成才”的叔叔，在“文革”前不久还与妈妈一起在中央党校被评为校级“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如今怎么这样惨？顷刻之间，一切过去倡导的目标、方向和真实的楷模都没有了！孩子们显得很彷徨和疑惑，经常向爸爸妈妈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听得出来，“读书无用”的社会思潮也在撞击着他们幼小的心灵。

由于“读书无用论”的猛烈冲击，孩子们确实有段时间心散了，尤其是在党校成员刚去“五七干校”的那个阶段。社会上不仅小学停课，中学和大学停课，中央党校也不再招收学员。

在“五七干校”允许孩子们复读后，孩子们都上了农村小学。长子金煜进入河南省西华县尹坡小学，孪生儿子就读于郭庄小学，女儿进入中学。



初去干校时，孩子们效仿着农村的孩子，放学后打鸟、摸鱼，四处疯跑，两个小弟弟跟着大哥哥玩得很开心。我们开始认为，只要不影响学习，让孩子多玩玩也有好处，既可多跑多吃，身体健康，又可以养成一个开朗、乐观的性格。但到后来，我们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些不专心，对学习的兴趣转淡了，有时甚至会完不成作业。尤其是我的长子，他在班上一贯学习好，热情、心地善良，结交的小朋友也较多。下乡后又增加了本事——用弹弓打麻雀，他比谁都打得准；摸鱼他比谁都摸得多，于是他的小朋友也更多了。干校坐落在颍河畔，有一条水渠，直接流过干校院外。长子金煜“创造”了一个玩法，即晚上去“堵鱼”，他们三兄弟，晚上有时一堵就堵回来一盆小鱼，我就用这些小鱼给他们做成菜，吃得很高兴。可到我检查作业时，发现金煜的作业本上，有的题抄上了却没有做，本子上有不少地方是空着的。作业只抄不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决定开始同金煜进行谈话。

“你怎么不完成作业？”我问。



金侠（前左）、金延（前右）、  
小表姐李力刚（后右）、小表哥李铁松（后左）在颐和园游玩

“妈妈，我在班上作业完成得最好。”金煜性格很活泼，此刻笑呵呵地对我说。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什么完成作业最好？这作业本上很多地方都空着。”我说。

“你不信就去学校了解了解，我在班上成绩是最好的。”他坚持说。（后来我到小学校去了解，老师说金煜确实是他们班上学习最好的一个。）

“咱们现在是谈作业，不是谈成绩。”我说。“那学习好，完不成作业怕什么？”他说。“不完成作业，你今天学习好，明天会不好，慢慢地就会越来越不好！”我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会一直学习好的。”他有几分委屈地辩解说。“从今天开始，放学后必须先写完作业再出去玩！”我斩钉截铁地说。他可能觉得我一点儿也不让步，提出来的条件太苛刻了，起身就要走。“不能走，你这是什么态度？坐下！”我对他下命令了。“好好！我去完成作业。今天是语文作业，要做课文朗读。”他随手摘下挂在他身后墙上的书包，拿出语文书念了起来。可是，他朗读时并不集中注意力看课本，而是嬉笑着，一会儿看我一眼，一会儿又看我一眼。

“看什么，我脸上有字吗？不好好念书！”我说。“好，好，我给你念……”他说。“怪不得这次谈话，从开始你就顶，原来是‘给我念’！”我原本就一直憋着火，现在实在是按捺不住了，抬手就去打他。他笑着举着两只小手在空中比画，让我没有办法接近他。可是，当看到妈妈真的动怒了，他也就再不敢继续顽皮了。

“妈妈，以后我一定按时完成作业，你别生气了。”长子金煜虽然脾气有些犟，但他心肠特别软，懂得心疼爸爸妈妈，他平时就很怕我们生气。事后我才意识到，当时他一边念课文，一边笑着看我，其实就是怕我生气，想故意逗我笑的。

这之后，金煜便告诉小朋友晚些再来找他。每天晚饭后，他就和小弟弟一起写完作业再出去玩。后来，我在检查作业时发现，孩子们每天的作业确实都完成了，但有的地方还是写得不够认真，我反复思索，觉得需要引导他们自觉学习，特别要让他们懂得珍惜光阴。从此，我和孩子们的爸爸就经常给他们讲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教导他们一定要有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做事必须坚持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至今，我们的孩子提起这些还说印象很深。



## 围起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

只有“乐在其中”，才能在学习时拥有永不消失的内在动力。而要培养起孩子的学习兴趣，仅仅靠老师与家长的指点和说教，往往是难以奏效的。这特别需要孩子们的自我培养、自我寻找和自我体验。

学习，还需要精力极度集中，要有“闹中求静”的本事。当然，这首先需要有顽强的毅力。

依照我们的体会，对于孩子，无论是学习兴趣的培养，还是精力集中的训练，都离不开博览群书，虽然这不是唯一的道路，但趣味横生的书籍必将让孩子们爱不释手。

我家有个好的条件，那就是藏书多。只因我和我先生从走出校门、开始工作，便一直教书，几十年如一日，他教党史，我教哲学。工作需要我们多买书，看起来勾勾画画、写写眉批方便；我们的兴趣也使我们多买书，一看到好书，两人都喜欢，就要买。即便是在我们生了四个孩子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时，也还是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书了。日积月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记得一位朋友来家里玩时对我们说：“你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财产就是书。”我先生说：“我家就是书多，书香扑鼻。”

书多，的确有收拾或搬运起来“累人”的矛盾，但在当时可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那全国上下一片混乱的日子里，我们夫妻就是用这些书圈住了孩子，用书围起了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

在精挑细选下，我们找出那些能够引起孩子兴趣的书整套整套地介绍给他们阅读。这里包括了《十万个为什么》、《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红旗谱》等；还有各种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以及传记类文学，如《居里夫人传》等。最小的孩子开始看书难，我们就买来带连环画的小人书给他们看。

“文革”开始时，我们的长女金萤十岁，长子金煜七岁，小三金侠四岁，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小四金延四岁。到“文革”结束时，金萤二十岁，金煜十七岁，孪生弟兄金侠、金延也已经十四岁了。在这十年中，孩子们逐渐长大。一开始是我们选书给他们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所读的课外书日益增多，读书兴趣也越来越浓，都学会自己寻找书看了。有时他们感到家中适合自己阅读的书已经不够用了，就干脆向小朋友们借阅，待中央党校的图书馆重新开放后，他们又主动去图书馆借阅。

孩子们读书相互影响。小弟弟看不懂的书，姐姐、哥哥看完后会讲给他们听。记得我家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最早是哥哥、姐姐看，而一对孪生兄弟还不认字。由于哥哥、姐姐时常讲起，耳濡目染之下，一到认字的年龄，小孪生兄弟便迫不及待地一本一本地阅读起来。这两个小弟兄在北京没有读完，又缠着让我们帮他们把书带到河南“五七干校”去继续读。读完了还绘声绘色地讲给小朋友们听。

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甚至吃饭时，要连催几遍才肯将书放下。有时，我们夫妻生怕他们连续阅读时间太长，会累坏眼睛，所以经常要催他们放下书，出去打球、锻炼锻炼。

记得有一次，小四金延问我们：“爸爸、妈妈，我看有的阿姨、叔叔打着、骂着让孩子学习，你们怎么总催我们出去玩，而不让我们看书呢？”

爸爸说：“你们连续看书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怕你们累坏了，再说眼睛会受不了的，长大后也得像爸妈一样戴眼镜了。”

我说：“你们出去运动运动，让血液流通，回来后，书看得会更快、更好。”

我们从孩子们经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相互谈论的话题中看出来，孩子们对书之所以发生兴趣，不在于字面上，而是在于字里行间表达的意思，也不是在比谁多看了几本，而是注意每本书上的情节。他们或是尊崇哪位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或是崇敬哪位革命先烈的铮铮铁骨与豪情满怀的性格；或者是喜爱书上的名言，将其提取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或者喜欢哪一本书中的曲折折故事情节……

当孩子们到达一本书接着一本书阅读的程度，他们的精力就会非常集中，能够自觉排除外面的干扰了。有时小朋友来叫他们出去玩，连叫了几遍他们都听不到；大人要他们帮忙做事时，他们会放下书，一面做事情，一面提出书上的问题，同我们一起研究。





不久党内发动了“批邓”运动，规模大，来势凶猛。当时的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支部书记，向我布置说：“你平时喜欢鲁迅作品，运用鲁迅的思想，写写‘批邓’文章。现在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写。”

我当即推辞说：“我不过是出于喜欢，随便翻翻看的。咱们是搞哲学的，对于鲁迅研究是外行。这种文章还是让语文教研室的同志写吧！”

他却坚持说：“谁都可以写文章，大家都可以学习鲁迅嘛！”

我只得说：“运用不好鲁迅的东西是会出丑的。如果一定要我写，那么我有个要求，能不能让我好好读一读鲁迅的书再写？”他答应了。

当时抄上鲁迅几条语录，写写批判文章，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我却做不到。主要是思想不通，感到难以理解：“毛主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怎么刚刚过去一年就变了呢？”因为心里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我根本没办法动笔。

不过，借助于支部书记的布置，我有了一个名正言顺地阅读《鲁迅全集》的机会，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了，而过去只是在业余时间零零散散地读了一些，根本不能系统地阅读。于是，我打着支部书记布置工作的旗号从图书馆借来《鲁迅全集》，开始一卷一卷地阅读，读到十几卷时，“四人帮”被粉碎了，写“批邓”文章一事随即作罢。我真感谢当时的支部书记，在读《鲁迅全集》的过程中，他没有干扰我，没有威逼我写“批邓”文章。这就使我避免去写那种言不由衷的、违心的文章，同时还赢得了系统地阅读《鲁迅全集》的时间。

在那段时期里，年仅十三岁的小儿子金延每天看我乐滋滋地读鲁迅的书，也提出要跟我一起读：“妈妈你读完先别还，你读一本我跟着读一本，然后再还给图书馆。”我想，鲁迅作品含义深邃，小金延才十几岁，刚读初中，怎么可能理解呢？但我转念一想，无论如何，“开卷有益”，让他早一点儿接触些鲁迅的作品也好。于是，我读一卷，就让他接着读一卷。

我怀疑他是不是都读了，有一次就问他：“你是不是一目十行、蹦蹦跳跳地读书啊？”

他说：“不是的，那样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我想试试他，就让他把看过的书合起来，我也把书合上，随便抽一篇文章，让他说说大概意思，他还真能说得上来。过去，他读《红旗飘飘》多卷本时，读得很快，他爸爸也有些怀疑，就曾提出问题抽查过他，想不到他回答得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很好。他那出众的阅读能力和记忆力，常令我们夫妻感到吃惊。金延在阅读《鲁迅全集》的过程中，还经常向他的姐姐、哥哥或小朋友们讲起书中的故事与人物，说到阿 Q、祥林嫂、闰土等时津津乐道。不过，当时的他对于鲁迅作品中的深刻含义，并不理解。孩子毕竟是孩子，父母此刻对于他的期盼也只能是那句“开卷有益”。

经过“文革”十年的折腾，以及多年的“停课闹革命”，孩子们少学了很多课内知识，然而，由于我的先生和我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使孩子们自觉自愿地用书筑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块小天地，这是在我家用图书“圈起来”、与闹哄哄的大社会隔离开的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孩子们在此读了许许多多很好的课外书。也正是有这块“乐土”的存在，让孩子们因爸爸当了“黑帮”、妈妈成了“反动组织红战团”成员所带来的惆怅、郁闷、惊恐的心情，逐渐得到缓解，慢慢地，在我家能够听到孩子们因谈论书上趣事而发出的欢声笑语了。在那时，没有进入我家、没有踏进这一小块“乐土”的人，不会看到，也想象不出孩子们每人捧着一本书专心阅读的可爱形象，以及在孩子们互相谈论自己所看图书中的有趣情景与动人故事时脸上那种欢快与由衷的笑容。只有他们的爸爸和妈妈才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孩子们这种欢愉的情形，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正是我们亲手在自己的小家里围起的小小的“平静乐土”上，他们不断走进“黄金屋”，又从中走出了一小群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栋梁之材。

恢复高考后，我们的女儿在第一批参加高考的报考人员中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而三个儿子在高中毕业后，也都以优异的成绩相继考上了他们各自理想的大学。

我家的孩子们一个个顺利地通过高考。首先要感谢他们所读过书的学校和老师，正是令人尊敬的“园丁”们，为孩子们提供了校内所应掌握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其次，也得益于父母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筑造了那一小块“平静乐土”，而正是这十年中大量的课外阅读，使他们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感谢“上帝”的启迪，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及时地为孩子们想出了“闹中求静”的好办法！



## 欠债与还债中的哈哈趣闻

没有学习毅力的孩子，是不可能成才的。培养孩子的学习毅力，当然要强化刻苦钻研。但也不能立足于苦，片面地强调“苦”，欢欢乐乐地掌握知识，岂不是更“酷”吗？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需要玩、需要欢乐、需要交友，“关禁闭”式的学习，只会在孩子和大人的心灵深处都留下遗憾。知识的积累，需要“集腋成裘”，需要记忆和背诵。然而，强迫孩子“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做法并不可取，而鼓励孩子创造一些寓学于乐的方式如对讲、背诵、比赛、复述等灵活的学习手段，可能会赢得更大的益处。

我们那一对可爱的孪生儿子，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他们喜欢故事，爱听故事，也爱讲故事，甚至连读过的书上的有关章节，凡是能够编为故事的，也都作为故事来讲。他们活泼的思考、牢实的记忆，以及丰富的想象力，经常使我们做父母的感到诧异。而他们本人的故事，我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尽管时间的流逝冲淡了我的记忆，然而，他们那一次又一次的有趣的言谈举止，却一幕一幕地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家有一张很大的床，是用中央党校 60 年代给职工发的两个大的、朱红色的木板单人床拼凑而成的，这对孪生兄弟生下来后用的就是这张床。上了小学他们放学后，无论冬夏，到家后一个习惯动作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大床上，互相讲故事。其实，他俩那会儿对书上的字还认不全，有的故事是从书上读来的，有的是过去听大人讲的，也有的则是他们自己编的。

两个小秃头坐在床上的姿势，和后来大家所熟悉的小一休一模一样。当然，这种盘腿动作并不是从一休那里学来的，因为看《聪明的一休》是后来的事。这种动作，我想可能来自他们的外婆。我母亲是东北人，东北老人休息时就是盘着腿往炕上一坐。由此可见，孩子永远是大人的一面镜子。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有一天，放学回来的两个小男孩，从外面跑进来，按照惯例一屁股坐在大床上，盘着小腿面对面地坐好。可出人意料地，听到对坐着的

两个小宝贝突然吵起来了：“你还欠我一个。”“是你欠我一个！”正在忙碌中的我根本没有听懂他们说“欠”是指什么，心里以为指的是他们小孩之间玩的那些纸烟盒，也就没有往心里去，只说了句：“好好儿玩，别吵！”小三冲我笑笑，说：“我们没有吵，是在玩。”小四也笑了，对我说：“妈妈，放心，放心！”于是，我就继续忙自己的事了。虽然我并不真正清楚孩子们所说的“欠”究竟是什么，不过知道肯定不是相互“欠”钱。因为我们家的四个孩子在读小学时，我们做家长的是一分钱都不给他们的：一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二是不愿让孩子学会花零钱；三是不希望孩子们在花钱上费心思，从而导致无法集中精力学习。

第二天，这小哥儿俩刚刚面对面地坐下来，就又吵了起来。我听到老三叫了声“你还欠我一段”，心里觉得纳闷：上次是老四说老三欠他的，这次又是老三说老四欠自己的，究竟“欠”的是什么？原以为是烟盒，可烟盒又不能论“段”算啊！我越想越感到蹊跷，干脆搬把椅子坐到大床边，直接问他们：“你



小孪生兄弟金侠（左）和金延（右）爱在一起讲故事



们说的‘欠’是指什么？怎么两个人天天都要还债呢？”

听他们把原委一说，我这才弄明白这个诡秘的“债”谜。原来，两个孩子白天在学校上课，下课又跑跑跳跳地锻炼身体，放学的时候感觉疲倦了，就在上楼梯时轮换着背对方。背上一层就要讲一段故事，背两层就要讲两段，背三层则要讲三段，以此类推。待回到家坐到床上时，若不能按层数讲完相应数目的故事，就算欠“债”，下一次还“债”。讲的故事内容则是大人给他们讲过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情节片段，结合自己看书能够“猜明白”的、“小人连环画书”中有的，以及其他书里的故事。两个小家伙相互背着上楼梯，所以彼此都是“债权人”，又都是“债务人”，到家后也顾不上别的，直接坐到床上互相讲一段段精彩的故事用以“还债”。尽管当时的他们对书上有些字还认不全，但他们仍会把多少明白点儿的情节“猜懂”，大致讲述出来。

当我把这个已揭开的谜底告诉我的先生时，他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这两个小家伙，办法还真多。”

我对此事进行了思索，认为两个孩子的这种“独创”，倒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这是一种极有趣味的促进记忆、主动思索的好方法。我们读书最忌讳的就是“狗熊掰棒子”——读得不少，但丢得也很多，有时几乎是“一个不剩”。而这两个孩子采用的学习方法则是将书上的内容通过记忆用自己的语言述说出来，这样做不但能够增强记忆，更能使思维活跃起来，再加上他们相互补充，完全可以在彼此脑中留下更多、更深的记忆。据说，关于人脑的最新医学研究表明，对某一事物的多次重复，特别是有意识的重复可以加深记忆，而且可以使人善于记忆。这可算是科学依据吧。

我主张读书要背、要记，但并不提倡死记硬背。而活记、活背的方法很多，这对孪生小兄弟所用的方法，可以算是“活”起来的、有乐趣、有味道的方法之一吧！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对他的儿子音乐家傅聪，自幼要求极严，从小就把他关在家里进行读书、写字、弹琴等文化艺术方面的教育，绝不允许他随便出去玩。有时，小傅聪因贪玩而不听爸爸的话，就会受到惩罚。虽然在这种严酷的教育下隐藏着傅雷作为父亲那深厚的舐犊之情，但后来当他回首往事时，也免不了会产生严厉的自责和沉痛的忏悔之情。在傅聪赴波兰参加第五届肖邦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钢琴比赛以及到波兰留学深造后，他在写给儿子的第一封家书中就曾谈道：“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远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罪，不能洗刷！”（摘自《傅雷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页）

有一位女博士的父亲在寄给女儿的信中，写了一首诗：

胸有成竹画自工，  
心存前贤业必精。  
悬梁刺股诚可敬，  
读书未必到三更。

（摘自《博士生的父母谈家庭教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我认为这首诗写得很好，情真意切，同时又很有见地。作为望子成龙的父母亲们，真的要为自己的孩子着想的话，就不要苛刻地剥夺他们的天性，而应在生活中关爱他们，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运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方法在玩中学习，在玩中记忆。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快乐地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取得“强迫学习”所无法达到的意想不到的成果的同时，不会给自己和孩子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 循序渐进，不“跳级”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更是人之常情。然而，学习必须“循序渐进”，这是适应人的智力发育的一种客观规律。如果违背这个规律，势必会在某一时期受到惩罚。以学校教育来说，高年级的功课，是以低年级的知识为基础的。如果只图让孩子快速升班而跳过基础知识的学习进程，





将来他再学更深的功课时，势必会感觉困难重重，甚至影响一生的学习；比如说，如果不在初中掌握好  $X+Y=Z$ ，以后的代数、微积分、高等数学就很难学得好。很多事实都摆在眼前：有的孩子就是因为小学时期跳级升班，基础没打好，原本轻松的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致后来未能如愿考上大学。

当年，我们的女儿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来家访，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智力超群，上课时总是喜欢画画，好像没有听讲。可叫起来提问时，她都回答得很好，作业完成得也好，考试成绩也挺好。学校提出可以让她跳级升班，请家长予以考虑。”我和我先生都说：“请让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后再回话吧。”

老师走后，我先生和我反复研究，一致认为不能让孩子跳级升班，否则会破坏“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很可能造成“欲速而不达”的结果。于是，我们专程到学校向老师阐述了我们作为家长的意见和看法后，还特别表示：今后我们会配合学校加强管教，绝不让金萤在上课时再画画了。

回家后，我们向孩子要来她画的图画。她果然画了很多，有仕女连环画，也有少数民族少女图。我们在问清她确实是在课堂上画的这些图画之后，并没有向她转述老师对我们说她“聪明”、“学得好”之类的溢美之词，而是批评她上课不专心听讲、搞“小动作”，同时明确指出：“这样做，既影响了你的学习，又不尊重老师的劳动，对其他小朋友的学习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他们很可能会仿效你上课不专心听讲而做别的事。”针对这件事，我和我先生对她管教得十分严厉，曾多次找她谈话、讲道理。

当时，女儿颇有几分委屈，时不时地还闹点儿小情绪：“想不到自己学习好，非但没受表扬，还要挨批评”，“那些和自己学习成绩差不多的同学，一个个高高兴兴地跳级了，唯独自己的爸妈不允许”。有几天，她回来就讲“ $\times\times$ 跳班了， $\times\times\times$ 也跳班了”。我们仍是一次又一次地给她讲“学习要循序渐进”的道理。正是坚持按部就班的学习，使她小学和中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得十分牢固。这也为她插队三年之后在全国恢复高考时，成为第一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的大学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能有人会认为，孩子喜爱绘画，家长却非要强令她不准在上课时画画，会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的确，我们多次出国探亲也亲身体会过，美国朋友就曾多次提出此类问题。

其实，我们制止孩子在上课时绘画，并不意味着不让她绘画，而是要让她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金萤读小学时喜爱画少数民族少女图

专心致志地上课，学好规定课程。这样做，并非限制孩子的个性发展，反倒是让孩子能够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并不像有的父母那样，听到老师说孩子上课绘画，就把她所画的一切图画都要来撕掉，而是拿来看看后再还给她，同时告诉她除了上美术课，在上其他课时不能画画，只能在课余时间画。后来，金萤每当写完作业或假日都习惯吟诗作画，对于她的这种雅兴，我们都积极予以鼓励。

现在想来，金萤童年与少女时期的素雅和文静的气质，其实与她的这种

爱好关系很大；而在她做外科医生后，手术针缝得很漂亮，与此应该也不无关系吧。

至于金萤上大学所选的专业是医学而不是美术，这并非因为当年我们不允许她上课时画画而刻意压制她的个性发展，而是我们尊重了她个人的选择。在他们报志愿时，我们是希望长女金萤和三子金侠学社会科学的，因为他们的思路清晰、文笔好。可是，他们在征求做医生的伯父、伯母的意见后，决定报考医学专业，我们也就尊重了他们的选择。

奠定孩子们个性全面发展的良好基础，理应成为家长“视野之内”，而不是“视野之外”的问题。这是因为，儿童、少年，包括青年，都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可塑性比较大。在这一阶段，他们的个性很难一下子确认。而个性的发展其实又是一种过程，每一阶段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如果在某一阶段就过早地确定培养他们某一方面的个性发展，在这一方面花费大量时间，而不注意他们在学校安排的课程上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很有可能会白白浪费家长和孩子的时间与精力，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徒劳无功。

据我们了解，那几年有几个孩子跳级升班后，多数成绩都从原来班级的名列前茅滑了下来，在恢复高考后，有的孩子竟然没有考上大学。当然，其中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多少也与不适当的“跳级”，即人为的“拔苗助长”有些关系吧。这是值得深思的。

其实，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大人们各种夸奖，有的来自学校老师，有的来自亲朋好友和叔叔阿姨们。孩子们年纪小涉世不深，容易飘飘然，自我感觉很好。但是作为父母，在众人对孩子的夸奖下，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静的心态。要知道自己孩子的分量和短长，切不可听到一些溢美之词，就过高评估孩子的状态。“阿姨、叔叔都说我好，爸妈还总批评我！”即使孩子表示不公平，做父母的也不能心软退缩，仍要冷静地看待孩子的缺点，该批评的还是要批评。当然要注意以充分肯定其优点为前提。总之，使孩子多一些自知之明，学会客观冷静地看待自己，这对于他们一生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裨益。

有的父母盼望子女成才的心情十分急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急”要有个度，有些父母希望孩子一下子成为“尖子生”，一夜之间跳入尖子班，于是同孩子一起“攻关”，帮助甚至代替孩子做习题，有的口述作文让孩子记，都分不清这究竟是孩子的作业还是父母的作业。其实，每位做父母的都应该首先明白，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学习要“循序渐进”，这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

有一本书叫《名人家教集锦》，其中有一段文字很有趣味，标题为“让‘拉兹’走自己的路”。当年，印度电影《流浪者》曾在我国红极一时，许多人都非常喜欢。在影片中扮演拉兹的演员名叫卡布尔，他的父亲帕里维拉是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帕里维拉就曾恳切地告诫卡布尔：“在我的房间里，你是我的儿子，你可以同我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但是，一旦走出这个房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你要同许许多多普通演员一样，自己去走生活的道路。”（《名人家教集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卡布尔正是按照父亲的严教，走自己的路，而且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直至十八岁才以一名记者的身份进入影视界。卡布尔步入影坛后，先是演了许多三流角色。但他奋发图强，刻苦努力，一步一步地登上了艺术表演高峰，成为蜚声世界影坛的著名演员。这是一个异常优秀的楷模，他所走的正是一条踏踏实实的成才之路。



## 更名改姓使不得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家中一定要教育孩子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家庭就像社会一样，需要一种权威的力量。一旦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建立起父母的权威，家长在进行家教时就根本不需要打、不需要骂，自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家庭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父亲的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国，一个家庭如果失去了父亲的尊严和权威，那就像航船失去了舵手、乐队失去了指挥。在我和我的先生相濡以沫的感情生活中，在我们为建立自己幸福、和睦、温馨的家庭环境的努力中，作为妻子，我在培育孩子们心目中的“权威力量”上进行了特别的努力。对于那种在孩子面前夫妻吵架、妻子图一时之痛快或争强好胜极力揭先生短处的做法，我始终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更不能苟同。

我的先生平时在孩子的心目中是很有权威的。这种权威的建立，不是靠棍棒和拳脚，也不是靠变形金刚或美丽的洋娃娃的物质诱惑，而是靠他的操行。他做人和做学问都非常老实——做学问老实体现了博学与睿智；做人老实则形成了很高的威望。尽管他在家庭生活中对待子女都很慈祥和蔼，但孩子却都很佩服和尊敬他。我家孩子们心目中的这种“好爸爸”的权威，正是由他们父亲自己的言行树立的。而作为母亲的我，所提供的也只不过是维护这种权威的力量。正像苏联伟大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所指出的：权威是由父母自身决定的，“不过权威绝不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权威的根源只出于一个地方：那就是父母的操行，包括行为的各方面”。

然而，“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孩子们的心也被搅乱了，竟然弄得孩子们不知自己的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父亲在孩子们心目中的权威似乎动摇了！

一天晚饭后，女儿金萤要求同我单独谈谈，那副模样显得心情十分沉重，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



她对我说：“张××的爸爸是保皇派，她要改姓、改名，她随她妈妈的姓了。我爸爸也是保皇派，比她爸爸还严重，又是黑帮，所以我也要改名，不再叫金莹了，就叫李永红吧。”

听到之后，我非常吃惊，情急之下不禁脱口而出：“跟黑帮老婆姓李，也不比跟‘黑帮’姓金光荣多少啊！”

她哭了。看得出这在孩子心中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我决定认真地同她谈一谈。如今回想起来，这次谈话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作为父母，应当用自己的真诚与耐心使孩子养成愿意向父母吐露真情的习惯，而不能一听到孩子说出不顺耳的话就顶回去完事。

著名的教育家穆尼尔·纳素夫说：“小孩子应该养成对父母直言不讳的习惯，父母应从他的言谈中结合家庭情况，引导他。父母的耳朵应永远俯在孩子的心灵上，他们的智慧火光应该永远照耀着孩子的前进之路。”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几多父母能够将耳朵“永远俯在孩子的心灵上”呢？平心而论，我在很多时候也是做不到的，要做到“永远”，还需要做极大的努力，甚至要努力终生。

那一天，我和女儿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一直谈到深夜。她把憋在心里的许多属于孩子们的稚气问题都提了出来，我当然只能耐心地一一回答。而且，我向她详述了她爸爸的历史，告诉她真相：“你的爸爸在1947年刚满十五岁就参加革命，表现一直很好。他是小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为了不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我只好胡乱地解释说：“那是有人思想跟不上，有人不同意贴大字报，有人不同意冲击校委”等。孩子好像明白了，情绪也平静了。我极力不把“黑帮”说得严重，因为这牵扯到她的爸爸。

经过这番长谈，她显然轻松了许多，最后说：“那我不用改名了！”

我抓住时机对她说：“你要记住，你爸爸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

几十年来，我在孩子面前从来没有说过爸爸一句坏话，都是讲爸爸如何如何的好。我们夫妻也从不在孩子面前争吵，遇到有意见分歧时，我们两个人就会避开儿女单独交谈。

由此可见，家庭权威的力量，固然要由父母自身的自律、自我严格要求来自然形成。但父母双方互相维护权威的努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当然，维护权威，要有基础、有前提，即父母要言行一致，身体力行，要求孩子做到的，自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己首先要做到。这样，美好的言行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只有在美好言行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权威，才不是形式的、表面的、夸张的，而是能够经得起“面前”与“背后形象”的考验。正如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所说：“父母无论装得多么了不起，只要他们在‘背后的形象’中存在着不严肃的生活方式的真面貌，那么，孩子将不会从内心尊重父母。作为父母，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以便孩子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来观察自己‘背后的形象’也不会感到羞愧……都将以一种美好的东西深深地印在孩子的心灵里。”我的先生、孩子们的爸爸，无论是“正面的形象”，还是“背后的形象”，都是非常高尚的。而这正是我这个母亲在家中“维护父亲权威”的前提。

## 黄帅究竟“帅不帅”

师道尊严，是我国千百年教育成功的古训；吾爱吾师，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家庭教育的成功范例是让这种古训和美德在孩子的心目中自幼扎根。

从孩子背起小书包，走进他们心目中的圣殿——学校起，他们便在一生坎坷的成才长途中，时时刻刻离不开老师了。有人可能对此感到困惑：“难道孩子已从学校走向社会还离不开老师吗？”我说的“时时刻刻”是指孩子从童年到成年，甚至终其一生，在他们成才的道路上，老师给予他们的有益的教诲、训诫以及音容笑貌，都将始终伴随着他们。

我国的革命领导人对教育过自己的老师都是极其尊重的。比如，毛泽东就曾于1950年10月亲自写信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请他对自己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校长和教员们给予关照，“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见《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而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视察云南省时，也专门宴请自己在讲武堂读书时的老师。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

老师为培养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尊重。可是，在“文革”期间，这些好的传统都被当作“四旧”砸烂了。特别是在“批林批孔”





运动中，“四人帮”又制造了“黄帅事件”，给少儿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为与班主任发生矛盾，于1973年10月21日写信给《北京日报》社。在“四人帮”的指令下，《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日记摘编，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黄帅的信和日记，并加了类似的编者按。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浊流，很多教师受到批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也令许多孩子的思想变得混乱不堪。

黄帅究竟帅不帅？当时，社会上的看法有分歧。不少报刊文章按照“四人帮”的调子，极力夸奖这位小姑娘，以及她的所谓“革命精神”。而更多的人，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终身执教的教师，则认为学生爱戴和尊敬自己的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对这种违背常情的表彰与倡导，感到不可理解。

那时，我家的孩子们放学回来常说“今天上课时有的学生在座位上往老师脸上扔粉笔头”，

“有的学生突然跑到老师面前，坐在讲台桌上，弄得老师没法讲课”，“课间时，有的学生还在院子里揪着老师的头发打老师”。每当听到这些情况，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也身为教师，更主要的是，我们痛心地意识到“中国的教育要被



金煜（右）和他当年的小学老师（左）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毁了”。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虽然我们注意到孩子们在家中没有一个说黄帅是对的，但心底还是担心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每当听到他们讲述上面的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形时，我们总是会严厉地追问他们：“那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孩子们的回答都是：“我们在上课，不能上课时就看书”，“那都是平时学习不好的孩子干的”，“那些孩子真是发疯了，我们绝不干那种事情”。

孩子们平时爱学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了，而且又听到孩子们说出如此诚挚的话，本来我们应该放心了。但是，“文革”中自上而下的那种大肆批判“师道尊严”、倡导“停课闹革命”的恶风，令我们仍放心不下。于是，我们反复叮嘱孩子们：“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不要参与他们的胡闹。你们的成长环境就像万紫千红的百花园地，而老师就是辛勤的‘园丁’。”

果然，我们的孩子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反对“师道尊严”的闹剧中，他们始终坚持“尊师重教”，而且，一直以来都非常尊重自己的恩师。长子金煜常说：“一日为师，终身父母。”即使在他荣获世界名校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的地球科学家后，也要借回国之机代表姐弟去看望他们的小学老师，当年的年轻老师已白发苍苍并晋升为校长，然而师生情依旧浓厚，满怀欣喜地留下了纪念照。

在培养孩子尊师重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家长要怎样教会孩子自己正确化解师生中发生的不愉快。我的看法是，家长应从正面多加引导，反复叮嘱孩子，感谢自己的恩师。使他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老师是辛勤的园丁，自己从幼儿教育到成为硕士、博士的教育程度，甚至于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专家，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自己的老师。如果没有老师的谆谆教诲，他们就不可能学到并掌握所需要的知识；如果没有学生对老师诚挚的爱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解与默契配合，成才更是无从谈起；“严师出高徒”，严格要求是好事，受教育者必须懂得教育者的良苦用心。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不断地调整孩子和老师的关系，特别是当孩子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和指责而产生对立情绪、拒绝接受时，家长进行这种调解和沟通的工作更是不可缺少的。而对于社会上有轻蔑老师或对老师进行人格污辱的思想行为，作为家长应义正词严地予以批评，排除这种社会现象对孩子心灵上的影响，并及时告诫孩子绝不能发生这种不良行为。当然，有些时候如果是老师有错误，家长与学生也可以予



以批评，但切记应以友善的态度。

我个人的经验是，“园丁”思想，在孩子们的头脑中，一旦扎根，对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思考，以及处理具体问题，将终身受益。

在金侠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每颗心上都镌刻着你的名字。你们共同的名字——‘红色园丁’。人有百岁之翁，树有千载之栋，然而，那使他们从一棵‘幼苗’开始茁壮成长起来的‘园丁’，却永远不会从人们的心坎上磨灭掉。”

孩子们有时也有对老师的不满情绪，或者怨气，然而，有了关于“园丁”的基本认识后，经常会自觉地进行自我心理调整。比如，金侠考上重点高中（人大附中）的第一学期，期中考政治时，顺利地答完几道大题后，被几道小题难住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一股怨气从心中升起直冲脑海，又从脑海里溢出来，变成一句怨言‘老师干吗不带我们复习呀’。……就这样我交了一张‘败卷’。”

“从考场出来，我一口气爬上一座小山。我站在这山顶上，想借着徐徐吹来的春风，拂散我心中的郁闷。”

“当我从山上缓步往下走的时候，刚才波涛翻腾的脑海渐渐恢复了平静。因为我找到了我惨败的原因：问题在这，在我而不在老师”，“这几道题多半是前两年学的，可那时学的真和狗熊掰棒子差不多，学多少丢多少，所剩无几，就连生产关系及这一类基本常识我也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想着这些，不由得又引起我一阵阵心焦。我痛恨罪恶深重的‘四人帮’这些‘偷时间的人’，偷走了我们宝贵的时光”，“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才挽救了我们青年一代，使我们的宝贵时光不再被‘偷掉’”，“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用加倍的努力，夺回被‘四人帮’偷走的时间”。

我的儿子从小山上下来时，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态。他抛掉了对老师的抱怨，抛掉了怨天尤人的情绪，而愉快地迎接未来了。在他的日记里，我欣喜地看到这样的话：“随后，我的脑海里又开始拟订学习计划了：一定要把政治赶上去！当我的计划考虑成熟之后，不觉山路已完，而脚已踏上宽阔的大路，迎着‘早晨’的太阳，理想又给我插上了一双金翅膀。”

如果家庭教育时刻注意帮助孩子能够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老师，那么，就不会出现像有的孩子那样，处处挑老师的毛病。相反，会时时注意老师的长处和优点，诚心地接受恩师的言传与身教。最近搬家，清理孩子们出国前的书稿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时，意外地发现金侠起草的一封有许多同学签名的给人大附中校长的信。这封信有点像草稿，不知是否抄写后寄出了？但是，孩子们对老师深沉的爱，溢于言表，看起来很感人。信较长，下面只引述几段：

“我们是高中八〇级一班的毕业生……五十二名考高中考进这一班的，全部都通过了高校招生考试。而其中考取全国著名学府清华、北大两校之学生达三十人。

“我班学生之所以在高考中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方面之一，是学生们的刻苦努力；方面之二，便是全体教工的辛勤劳动，特别是我们的郭老师。”

这位郭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信上接着列举了这位“园丁”辛勤劳动的感人事迹，而且概括说：“郭老师的模范工作，不仅我们这些学生，就连家长们都交口称赞。”“郭老师就是这样，身教重于言教，他的行动，感染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整整两年，老师头上白发又增多少！”“我们的成功里，倾注着老师们的多少心血啊！”“我们愿意在将来评选先进教师、特级教师时投上我们的赞成票，希望组织上加以考虑。”

“最后，为人大附中母校有这样的好老师而高兴！”

我仔细查了一下，信上的签名者有三十人之多。这也是考上清华、北大、协和医大的一批好学生。这说明一个道理，即学习越好的学生越爱自己的老师，爱老师的学生，才容易得到老师的“真传”，而且，这些学生深深懂得学到老师“真传”的深远意义，老师们言传身教的知识和榜样，能够使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鹏程万里。

## 苦度四壁虫鸣之夜

“无规矩无以成方圆”。一个孩子要想成才，父母一定要自幼培养他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这需要同学校紧密配合，反复开导孩子：学校的制度要执行，学校的纪律要遵守，学校的作业要完成。

有人认为，才子就是那种随随便便、放荡不羁的人。其实，真正有“大才



气”的、“成就大业”的人，都是有严谨科学态度的人。他们不仅懂得一个小数点不能差，毫米不能差，连纳米（十亿分之一米）也不能差。真正能够成才的人，在学习上、生活上、工作上、业务上都是以科学的计划、严格的纪律、严谨踏实的学风作为底蕴的。

孪生兄弟虽然最终一个考入清华大学，一个考入八年制的协和医科大学，但他们的成长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年夏天，是在河南农村的“五七干校”，小孪生弟兄在读小学三年级。整个假期在我们的督促下孩子的作业都完成较好。开学前的四五天我大意了，没有检查作业。在临开学的头一天，发现两个人的作业没有做完。

我对孩子说：“晚饭后写作业，我陪你们，熬夜也得做完。”

机灵的小三金侠笑了笑对我说：“妈妈，我问同学了，他们都没做完，我们两人做的算是最多的。”

老实的小四接着说：“妈妈，不怕，老师不会说我们。”

我告诉他们：“怪妈妈这几天作业检查不严，也怪你们没有主动做。假期作业一定要在假期完成。不要管别人，咱们晚上一定要做。”

吃过晚饭，稍事休息，他们二人就开始写作业了，我在一旁陪着，手拿一本书看。我估计会比较快地做完，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直至深夜。中间一个小时休息一次，我和两个孩子走出门外，站在那里伸伸腰，吸点新鲜空气。我们周围有“五七战士”种的菜地，还有农民种的水田，又有水坑，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蛙鸣，以及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虫声。各家都熄灯了，只有我家的灯仍在亮着，心中很不是滋味。熬夜是一件苦事，尤其我已经下地干了一天活，腰疼腿酸，困得直打哈欠；看看两个孩子，也是十分疲惫的样子。心中不由得想：“这真是‘苦度四壁虫鸣之夜’啊！”有些犹豫了：“是不是该这样‘自讨苦吃’呢？我这个妈妈是不是太严格了？”回来后，看看孩子的作业，已近“百尺竿头”，心想：“坚持，坚持！”这百尺竿头的最后一步，该多难迈啊！两人作业全写完，已经深夜两点了。小四先放下笔，出去方便，回来钻进被窝。小三写完，坐在那里吧嗒吧嗒地掉起眼泪来。

我笑了笑说：“写完该高兴啊，为什么哭？”他没有吱声，继续掉眼泪。我说：“可能手疼了吧！”拉过他的小手看看，果然，右手中指的第一关节有些熬夜写作业的年龄红肿。“可能写得急，握笔紧，时间长，妈妈给你揉一揉。”我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金侠（前右）、金延（前左）

把他的小手指用我的手轻轻地揉着。他说话了：“我不是为这个哭，是想妈妈干一天活很累了，晚上还得陪我们写作业。以后，再也不这样让妈妈挨累了，作业早点完成。”小三金侠是一个重感情的孩子，平时话不多，但说起话来，总是把他的感情表达得十分清楚。我感动地把他搂了过来。

小四金延钻进被窝并没有睡，他的那种憨厚、处处为他人着想

性格，养成了一个“放心”的口头语，睁开已经有点睡意朦胧的双眼，急忙接着小三的话说：“妈妈放心，放心，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写作业，不会再让妈妈陪我们熬夜了。”

第二天，孩子放学后，蹦蹦跳跳地回来。小三远远就喊妈妈，手里还挥动着笔记本：“妈妈，班上就有两个人完成了作业。”

我心里已经领悟到了，故意问：“是哪两个？”

小四高兴地抢着喊：“是小三和小四。”他们之间只差七分钟，小四一直不习惯称哥哥，小的时候，跟大人一样称“小三”，长大后直呼其名。

孩子带来的喜讯，使我当然格外开心。他们还说：“老师今天问‘谁的作业做完了？’还让举手”，“看完成的人少，老师说今天先不收作业，三天以后一起收，但必须做完，谁不做完也不行”，“老师还表扬了我们俩”。

从这以后，孩子写作业非常主动、自觉，总是一到家，先写作业，写完再去玩。

“苦度四壁虫鸣之夜”，留给我的印象较深。这次的苦熬、苦写，使我感触





良多：

第一，父母做出表率。

在眼看着两个小宝贝低头写作业时，就思忖，事后很久我还在想对孩子学习，不能打骂，不能强求，要启发自觉，首先父母应做出表率。

在必要时，父母还得和孩子一起读书、学习。而那种为孩子不完成作业，不好好学习，经常“动武”的父母，又常常在孩子身边搓麻将、打扑克，这不是“学习不好”的不良氛围和巨大“冲击波”吗？我的长子金煜曾对采访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父母强求孩子读书的时候极少，我甚至感到我们从小读书的习惯，是顺其自然，因为父母是表率，父母身体力行。”

第二，家长对孩子的作业一定要经常检查、督促。

我主张“顺其自然”，但这并不等于“放任自流”，而是讲不能拔苗助长，让其自然成长。然而，在成长过程中，具备“取乎其上”的可能性时，一定要努力将其变为现实。

“必须完成作业”，老师布置作业时，已经考虑到完成的可能性，家长面临的责任，只能有一个，即严格检查与督促，使其必须完成。在这里，施以“慈母的心肠”，心软、放松、怕累着孩子，是在培养孩子“拖沓”的坏习惯，而不是培养人才所应有的风范。

第三，苦熬、苦读不可取。这有损孩子的健康，也不利于父母的休息。

古人云“头悬梁，锥刺股”，这只不过是在倡导一种刻苦学习精神。任何人也不会天长日久地这样做，仅就身体来说，必定无法坚持，更何况自幼让孩子这样学习，也过于残忍，在心疼孩子的父母面前，这是行不通的。

像我们这样的“短促突击”，只能是在极为必要时，仅此一次，使孩子有一个“作业必须完成”的信念就够了。“苦度四壁虫鸣之夜”，是在不得已时采取的办法，而不是家教的良策。

第四，父母应指导孩子拟订假期完成作业的计划，并分阶段督促检查，最好在假期终结前的几天，就完成整个计划。

有些父母的那种“大人没时间，不必检查作业，而应靠孩子的自觉”的说法，我认为很不妥当。因为，大千世界对孩子们的吸引力太大了，他们对什么都感到新奇，这是正常的，也是对他们的成长有益的。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超过限度则会适得其反。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听，什么都要摸，什么都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要试，势必占用很多时间，消耗许多精力。这恰恰需要大人的正确引导，以使孩子将精力集中在学习上。检查作业是一种“引导”或“督促”的方式。孩子没有大人那样“自觉”，没有大人那种自我克制能力，孩子作业完不成，他们应该受到批评，但我们做父母的也该好好反省自己。

我们孩子后来的学习越来越主动和自觉了，我也严格遵照自己的四点“领悟”去做了。

“苦度四壁虫鸣之夜”，这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因为，孩子们作业写完了，完成了别人没有做完的事情，所带给他们的是轻松与欢畅，也为他们带来了自信和自尊。这也是一个苦涩的夜晚，熬夜奋战完成作业。这和我们的一贯主张“让孩子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不熬夜，准时休息，养精蓄锐”相矛盾。每想到这一夜，留给我的更多的是教训：少搞“短促突击”，要提前抓，抓早抓好。

## 再苦也要教育好孩子

父母将家教作为自己心目中永恒的主题，是孩子成才异乎寻常的因素。

一些父母在一时一地，或一定阶段、一些地方注意子女的教育并不难。难的是终生在心目中将家教放到一个重要位置上。有人总是在做孩子成才的梦，但只是在梦幻中追寻，在现实中却强调自身工作忙、业务忙，不肯挤出时间投入子女教育。日本教育心理学家木村久一说：“我只是想把儿子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才挤出自己仅有的一点智慧，在工作许可的状况下，想尽力把他培养成健全的、活泼的、幸福的青年。”这话讲得多么动人！

对孩子的教育、尽心尽力、永不放弃，是一种特别的境界。尽心尽力反映出在父母心目中，问题的分量。特别是在父母遇到逆境时，如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困窘，生活上的不顺等，是否还能把子女教育放在应有的地位，就是对父母的严峻考验。其实，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大风大浪，爬过多少高山峻岭。一帆风顺是不可想象的，相反，不时地从山巅跌入谷底、在大浪中翻船，



却是常有的事。这可能成为一些人忘却家教的借口，但这不过是在大浪淘沙中反映出的对子女教育上缺乏认识，缺少恒心、缺少毅力的表现。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父母，在任何艰难险阻的情况下，都会顽强地坚持子女教育。他们坚信家教的永恒性是一种客观规律。应当克服各种困难、创造一切条件驾驭这个规律。

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导师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这就是说父母不仅要有知识、有文化、有美德，还要有对家教的社会意义的充分认识，从而像做学问、搞事业一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古代著名哲人柏拉图曾说“子女教育是社会的基础”。有远见、有社会责任感的父母任何时候也是不会忽视和放弃子女教育的。

## 笃实的信念：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要做能够使子女成才的父母，一定要首先成为襟怀坦荡、心胸开阔、有战略眼光的乐天派。相信自己教育子女的伟大意义；相信孩子，相信历史，相信未来；相信孩子们会伴随历史成长，会有一个事业辉煌、阳光明媚的春天。

“现今的父母教育子女，就是缔造我国未来的历史，因而也是缔造世界的历史。”（《父母必读》，第22页）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这些话，讲得多么高深、多么有气魄啊！

我和我先生的一生，有过心灵的创伤、痛苦、凄楚、哭泣，特别是在“文革”中，曾一度对前途丧失信心、悲观、失望，但我们总体上还都是乐天派。虽然“文革”中乌云弥漫，但我们相信最终乌云会吹散，风雨会停息，未来的天空会重现蔚蓝色。

在“文革”初期，我和我的先生，虽然才仅仅三十多岁，对自己的前途，却感到无望了。对未来不敢去想，每当想起，心里也总是一片漆黑，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对于自己总是有一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机感。但在那个年代又确实无可奈何。不过人总是得有点心理寄托，我们唯一的寄托，就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是希望孩子们有个美好的未来，即有一个学习深造、事业辉煌、人格高尚的未来。那是我们心灵的曙光，未来的希望。

我们呕心沥血地去为孩子们营造一种环境，为他们一步一步地创造条件，一点一滴地积累寸土。包括他们的学习、生活、饮食起居和健康，哪一项也不放过，寻找着各种机遇，为他们自己把握未来创造一切好的可能。我们笃信孩子们的未来是美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憧憬孩子们的未来，是我们心灵中的一片乐土。

我先生和我私下议论：国家将来要富强，要实现“四化”，还是需要读大书的、有本事的人。这种思想还经常传授给孩子。所以，1973年江青一伙组织媒体大肆宣扬“白卷英雄”张铁生时，孩子们都不以为然，且嗤之以鼻。为了孩子们学习好，我们想尽了办法，除让他们继续大量阅读课外书籍，还强调一定要学好课内功课。

孩子们反映农村的中小学师资质量差时，我们忧心如焚，担心影响孩子的学习，影响孩子的成长，影响孩子的未来。和同事们谈起来，大家都有同感。后来，在众多父母的多次议论、交换意见中，形成了向校方提出的建议，结果一个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子弟小学，在河南农村诞生了。当时，大人和孩子的欢快心情，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领悟到。

教师全是来自中央党校的“五七战士”队伍。这支队伍是一个宝库，储存着许多人才。不少都是从各个大学调来的尖子，多数是学社会科学的，但也有学数学的、理化的、语文的。为了使孩子们尊敬老师，虚心向老师学习，我们在家向孩子一位一位地介绍他们的老师。

×××是从北京大学调来的高才生，是专攻语文的；

×××是从武汉大学调来的高才生，数学系的尖子；

×××是从复旦大学调来的高才生；

……

孩子们还没等上课，就对老师发生了兴趣。放学回来，不论问到哪一位老师，他们都说：“教得好，听起来很有趣！”

至今，我们到美国去探亲，孩子们还问起当年的老师：“×××老师现在怎样了？”当我们说“很好，老了，但身体不错”时，他们都十分高兴。这是一种永难忘却的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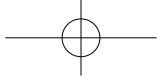
“干校”子弟学校，教材虽然都是社会上的通用教材，但教师们水平高，备课又刻苦认真，加进许多新的内容，科学、趣闻、方方面面的数理化知识，让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在希望的田野里驰骋。

为了让孩子们牢固掌握所学到的知识，我们要求孩子们注意考试成绩，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凡是孩子们获得的“三好”奖状，都一律给他们贴在墙上。孩子们很争气，也互相竞赛，每次只要有评比，他们每人都能够拿回奖状。可惜干校宿舍那种墙是高粱秆加泥巴，只能用糨糊贴，不能按图钉，否则会揭下来，完整保存至今。党校“五七干校”的住址，原为河南西华劳动大学。中央党校占用后，把大教室隔成一家一户的小屋，墙都是由秫秸扎起，上面甩一层泥巴，再糊上报纸。孩子们从郭庄小学、尹坡小学、农业中学到“五七”子弟学校的获奖证书，都用糨糊贴在那里。撕下证书，就等于破坏了一面墙壁。于是，只好一年年地贴，又一年年地留在那里。

孩子怎样能有一个好的体质，这是我们几乎日夜都在操心的问题。我们很相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理，而“体”是孩子学习好、品德高尚的物质保障。很难想象一个经常跑诊所、住医院的孩子能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或者成为处处为他人做好事的“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为使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体质，我们鼓励孩子有劳有逸，鼓励孩子参加体育比赛，掌握各种球类的训练技艺，鼓励孩子们星期日尽情地玩，使大脑得到充分休息，鼓励孩子多吃、多睡、多活动。

我们经常对孩子讲：“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弓满弦易断，锋利刃易折”。我们的孩子的特点，不属于一玩就“疯”、“疯”起来不肯读书的孩子，而是读起书来，经常爱不释手，必须反复提醒“休息休息、出去玩玩”。所以，提醒孩子自觉地把握“有劳有逸”这一人生常识，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特点，从不同侧面，予以启迪。

体育活动重在参与而不在于夺取名次。我们分析了自己的四个子女，从他们的天赋、体质、爱好等各方面来看，哪一个未来都不会成为体育专业人才。所以，我们提示孩子参加体育活动，是为了有一个好的体能。他们有的参加田径比赛、球类比赛，有时在校内，有时在校外，有时还去其他省市，如老三金侠被选到外省去参加全国医学院校的篮球比赛。我们叮嘱，能坚持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而不在于一定要夺取第几名。这样，能够为孩子解脱心理压力，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不会有“外出比赛拿不到名次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重负。

在父母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孩子们提供体育锻炼用具，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把四个孩子从小养大，因二人工资收入少，曾十分困窘。孩子先后考取大学，在同时供四个大学生的情况下，工资收入几乎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知识分子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我们真的解放了，由衷地感谢党。这种“解放”是多方面的，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对于我们触动更深的是心灵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我们知识分子再不当“臭老九”了，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我们心情舒畅地日夜备课，讲好课，还写书、写文章。当时，文章和书既是科研成果，又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给予稿费了，家庭收入随之增加。国家大形势的可喜变化，带走了家庭的“经济危机”。我们除给孩子们交学费外，还能够把节约下来的钱，为孩子买些体育用品。有一年冬天，除了青岛海洋学院的长子外，我们特意给其他三个在北京就读的大学生，每人买了一双他们最喜欢的冰鞋。当孩子们痴迷于书本时，看到“冰鞋”凝结着父母对他们健康的企盼，不想动也要动了。

由于锻炼好，饮食合理，孩子们的个头长得令人吃惊，最小的弟弟一米八四，老三一米七八，大哥一米七七，大姐一米六八。与同龄孩子比较，都是大高个头。

孩子们的德育教育，使我们花了许多脑筋。我和我先生深深懂得“品德高尚是成功之本”。很难想象一个惯于投机取巧、坑害别人的人，能够踏实做学问，并获得成功。孩子自幼，我们管教就比较严，重点是帮助孩子树立诚实、正直、勇敢、助人、大度、慷慨等高尚品德。

我们自创了一套教育方法，主要是以品德教育为中心，主要方式是“个别谈话”。即同有问题的孩子单独谈话，讲清道理，而不是在公众面前批评他，留给孩子以尊严。我们相约在几种情况下不去批评孩子：(1) 饭桌上不批评孩子，因为这影响孩子的食欲和健康；(2) 在客人面前不批评孩子，因为这不利于培养他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3) 在全家人都在场的时候，不批评某一个孩子，因为这影响姐弟间的相爱与好感；(4) 在听到“外人反映”后，我们过于生气时，不去批评孩子，因为，容易有情绪，说话爱“走火”或者争吵起来。我们自创的教育方法，简称为“四不”“一屋”。





这诸多的不成文的“不”，是否会影响我们对孩子的严格管教呢？一点也不。我们的“个别谈话”，是相当严肃的。然而，这种严肃，重在分清是非，并不影响家庭的气氛，我们的家始终是温馨与和睦的。

“我们想使儿童变成聪明、贤良、磊落的人，用鞭挞以及别种奴隶性的体罚管教他们是不合适的”，“奴隶式的管教，其所养成的也是一种奴隶式的脾气”。这是西方哲人洛克的名言。

总之，我和我的先生都虔诚地笃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为孩子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呕心沥血地去创造条件。但是，比起他们的一生来，我们的力量还是十分绵薄的，孩子们的未来，还得靠他们自己去创造。然而，我们还是坚信他们会有一个充满阳光的未来。

## “孩子王”变为班上“好带头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子女成才，是一种艰巨的事业。西方近代哲人斯宾塞提醒父母“经常记住正确地进行教育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而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是成人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

把一个孩子，特别是人们称之为“问题孩子”变为一个“好孩子”，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好的父母”，是能够看到这种艰巨性，具有坚强意志和深厚感情，以满腔热忱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努力寻找使孩子转化的各种方法与条件，这里特别需要的是“深厚感情”。爱孩子才能教育好孩子。与其把注意力放在消灭儿童的缺陷方面，不如把注意力放在用生气蓬勃的爱来感染他们方面……只消灭恶的而不补充善的是没有结果的。

我和我的先生做得也并不完善，但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与教训，我们体会，作为“好的父母”应该有上面的境界。

我们的长子金煜，有着一一种非常可爱的性格，他豁达，诚实，悠然自得，助人为乐。他又很幽默，爱开玩笑，有时妙语解颐，使人笑不能止。所以，同他在一起，非常开心，有信赖、有依托、有理解、有包容，他的心好像是大海。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可是，这样的一个儿子，小的时候外号却叫“小闹”。而这个名字伴随他走过整个幼儿园的童年。还在他牙牙学语的时候外号就有了。他是一岁半送幼儿园整托的。

一次，我去接他，幼儿园老师说：“这个孩子很可爱，我们都喜欢他。就是夜里好哭闹。可白天不哭，很爱笑”，“晚上哭，白天笑，我们给他起个名，叫‘小闹’”。

我同老师开玩笑说：“名字起得很有分寸，如果黑天、白天一起闹，就够得上‘大闹’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现在还不够。”

老师的话，我真的领教了。每周六、周日晚接他到家，总有一阵哭闹。当时，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教师，都住在一个大的筒子楼里。怕影响别人，夜里我总是抱着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想：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个毛病，送整托后，变成了“夜哭郎”？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1）来北京前，在沈阳有一个老阿姨带他，他们的关系很好。现在环境是陌生的，人也变了，小孩不适应。（2）孩子过早地送幼儿园整托。中央党校当时的幼儿园办得很好，一岁半就可以入整托。所以，我们也像当时党校的其他年轻父母一样，孩子一岁半刚过，就送了整托。孩子饮食起居，困难都比较大。（3）离开了妈妈。长子吃母乳整整一周岁，夜晚一直同我一起睡。黑夜总是依偎着妈妈，睡觉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小手放在妈妈的胸脯上，好像时时怕大人离开。有时夜里睁开双眼，看有妈妈在身边，依旧睡。可是，去幼儿园后，夜里摸到的是冷冷的小木床，看到的是身边熟睡的小朋友。孩子还不懂事，分辨不出具体差异，但会有所感觉。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幼儿园的老师，希望一起解决“小闹”的问题时，老师认为分析得很有道理，并表示一定要相互配合。

闹夜，这是相当大一部分孩子的习惯。解决的办法各有不同，但不论是谁，父母恐怕得分析它的原因。特殊的环境，孩子的特殊性格，会显示出各种特殊的原因。“水有源，树有根”，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找出特殊原因。

我家“小闹”的问题，大约有半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主要是由于幼儿园老师的精心照顾，把他单独作为“问题孩子”，夜里在交接班的时候老师们都相互转告：“夜里对他多看看，多拍拍，多抱抱，多哄哄。”由于老师们代替了他的那位老阿姨的看护和妈妈给予的温暖，以及孩子对幼儿园环境的适应，半年后，长子金煜夜里不再哭闹，也不再吵人了，皆大欢喜。



可是，他的“小闹”的名字却流传下来。至今，有时在党校大院里看到当年的阿姨，还不时地提及：“当年的‘小闹’，现在可有大出息了！”我一再表示感谢老师。

长子金煜的“孩子王”的绰号，是在“五七干校”时老师给起的。当时，社会上对“五七干校”的印象很不好，一般都认为，这里集中的是“黑帮”、“走资派”等劳改犯。我们周围的农民的认识，也很难例外。他们在言谈话语中，难免把这种看法传给孩子。所以，中央党校的孩子上了农村小学后，同农民子女的关系并不融洽。听孩子们说，常常被骂“黑五类”、“狗崽子”、“小走资派”等。每当听到这些，我们都告诉孩子“不要理”。有时，听孩子说：“他们又打党校孩子×××了。”我们说：“告诉他爸爸，找找老师，以免再打、打坏了。”这种党校孩子挨打的消息，从家长方面也多次听到。

党校有上百个孩子在农村小学上学，家长们都忧心忡忡，怕孩子们相互打起来。可是，家长们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孩子们慢慢打起群架来，一群打一群，最大的一次是“百人大战”。没想到这场“大战”，竟和我的长子金煜这个“孩子头”有关系。是他和农民孩子的头头尹同学先闹起来，于是双方孩子随着两边头头的推搡而“起哄”，厮打起来。家长们当时虽然没有在场，但听传说与孩子们的自述，是在放学路上，一方是干校孩子，一方是农民的孩子，双方越聚越多，最后达到上百人之众。

第二天，干校领导和管干校子弟教育的同志，把一些家长找去，我自然在其中。领导介绍了打群架的情况之后说：“校领导明天要带着一些家长去道歉，因为我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一定要搞好关系，不能再发生打架的事情。”

军代表说：“据小学校方讲，互相无重伤，主要是骂架。今天我们找来的是各班孩子头的家长，明天，我们一起去向贫下中农道歉。”

次日，军代表和干校抓教育的领导，带着我们一些家长，到了尹坡小学。主要是听小学校领导和干校领导讲话，也有老师讲，但不多。

小学校领导，主要是讲“百人大战”的简单经过，而且说“多亏有的老师和家长及时赶到现场，避免了孩子们受重伤”，还说：“希望双方家长同学校配合，教育好孩子，这种事以后不能再发生。”

干校的领导主要是讲：“我们和家长代表们一起道歉来了。干校的同志下来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想到孩子们之间发生了这种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事情。很抱歉，很对不起！以后，我们对于校孩子一定要严加管教。”他还提出希望：“中共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是全部党校的人都来了，只有极少数‘黑帮’，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而且，‘黑帮’的孩子同他们父母的错误没有关系。请尹坡小学的家长告诉自己的孩子，希望相信干校的孩子，并能够相互交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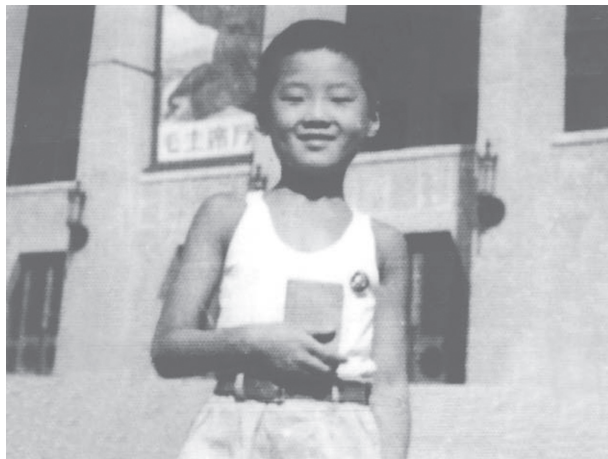
班主任代表讲话也说：“党校的孩子学习都比较好，希望孩子们在一起互相学习，都成为好朋友。”

这种会开得家长们心情比较舒畅，以后的事，就是双方孩子家长，各自给孩子做工作了。这之后，干校领导还多次为孩子们开会。我也和党校的一些家长去找老师，研究怎样教育好孩子。

金煜老师说：“金煜是‘百人大战’的头头，他是一个孩子王……平时他就是班上的孩子头。他若是好，全班好；他若是不好，全班就不好。有一段，他上课说话，班上纪律明显下降。我找他谈话，让他在班上当个‘好带头羊’，帮我整顿纪律。有时上课孩子们说话，我说几遍不行，他只吼一声‘别说了’，立刻安静。”

我问：“为什么？是不是他平时对同学们很凶，都怕他？”

老师说：“他平时总是笑呵呵的，对老师、对同学都不凶。主要是学习好，有问题同学都愿意问他。他还很会玩，打雀、摸鱼很有本事。听说，他一走，后面常常跟着一大群，还有别班的孩子。好像都怕金煜不理他们。”



“小闹”、“孩子王”变为“好带头羊”的金煜



回家后，我一再叮嘱：“小煜你一定要在班上起好作用，团结所有的小同学。”他每次都半开玩笑地回答：“妈妈，不成问题！”

后来，我和几位家长一起去拜访老师。关于金煜，她们主要是谈：“这个孩子进步很大，其他小朋友也跟着好起来！”

我说：“他哪里会有那么大的魅力？”

老师说：“孩子们爱听孩子的。金煜很仗义，愿意帮助人，学习上帮人很热心，好像打架有金煜在场他们也放心。原来，班上只有党校孩子同他好，现在我们班村里的孩子也跟他好起来了。”

真没想到，金煜和班上很对立的一位姓尹的同学，也是从他们二位往身上互甩墨水开始的“百人大战”，后来竟成了最好的朋友。记得一个暑假，尹同学背着半面袋自家地里种的香瓜，满脸流着汗，从他家中背来送给我们。河南的夏天，干燥酷热，我们全家都十分感动。金煜说：“农民的儿子非常实诚。对人不好时，他就吵；对人好时，他可以把整个心掏给你！”他们后来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干校解散，我们全家搬回北京前，尹同学还来家看我们。

我们在离开干校时，曾去看老师，她说：“很庆幸，终于把金煜这个班上的孩子王，变成了好带头羊，他帮我做许多事情，少操不少心；也庆幸他和尹同学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这种‘不打不相识’的童年的诚挚、天真无邪的友谊，是很可贵的。”至今金煜还很怀念他们的老师。他说：“有一次，我上课睡觉，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没有批评我，反而打了一盆凉水让我洗脸。从此我再也不上课睡觉了。”

从“小闹”、“孩子王”变为班上的“好带头羊”，留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我想：没有孤立的家教，哪一个家庭都不是生活在渺无人烟的荒岛上。一定要有校内外的紧密配合。家教的硕果即孩子们的成长，向来是师长与父母共同浇灌、培植而成熟起来的。这是共同的汗水结晶，也是共同的心血结晶。要感谢老师，绝不能泯灭作为辛勤园丁老师的心血。孜孜不倦地教育着孩子们的老师和父母，应当永远受到社会的尊敬。



## 个个捧着大砖头静静阅读

子女成才要靠多方面的力量。家教固然重要，但仅靠一个家庭内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要有社会的培养与影响，学校的哺育和栽培，还有“小社会”即周围邻里、至亲好友的帮助。

因此，父母在家教中遇有困难不能“封闭”自己，不能独居“斗室”，焦虑、惆怅、冥思苦想，而要迈开双脚、走出家门，诚挚地向社会、向老师、向亲朋好友“求助”。“多谋才能善断”，“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

还是“文革”期间，一个夏日的傍晚，我独自在庭院里散步。编书一整天，头脑发涨，想一个人在院里走走。这是中央党校的南院。院子的正门，正对着颐和园的南门。当年慈禧太后建颐和园时，在这里专为文武百官营造了下榻之处。院子很美，有湖泊，有小桥，有桃园，有早年的小四合院等。

但是，看到这一切，无一能够引起我的兴致，心情很沉重。看着刚刚升起的月亮，好像凝固不动。不时抬头望着明月，遐想嫦娥会奔向冰冷的月宫，无情胜有情，而人间为什么这样无情啊！领导明明知道孩子爸爸被派外出农村搞运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在家，却硬要把我和四个孩子分开，调来北京“编书”，搞得我日夜思念。想着想着，眼泪止不住像泉水一样地流了下来。散完步，不敢回屋，因为，我和从干校调回北京工作的一位女友住在一起，哭后红肿着双眼，没有办法见她，于是，我在院子里转悠了一个多小时。

那是在被指定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折戟沉沙以后，党中央号召学习六本哲学著作，即《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很多干部读不懂，于是哲学教员被起用。我曾一次又一次地被安排讲课。在我们干校讲课，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只能夜里备课，已经够辛苦了，但总还能够同四个孩子在一起。可当时又多次被抽调到其他干校讲课，什么石油部干校、农林部干校等，一去就是两三天。老金被抽去参加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下乡了，几个月才回来一次。我又反复被抽调外出，扔下四个孩子在家里，实在不放心。车一来接，我总是提心吊胆，怕孩子出事。但正像派我外出讲课的领导所说的“这是政治任务，学习是中央布置下来的”，有谁能顶着不去呢？心里像吊着一块大石头，压力很大，既惦念孩子，又必须讲好课。因为是代表中央党校去中央各部委干校讲课的。那些干校的人在乡下虽穿得不好，但水平很高。这我心里一清二楚。

然而，更使我预想不到的是，有一天，一位编书组的负责同志来找我谈话，说：“校领导研究让你去北京编六本书的辅导材料。”

我说：“去不了，老金抽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再走，四个孩子怎么办？”

他根本不回答我，只是说：“领导知道老金不在家，可是，反复研究，再找不到别人了，只能你去。”

我说：“哲学教研室人那么多，都在干校，怎么非我去不可？”“现在小三、小四只有八岁，哥哥十一岁，姐姐十四岁，谁照顾他们啊？”

很明显四个孩子需要人照顾，可是，来通知我去北京的写作组的头头却说得很简单：“大的照顾小的。领导已经决定了，不能不去，下周走，做准备吧！”

我说：“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必须去？”

他说了一句“必须去”，很不耐烦地转身就走了。似乎我这个人很不知趣，不让你在干校劳动，让你去北京编书，还不愿意去！

我当时心里很生气，认为他和那些领导生孩子太少，不理解我这个多子女的母亲，从而做出这种不近人情的决定。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不讲人情，不讲人性，不考虑干部的实际困难，一味强调政治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的生硬作风，不正是“文革”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吗！在这种大气候下，个人抗争是无用的，只能服从了。

说准备，我自己没什么好准备的，夏天随身带几套衣服就可以走，关键是怎么安排这几个孩子。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就去找几个好朋友，同他们讲述领导的决定。大家都很同情，表示尽一切努力帮助我。

远亲不如近邻，首先考虑到的是，同我们只有薄薄的一层秫秸墙壁之隔的邻居，孩子们称为“汪阿姨”。她淳朴、善良，对朋友异常真挚、诚恳。因为



## 我家走出四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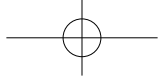
有心脏病、十二指肠溃疡，下地干活几次虚脱，用架子车拉回后，再也不叫她去干活。平时，我对她很好，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并称她为“汪姐”。她热诚地说：“我整日在家，可以在生活上把孩子照顾起来。”把四个孩子扔给一个老病号，我实在不忍心。本该照顾她，可是现在相反，她出来为我排忧解难了。干校不能请保姆，其他同志又都白天下地干活，晚间各忙家务事。当我不得不走时，又找不到别人照顾，只好把孩子扔给她了。真是无可奈何！

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校医室的一位姓傅的女大夫。她来干校前，长期和我住在一个楼。她在三层，二层还有一位女友。她们对我们照顾得都很好。当时，在我家做临时工的阿姨说：“你们好像东北三姐妹。”傅大夫深夜亲自送我上医院，13时7分生下小孪生兄弟。这以后，她自动做了我家的义务保健医生。很喜欢我的四个孩子，经常是下班回来，先到我家，看看孩子，再上楼回自己家。由于她的经常照顾，我的四个孩子只有两个短期住过医院，其他的病没有出家门就得到了及时医治。她比我的亲姐姐还亲。我编书一走，孩子的健康和学习，就由她操心了。我几个月不在家，老金住在乡下，挤时间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跑回家一趟，也只能住很短时间，起不了多大作用。全靠汪姐和傅大夫常去照看孩子。

为了减少我的挂念，傅大夫还写信给我。记得在一封信里她谈到去看孩子的情景时说：“孩子们放了学，做少许锻炼后，就回来写作业、看书。我常常看到他们手捧着‘大砖头’静静地阅读。”孩子们看课外书的能力都比较强，从八九岁起，都可以看大部头的小说了。见傅大夫在信中的生动描绘，我异常感激，放心了许多。

后来，孩子的二伯父、沈阳医大附属医院的著名教授金春和来京开会，我谈到小三金侠的心脏病时。他即刻去找阜外医院的心脏科专家、他的老同学胡旭东，请他为爱侄医治。正是这位专家曾做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联系好后，我喜出望外，请一位姓李的老师，趁回京公出之便，把孪生儿子带回北京。我当时同一位女友共住一个房间，放不下孩子。所以，把他们放在北京大有庄的一位阿姨家照看。我请假带孩子去查病、医治。

完成编书任务后，我带着两个儿子，重返河南“五七干校”。他们上学，我又去劳动了。



这件事留下了生平难以忘怀的反思。上一节中曾谈到，没有处于孤岛中的家教，孩子上学后，需要家长和学校老师的配合，此外，家教还需要社会的配合，其中尤其亲朋好友相濡以沫的救助。谁也没有三头六臂，个人没有分身术，亲朋诚挚的帮助，会使你增添力量，增添“心脏、大脑和双手”。



## 第三章

# 青年的求索与拼搏

### 让孩子“闯出成功的悟性”

一个有理性思维的母亲，一个真正要孩子成才的母亲，一定要敢于“放飞”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到社会上去闯，到大自然中去闯。这会使他们闯出成功的悟性，即获得与发展自身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想象力对于事业的成功是不可缺少的，是至关重要的。做父母的千万不能阻拦孩子，不能“锁住”孩子。能够放他们走出去，就是间接帮助孩子赢得悟性，发展想象力。雏雁如果总是匍匐在母雁的羽翼下，羽毛不会丰满，永远不会飞翔，不会成为远飞的大雁。

有的同志见我的几个孩子先后出国了，对我说：“孩子都不在身边也不好，到老了没人照顾。”

我的回答总是一句话：“我不能阻碍孩子的发展。”

做父母的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这是人之常情。我这个人尤甚。因自幼丧父，只同母亲、兄长三人艰难度日。所以，总有一种可怕的“孤寂感”紧紧地缠绕着我。和我先生喜结良缘，又有了一个亲人，好像又多了一层依靠，一生同他相依为命。有了小孩后，总想孩子时时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每放走一个，就有许久许久的心酸、难过和思念。

但是，每当我送孩子出国时，却都是高高兴兴的，从不落一滴眼泪。还告



诉比他们晚出国的配偶：“不能哭”，“上路有人哭，不吉利”。这并非因为孩子出国能够满足母亲的虚荣心，也不是妈妈变得心狠了，更不是相信了古谚：“送君流泪不吉利。”而是因为在感情上，已经有了一个磨砺过程。好像从孩子们考大学起，我就经过了这种情感上的“炼狱”。

记得长女金萤考上大学时，我非常高兴。她考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从插队考上大学，怎么能不令人欣慰，况且女孩学医天性也比较合适，其中还有一点使我格外高兴的是，女儿在大学学习五年期间，能够不离开北京，不离开家，每周都可以回到自己的身边。

可是，长子金煜考大学就不同了。他喜欢大海，一定要报带“海”字的大学或学院。当时比较有名的是山东海洋学院（现称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运学院等。我很不愿意他报这种志愿，总觉得他是 101 中学的好学生，报考北京的大学不成问题，为什么要远离家、离开父母？感情上怎么也舍不得。但是，报志愿时，我的先生同我相约：“我们一定要注意孩子们的志向，可以做参谋，而不当司令，不能‘越俎代庖’，要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有了这种理智的信条，我们就不能，也不该多说话了。最后，孩子考上了他所报的第一志愿，即青岛海洋学院，孤身去了山东。他走后，其他两个儿子，先后考上清华大学和协和医大，都在北京，而且是一流学校，我当然十分欢喜。可是，每当周末三个孩子回来团聚，少了一个大儿子，欢喜之中，心里总是掩埋着几分难过和思念。聪明伶俐的长女，比两个孪生弟弟大六岁，敏锐地觉察到了妈妈的痛处。

她曾多次劝我说：“妈妈，您不能总想着把孩子搂在自己的翅膀下，放走一个就难过一回。孩子们都是要远走高飞的，妈妈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先生有时看出来，就同我开玩笑说：“又想孩子，犯老母鸡的毛病了。”

我自己也觉得不能不听他们的良言相劝，得学习《杨家将》里的佘太君。慢慢好了一些。

但是，后来遇见一件事，我可难过极了。这是一年夏天的暑假，长儿金煜没有回来，同学捎回一封信，打开一看，信上说：“假期不回家了，想要多学习些。”

我凝视着信，问同学：“要学习怎么不把书带回来？”

回答是：“他可能想半日学习，半日打工吧。”

我急忙追问：“干什么活？”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回答：“帮着搬书。图书馆搬家，书得从一楼扛到五楼，没电梯。”

同学在时，我尽量克制，一走，眼泪刷刷地往下掉，越想越怕孩子累坏了。特别是想到，当时家境困难，同时供四个大学生，没有一分助学金。因为，当时国家规定，家庭收入平均每人在三十元以上的，不能享受助学金。我同我先生的工资合起来是一百八十元多一点，平均恰好在三十元线上。我们吃得很节省，孩子们的衣服是补了又补。我们的长子很懂事，看到这种情形，曾问我：“妈妈，如果我能考上研究生，还能不能供？”我说：“就是去寄卖衣服和裤子，也一定供你们。”看来，长子对于学费，一直是很有忧虑，想通过打工帮助家里。他很有闯劲，是我国恢复高考后，大学生第一批打工者。当时，我的脑子还不开放，总以为是家境不好，使孩子受苦了，当时不懂得在国外的大学，打工已习以为常。一个假期心情都很不好，哭了几次，格外想念我的长子。这种感情上的熬炼，真是苦得难以陈述。然而，孩子却成长了。这为他后来出国留学，边读学位、边打工赚钱，弥补助学金的不足，以坚持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的小儿老四第一次离开我们独自外出，是在一个美丽的黄昏。他正在清华大学读书，需要到沈阳中科院金属材料研究所合作搞项目。其实，只去几个月。可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最小的孩子第一次独自离开家，听说学校的这个安排后，一种挂念和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他上火车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医院护理他爸爸，虽然孩子百般劝阻不要相送，我还是坚持要送。我们商定我从医院、他从家出发，到火车站会合。可是，由于我到晚了，那一班车已放行完毕，我是最后到站台的。人们已上车，还有十五分钟开车。我没有记住他的车厢号，所以，从第一个车厢，跑到最后一个车厢，又从最后一个车厢，跑到第一个车厢，一心想把买的吃的东西交给儿子，并再看他一眼。多亏自己年轻时是运动员，否则这一顿跑，也吃不消了。“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中段车厢，从外面看见了儿子。他发现我，从车厢里跑下来，车都快开了，我本该喜出望外，可是却热泪横流。并一再叮嘱：“第一次出门，一定要小心谨慎。”儿子跳上车，还站在车门挥手喊：“妈妈放心！”我举不起手，因为在擦眼泪。看着徐徐开动的带着儿子远行的列车，颇为惆怅。送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我看着落日的黄昏，心想：





黄昏，你能：  
安慰受剧烈痛苦折磨的灵魂，  
安慰头昏脑涨的学者  
和重返卧榻的劳动者，  
可是你为什么偏偏不能安慰我？

（波德莱尔：《恶之花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这一生相依为命的老公，卧病不起，肺部肿瘤手术的结果，尚不得而知；儿子们一个又一个地“飞走”。好像我已经难以承受这种压力。看看周围，站台的人都走空了，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回往医院的公共汽车。在路上突然想起，人们赞美法国19世纪与雨果齐名的大诗人沙尔·波德莱尔风格的两句话：“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像英国雾一样具有渗透力。”（波德莱尔：《恶之花选》，第133页）我们夫妻、母子感情的“渗透力”很强。但是，我的感情为什么这样脆弱？人的感情到必要时，能否也会变得像大理石一样的坚硬呢？我边走边这样想着。这次放飞孩子，对我的感情又是一次考验，但我觉得表现并不良好、不合格。

然而，小儿子却经受了同他哥哥一样的很好的锻炼。他在来信中说：“我现在身体很好，每天学打篮球，已经开始入门了”，“最近还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作《位错体系的统计模型及其单晶屈服强度的计算》，花了足足一个月时间，是一个纯理论性的论文”。

我们的次子，也就是在家中排行老三的金侠，平时沉默寡言，但异常聪明，善于观察，想问题很深。我这个妈妈好像已经被他看透了。可能他估计，反正事先告诉妈妈，惹得她舍不得，索性来个“先斩后奏”。按照既定的学习计划考入协和医大的头两年，是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基础课，北大离中央党校很近，骑自行车只要十多分钟，可以经常回家。有一次他说星期日要和同学一起出去玩。我想是近处，很快就答应了。后来，我从他写的《踏上北京第一峰》的回忆文章中才发现，他和同学们“历险”去了，这是一篇十足的“历险记”。下面摘录几段：

“4月份的北京，暖风拂绿了高高的白杨树梢，一个星期六的下午1时15分，我们一行八人，带着十四个水壶、两只手电筒和一些零碎，背着两架照相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机，从北大骑车向东灵山出发了。

“地质系 × × 说，那是北京最高峰，在北京西北方，海拔两千三百多米。从地图上看，不过一百多里，我们满以为只消一天半便足以往返。谁知事情却大出所料。

“骑出门头沟进到山里时是 4 时 20 分，突然杜培刚的车胎坏了。尽管花了两个多小时，补了三个洞，还是没能维持多久。于是我们分成两半，一半人先骑车走，到前面搞点吃的；另一半只得徒步了。不幸的是，我们接着就遇上了一段最难走的盘山公路。仰面而视，只见那路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条白色的大蛇缠绕在青山之上，蜿蜒而上，够着天上的云朵。

“我们只得先倾着身子，把全身的力量都压在前脚掌上，一步步缓慢地行进。车轱辘仿佛不是圆的而是方的了，费很大劲才拖着走一点。我们流着汗，默默地走了一个多小时，除了几十米深水沟下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偶尔传出的狗叫声以外，伴随着我们的就只有自己的车轱辘声和汗水落地声。其实这段路充其量也就两千米。

“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终于有下坡路了。管他车胎坏不坏呢，靠瓦圈也能轱辘十几里。‘呼’‘呼’耳畔扇动着风声，骑着车飞驰而下。这里也不知道有多少急转弯，恐怕每五十米就是一处。尽管捏满双闸，还是止不住心惊肉跳，只见自行车不停地往前蹿，好像稍一松手就要撞到几十米外的另一个人身上，一同跌进路旁的山涧。还好，我们平安地在一个叫‘雁翅’的地方会师了。多亏一位姓阮的养路工的帮助，杜培刚的车胎终于补好，这时已是 10 点钟了。‘东灵山高入天，雁翅方才到一半’，这是这儿的民谚。考虑到还有一半路要走，我们决定继续赶路。”

于是孩子们又开始夜行。如果有我这个心疼幼雏的“雁妈妈”在，绝不会让孩子继续赶路。“谁知道前面还有什么险情，况且，孩子们已经劳累一天了”，这是我当时必然会出现的心态。

可是，孩子们有他们的逻辑，要一鼓作气。事实证明，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继续闯，使他们闯出了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胆量，以及更多的“关于闯的经验”。他们想出不少办法去摸索走漆黑的路。“小分队”的前面一个手电，后面一个手电，用微弱的电光照亮，每人依序口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以防止掉队。他们还用歌声、笑声、吟诗冲破对黑夜的恐惧。



“然而，夜，仍是那样黑暗，尽管满天繁星；路旁永定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像毫无表情的时钟，偶尔，头顶飞出一块巨石，活像山妖张开了巨口，要把这些斗胆的年轻人吃掉。”

“当我们到达‘斋堂’（地名）时，已是午夜1时了。随便在路旁找了个客栈，为了不惊动熟睡的主人，我们便在马厩旁边的草料堆里住下了”，“咕咕的



闯出成功悟性的金侠

野鸡声，唤醒了寂静的荒山，红日初升，开启了又一个黎明。捧一捧清凉的山泉水，洗去头上、脸上的草屑，再吃一顿盐粒煮面条，做好最后冲刺的准备……这天12点，我们全部登上顶峰，在地质杆下面留下了象征胜利的合影”。

文中还有许多有趣、生动的具体经历，这里不想一一引述了。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经历所给予孩子们心灵的启迪是什么。

通篇看来，似乎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闯出了成功的悟性”，这是身内之物、无价之宝。从文章的结束语中，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

“当我们全身匍匐着向山上爬的时候，当我们迎着六七级的山风站在山顶的时候，当我们用一根绳子牵着下山的时候，当我们扒断手腕粗的朽木、踏着一尺多厚的腐叶穿过原始森林的时候，当我们……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在我面前呈现：人们羡慕成功者的幸运，可知道他们走过的是怎样的路吗？”

这里告诉我们，此次孩子们的闯，难能可贵的是，闯出了一种对人类成功的认识，即独有的悟性：只有不怕艰险，敢于攀登的人，才能获得事业的成功。

“对孩子来说，想象比拥有百万家私还重要。凡是幼儿时充分发展了想象力的人，当他遭到不幸时也会感到幸福；当他陷入贫困时，也会感到快活。所以说，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不善于想象的人。这种人在社会斗争中必然遭到惨败。”（《早期教育和天才》，第172页）这是日本教育家本村久一令人久久思索的深刻论述。而这种想象力的基础是头脑中的一系列的悟性，悟性来自直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观，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到社会中去观察，去亲自体验，亲自实践。父母特别是做母亲的，必须学会自觉磨砺和克制那种舍不得孩子“外出苦练”的情结。

### 锻造一副能够保护自己的盔甲

成才的路是艰难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有风险的。所以，孩子们需要有护身的盔甲。这种“盔甲”是什么？以我看它不是着装于外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身内之物。它不是古人抵挡长矛大刀的战袍似的“盔甲”，而是应付当今复杂环境的现代化的防身“武器”。

现代化的防身“武器”，这要靠孩子们自己去“锻造”，在一定时间里，当然还需要父母帮助去“锻造”。父母如何帮助？著名的政治家希拉里·克林顿曾较早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参考消息》曾刊有一篇写克林顿一家的文章。其中，谈到希拉里的家教：“希拉里经常教育女儿，希望帮助她锻造一副能够保护自己的盔甲。”（《第一家庭的“黏合剂”》，见1999年2月4日《参考消息》）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令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下去，希望了解希拉里将什么看作保护孩子的盔甲，又是怎样帮助女儿锻造的。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她问女儿：‘竞选的时候，人们会说爸爸妈妈的坏话。如果他们对你说……你怎么回答呢？’省略号后面是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辱骂之词。切尔西禁不住泪如雨下，坐在一旁的父亲脸色灰白。希拉里要上的课就这样完成了。”

这是让孩子在竞选中有一个思想准备，能够挺得住别人对自己父母的辱骂。当然，作为国家领导人孩子的切尔西，帮助她领受一下“身在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希拉里这位令人尊敬、有教养的妈妈，对切尔西进行这种教育是很必要的。然而，文章所要探讨的问题是：“怎样帮助子女锻造一副自我保护的盔甲？”回答得似乎过于简单了。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她在思考这个问题。沿着这个思路，我回顾了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在这里，没有同这位可尊敬的夫人比试高低的意思，只是希望共同探讨问题。



什么是孩子“保护自己的盔甲”？怎样锻造？我觉得，如果高度概括的话，那就是父母要教给孩子自觉地塑造关心和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有了一个健康的心态，能够对于任何问题，有信心以一个“最终胜利者”的心态去处理，这样，就可以对付各种困难、险情以及突如其来的袭击，包括他人对自己父母的侮辱。而不会在忧郁、孤愤、幻想和躲避的病态心理中追寻没有可能的解脱。有了一个健康的体魄，能够坚持学习、劳动和锻炼，头脑会时时保持清醒，事业上有勇气也有能力拼搏，有力量顽强对付坏人和一切恶劣环境。

虽然过去我没有关于让孩子有“保护自己的盔甲”这样明确的概念，但是，我们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孩子这一方面的素质。可能这也是一种“锻造”吧！我们认为能够让孩子们有一副“保护自己的盔甲”的首要因素是知识武器。因此，要求每个孩子学习都好，这是我们的“至上命令”，毫不含糊，毫不让步。同时我们又帮助孩子学习，讲解他们不会与不懂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孩子理解“为什么而学习”。孩子们出国已十来年了（当今，在该书再版问世时，孩子们出国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是，至今在我的儿子的大学日记本中，还将世界名人的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这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名



各个都具有保护自己盔甲的“身心健康”的四博士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言。

关于这种人生所应有的追求、学习的最终目的，我们经常给孩子们讲。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我们几个人都学习劲头十足，就是因为心里有个大目标。”最近整理书，还发现我儿子的手抄卡片有这样的话：“诚实做人，处事正大光明。”下面注的是：“查理的房子有着这句铭文。”同样的话，卡片上还有一行英文。孩子都精心地抄下来，显然是将它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了。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健全的心理素质，可以说是“保护自己的盔甲”的基础。

另一种构成盔甲的重要因素是身体素质。关于怎样培育孩子们的健康体魄问题，我和我的先生都花了很多脑筋和工夫，也给孩子们许多鼓励。从小我们就带孩子们游泳、滑冰、打乒乓球，还让孩子们和小同学一起打篮球，长大打排球、踢足球。



三弟兄在滑冰，金煜（中）、金侠（左）、金延（右）

运动是要花“本钱”、付出代价的，然而，这是一种大有益于终身事业的代价。可是有些为人父母者却没有搞通这个道理。我曾看到这样一篇报道，一个孩子爱踢足球，还总想为班上争第一，所以课外花的时间比较多。一天，外面下小雨，他踢得满身是泥回来，被父母打了一顿。后来，孩子因为父母伤害他的自尊心，而自杀了。遗书上还告诉一位同班同学：“咱们班一定要踢一个第





一名。”这是一个很凄惨的例子。父母打孩子的理由，不只是弄脏了衣服，还说“玩影响学习”。无疑这是将运动和学习对立起来了。我们则要求孩子，运动时全身心投入，不想别的，使大脑得到充分休息。学习时全神贯注，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孩子告诉我们：“这样学习，感到轻松愉快。”他们都是不同学校的运动队成员。长女金萤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校排球队的队员；长子金煜是青岛海洋学院的校篮球队与校乒乓球队的队员；老三是协和医大校篮球队和校乒乓球队的队员；老四是清华大学冬泳队的，并考取了国家田径三级裁判。

金煜说：“考试前，别的同学紧张，我玩，打乒乓球。高中时，我考全年级第一，老师让我向几百名高中生介绍学习经验，我也不知道自己都讲了些什么。”考取了海洋大学（当时称海洋学院），他照样热衷于球类。

为使孩子们身心健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尽量让孩子们参加各种文娱活动。不仅要使孩子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而且要充分享受年轻人的快乐。学习是一件苦事，但学习好了，“苦中有乐，乐在其中”；运动本身就会带给人们健康、愉快。可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活动，常常会被家长忽视，这就是孩子们的文娱活动。我们的家，常常我先生拉小提琴，我唱歌给孩子们听。我家还买了各种棋类，军棋、象棋、围棋、跳棋等。爸爸先是教，后来，他们就同爸爸比试。没多久就把爸爸从老师变成了手下败将。家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金侠在师生联欢会上表演西班牙舞（右一为金侠）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长女金萤成了中学校乐队中的小提琴演奏员；老三金侠是小提琴的爱好者。到读大学时，孩子们有时还参加表演。老三在一篇“随记”中谈到一次文艺活动时，非常开心地写着：他们“共享了年轻人的快乐”。在读完北大为协和医大所开的生物课时，北大生物系举行了“师生联欢会”。“晚会上，共演出了十四个节目，其中像朱承和陈小虎的双簧，以及我班编排的英文短剧，还有我和其他三个同学苦练两星期而排出的西班牙舞，皆为班会增辉不少。”

最后的节目一演完，“老师和同学手拉手跳起舞来，唱着《青年友谊圆舞曲》。舞台已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半圆，它已扩展到整个二楼饭厅。最后是一百多人都站了起来，一圈一圈地围绕着，在乐声中欢乐地起舞”。看，这真是一群欢乐的青年！

协和医科大学的学制，是八年一贯制，本硕连读。如果没有这种充分的文体活动，是坚持不下来的。金侠还作为一个好学生，坚持八年，获得学位。倘若缺少身心健康的“综合平衡”，是难以承受的。这些综合素质，也可以说是我们和孩子一起为他们“锻造的一副保护自己的盔甲”吧！

## 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作为母亲不仅要对孩子严格要求，而且要舍得让孩子到艰苦环境中锻炼，在暴风雨中成长，从而锻造出非凡的坚强性格，胜利通过布满荆棘的成才之路。

中国古代哲人孟子说得非常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

有一年的暑假，三个宝贝儿子都从大学回到我们这个温馨的家。一个是从山东青岛海洋学院回来；一个是从协和医大回来；另一个是从清华大学回来。京城的7月是多雨季节，但从7月下旬到8月，酷暑闷热。然而，我们的家却异常欢乐。三个人都带回了好成绩。两个孪生弟弟刚读完大学一年级，在大学所见，皆感新奇；哥哥已读完大学二年级，又身居异地，很长见识。三人在一起谈起来，海阔天空，情投意合，但有时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



见，争执博弈，加上哥哥的幽默，常常是笑声朗朗。他们的爸爸和我，最爱坐在一旁听儿子们“海聊”。我们二人常常像古人所说的“忍俊不禁”。

爱女金萤，已进友谊医院，开始做实习医生，从友谊医院乘车需两个小时才能到家，所以只有周末才回来。她的性格变化很大，开朗、活泼、有说有笑，一进屋就喊“妈妈、爸爸”，将几个弟弟看作自己的骄傲。假期和弟弟们在一起，好像做医生的疲劳，顿时而飞，总是参与弟弟们的“交流”，说啊笑啊！每当孩子们都回来，平时笑容可掬的爸爸，常常开怀大笑。而我呢？自从四个孩子都考取大学，每当假期团聚，总像喜从天降，笑逐颜开。

就是在这个欢乐的假日，我却有足足四天的时间，情绪很不好，坐卧不宁，忧心忡忡，自责自虑。

那是在1981年的8月中旬，暑假期间。三个儿子酝酿去“十渡”。十渡是北京郊区的一处风景游览区，当时才刚刚开发，很原始，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比较完善的交通和旅游设施。十渡什么样？我从来没有去过，至今还不知什么样子。听孩子说，那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开始，我很轻松，觉得北京闷热，出去玩玩也好，帮助孩子一起准备行装。8月18日，三人骑着自行车，起程了。

临行前，我问：“得几个小时到？”

长子金煜回答：“听说得骑上十个小时。”

我听后一怔：“啊？要骑那么长的路？”

好开玩笑的金煜说：“这小菜一碟，三个大小伙子，走也走得去。”

我又问：“得几天回来？”

老三金侠回答：“可能往返三天。”

我说：“时间不短啊！”

他又笑了笑，拍拍胸脯说：“妈妈，没事，你看我们几个身体多棒。”

老四金延满面笑容地说：“妈妈又不放心了，放心！放心！”

送儿子们到了路口，看着孩子们欢天喜地，向父母挥手告别，我们也就回家了。不知怎的这一天我心绪不宁，如坐针毡。心里反复嘀咕：“‘十个小时’，‘往返三天’，得穿过多少城市的马路？遇有车辆拥挤，他们只顾快骑，会不会出危险？”“上山时自行车怎么推呢？”“‘往返三天’，不能都是晴天吧，下雨可怎么办？”“车子都比较破旧了，若路上车坏，赶上没有修车的，可怎么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办呢？”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我一整天，心乱如麻。但又不敢向爱人倾诉。因为，听老人说，亲人外出，不能在家“想不吉利的事，说不吉利的话”，否则，人在外，心会乱，易出事。关于这种事，早些时候，我曾好奇地问过一位搞自然科学的老同学：“是这样吗？”他并不否认，而且说：“可能是远距离的生物磁场吧！”我一个人憋在心里，一个问号接着一个问号地在头中旋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搞家务没心思，看书也看不进去，多亏是假期。

于是，我告诉孩子爸爸：“我出去走走！”我沿着中央党校的人工湖漫步，心想：“是三个大小伙子一起出去的，惦念什么？这是不是有点庸人自扰！”“整个假期，怎么能够都让孩子憋在家里？”“他们的自行车都骑得很熟练，性格个个沉稳、机敏，你怕什么呢？”我看看天，万里晴空。当时，北京没有像现在污染这样严重，还能看到蓝天与白云。“大好的晴天，你怎么总想‘下雨怎么办’？这不是‘无鱼作罢’，白费工夫吗？”想来想去，心里略有平静，就回家了。

可是，第二天下午，真的下起雨来。我的心又开始翻腾：“糟了！我给孩子衣服带少了，下雨天凉。”“现在，他们可能该进入山区了，雨后山区的夜更凉。”“谁知道上了山，是雨后，还是正在下雨呢？怎么没想到多带几件衣服？我真是一个粗心的妈妈！”“阴雨，天黑得早，山路难找，只带一个手电筒。我怎么没有多买几个，一人带上一个。”看看窗外，雨越下越大。心想：如果到了山上，雨越下越大，几个孩子淋雨，发病可怎么办？

我问我的先生：“北京的雨这么大，十渡会怎样呢？”当时的天气预报，还不报十渡的天气。

先生为安慰我，说：“十渡还可能没下雨。”看着我那种心绪不宁的样子，接着又说，“你是不是又惦念儿子了？别想那么多。”

我说：“能不想吗？”

他说：“你还是有‘数不完的忧虑’啊！”

“数不完的忧虑”，是在“五七干校”时我总头疼，去看病，一位农村老中医指点病因的说法。我接着先生的话说：“可能老毛病又犯了！”

入夜了，雨还是下个不停。听到滴滴答答的雨点声，心想：我的儿子们究竟在哪里？若黑夜进入山区，会不会遇到蛇蝎虎狼？事先也忘打听一下，是否有这种可怕的动物。我这个人缺少预测，总是事后诸葛亮！想到这里，眼泪



流得湿了枕头。身边的爱人，睡得很香，一阵阵发出鼾声。我下床取手巾擦眼泪吧，又怕打扰他，只好用手擦擦泪，将枕头翻了一个面。我又轻轻地坐了起来，身上盖着被子，不停地责备自己：“人称我这四个孩子的母亲是‘女强人’，可是，我多么脆弱啊！怎么一想到孩子就坚强不起来了呢？”

熬过这一夜，已经是孩子们走的第三天了。上午读读书、备备课，心里还算宁静。中午和下午搞家务，看了看外面，雨后的路很泥泞，又乱想起来：雨后山里，路更滑，不摔才怪呢？可能吃的也带少了。我默默地数着面包和其他食品的数量，心想：三天肯定不够。他们说路过同学家可以吃，可是事先电话也没联系上；路上买着吃，钱带得够不够呢？

我问孩子爸爸：“你给他们带了多少钱？路上够花吗？”我家一直是他爸爸管钱，他会计划。

他说：“足够了，放心吧！我看你这几天没停地想儿子……今天晚上就该回来了！”

晚上，我到外面，往校门方向走，迎了几次，都不见儿子们回来，真是急坏了。爱人在忙着写文章，不便更多地打扰。只是每次回来，都问他：“怎么还不回来？”开始，他说：“再等一等。”天色已晚，他同我一起出去看了看，也着急了，说：“怎么还没有回来？”但还没忘记安慰我，又说，“今天回不来，明天上午一定会回来！”

这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心想：没有电话，没有交通工具可联系，会不会出事啊？想着想着，又流起眼泪。可是，很恨自己：怎么总往坏处想！

8月21日下午，几个孩子终于回来了。我乐不可支，里外张罗着，让孩子吃饭、喝茶、洗澡、更衣、休息。看来，他们已经累得不行了。

爸爸问：“此去怎么样？”

孩子们回答：“这不很好吗？”“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我说：“明天再谈吧，快吃快睡！”

孩子们都甜甜地入睡了，几天来，我也第一次睡上一个好觉。次日，几个儿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谈起他们的“四日游”来：

从家出发，驱驰一小时余，到丰台路口，小四车胎坏了，补胎。听到这里，我心中默默地难受，想：生活困窘，不能买新车，几个孩子骑着旧车走这么远的路！看来，我所惦记的事，出家不远就发生了。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不过，他们倒很乐观，又接着说，补好胎继续前进。而且，果真是找到同学了。顺利过良乡，拐个弯，到东方红炼油厂。在金煜的同学家饱吃了一顿烧茄子、冬瓜、馒头。同学又为他们安排了午睡、休息。下午5点，从“东炼”出发，6点在周口村的小饭店里吃了糖三角、鸡蛋汤、煮花生米。也是吃得饱饱的。我只惦记吃的带得少，未曾想到，他们已成为“大雁”，会在路上觅食了！10点到六渡，12点到十渡，在山下的十渡小学略略休息。

下午2点开始爬山，5点钟才爬上山顶。吃了六个面包后下山。不料，下山时，走差了路，晚8点，被一处绝壁阻住。试用绳子将金侠吊下悬崖开路，连续吊了几次，见悬崖太深，才作罢。天已经黑了，哥几个只好决定在山旮旯里宿营一夜。夜里10点多钟，实在太冷，根本无法入睡。于是，他们挤进一块斜翘起的大石头底下，铺点柴草，哥三个得侧着身子，背靠背，才能躺下。

次日凌晨，4时许，小三冷得浑身发抖，小四也颤抖得厉害，还不停地咳嗽。夜里多次听见火车叫，拿手电打了多次信号，也无济于事。于是兄弟三人决定再上山顶返回。上午8点多钟，才重返他们昨日所上之地。看见了希望，三人决定吃掉最后一点粮食：两个面包和一袋方便面。水是昨晚顺大沟下来时，在不大的坑里灌的。恐怕是积的雨水，有些发黄，上面浮着黄绿色，不知是不是苔藓，可是，又饥又渴，哪里还顾及卫生习惯！

然而，孩子们心态健康，帮了他们忙。谁也不报怨哥哥领错了路，大家还十分乐观。一边吃，一边向四周的山上眺望。他们说：“这时的情景，真令人难以忘怀啊！”

太阳一照，四周近处的山升腾起一片片薄雾。望着秀丽的蓝天，谁也不会想到，昨夜竟下雨不断。而远处的山，就更好看了。据说这儿与狼牙山毗邻。也就是孩子们在书中读过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那一场八路军抗击日寇，以少敌多，最后五壮士壮烈跳崖的那座狼牙山。当时也确实可以看到远处峰峦起伏，峰顶衔接得像颗颗狼牙。从“牙缝”里飘出一股浓浓的云朵，慢慢地向天上的云层溢去。儿子们形容“活像妖怪驾云直奔天宫”。而远山也呈现各种奇景。三弟兄还给它们命名：石头老人、鹰嘴岩、三尖两刃刀，乞灵下跪的人……

天晴后，山顶上的太阳越来越热。9点左右，孩子们决定顺原路返回。不料，究竟哪一条是已走过的上山路呢，三弟兄谁也不敢肯定。下山的路在哪





儿，怎么也找不到。后来，三弟兄是从洪水冲出的大卵石沟下来的。因为，从石头被水冲刷的形状上看，估计可以走到山底。下到山底的农家，向老乡诉说了昨夜的遭遇，老乡们好心地烤好的玉米给三弟兄吃。12 点半左右，兄弟们回到了十渡。孩子们说：“经过这几天不停的奋斗之后，我们活着回来了，但胳膊、脚上都留下了一道道清晰的伤痕。那是被草木划的。从第一夜起到昨夜，以及各人产生的一些怪诞的想法，我们都觉得像经过了一场梦！”

我问：“什么怪诞想法？”

小三金侠未假思索地说：“怕再见不到妈妈了！”

小四金延忙补充说：“真不知能否回来，怕见不到爸妈！”

大哥金煜说：“我夜里在山中想到的是国家要损失三个栋梁之才。”

到了十渡，吃过午饭，憩卧后，兄弟三人为消除疲劳，去十渡游泳。太阳出来后，照得温乎乎的水，摩挲着肌肉，身上的疼痛感立刻消失，极为惬意。从4点半去，游得很久，回来已经晚了，不能再行赶路，于是，只好多住一晚。

第二天，早7点起程往家奔，除中午小憩和吃饭外，大约骑十个小时，5点30分平安到家。

孩子们这次外出，战胜了种种困难，赢得了胜利，他们是“打胜仗”的小勇士。锻炼了意志，提高了勇气，丰富了人生，心旷神怡。

而妈妈的感受却显得有霄壤之别。主要是：

一、不该把已进入韶华时期的儿子们，还当作襁褓中的婴儿，似乎总得由妈妈包包裹裹，才能防风御寒。孩子已成长得会自我保护，做母亲的则应“情随事迁”，不能落后于子女的成长。

二、不应过多地自责，似乎衣服准备少了，食品带得不够，手电筒少带了，都是由于妈妈想得不周延。其实，诸如此类的事情，只要提醒一下孩子就够了。甚至可以提醒，任由孩子自己去锻炼，从而学会每次行动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三思而后行”。父母不可能跟随孩子一生，哪里会什么都由父母去代替他们思考！儿子们很明事理，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那么做母亲的何必无端地苛责自己，而自寻烦恼呢？

三、过虑是不应有的。不过“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也是人之常情。但过多地忧虑，就够不上是“拿得起，放得下”、有爱又有胆识的母亲了！

在欢快地迎接儿子们归来之余，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很欠“修炼”，是一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个需要不断自我完善的母亲！

### 智慧启蒙，培育小天使

成才需要知识，而知识需要积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知识的积累是一个长过程，需要勤奋、顽强、持之以恒。

中国古代的《孝友堂家训》中曾指出：“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治家、治国、治身、治心，道岂有先于此者乎。”（转引自《名人家教集锦》，第 426 页）

这些“家训”很有道理。孩子的成长如果没有对知识的勤奋、顽强、长期的积累，是无以成才的。首先，孩子要学习好，就要有勤奋、顽强的精神。否则在求索知识的道路上没有办法持之以恒。这种精神，需要自幼培养，使之变为属于他自己的内在动力，属于他那纯真的亮丽的灵魂的一部分。

女儿金萤 1956 年出生于北国冰城哈尔滨。幼小的时候，有着白白胖胖的小圆脸，略高的前额，被满头黑发覆盖着。哈尔滨过去是一个教堂颇多的城市。女儿常常使我想到教堂画像中圣母玛利亚怀抱的小天使。她虽然没有西洋孩子那种金发碧眼和卷曲的发丝，但同样有着白白的皮肤和圆圆的脸庞，差异并未使妈妈心目中的“小天使”难以寻找位置，只不过是把她想象为东方的小天使。

“天使”，这是圣洁的象征，是凝结着纯洁、善良、活泼、天真、聪颖、爱憎分明、智圆行方的可爱的小生灵。

我的女儿，后来变化很大。还在少女时期，她就不再是人称的“小胖墩”了，而成了纤细的少女；不久她又变成了身材细高，秀美窈窕的大姑娘；现在仍是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的妈妈。

然而，母亲好像最了解女儿。我觉得她的美，主要不是在外貌，而是在于她有着一个极为特殊的性格，即外表的轻松、嬉戏、随意，掩盖着内心进取向上、宁折不弯、顽强不屈的勇于拼搏的性格。



那种“持之以恒”的顽强精神，似乎自幼就已初露端倪。因为我和我先生来北京学习，她生下来就被放在姥姥身边。有不少时间她住在舅舅家，是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度过了充满好奇和遐想的童年。姥姥虽然没有文化，但会讲故事，而且女儿才二周岁多，姥姥就让她和自己的孙女、孙子排排坐，一起听收音机里的儿童故事、歌谣、小诗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机。每听后，还让四个孩子分别重复述说。长此以往，培养了孩子的持之以恒的性格，而且小脑瓜里的歌谣、故事、短诗，越积越多。女儿不到三岁时，我把她接回沈阳，她总是到点就让开收音机，照听不误。这时她什么话都会说了，会背诵许多东西。

1958年冬，安排干部下放。临走前夕，沈阳师范学院教研室的女老师说：“你女儿从哈尔滨回来这么久，我们还没看见过。把她带来玩玩。”

我说：“要结束课程了，这一阵子上课多，特别忙。”

资料室有一位女老师，没有担负课程，而且自己没有小孩，又特别喜欢孩子。她说：“你去上课，我带她玩。”

一天，起大早我把女儿从坐落在沈阳市南郊南湖的家，横穿整个城区，带到坐落在北陵的师范学院。8点钟，我准时去上课。因为是整个政教系的大班哲学课，课间休息较长，二十分钟。当时有的女同学喊：“李老师的孩子来了。”一帮女同学和男同学就往教研室跑去看。我说：“你们跑什么？好像看金丝猴似的。”有的男同学干脆把她抱到教室来，于是一帮人又跟了回来。他们把她放在我讲课的讲台桌面上，当然看上去，要比我高了，因为，脚是踏在桌面上站着。

一位学生说：“小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课吧！”其他学生都坐下了，我也坐在前排书桌的一个空位置上。我本以为，她会吓哭，因为两岁多的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大的场面。令我十分吃惊的是，她落落大方地问：“讲什么？”学生们说：“讲什么都行！”于是，她先是背诵童谣：

大马路，宽又宽，人行道，在两边，警察叔叔中间站。

接着又唱起儿歌：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人民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钱，对我把头点，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她刚一停，同学们就报以热烈掌声。她听到掌声更来劲了，于是，又诵：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她一个接着一个地背，一个接着一个地说。我看看表，仅有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还有两分钟就到点了。可是，她好像还有很多“课程”没有讲完。我请资料室的李老师把她抱走。她说了声“再见”，就被抱下台来。下面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接下来我上课，第一句话是：“把你们的休息时间都让她占了！”同学喊：“这是最好的休息。”

我开了禁令，说：“下面我讲课时，大家自由些，可以外出方便。”上完课后，我把她带回家，告诉姥姥和她的爸爸，今天她去学校的表现。他们十分开心。姥姥说：“她天天听，天天还让

准时开收音机，一天也不让间断，小脑袋里，东西能不多吗？”爸爸说：

“小小的年纪，还真有点顽强的学习精神哩！”她问：“爸爸，你说什么？”爸爸说：“你长大就懂了。”我在过去的老照片中，发现我去哈尔滨接金萤时，哥哥提议到照相馆去照的相。我的兄嫂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在金萤的智力开发上、“做好孩子”的教育上，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我们调来北京后，居住条件稍一允许，又将金萤接到北京家中。这一年女儿第一次踏入文化气氛浓重的古老而又崭新的北京城。一切对于她都是新鲜的，又来到父母身



怀抱里的金萤正值她“讲课”的年龄



边，整天伴随着她的是欢笑。我们很快送她上了当时教学质量相当好的北宫门小学。学习更给她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她成了班上学习领先而又守纪律的好孩子、少先队小队长。放了学，书包一放，就写作业。做完作业，每次检查，作业写得整齐干净，很少有差错，而且字迹十分工整。她不是偶尔一天这样做，每天都这样坚持，而且不要大人督促。我看到她那全身投入、持之以恒的样子，更爱她了。经常表扬她的勤奋和顽强。心中不断重复着：“不愧为我的小天使。”爸爸也经常重复着对她幼年时的评语：“小莹真有点顽强的学习精神。”

然而，晴天霹雳，“文革”发生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孩子好端端的学习被中断。紧接着有一天礼堂前厅突然贴出一批她爸爸的大字报。当时，她已经小学四年级，能够读懂大字报了。本来，停课的“失落感”已经使她十分痛苦，因为，她爱学习，猛然打乱她的“有秩序的，而又兴致甚浓”的学习，扰乱了她“孜孜以求之”的心境，摧残了她的学习乐趣，而她的顽强的学习精神，又不允许她颓靡下去。现在又加上一层“黑帮子女”的压力。她沉默了，不爱说话，变得内向。对于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女孩解决这样严峻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后来，中央党校决定全部教职工都要去河南西华县的“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双职工也一个不留，孩子得送走。这不得不又一次迫使我们把孩子都送到姥姥身边。这时姥姥全家也随舅舅下放去了黑龙江省通河县。通河县是松花江边一个不通火车、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小县城，学校质量异常差。从北京那种高质量的学校来到这里，她的心情更郁闷了，性格也变得更为内向。然而，她的心没有散，学习特别努力，并且告诉舅舅：“爸妈说，我有一种顽强的学习精神。”我们去通河时，她舅舅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学习非常好，完全是自觉学习，不用人管。精神状态好，真是孜孜以求之，顽强地学习。”

去通河不到半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在党的“九大”“要准备打仗”，特别是林彪“第一号命令”下达之后，地处中苏交界前线的黑龙江要“战备疏散”。于是，我又北上通河，把孩子们接到河南的乡下。这里的农村中小学的破旧校舍，残缺不全的课桌椅，以及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就教中学的师资水平，使孩子们快乐不起来。在她对过去的追忆中，曾写道：“1969年11月，随父母进军河南省西华县‘五七干校’，领略泛区农场的果香，当了三年土兮兮的农村中学生”，“1971年，流放结束，身负父母重望，只身返回京城念书”。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在河南农村这三年，虽然许多孩子都心散了，而她却刻苦读书，还像过去一样，课内作业从不让人督促，还大量阅读课外书。每学期她都荣获“三好”奖状，弟弟向她学习，每学期也都拿回“三好”奖状。每当学期末，我家总是“大丰收”，墙上一下子悬挂起四个新添的“三好”奖状。阿姨和叔叔们赞美说“金莹是个好带头羊”。

女儿后来慢慢愉快起来，又有说有笑，天真活泼了。那是在她读三年农村中学的最后一年。这时，父母都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而他们进入了党校老师们自己办的中学。孩子满意高水平的老师与趣味横生的高质量的教学，她在描绘课堂学习兴趣时，常常手舞足蹈。后来，老师又将她们这个中学毕业班带回北京，去晋升高中。

重返京城读书，为孩子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他们进入了“文革”前的北京高干子弟集聚的 101 中学，师资水平高，教学质量好。她还一直是班上公认的“学习尖子”，一再受到老师表扬。她还自寻欢乐，顽强地充实知识，在学习之余，又发挥自己的特长，被选参加小提琴校乐队，每当练习时，背着自己缝制的、套有爸爸年轻时用过的小提琴的琴包，高高兴兴去排练。正如她自己所写的：“在北京 101 中学接受中等教育，念完高中。是个学习尖子……居然还做了两年业余小提琴手，给单调的学习生活添了点浪漫色彩。”

按着正常的学习规律，高中毕业的孩子们应立刻考取大学，可是在“文革”的独特年代，一切都是那样反常。这批孩子也难逃上山下乡的命运。金莹在日记中曾写道：“一声令下，背着行李，进了郊区农村，开始了半自立的庄稼汉生活。”这就是 1975 年 3 月 101 中学高中毕业生的插队下乡。从而使她们和“老三届”一起成了被耽误的一代，走上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

插队下乡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可令女儿更痛苦的是她的前途。她并不甘心就这样当一辈子庄稼汉，偶尔回家来，听到弟弟们又读了著名的新书，感到自己“落伍了”，曾伤心地哭过。而且，她边哭边说：“妈妈，我都不如弟弟了。”于是，她千方百计借来弟弟看过的课外书，带回农村，挤时间，将书一本一本本地读完。

正好，这时她下乡的公社农村中学缺少一个二三年级的理化教员，需要同时教两个年级的两门课——物理与化学。而且提供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每天放学后，教师、学生都回家，这位教师要一人住在学校里，看守空荡荡的校园。





农村中学坐落在村子边，十分荒凉。公社到下乡知青中选教员，提出让大家报名，谁都不敢报，谁也不愿去当这种教员。可是，金莹毅然地报名了。之后她对我说：“妈妈我胆大。一是工作需要人去干，否则农中学生同时要缺两门课，原来的老师病了，不能再任课；二是给了我一个学习机会，可以好好复习一下中学的课程。”我们表示对她支持，而没有让她停止授课。

真难为她，竟在这种环境里工作足足一年，以高中毕业生的资质，同时完成了两个年级、两门课的教学任务。

功夫不负苦心人。她的顽强意志帮助了她，事先谁也没有想到，在粉碎“四人帮”后，仅仅一年，大学就恢复招生考试。她当时欣喜万分地应试，而且以高分被录取。正如她在自己日记中所写的：“1978年3月，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完成了社会地位的转变。”

自幼培养起的顽强精神，使她在关键时刻能够去克服一切难以战胜的困难，终于使她从一个“农村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大学生。

## 右手骨折，左手握笔

父母都希望孩子成才，而且追求孩子完美，似乎样样都该好，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世界上就根本没有那种十全十美的“完人”。

我的长子金煜，虽然是美国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文章写得也好，在全世界超一流杂志《自然》上发表了文章，然而，至今汉字却写得较差。我们总认为，这是他生平的一大遗憾。爸爸说：“你回国不能到大学教书，板书写不好。”

然而，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手指骨折与练字的苦痛呢？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像是一个星期天，他突然从外面跑进来，左手托着右手，哭着、喊着：“妈妈，我的大拇指断了。”

我和他爸爸没问缘由，立刻带他去医院，诊断：右手大拇指骨折。接骨时孩子哭，我也哭，心想：十指连心啊！长子金煜的性格十分豁达乐观，整天笑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呵呵的，这次实在是痛得难忍哭了。我不断安慰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做母亲的还可以有另一种做法：“有的母亲看孩子受了一点伤就过分地安慰他，反而加重了孩子的痛苦”，“正确的做法是不过早地谈这件事，把孩子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以便使他忘记痛苦”。（斯特娜夫人《早期教育和天才》，第176—177页）

经过接骨、打石膏、包扎，右胳膊到手被长条木板架起，脖子上挂着绷带托着木板。我们就这样回家了。到家才顾得上问缘由。原来是小孩们在同学家捉迷藏，同学没有看见金煜的手，狠一关门，就把金煜的右手指夹得骨折了。

从此，他不能用右手握笔。俗云：“伤筋动骨一百天。”一连几个月孩子右手不能提笔，只能用左手习字。当拆掉石膏，右手握笔时，大拇指不能弯曲，不能用几个指头捏笔，只能用整个手攥着，大拇指直挺挺的。

儿子说：“妈妈，我右手不好使，还是用左手写吧！”

见孩子写字时的痛苦和可怜样子，不忍心了，我说：“两手交替使用吧，但不能停止练右手。”

为什么不让“停止”？当时，我脑子很僵化，总认为“还得设法让金煜练右手写字，这对大脑发育有好处”。

我每天规定固定字数，让他用右手写。孩子说：“怎么越写越不会写，字也越难看？”他表现得很痛苦。孩子痛苦，就不该继续让他再练右手了。这一生用左手写字有什么不好？我没有顺其自然，相反，还劝孩子不要急。给他讲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的故事：“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终于成了大文学家……”孩子听妈妈的话，一直坚持写啊练啊，但很难过。

只是到后来，我看孩子大把抓着笔练字，比初学写字的孩子还困难，那又是夏天，有时练得头上直冒汗，我很心疼，从此就不再让孩子那么狠练右手写字了。心想：学习好就行，字好坏也无所谓。他爸爸也说：“随他写吧！”

孩子从右手变为左手写字，又从左手变为右手写字，变来变去，字怎么能写好？

有一年，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从东北调来一位教员，记不得他是当过教员调来的，还是应届毕业生。不过，他来不久，我就发现他是用左手写字。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都很好，还能写美术字、写大标语，人又极为聪明。现在（我在修改这一版书时），他已经是中央党校哲学部的领导人了。当年，见



到这位年轻人，颇为感慨。既赞赏他的才华，又浮想联翩：小煜的右手拇指骨折后，左手练字已经比较习惯了，不再改为右手执笔，一直用左手写下去，可能字要比现在写得好，即使没有××写得好，总比变来变去好。父母总是让孩子走自己习惯走的路，我们用右手写字，似乎是不能打破的“天条”。其实，左撇子的名人和学者，古今中外均不罕见。是大人思维方式的凝固，影响了孩子。

经历了这件事后，自己有几体：第一，“右手骨折，左手握笔”，改变了孩子习惯，而又是不得不改的事，不一定要强行改回来。练会左手写字，孩子已经付出了心血，锻炼了毅力，应当让他坚持做下去。第二，孩子的读书、写字，搞好了，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要有一个“刻苦修炼”的过程。书法家需要花这种工夫，一般人大可不必。第三，“得饶人处且饶人”。事情发生后，我先生和我谈起来都很奇怪：“怎么把小煜手指夹骨折的那位同学，父母不仅一次没有来看过孩子，见面后还从未提及此事？”后来，我们对这件事采取了谅解态度。平时两个孩子是好朋友，能宽恕就宽恕吧！我们的宽宏大量影响了孩子，金煜的手好后，和那位同学仍在一起玩，仍然是好朋友。

孩子交一个“好孩子”做朋友，很不容易，彼此影响很大。我国古代教育家颜之推曾说：“人在少年，神情未定”，“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君子必慎交游焉”。（《颜氏家训集解》，第128页）这种看法既形象而又深刻。

## 妈妈不要怕，“脑浆出来了”！

做父母的不能对孩子过于娇惯。尤其是现在的独生子女，“娇惯”几乎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爱要爱到正处，爱得深切，爱得得体，爱得适度。

有一种母亲恨不得把孩子用玻璃罩子罩起来——怕跌倒摔伤不让孩子滑冰；怕溺水不让划船和游泳。这种教育方法只能使孩子成为既不能自立，又对社会无用之人。中国古代大思想家朱熹很早就告诫人们：“父母爱其子正也，爱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我们今人也应永远记住这一古训。

我和我先生爱孩子爱得十分深切，但我们从不对孩子娇惯。有一次，我们的孪生儿子之一金侠，游泳时跳水，摔得很重，我们非常心疼。但仍然称赞他战胜伤痛的刚强与毅力，痊愈后继续让他去游泳，而且还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游泳，使其既锻炼了身体，又磨砺了意志。那是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

1973年后，中央党校的干部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和理由被陆续从河南“五七干校”抽调回京。1975年秋发大水，“五七干校”被淹后，全部从河南撤回。回北京后，我们先是被分配在党校南院靠北门的筒子楼住。因为是六口之家，分了两间房。不过做饭在室内，有一间不得不既做宿舍，又当厨房。上班是在北院，距离南院不远。但我的自行车骑得不好，二十八岁生了小孪生兄弟，为给孩子哺乳，才开始学车。水平是只能在党校大院里转，而不敢骑车上公路。所以，在搬到北院前，早中晚我都是步行，往返于北院与南院之间。

一天，下班时，走到大有庄通往颐和园的交叉路口。那里为行车方便，当时立有一面大圆镜子。快走近时，发现小四金延在镜子下面站着，见到我异常紧张，脸色也十分苍白。

他语无伦次地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怕，‘脑浆出来了’！”

“什么？谁的脑浆？”我惊讶地问。

“小三的。”他急答。

我拔腿就跑，小四跟在我后面跑。

一进门，见小三金侠整个头和脸都缠着纱布，只露出一双眼睛、两个小鼻孔和一个小小的嘴巴。他坐在床边，手放在桌子侧面翻着书。我知道是出事了，紧张地问孩子治疗情况。问是谁给包扎的，想立刻带他去医院。当时，长子金煜和小四金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

“妈妈，不必了，是颐和园门前部队诊所医生缝的针。医生缝好针说四天后去拆线，一周就好！”金煜说。

“伤口很大吗？”我问。

他又说：“伤口很大，缝了十多针。怕感染，还给打了一针。”

小四特别强调说：“医生说，摔得很重，脑浆出来了！”

小三金侠一直没有说话，头和脸都捆得紧紧的，开口可能也不大方便。不



过，他一直坐着。别人说话中间，尽管我几次让他躺下休息，他都不肯躺下，始终是一种姿势坐着。我心里一直感到发颤，看看孩子，难过极了。自己的心肝宝贝怎么摔坏了头部？于是，问孩子们，据他们讲，读小学的李生弟兄先放学，读 101 中学的小煜哥哥还没有放学。于是，他们同平时喜欢他们的大哥哥和一群小朋友一起去颐和园游泳。小四在浅水区游着，小三去跳水了。坐在岸边一个大哥哥发现小三跳下去，人没有浮上来，而漂上来的却是血。他立刻跳下水，见孩子趴在昆明湖浅水区的鹅卵石上。大哥哥憋着气，背起小三，上了岸就跑，边喊：“小四快跟我来！”在大哥哥身上背着的小三，头部一直在流血。

大哥哥一步没停，跑得很快。没等到诊所，小三苏醒了。经过缝针、包扎、打针，一切都处理好。大哥哥又将小三背到家。这时，哥哥金煜放学了。大哥哥向金煜将情况作了交代后，就走了，跟随来的一群小朋友也随同走了。

安顿好孩子们吃晚饭，我还不放心，于是，去了颐和园门前的诊所，这是一个解放军医院在这里开的诊所，但人都下班了。焦急一夜，第二天，让孩子爸爸代我请假，一上班，我又到诊所。问过几位医生后，才找到头天给金侠缝针的医生。

他说：“孩子头撞在鹅卵石上，是额头上方，伤口很大，缝十一针，又打了防止破伤风针。四天后打开看看，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拆线，但至少得休息一周。”我特别问了一句：“孩子说‘脑浆出来了’，是真的吗？”医生说：“那还得了！没有，是我吓唬那个小孩……小孩的名字好像叫金侠。”我说：“是。”很佩服他不看病历，竟在来往的许多患者中，还记得我儿子的名字。



摔伤前的金侠(前左)、金延(前右)、表兄(前中)、表姐(后左)、妈妈(后右，作者年轻时)

他接着说：“金侠的胆子很大，那么浅的水，竟敢往下跳，而且从消毒、缝针到包扎，他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叫一声痛。我怕以后再去冒险，吓唬他，说：‘伤口特别大，脑浆出来了。你以后可不能这么闯了，哪有用头往石头上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碰的！’”

医生笑了笑还说：“孩子当真了吧？”听到这里，我心里轻松许多，说：“他的孪生弟弟听得十分认真。是他学说的”，“摔伤的小哥哥很少说话”。

我又问：“会不会使大脑里面受损伤？”

医生说：“不至于，伤口大，但比较浅。测试了一下智力，显得很清醒。”这位医生认真负责而又亲切和蔼的态度使我很感动。

回想当时那位令人感谢不尽的大孩子背着我的小三去诊所时，孩子们身上都没带钱。但诊所的解放军医生本着“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给予了及时的抢救治疗，保护了孩子的终身健康。真是可亲又可佩！

金侠在家休息一周，准时拆线，伤口愈合尚好。但就是在这一周，他没有好好休息，除外出晒晒太阳，几乎都是看书。我生怕经过猛烈的跳水撞击，伤害了他那聪明伶俐的头脑，又见他忍着疼痛读书，心疼而又十分焦虑。

孩子为什么要忍痛苦读？该休息而不休息，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自问自答：“是否过去的家教有了偏颇？过多地强调‘劝君惜取少年时’，强调‘劳’而忽略了‘逸’的教育？”

后来，从他的回忆中，我发现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而是他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对自己童年的回忆，促使他顿悟，要抓住“今”，要自觉把握时间。

孪生弟兄，是在我们住“五七干校”时，读的小学一年级。在农村小学一读几年，使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而我们的老三金侠，平时沉默寡言，但很善于观察与思考问题，成熟较早。在他考取全国著名的大学后，曾写了回忆在河南那段经历的日记：

“我像一株不幸的小树，在幼年时没得到应有的哺育，当长到成年，能独立于大地之上，承担风雨的洗礼，迎接太阳抚摸时，方才发现自己的根基是那样的薄弱，严重地阻碍着实现长得更高大的愿望。”这种可贵的顿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在他摔伤时，那幼小的心灵中，是否已经有了认知，或已有所萌发了呢？否则，他为什么那样苛求自己、忍痛苦读呢？那种劲头，特别像要把没得到的“应有的哺育”找回来的顿悟和决心。

怎么找？他很有见地的议论说：“我知道‘过去的不会回来，将来的还不确实，只有今天是抓得到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孩子在书写他的心声的日记和生活志中，曾反复强调，为了将来，一定要抓住今天，抓紧时间：“‘时间’，它





是多么神秘和美妙啊，好像巧手的装饰工”，“现时初春，要抓紧读书和锻炼，为了将来”。

回想起在我们的小宝贝摔伤与疗伤的日子里，我的心是颤抖、焦灼、爱莫能助、乞求“安然无恙”等复杂情绪，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每天还要上班和大家一起去完成那“文革”的所谓“继续革命”。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遏制我对家教的思考。我想：家教应因人而异，也该因时而异，不能只去念一本“永不变的经书”。在正确对待“时间”、“劳逸”、“张弛”的问题上，当孩子学习抓得不紧、作业完成得不够，过于放松自己时，做父母的要强调：“劝君惜取少年时”，时间“匆匆”，要“劳其心智”，要“弦在弓上，张大其力”。而当孩子已知时间的“美妙”、“神秘”，是“巧手工”，去拼命抓紧时间，一丝也不放过“今”时，且从而不得休息，过苦过累时，就要叮嘱孩子：“逸”是“劳”的忠实的，而又是一个不可须臾离开的伴侣。“弛”对于“张”，也是如此。正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侠儿一直是个很爱读书的孩子，记得1998年圣诞节时，在全家大团聚的一点点空隙时间中，他将哥哥金煜从国内买去的一套《金庸全集》，一本本从书架拿下来，一口气读了七本。

对于孩子们的读书兴趣、幼年和童年的追忆，以及今天看到的或听到的，都是感到心驰神往，金石为开。确实，他们对知识追求的真诚，那真诚的举止，真诚的言语，真诚的感情，使再坚硬的一切，都能为之动情。

## 无疆的爱，如夏花般绚烂

父母帮助孩子树立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终极目标，又树立一些可移动的近期目标，是激发孩子们自觉努力成才的内动力。这个终极目标从正面引导和可接受性来看，以使孩子们自觉成为一个对社会大有用处的人为宜。也就是说，要求他们不虚度此生，成为一个爱他人、爱社会，而大大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有了终极目标，又有可移动的近期目标，就像有了一个个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出现的“靶子”。孩子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形象而生动地设计自己，欢快地“击中”一个个“靶子”，勇敢地奔向终极目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我家的“好带头羊”、几弟兄的大姐姐、我们的宝贝女儿。我们的长女金萤时刻都在注意塑造自己，希望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拥有一个“绚烂的人生”。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女儿用秀丽的笔迹在日记上留下了这种美好的诗句。这是她在1982年苦读五年医学院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在当时的教学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做外科医生时，为自己写下的夙愿。无疑，这是一位“白衣天使”的心声。

接着，在日记中，她解释说：“这是印度哲人泰戈尔的名言，这话说得多好、多美！所含之情又有多深！可怎样才能使自己生如夏花，死似秋叶呢？怎样才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

这里，一连串提出两个“怎样”。我先生和我，同女儿在一起，从未就诗论诗，更没有谈过泰戈尔的诗。只记得童年曾为她讲过唐诗，《唐诗三百首》中，她能背诵很多。诗词谈得不多，但关于怎样做人，怎样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我们却同她谈了许多许多。

当她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后，我们不厌其烦地叮嘱：“当医生要讲奉献，而且



女儿金萤希望有一个像夏花一样的绚烂人生



是无私奉献”，“医生穿得很干净、医院很明亮，但患者却带来细菌成群，做医生的一定不能怕脏、怕累”，“要有爱心，对患者要有诚挚的爱”。我们还常向她讲自己到医院时的感受：“见到笑容可掬、耐心医治、妙手回春的医生，有病没治也好上三成；见到那种严声厉色、冷面怒斥、敷衍塞责的医生，常常有未死先进‘鬼门关’的感觉”，“医生的价值就在于千方百计地为患者治好病，不愿意给别人看病，还算什么医生？”

可能，我和我先生都一直当教员，很注意孩子们的健康心灵的培育，很注意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孩子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又特别注意区别孩子们的不同工作，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其实，这些道理，孩子们都懂得很多。可是，听到我们重复这些从社会上多次听到的道理，他们没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示，都是细心倾听，可能是尊重父母的一片期望吧！这其实也是对女儿提出的两个“怎样”的回答。

女儿喜欢吟诗作画。她经常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包括对人生的看法。有时自己写诗，有时抄录别人的诗，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她曾在日记中抄录了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的诗，这好似在回答“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特别是回答怎样使她的一生“如夏花一样的绚烂”。

裴多菲的诗，题目是《我愿意是激流》：

我愿意是激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在岩石上经过。……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的两岸，面对一阵阵的狂风，我勇敢地作战。……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着风雨的打击。

这是《我愿是激流》一诗的片段，是女儿对于自己做人的心理境界用诗的美丽语言的描绘。这种“境界”是否也凝结着父母家教的点滴心血呢？这只有摘抄这些诗句的女儿自己最清楚。

后来，我遇到很多动人的事，发现女儿用最大的努力和火一样的热情，在行动上谱写着自已绚烂的人生。她自己的工作告诉人们：我在实现泰戈尔的名言：“使生如夏花之绚烂”，也在实现裴多菲的妙语：“我愿是激流”。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去世的前一年冬天住在友谊医院。我同他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女儿事先已联系好去医院探望他。当时，我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后被选为会长），代表研究会去探望我们的老顾问。另外，我们研究会的同志共同撰写一部九十七万字的《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上下两册），评介二十七位哲学人物，其中有冯友兰先生。定稿前，曾送他核阅。当时，他已双目失明，关于他的几万字，全是他女儿念给他听的，而且写回他的宝贵意见。书稿返回很及时，书准时出版。我和傅云龙教授是该书的主编。为感谢冯先生的关怀，傅教授与参加撰稿的同志让我代表去医院探望冯先生。恰好他住的是友谊医院，是我女儿的工作单位。为了方便治疗，以及冯先生家属易于找人，我希望女儿同我一起前去看望。她那一天很忙，有胆结石切除手术，但还是没有一点犹豫地答应了。

在头一天的电话中，她说：“妈妈，我一定帮助这位老先生好好治疗。做完手术，咱们立刻去看他。”“手术后，你需要休息吧？”我关切地说。她说：“那不重要，看患者更重要。”她说得是那么真挚、热诚，我很感动。

我在她下手术台前，去医院坐在外科病房外的圆厅等候，那里有不少做过手术、练习下床走路的患者，有的捂着肚子，有的按着腰，有的歪着肩膀手扶着胸，还有的拄着拐，其他就是不少陪同或来探望的家属。我想，这些患者，可能是腹外科和胸外科的患者。女儿是腹外科的大夫，估计不少人熟悉她。刚想到这里，女儿跑来了。不少患者同她打招呼，她一一笑着回话后，对我说：“妈妈，刚下手术台，等急了吧！对不起，您再稍等一等，我去嘱咐一下患者家属，立刻就来。”随着我的“好”声，她消失了。

接着围来一帮面孔陌生的患者，先是一个中年妇女开口了：“你是小金大夫的妈妈吗？”我回答：“是！”“我的手术是她做的，胆结石，手术做得又快又好。”“他们里面有不少人的手术也是她做的。”中年妇女指着身边的人说。接下来，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说起来：“小金大夫，手术好，对人态度也特别好。”“她总是笑眯眯的，问多少问题，都一一回答，没有发烦的时候。”“关心患者像关心亲人一样。”“该查房时，她一定来，不到查房时间，她也来。”“做完手术，晚上经常来看患者，实际那是占用休息时间，自动加班。”

她们还讲：“小金大夫做手术后，别人送什么都不要。”

“一个农村老太太儿子病重，小金大夫给开刀治好了。老太太很感激，从家中带来不少好吃的东西给她，她都不要。老太太见没办法表示感谢，一下子



给小金大夫跪下了，小金大夫急忙跪着把她扶起来。”

“有的老头还给她深鞠躬，她百般不让，没办法，自己也行大礼还给老人。”

有一位看上去举止显得层次很高的女同志，年龄显得略大些，说话慢条斯理：“你女儿对人非常诚实、正直，全身心投入救死扶伤，工作总是带着笑，患者喜欢她，亲切地称她‘小金大夫’、称她为白衣天使！”

女儿来了。有一位像工人家属的妇女还在说：“我老头也是小金大夫开的刀，你怎么生了这样好的女儿？”她用手指了指我的宝贝女儿。女儿来后，同她们打了招呼，还问了某人的病情，笑着说：“送我妈妈去看患者，随后来看你们。”

在去冯友兰先生所住的高干病房的路上，我同女儿学说大家在夸奖她。她说：“这都是应该做的，我们同学都是这样做的。患者抱着很大的希望而来，是求医的。有不少还是外省的疑难病例，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可不容易呢！”“治好出院我很开心，治不好心里非常难过。”听后我想：话是那样质朴，没有一点自我炫耀，一心想着别人的苦痛。我善良的女儿啊！什么时候都是妈妈心目中的小天使。

冯先生和在身边看护他的女儿，见我们到来非常高兴。虽然，冯先生双眼看不见了，经他女儿的介绍，还一一同我们握手。冯先生表示感谢我们来探望，表示感谢为他写书。他女儿见我带来本院大夫，特别高兴，说以后有事要经常找她，女儿热情地答应了。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支部书记，是我们很熟的老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来党校工作的。他的女儿在陕西省航空航天工业部的一个工厂工作，得了重病，是肝硬化、脾部大出血。来北京友谊医院治疗，经诊断，需要做大手术。整个手术是一位姓许的主任带领金萤做的，恢复得很好。这位支书的女儿在住院期间和我女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对小金大夫的好感、信赖，非同一般。到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一点小小的不适，就叫着要找“小金大夫”。她妈妈告诉她：“感冒，校卫生院就能够看，不用去友谊医院。从党校到那里，一堵车得两个小时。”一次，在党校院里的路上，她妈妈告诉我：“一点小病，就喊着要找‘小金大夫’，这次说服了，下次还要找……到校医院还让其他医生看她的横贯腹部的刀口，校医说：‘谁给你缝的针，这么漂亮？’她十分得意地说：‘是小金大夫，我的好朋友。’”据她父母说这个女孩“病医治好后，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回到陕西省，生活了六年。后来病情复发，没来得及送到北京医治，而此时小金大夫也已经出国了。”不幸的是，当地医院虽已尽最大努力抢救，这位女孩还是走了。

## “痛痛”才成长

具备坚强性格的人，会成为巧妙而又乐观地扫除成才道路上障碍的“高手”。

长女金萤在友谊医院做外科医生期间，左腿曾两次骨折。两次都是整条腿打了长长的石膏，我看着既感觉可怕，又感到心疼。我心想：漂亮的女儿要是以后成为跛脚可怎么办？还怎么再当外科医生？外科手术需要站手术台啊！当时见到女儿坐在床上不能动的样子，虽然她总是笑咪咪的，而我却偷偷落泪。

1984年12月10日，女儿已经有四个半月的身孕。一天晚上，她在医院的女宿舍休息。已经是深夜了，不是她值班，也就安心入睡了。可是，她的学生突然来叫她，说有一个危重病人，需要她帮助处理。她急忙穿上衣服，像每次遇有危重病人一样，下了楼撒腿就跑。医院当时正在改建施工，堆放很多建筑器材，又缺灯光，黑糊糊的。她没有见到长长的又黑又粗的钢筋横在院子里，快跑到病房时，绊了一跤。她瘸着腿，别人搀扶着，还看了病号。病人得到妥善的治疗。可是她的腿经检查，髌骨骨折，关节腔积血。左腿抽出了许多血，还打了一个长筒石膏。在医院睡了一夜，第二天，医院派车送她回家。

女儿像从战场上回来的伤员，被别人架着上楼，长长的“石膏腿”，还有四个多月的身孕。

我惊讶地说：“怎么摔成这种模样？说是在昨天，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送她来的医生说：“怕家人惦念，电话她都不让人打。”见到她的样子特别使人心酸。可是，为了不使父母心疼，不为全家增添烦恼，她一声也不叫疼。关于摔伤的原因，简单说了说，对于任何人都无所报怨。每问到她，总说“不疼”。我问：“吃止疼片了吗？”她说：“没有，不疼。”她爸爸说：“这姑娘真是钢筋铁骨，怎么问都说‘不疼’。”





我说：“怎么能不疼呢？怕说出来，全家惦着，又怕我睡不好觉。她只想照顾别人，疼也自己忍着。”她爸爸说：“我讲的钢筋铁骨是指性格，怎么能不疼呢？人都是血肉之躯，她很能忍啊！”



金莹外柔内刚，有着钢筋铁骨

女儿坐在床上，不能下地，可是，对自己要求仍非常严格。当时，我家有一台英文打字机。她为自己做了一个计划，每天打字两个小时，读英语三小时，其他时间看各种书，包括小说、诗集。当她向我吐露自己的计划时，我说：“不的性格行，你现在主要任务是养伤，要多睡觉。”她整天还是笑眯眯的，有时睡觉，但睡得不多，主要是舍不得时间。她坚持按着自己的计划行事。她处处观察和想着别人。当看见爸爸每天写书，抄写比较吃力时，还主动提出帮爸爸抄稿子。有时一天抄六个小时，然后又坚持两小时打字，一小时读英语。这中间友谊医院的骨科医生拿着医药包来看她，发现关节腔有积血，决定给她穿刺，她怕我心疼，让我回避。当穿完刺，打好石膏，请我回来时，她还是谈笑风生，问她疼不疼，仍说“不疼”。女儿的这种“柔里有刚”、“刚柔相济”的性格，使我这个做母亲的既心疼又喜欢。心疼的是，自己的爱女、宝贝女儿，摔成这个样子；喜欢的是，看到她身上这种性格，会带给她任何困难都可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以克服的坚韧和耐力。这一点，对于造就她绚烂的人生，无疑会有一种构筑大厦的钢筋骨架的作用。

女儿的左腿第二次骨折，是在四年以后，也是一个冬天，即1988年1月3日。她下了夜班，去陶然亭公园滑冰。没有料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冰场上的裂缝卡住了女儿的冰刀，而她滑得较快，来不及刹住，又摔倒了。这次摔得更重，仍是左膝盖骨骨折，不过，不是过去断裂过的地方，而是又有了新部位的骨裂。人的一个膝盖骨才有多大，竟然断裂两次！这让父母很揪心，对女儿的心疼，使我们有切肤之痛。

然而，这一次骨折后，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城里许伯伯和刘阿姨家。开始，知道女儿又摔伤了，我们很着急，想立刻将女儿接回来。女儿和她的同事们分析，在城里疗伤方便。疗好伤最为重要，我们也就同意了。

刘阿姨的女儿一直是金萤的好朋友。刘许二人曾是我们的邻居，也是多年老友。我们多次去看望，见在那里离友谊医院距离近，室内安静，休息得很好，而回家她难得休息。因为她的小女儿在我家，由阿姨带着，顽皮得很，而且，天生有一个漂亮的歌喉，哭和笑嗓音十分洪亮，玩起来能量也很大。因而，也就同意她在许家继续住下去。

这一次，又是打的长腿石膏。疗伤过程，友谊医院医生又去为她穿刺、抽血，而且几次检查都说恢复得不理想。然而，她想的还是别人，想着许伯伯、刘阿姨的病怎么治？据这两位好友说：“小萤为我们出了许多好主意，尽想着别人，一再怕我们为她操心。”

在这次养伤过程中，她还不断关心她们外科年轻人的科研成果。让科里同志拿来集体编书的译文书稿，她所负责的部分，都是欢欢喜喜地准时完成，表现得十分乐观。她在日记中曾写道：“××拿来文稿，译文两篇，校清样十稿。这下有活干了，俏皮点说，这叫‘堤内损失，堤外补’嘛！”

在骨折的疼痛中，她简直不是在疗伤，而是在以何等惊人的速度工作啊！1月3日骨折，到1月10日，她已经完成英译汉的医学书几万字的校对任务。不过，很惨，左脚全肿了。我们去看她时，那只脚简直像发面馒头。校对完文稿，她又翻译《胃代食管中幽门成形的问题》，全文四千多字，三天译完。后来，又接着完成科内同志带来的二十万字的校对稿，五天完成。过后，还与同志一起译乳腺癌的文章，也按时完成。我们去看她，推开门，见打着长石膏的



腿伸在桌下，脚肿得圆圆的，还伏案工作，好不心酸！

当我们 1995 年在美国探亲的时候，已从英国来到美国的金侠告诉我：“妈妈，我一到美国发现姐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怎么进步得这样快，我都惊讶！”我说：“是否与在国内的学习有关！”我想：像这样带病苦干，不会不为祖国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忍着伤痛，还这样拼搏，平时的非凡努力，更可想而知了。

女儿的这段故事，就讲到这里，不再赘述了。不过，当我放下笔前，却静静地思索起人生的道理。用我们学哲学的人“行话”来说，即人生哲学。已经是深夜 3 点，而我的思绪不能歇息。现在的年轻人常常喜欢探讨人生的价值，而答案确实很多很多，而且有时还极其相反。五六十年代被奉为楷模的雷锋，无私奉献，已被某些人看作是不值得效仿的；被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表现的义利观，也被某些人看作不合时代潮流的应被淘汰的糟粕，他们眼中的圣物只有钱。责任、义务、理想、抱负以及友谊，通通都被淹没在金钱利己的赤裸裸的冰水之中。这样，即使赚到了大把大把的钱，买上漂亮的洋房和汽车，过上奢侈的生活，难道能算是绽开了人生的绚烂花朵吗？也许有人认为我的认识是保守的，落后于所谓“新潮”。但“新潮”所要求的难道仅仅是有几个钱吗？一个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人生，岂不是太苍白了吗？我还是坚定地认为，需要有对人生的美的向往，即非凡的抱负，利他的精神，诚实的劳动，顽强的毅力，快活乐观，埋头苦干，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能像金萤所追求的“使生，像夏花一样的绚烂”。

## 宁愿伤着自己

做人之道，是事业成功之本。在家教中，品德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子女成才的“切入点”。

我家子女教育的根本是教孩子做人、助人、关爱别人。这也是中外文明在我们这代人心理的积淀。我们期盼自家成才的儿女，绝不是一心只为自己，而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是心里永远装着他人，有才又有德的人。这些也是我们经常对子女谈到的。

可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记得，1976年的一天，我们下班了，除小四金延外，孩子们也都陆续从学校回来。正在盼望小四时，家中拥进一群孩子，搀扶着小四进来。没等小四开口，孩子们就着急地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他们说：

“我们是去五道口附近工厂学工的67中的学生，金延的同学。”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群人靠路右侧骑车，一个好像农村妇女的人，抱着孩子从停着的汽车队前跑过来，正好跑到金延的自行车前。”

“如果金延继续往前骑，她抱着孩子后退，已开动的汽车必然要撞倒她们母子”，“可是，金延如果猛刹车，我们后边一辆辆跟着他的车，会相撞。旁边还有很多行驶极不规则的汽车，肯定我们也会出危险”。

“金延急中生智，猛一歪车，自己掉到路旁很深的沟里，保住了她们母子，也保住了我们大家”，“但自己却摔成重伤，自行车全摔坏了。我们是扶他坐公共汽车回来的”。

他们还说：“金延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都很感动！”

可是，金延自己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本能，没有那么高尚的精神。直到将该书初稿（第一版）捐给在美国的四个姐弟修改时，他又在自己手中书稿的这一页上，写下了十七个字：“本能而已，不愿意伤害别人，只有自己下去。”后来，他在电话中还叮嘱我：“请妈妈将同学和老师表扬的话拿掉。”这样，我不得不删去师生们的许多可能都是真心的“溢美之词”。

当时，我表示感谢同学把儿子送到家。可是，心里却很着急，想立刻将儿子送往医院。孩子爸爸当时没在，因为小四一进屋，他就立刻去车队联系要车。车来了，先到了海淀医院。值班医生说：“没有办法拍片，都下班了。”回来已经很晚，我们又找到了我的好友校医室的负责人傅大夫，她的老公曾大夫是著名的解放军总医院301放射科主任。由他帮助约好第二天去301医院拍片子、治疗。夜里，我没有睡好，心里非常忧虑，担心明天拍片子诊断结果是骨折。一会儿起来看看，一会儿起来看看，眼见小四的腿越肿越厉害。到凌晨4点多，右小腿上段像是鼓起了大水疱。

第二天，刚巧金延爸爸开会。我们这代人“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竟然没敢请假，只用自行车送我们到301医院马路边的班车站（当时，301医院有



一个从军事科学院开往五棵松的上下班接送本院人员的班车，我们靠曾主任帮忙得以乘坐)。曾主任和我把孩子连背带拖地弄上车，又背下车。照相、拍片后，医生告诉我孩子是“小腿胫腓骨骨折，很严重”。小四见我含着眼泪，并极力抑制自己的样子，笑着说：“妈妈放心！几天就会好！”医生从腿中抽出整整一盘血，自然很疼，但孩子极力忍耐着。然后，打了几乎和腿一样长的石膏绷带。一切处理完，拖着长长的石膏腿，我自己是背不动，也拖不动了。当时北京尚没有出租汽车，只好等待301下班的班车，随着曾主任一起，由他帮忙，才得以回来。下车时，因事先通了电话，他爸爸在马路边用自行车等候，并把我们接到家。

在粉碎“四人帮”家家欢天喜地的气氛里，我家却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更令人身心憔悴的是“祸不单行”。我母亲从我家去武汉的姨妈家，因姨父分到老红军住宅，姨妈让老姐姐去新居共享。可是，由于气候不适应，我母亲一到那里就生了病。正当小四卧床，任何事都不能自理时，突然从武汉来了加急电报：“母亲病危，速来。”这当然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我马上去买火车票，收拾行装。

第二天去武汉，在上车站前，我看着躺在床上、急需照顾的儿子，可又不能不走，因在武汉还有一位一生含辛茹苦生我养我的老母。当时，我矛盾得心都快撕裂了，热泪横流，反复叮嘱老金如何照顾好我亲爱的儿子小四。

母亲先是脑血栓后变为脑出血。我和从哈尔滨来的哥哥昼夜轮流护理，病情虽有反复，但趋势日渐好转。这时，我的心好像有了一条缝，认为母亲有生还希望，精心看护。北京也来信了。老金的信说：“从卫生所借一副拐杖，小四能够拄拐下地了”，“67中学的老师、班主任都来看过他。说了很多表扬的话”，“学校决定老师上门补课，都准时来，没有缺课”，“儿子还用较多时间突击了他所不喜欢的英语，现在，有兴趣了，进步很大”，等等。

小四来信说：“我让爸爸天天上班，不影响工作……尽量一切自理，有时用拐，有时能单腿跳。”还说，“这也是对我意志的很好锻炼。”我立刻回信：“单腿跳的锻炼要不得，因为石膏腿，会随之摇动，骨折部位，接骨会变形、不端正。”又写信给老金，请他“无论如何请假照顾孩子几天，全靠自理，跳跳蹦蹦腿长不好”。

母亲的病情逐渐稳定，医生说“可以回北京养病了”。可是，妈妈已经变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为“植物人”，什么也不能说，连示意都没有。我请求医生：“再设法治疗，并说‘妈妈只有六十六岁啊！’”医生说：“再没有任何办法，回家养吧，弥留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回京后，我们极力挽救，精心照顾，可是，只有三个月，她老人家还是走了。

返京不久，小四也该拆石膏了。但拆下石膏后，医生说：“不理想，一个腿长，一个腿短，病腿肌肉有萎缩。”经过一段矫正治疗，不见效。后来，医生说：“主要得靠锻炼，游泳最好。”当时，中央党校的人工湖是一个大游泳池，可以随时随地下水。我们带着小四，坚持游泳。

当四儿需要练腿的时候，我们带他和几个孩子晚饭后总去游泳。有时游一阵之后，站在岸边观看；有时还让兄弟三人游泳比赛。当我发现小四的蛙式蹬夹动作完全变得不成样子时，心里难过得无以名状。受过伤的腿和另一条腿并拢不起来，失去了泳姿的夹水动作，两腿不能一起蹬夹。心想：孩子个子很高，腿一长一短，变为跛子可怎么办？当时考大学，要求很严，既要求分数高，又要求身体好。不像现在对残疾人有照顾。分数再高，如果是跛子也不会被录取。我生怕报考时，体检不合格。

金延见我紧锁双眉，心布乌云，一再劝我：“妈妈，到考大学时，我会锻炼好的。”孩子这时反过来安慰妈妈了！金延有他自己的境界。他曾工工整整地抄写在造句本上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唐代才子王勃为后人留下的千古绝唱，也是我儿子最喜欢的诗文之一。王勃是借景写志，表达了一种寓意高雅，前景无限的气度与情怀。我想这种气度与情怀可能在催生儿子心灵的成长。

几次复查我去问医生，医生都说“坚持游泳有希望练好”。

于是，我们每天带孩子坚持游泳。一个暑假过去，儿子的腿直多了。又是一个夏天，两只腿逐渐一致了，越来越笔直、齐整。由于坚持游泳，结果两腿完全恢复正常。高考时，不仅考分名列前茅，体检也完全合格，于是，考取了他所理想的清华大学。我不由得想起白居易的一句诗“世路风波子细谙”，是说生活道路上充满矛盾。这是事实。然而，王充的《论衡》又告诉我们“胸中之颖”（心中存在的才能），可以排解矛盾。医生的才能与经验，所赠与我们的“坚持游泳”这一招，看起来很平常，然而，对金延考取大学和后来的发展，却起到了不菲的作用。





如果用一句“轮回报应”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善有善报”。当年，我们的小四金延为保住一个陌生妇女和孩子以及同学们的性命，受了重伤，可是没有落下残疾，也没有影响考取大学。然而，这种“善有善报”，不是来自上天的安排，而是来自崇高的道德要求和自我克制。金延一再告诉我，不要把他说得“高尚”，而要低调。可是，我不能不告知我的读者要牢记，用做人的高尚道德教育自己的孩子。有了这一切，做事虽不求报答，但却会出现“善有善报”的良辰美景。

## 真正的美与不美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合情合理地追求美。对美女演员、美女歌手、美女模特、美女教师，以及帅哥美男，不少媒体有颇多羡慕和吹捧之词。可是，我觉得这多是讲的外在表现，而非美的深刻内涵和精神。

我们那可爱的小李生仅大弟弟七分钟的金侠，曾有过绘声绘色的描述，令人看到“美”在他那里释放出闪亮的光彩。他在日记中写道：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有两种人：一种欣赏的是低级趣味的、庸俗的、雕琢的华美；一种欣赏的是高尚的、健康的、自然的朴实美。我是怎样爱美的呢？我欣赏一切存在着的美：美的心灵，美的音乐，美的环境，美的服饰，美的人。

上面是金侠对于“美”的看法和个人感情的抒发。在写书时，经过他的允许，我看了他的日记。当这些有见地的关于“美”的话题闯入眼帘时，我回味无穷。

俄罗斯伟大诗人契诃夫曾说：“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好的，心灵、面貌、衣裳、思想……”苏联的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曾说过：“生活是美好的”，“一切都会好的”。看来，人们都向往着美。谈起那种“健康的美”，“自然的朴实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美”，或“一切存在着的美”中，人们不会忘记“美的心灵”，即契诃夫所认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好的”，而占据第一位的美好是“心灵”。

可能正是因为我的侠儿喜欢那多种美，而又把“美的心灵”放在第一位，所以，从小到大，人们包括老师、同学、同事以及家人都很喜欢他，而且认为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小的时候，每次演出，他都是领队的聪颖儿童；少年时是一个灵慧、可爱的少年；到了青年时，用他们同学的话说，他又是一个“沉默寡言，善于思考，为人诚实，待人真挚”的帅哥、“乐于助人，身心健康”的好青年。

我们的侠儿在协和医大八年的学习，是相当累的。可是，不论老师或同学选他做什么社会工作，他还是尽一切努力去做。

他也深感工作和学习时间有矛盾，并无争强好胜或出风头之意，而是默默克服困难，似乎是在完成一种“使命”，一种为了同学们生活好、学习好而不能不去完成的“使命”。他常说“我不去做，别人也得做”，“我‘义务’出工，耽误了时间，为别人省了时间”。他有时也感到工作和学习时间有矛盾，心绪苦闷，甚至烦乱。可还是顽强坚持着把承担的社会工作做好。因为，有一种更高的思考时时在激励他：“不能总想着自己”，“一事当先，不能先替自己打算”，“为了大家”应放在第一位。诸如此类的思想，在当时的日记中，写了不少。篇幅有限，下面只能摘录几段：

“尽管诸如‘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之类的口号如今已经不那么时兴，不吃香了。继之而起的是之对立面：‘发现自我’、‘个人利益才是实惠’之类的言论不胫而走，风靡于世。然而，我现在却凭直觉很强烈地感到：一事当先，先为自己打算还是很不明智的。即使我不加以‘见利而忘义’之冕，也得指出：在这种思想方法下，只会做出这样的事：为了相对要小的事情——但是既得的、眼前的、有利的，而舍弃了要大得多的反而是长远的事业。”

“当人生意义的讨论在《中国青年报》上展开时，我还是完全不懂事的孩子……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我有这样的信仰：即我的生活目的，就是要使我变成个高尚的人，去追求最高尚的品质。”

从以上这些片段，不难看出，他将公与私、利他与利我、高尚与卑下，以及生活目的等有关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大问题，都统辖在要使自己“变成个高尚的人”、“追求最高尚的品质”的大目标下了。这无疑是他心目中的那种“高



尚的美”。从往来交谈、国际电讯，以及从他现在的同学、好友的议论中，我们发现，至今，他对此仍恪守不渝。

可能是因为他一心在追求“高尚的美”，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大家很尊重他。每到一个学校，同学或老师都要选他当干部。于是，他担负了各种社会工作。如在北大那种“群英荟萃”的地方，还选他当学生会副主席、校卫生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以及各种文体活动的组织者，等等。

凡是孩子们在学习期间当干部，一般我都不大同意，主要是怕占去时间，影响学习。他在北大生物系读协和医大的医预班时，由于1981年新的学生会改选，当时的一些学生会委员都提出让他出任生物系学生会主席。他回来讲到这一情况时，我泼了冷水。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家母虽不愿我当干部，但家父并未反对。”可能因为父母的分歧，他推掉了主席，但又没有完全推卸，而仍当了副主席。

然而，在当时的学习中，“为了大家”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同工作与学习时间的矛盾，却是无法否认，而又不折不扣的现实。比如，在他的一页日记中，曾写道：“‘卫生工作委员会’明日将宣告成立，本人将荣任副主任委员。这些天来的有机化学已经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了，而这一任命无疑又将在我肩上压上一担。”

矛盾是活生生的，但他并没有推却任何社会工作，而是竭力寻找办法解决。当然，学习要和别人一样好，另外还要负担社会工作，而且一心想做好。这无疑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心血和汗水。

他在日记中写道：“汗水不需要货币去购买，收获却只有汗水才能换来。”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然而，它在人们心目中扎根，并付诸行动，又是那么步履维艰。必须以“汗水才能换来”，这就像“冬去春来”一样的实在。

写到这里，我拿起了一个小红本本。因为它很可爱，已放在我案头多天了。这是和金侠的日记、生活志放在一起的一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优秀团员证书。虽然已存放十三年（现已是二十三年了），但仍然是那么火红、光亮。中间的团旗、团徽，以及上面的“优秀团员”几个大字，依旧闪着金光。从封面下文和里面的两枚红色印章来看，是由共青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委员会以及共青团中国医学科学院委员会颁发的，时间是1986年。

儿子是1980年考入八年制的、本硕连读的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于1988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年。就在毕业前夕，正如证书的内文所说：“成绩显著，授予‘优秀共青团员’光荣称号。”

每人每天都在写自己的历史。儿子在一进大学时就在日记里自己发誓：“我有这样的信仰：‘我的生活目的，就是要使我变成个高尚的人，去追求最高尚的品质。’”这段话，在该书中，不禁两次引证，是企盼当今正在就读的学子，人人心目中，也都能有一种自觉的“高尚”。看来，儿子这八年，是凭着自己的信仰和目标、心血和汗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他在每一天、每一步都严格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历史，是一个公正的“法官”，协和医大的上下下同这位可尊敬的“法官”携手，通过青年的先进组织认定了儿子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人生才有几个八年啊！

## 赋予时间独有的价值

成才绝对需要时间。家教使孩子首先必须懂得时间的宝贵，中国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德国著名诗人歌德为教子珍惜时间，曾在自己的诗中写道：

我的产业是多么美，多么广、多么宽！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地是时间。

我们体会，父母应该特别教育子女珍惜眼前时光，不能有一天虚度。正像我儿子深有领悟而在日记中写的：“最可贵的是眼前时光，这是唯一的真实欢乐……未来美景的最佳保证。”

然而，这又不能少吃、熬夜、不睡，拼消耗。我们反复教导孩子要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向效率要时间。这就要赋予时间以创造性。我们的几个孩子都有时间观念，他们又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准确而又灵活、巧妙地运用时间。从平时的交谈，以及通观侠儿的日记，能够看得出，他摸索了不少正确处



理时间与学习、工作矛盾的方法。这些方法，出自一个仅仅有十八岁、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思考，难免有它稚气之处。然而，对于在今天提倡学习“科学发展观”之中，一些人苦于学习与工作矛盾，可能不无参考价值。尽管情况不同，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干部主要任务是工作。但二者有共性，这就是同时遇到了工作和学习的矛盾。可能有人会说：“怎能让我们向小孩子学习，这岂不可笑？”中国的儒学大师、人们所熟悉的孔夫子就认为“学无常师”。相传他勤学好问：“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苴弘，学琴于师襄……”他经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之所以作上述议论，主要是通读儿子的日记，花了一些时间，概括出几点，不只是希望做学生干部的能略知一二，也很希望大人们同样认为下面的话不是多余的。

儿子是怎样处理“学习与工作矛盾”的呢？

第一，善用眼前光阴。工作会占去一些时间，但善于利用时间，可使人得到补偿。

儿子在日记中写道：

“其实，最可贵的是眼前时光，这是唯一的真实欢乐……未来美景的最佳保证，莫过于善用眼前的光阴，以有效的方式工作、思索和帮助人。只要你不断善用眼前光阴，将来必然和眼前一样美好。这样可以确保一年过得非常充实，没有一天虚度。”

这里谈到要珍惜眼前光阴。而如何珍惜呢？首先，要“以有效的方式工作”。如果拖拖沓沓地工作，或工作方法“不对症”、不科学，只能去进行低效劳动，甚至无效劳动。眼前时光势必会从身边溜走，还哪里有什么学习时间呢？其次，要有效地思索。如果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那种脱离实际的思考，或为小是小非所纠缠的思考，只能白白消耗精力和时间，又怎能去有效地学习呢？再次，要有效地帮助别人。如果出发点是帮助别人，而这种帮助是无效的，或适得其反，那么失去的就不只是自己的，而且还有别人眼前的光阴。所以，欲珍惜眼前的时光，需伴随一系列合理的思索和有效的方法，否则无法解决学习与工作的矛盾。

第二，要有“时间宝贵”的观念，不能将时间在叹息中浪费掉。

“如果一味地纠缠过去，怨天尤人，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时间也会在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叹息中浪费掉。”这是儿子在 1980 年，也即他十八岁写下的自勉，即不能使自己处于矛盾—叹息—浪费时间的恶性循环之中，遇有矛盾，要有一个积极的正确处理的态度。

他还以理科学推理的办法，告诫自己要有一种信念，并从中获取力量：

“真的，理科生虽然不常能说出满怀激情的话，然而，仅仅是从推理而演绎出的被用之所谓结论的东西却并不是干涩的。比如说，为了……的目的，我们是一点时间也浪费不起呀，一小时，半小时，哪怕是一刻钟，都是宝贵的。人就能从这样简单的信念里吸取到紧张奋斗的力量。”

儿子是学理科的，确实不爱说那种“激情满怀的话”，但他以理论的推理得出了时间宝贵的信念，而且坚定地认为，这种信念可以给人以“紧张奋斗的力量”。

确实，如果一味叹息“学习时间不够”，“被工作冲击了”，等等，而不去紧张奋斗，将永远解决不了学习与工作的矛盾。

第三，赋予时间以创造性，提高效率。

当社会工作占去了儿子的时间，他比别人的学习时间少，但还是显得十分乐观。他很有独特见解地区分了“绝对时间”与“相对时间”。认为自己失去的时间是绝对时间，它可以用提高相对时间的效率来补偿。

我这个一直教哲学年过七旬的老教授，在这一生向学员讲述关于时间与空间的道理之多，是数不清的。然而，还从未对这种“相对时间”与“绝对时间”动过这样的脑筋，而儿子写这篇日记时，只不过是个小青年。请看，他是怎样说的：

“我总希冀着突然间我拥有很多时间。今天，我才发现，并不由于我好强，天会赐予我比他更多的时间。而成才绝对需要时间。时间分绝对的和相对的。时钟指示给我们的便是绝对时间，而‘相对时间’我理解为效率……而绝对时间中很大一部分是生活必要时间，缺少了，人便无法工作。看来，只得发扬‘钉子’精神去拼命地挤、去钻了。”

然而，他并不认为“拼命地挤”时间，就是不吃、不睡、不休息，而是给时间以高效率，赋予其以“创造性的价值”。

当然，赋予时间以创造性，提高效率，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儿子告诉我们需要乐观。我的侠儿是不喜欢做“苦行僧”的。他总是乐观地战胜困难，在别





人看不到欢乐的地方看到欢乐。1980年12月份的日记中曾记录着下面一首诗：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当着别人意如“秋愁”，为时间而烦恼时，而他则境为“春朝”。问题是赋予时间以特别的价值，即独有的效率。他认为：“不赋予时间以创造性的价值，它就像小溪的流水，只能带去凋谢的青春的花瓣，而不能浮起成就的远洋货轮！”

## 清纯的爱

正确对待子女的爱情与婚姻是家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处理好这个问题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

爱情是孩子成才过程中相互激励、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一种特殊的力量。有的父母为子女成才，总是让子女推迟恋爱与婚姻。常常听到或看到有人说：“先立业，后成家，学完再说。”有人坚决反对子女在大学时谈恋爱。可是，父母脱口而出这种强硬戒律的，是否切实地为子女想过“学完再说”是什么意思？按现有学制小学六年，中学五年，大学五年，硕士、博士研究生六年，共二十二年，加上学龄前六年。岂不是要推迟到二十八岁后再恋爱、成婚。这种“晚婚”岂不过晚了？有的人就是为这种观念所支配，而一再放弃可遇而不可求的择偶机遇。到学有所成了，年纪也相当大了，理想的终身伴侣也十分难寻了。

我认为，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客观现实。要成才的子女都去做“苦行僧”，这是根本做不到，也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父母不要去为孩子恋爱、成婚的事情设硬戒条和过多操心。正确的家教应尊重孩子们的选择，真正坚持婚姻自由。父母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恋爱观、婚姻观。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我们一直认为，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历史上曾演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爱情，但是，并非每个人对爱情都有深切的理解。我们的经验是，应当让孩子们在适当的年龄里，懂得“什么是爱情”。这要成为“启蒙”教育的一个内容。因为这有利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有利于他们的终生成长，有利于他们将来建立起一个幸福家庭，从宏观看也有利于社会。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由一个个健康细胞组成的社会，才可能是健康的稳定的社会。

有的父母怕孩子们“心乱”、“不集中学习”，在家庭中惧怕谈论爱情。可是，在我们这个家庭中，谈论这个问题，好像一直比较“自由”。我们常常为孩子们背诵俄罗斯诗人的诗：

爱情不是月光底下的散步，也不是花园椅子上的叹息，什么都是可能的，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雪。爱情是一首美好的歌，但是，歌是不容易唱好的。

有时我们还讲自己的爱情故事，给孩子们听。这并非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帮助孩子们懂得什么是爱情，以及怎样正确对待爱情。我和我的先生在年轻时，别人都说我们是幸福的一对，十分般配。到了老年，有的老同志或老同事见到我们，还常说：“你们二位是优化组合”，“全家也是优化组合”。这里，虽有些溢美的成分，但是，也比较接近实际。我和我的先生，在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作为老同学而相恋。我们相亲相爱，订下终身（当时，还有传统的先订婚后结婚的习惯。订婚那年我十九岁，他二十二岁）。三年后结为伉俪。这一生，我们甘苦与共，相互理解，互相帮助，感情至深。有四个宝贝儿女，现在已有七个第三代，我们也已经到了“夕阳无限好”的年龄。金婚之期已过，“白头偕老”之约必能实现。

我们向孩子们陈述自己的过去，以及讨论爱情与讲解他人的故事，是希望给孩子们一些启蒙、参考和应有的认识，以便正确处理在他们那个年龄里多少感到有些“神秘”的爱情问题。可能是由于这种经常的开导与社会的教育，三个儿子在遇到这个问题时，都有了较好的心理准备。他们像真正男子汉一样，自主、自由，完全按着自己的意志，选择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喜结良缘，为我



们带来三个可爱的好媳妇。至今他们都生活得十分幸福。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一方出国后，常常导致婚姻的离异。我家三个儿子都出国，却未发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幸福的获得，看来是以较好的认识和悟性为基础的，这与平时的家教不无关系。当我的一个儿子，即老三金侠和被称为才女的漂亮姑娘王阳相识时，他并未因这一难得的机遇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写下了这样的随笔：

“当我们讨论怎样对待爱情的时候，且勿忘记问一问自己：‘爱情究竟是什么？’如果对这个本质问题模糊不清，乃至看法相异，那么，对待的方法自然大相径庭。”

“我以为爱情乃是一切人类感情之中最崇高、最神圣的一种。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是人类道德的结晶。无怪乎人们常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愿望表明：一切美好的姻缘都被认为是最合乎道义的。之所以神圣，是因为由爱情所至的婚姻一开始，爱的一方便对另一方负起了终身的义务，同时，爱的双方共同负起了对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和义务绝不是卑劣的人所能负担得了的。”

在儿子的“随笔”中，还评论了所谓的“恋爱自由”、“爱情至上”的问题。其中说：“不否认爱是以感情为基础，也不否认爱人要自由选择，但爱情绝不是儿戏，爱人也绝非玩物。这正是人和动物的性爱相异之处。”

“爱情绝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灯红酒绿，它还包含着对爱人和社会的巨大义务。脱离了义务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啊。”

“借口追求改变了（实际上是地位升迁了），而要相应地改变爱情，无非是那些朝秦暮楚之辈借‘恋爱自由’、‘感情基础’，冠冕堂皇的招牌，在掩护自己摆脱应尽的义务罢了。”

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爱情较为深刻的认识，又有了相互沟通与共识，我在上面所讲到的那一位漂亮而又有才华的少女，比较顺利地成了儿子的贤妻（见照片）。

他们两个人在中国分别从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去英国学习和工作。金侠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儿媳用自己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工资收入支持他。当侠儿荣获博士学位后，二人又一同到美国纽约，一个搞研究，一个进公司（现在二人都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工作，儿子是副教授，儿媳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是计算机高级技师)，生活得很美满。正是虽多经沧桑，而爱情经久益坚。这恐怕同他们共同对爱情的深刻而正确的领悟，也即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



金侠和爱妻王阳的合影



## 第四章

# 离开妈妈的羽翼搏击长空



### 瞄准世界高科技

#### 我们要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

尊重子女的选择，是家教的重要信条。在家中只是长辈说了算，而孩子们自由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受尊重，要想真正帮助子女并使其成才的愿望，很难实现，最终很可能会变为“海市蜃楼”。

有一位女教育家马霍娃呼吁“要尊重孩子”。她认为，给予孩子成才以帮助，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做到的，“我相信只有建筑在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好的、亲密的家庭，才有这样的帮助”。

对于孩子树立终极目标与可移动的近期目标，作为父母需要特别尊重孩子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给孩子以帮助，才会是切合实际的，容易被接受的。比如，当有了终极目标后，具体目标是什么，它的质的定向、量化，以及如何实现，这都是应该由孩子们自己去思考、衡量和决定的事。父母要关心，要当好参谋，但不要干涉过多，不要说些不符合孩子实际的话。我就对孩子们说过不从他们实际出发的话，不过孩子以自己的行动纠正了它，我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教训。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天，突然接到长子金煜打来的国际长途，他高兴地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说：“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要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了！”他在美国学的是构造地球物理，我以为学校真有此安排，认真地问：“什么时候去，跟谁一起去？”他说：“今年夏天，和金侠一起去！”我感到蹊跷，他在美国，金侠在英国，而且他学地球物理，而金侠研究的却是艾滋病，去什么珠穆朗玛峰？这种地方肯定不会暑假自费去玩。于是，在电话中，我停顿了一下，说：“你是开玩笑吧！”

他说：“不！金侠在伦敦大学进修学习之后，该读博士学位了。他准备去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学习。我在北伊利诺伊大学做了半年助教，又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夏天在南太平洋的海上考察。现在，我要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了。”



金煜（右）和金侠（中）立志“攀登珠穆朗玛峰”，  
金延（左）在攻读国际研究员

“啊，原来是这样！”我说。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全世界排在头几名的顶尖大学，当然是教育界的珠穆朗玛峰了。不过，我的担心又涌上来。“这些学校都好，但也十分难进。你还不如申请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对那里已经比较熟悉；让金侠申请读伦敦大学的博士吧！这些学校都是世界知名大学，也很好。”“不！妈妈，我们都商量好了，已经下决心，要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你过去不是曾说过‘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





吗？”他说。“你们可真会用啊！可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上得也太高了，小心摔下来，像妈妈似的，摔个骨折。”我说。

“不会的，妈妈等着听好消息吧！”儿子的回答十分坚定而又充满信心。

我的左手腕骨折，孩子们已经知道，是他们的爸爸在电话中告诉的。孩子们为此十分挂念，已多次来电话问候。这次打电话时，我手上的夹板还没有拆，但已经好多了。

调到海南任省委党校副校长，还继续兼任中央党校教授，仍带中央党校研究生，工作本来已经很忙，但还有一个帮助海南党校同志审阅书稿的任务。另外，因女儿是外科医生，工作支应不开，她的女儿一直放在我家，请保姆带。可是，我去海南，姥爷作为男同志“指挥”保姆有困难，只好由我将小外孙女带到海南。海南人一般不愿意做保姆。也可能那几年特区经济发展较快，随便做点什么，都很容易赚到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找不到保姆。

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姨妈，住在我那里。因她做过肺切除手术，冬天主要是到海南这个用她的话来讲是“地上天堂”的地方来疗养的。她老人家主动帮我忙家务，我很不忍心，下了班，一切都尽量自己干。记得一次小外孙女出水痘，除口服西药外，每天下班我还要熬上一小时中草药，为她洗遍全身。有时，晚上开会，回来还得熬药，涂洗。当时，每晚一躺在床上，好像一天的劲都用得一点不剩，总是感到精疲力竭。过度疲劳，“透支了”，终于由头晕而摔倒，搞了一个左手腕骨折。

我生怕两个儿子为“攀登珠穆朗玛峰”，搞得过累，拼得吃不消，有损健康。后来多次通话中，我也反复叮嘱：“不要把目标定得过高。”可是，他们每次回答的意思都差不多：“我们有信心，请妈妈多保重。”

因为，我当时在海南，给我的电话都打到那里。可能由于我摔伤了，孩子惦念，我当时接到的国际长途，比在北京他们的爸爸接到的多。当孩子爸爸来海南看我，并在海南修改书稿时，我将孩子“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想法告诉他，并说出我的顾虑，即一旦进不去那种世界顶尖级的好大学读博士，将进一般大学的机会也耽误了。

我对先生说：“是否有点太冒险了？”

他说：“可能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实力会作估计，有一定把握，否则不会作这种狂想。”他用了“狂想”这种词，看来也是颇为担心的。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我随和地说：“孩子们的自我估量也不知是否求实。不过，也许他们自己心里有底。闯闯看吧，不然他们也不会甘心。”

这之后，我先生继续修改他的书稿，并照顾我。姨妈有我先生在我们身边，当然放心许多。不过，她老人家还是极力照顾我和小外孙女。

有一段时间，既没有接到海外来信，又没有电话，我等待得十分焦急。虽然也知道孩子在集中精力拼搏，申请他们所要就读博士的两所大学。攀登珠峰，谈何容易！这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只是日子一久，在电话里听不到孩子的声音，就异常思念。可是又不能向国外打长途。当时中国的国际长途费不仅按每分钟计算的绝对数额比国外贵，而且如果同我们工资收入比起来，那更是昂贵得不可高攀。不要说同国外几个孩子通电话，就是只给一个孩子每月打一次电话，也是吃不消的。所以，我们只有焦急地等待。多亏我和我先生手头都有繁重的工作。如果是闲暇坐等，说不定会焦虑成疾。

一天傍晚，我们刚要外出散步，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恰好是我们日思夜想的长子金煜的声音：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金侠已经申请到英国公开大学全额奖学金，到剑桥大学医学院去攻读博士学位了，经费没有任何困难，请放心！”

“我是同时被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也都是全额奖学金。经过慎重考虑，最后，我还是决定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但我和同学开玩笑说：‘我在娘肚子里就知道麻省理工学院，所以我选择了它。’”

接着，他说现在他到了波士顿，并已去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了，又将波士顿新住址的电话告诉我们。

我在电话里开了一句玩笑：“你们两个攀登珠穆朗玛峰真的成功了！”

他说：“这才算开始攀登，路还长呢！”

他爸爸也在电话里，对他和弟弟表示祝贺，又说了不少鼓励的话。

不久，金侠也来电话了，同样谈了他和哥哥研究“要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经过、申请情况、到剑桥学习后的兴奋心情，以及新的地址、电话等。我听得十分开心，并向他诚挚地祝贺。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家人同时都可以听的电话，只好在我听过电话后，一一地向我的先生和姨妈转达，他们都高兴极了。

孩子们都早已获得博士学位，我们现在是追忆多年前的往事。不过，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自己很可笑。一听孩子在国外要申请全球最著名的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就十分担心和犹豫。既感到那种大学好，又感到高不可攀。怕他们去不了世界名校，受刺激；怕名落孙山，差的学校也榜上无名；怕他们攀登不上去，摔下来；怕申请不到奖学金等。当时，真是有数不清的顾虑和犹豫啊。而且提出阻拦，让他们申请已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与伦敦大学的博士。多亏孩子们有主见，当时没有听我的。自己既然希望孩子在现代高科技的学习与研究上有所成就，孩子攻克科学难关的决心也很大，做父母的就应任凭他们翱翔，何必搞“远距离遥控”！孩子们都不犹豫，自己还犹豫什么呢？

这让我反复回味马克思的名言：

在科学的入口处，  
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  
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页）

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做“错误”指点，像我所做的那样，多半是以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孩子。子女们一点点长大起来，特别是上了中学以后，最了解自己实力的是他们自己。父母一定要充分尊重他们。长辈可以讲话，也可以“指点”，但话要注意孩子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否则孩子会据理纠正父母。不要以“听话的孩子”去作为认定“好孩子”、“好青年”的标准与尺度。有时，“不听话的孩子”和年轻人，才是真正有出息的。鲁迅曾说：“‘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6卷，第84页）

## 中国应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鼓励孩子们的雄心壮志，支持他们为国争光的抱负，是为人父母者进行家教的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如果一个孩子心里只拘泥于几次考试的成绩，获得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高分，或稍稍高出周围的孩子就沾沾自喜，而不会远望，不懂得向大处想，这种孩子，心里缺少阳光，很难会有大的造诣。

所以，做父母的不论是孩子处于童年、少年，还是长大成人，出国留学，对他们的宏伟抱负，一定要感到欢欣，积极鼓励、支持，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助其一臂之力。

金侠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邀我们于 1992 年夏去英国探亲。下面请读者随同我们看看在英国的一次感受：

英国的天气很特别，8 月的盛夏，不是酷暑闷热，而是凉爽宜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按照金侠和儿媳王阳对我们短短三个月探亲的周详安排，这一天是去参观儿子就读的学校——剑桥大学医学院。

早晨同我先生一起散步，发现衣服穿得过少，其实，比在北京的 8 月份穿得多，不是短袖而是长袖衬衣，不是绸裙而是呢裙，可是，还感到凉。回来对儿媳说了。她找了一件她的红色短风衣，说：“妈妈，今天参观，再加一件衣服吧！”她细高窈窕，可是爱穿肥大的衣服，我一试，还很合身。穿着儿媳的衣服，儿子开车，我们就出发了。在车上听到儿子和儿媳的介绍才了解到，英国是一个岛国，四面被海洋环抱，随时有海风吹来，一年四季空气清新宜人。就是过去由于工业发展较早，又较集中的英国著名的“雾都”伦敦，现在由于注意了环境治理，以现代化方式清除了污染，空气质量已大有改观。工业污染而使鱼虾一度几近绝迹的泰晤士河，现在也已经可以钓到大鱼了。这说明，人类的环保意识增强后，同自然界的关系到科学的协调，生存环境是可以改善的。

英国 7 月、8 月的最高温度不到 30℃，平均只有 20℃。儿子与儿媳已经来了三个夏天，没有一个夏季是超过 30℃ 的。儿媳还打趣地说：“天气预报，一说明天 30℃，女士们就赶快找漂亮的连衣裙，准备第二天穿。因为，平时穿的机会很少，这都成了她们的习惯。”这里，冬天也只有零下几度，草坪终年常绿。夏天不热，冬天不冷，颇适于居住。孩子们这一说，我们才明白。难怪我们探亲的 7 月、8 月、9 月三个月感到气温是这样的舒适。

参观的这一天，阳光明媚，又凉爽宜人，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在国内早已向往着看看儿子的生活与学习环境了。有一次，梦见金侠在英国住在一个穷兮兮的中国留学生筒子楼里，在一个很拥挤的、破旧的大教室读书。醒来明



知道这种梦很荒唐，全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

尽管心里明镜似的，但还在金侠打来国际长途时间：“你们那里条件怎么样？我们可能要出去看看。”

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条件很好，来看看吧！我和阳阳商量，正要给双方老人发邀请信呢！”

儿子有些奇怪，打电话问姐姐：“为什么妈妈突然要出来，是否在国内不舒心？”

姐姐解释说：“不是不舒心，而是想念。”

后来，他姐姐把这次电话告诉了我们。来英国后，看到他们的居住条件，相当满意，越发感到梦中所见的荒唐。可能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状态缺乏了解，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中国过去大学生宿舍的拥挤和简陋去想象国外学生的居住状况，而担心孩子在国外的生活居住条件。过于思念，造成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为彻底打破梦的幻境，在金教授与我合写的《英伦之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一书中，还专门以一节写了金侠和儿媳王阳的那个可爱的、幸福的小家，题目是《现代化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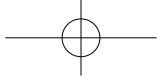
儿子学习的环境如何呢？他早7点多上学，中午回来吃个午饭，不休息就走，下午6点多才放学到家，晚上如有特别患者血液化验任务，还要加班。一天十多个小时，究竟学习与生活在怎样一个环境里？记得我5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六个女同学一个宿舍，床挨床，没有办法在宿舍看书，只要不上课，就跑图书馆或资料室；就是在我探亲前，还听说北京大学学生晚自修上图书馆学习，还得提早去占座位。不知是否属实。但中国的大学普遍学习条件差，这是无疑的。

可是，我们到儿子的学习室一看，完全出乎预料。博士生们的学习室明快、豁亮，每位学生有个书桌，都配有最新型的彩色电脑、激光打印机，还有与系里其他人员共用的黑片和彩色复印机，以及随处安放的黑色沙发椅，等等。

我对老金开玩笑说：“博导，你看人家这博士生学习室多漂亮！你的博士生怎么样，比一比。”

我的先生总是带有一种“知足者常乐”的模样，说：“我的博士生，每人还能有一个小房间。这是中央党校，比一般大学好多了。”

属于儿子学习条件的，所见之学习室，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他还将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我们带进了他和几个师兄弟一起利用的一个大大的、阳光特别充足的实验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我们还从门外窗户看了看专门做艾滋病研究的实验室。接着又来到一个为每周做学习汇报用的报告室，同样，十分宽敞、明亮，在一面墙上还有投影光板，另设有投影机，儿子还给我们做了一个学习汇报表演。

走出他们的这一栋学习楼，又各处看看，周围全是一栋栋玉白色的整洁的高楼。楼与楼之间全是绿草坪。整个环境显得清洁、舒适、宁静、美丽。儿子指了指和他们的学习楼毗邻的一个外观差不多的楼说：

“那是分子生物研究所。就在那个楼里，先后出现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的设备，和我们的也差不多，凡研究自己专业所需要的现代化仪器，应有尽有，各研究所都是这样。关键是怎么利用这些条件。”

“那就充分利用吧！你们不是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吗？”我说。

“妈妈，我们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儿子很有信心地回答。

爸爸说：“现在，攀登的目标更具体了，分子生物楼就有四个活生生的榜样：诺贝尔奖获得者。”

“爸爸，那不是高不可攀的。”可是，儿子又十分感慨地说，“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得过一个诺贝尔国际和平奖，那算什么？完全是西方为了反华政治需要。靠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得奖，不是光荣，而是耻辱”，“我们留学生都在议论：‘中国应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家也都有决心为国家争得这一殊荣”。看来，中国没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使儿子和他的同学们心中很不平静。

回家的车子已经发动了，儿子手握着方向盘，还继续讲：“当然，有美籍华人获奖者，这固然也是全球华人的骄傲。”可能留学生对这个问题议论较多，儿子如数家珍似的说：“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76年丁肇中获物理学奖，1986年李远哲获化学奖。”他又说，“接下来是谁呢？我们这批留学生，虽然决心很大，勇气十足，也有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精神。但毕竟起步太晚，要真到达这一步，可能还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下一批获奖者，肯定没有我们。”

看来，这批留学生，包括儿子，一点也不妄想，给他说对了。我们谈话的时间是1992年8月。接下来，美籍华人获诺贝尔奖者为：1997年朱棣文获得





物理学奖；1998年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同美国科学家劳克林、德国科学家施密特，由于量子物理学的研究上有突破性贡献，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至今全世界华人得诺贝尔奖的已有六人，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外国研究机构中获得的。这一方面表明华人的天赋和素质并不比任何外国人差；但同时也说明国内研究机构的条件和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奋起直追。

在车子上，听到儿子说，他们“毕竟起步太晚”。为了鼓励儿子，我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儿子说：“妈妈，这话说得多好啊！”

我说：“不是我说的，是马克思说的。”

他说：“你一说，我想起这段话的意思了，可忘记是马克思说的，还是恩格斯说的，记不准了！”

爸爸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的。”

“好！我们原来的邻居、好朋友、剑桥大学研究农学的博士生小王，听你们来了，下周日要在他家请吃饭。还有几位博士生作陪，我要用马克思的话给他们鼓鼓劲，大家一起去攀登。”儿子说。

一周一晃过去了。我们按着小王的邀请，晚餐前到他家。另外几位博士生已经到了。小王和他的妻子为我们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餐。有中餐、西餐、“中西合璧”式的，味道相当好。席间边吃边交谈。

我同一位坐在自己身边的博士生谈起上周参观剑桥大学医学院的印象，而且说：“这么好的学习与研究条件，真该多出一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他说：“不少，整个剑桥大学出了五十多人了。在全世界排第一，哈佛大学才三十多。”他还说：“剑桥大学历史悠久，规模很大，有三十个学院，五十个系和二十一个科。1991年有学生一万多人，研究生近五千人。他们培养研究生，不是以毕业多少博士为荣，而是以多少人荣获国际最高奖、在诺贝尔奖大学排行榜永远保持第一名为目标。”

听到这番话，我心里很不平静。心想：世界名牌大学为学生竖的标杆可真高啊！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千方百计为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创造条件。我们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国家要真正“有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方面，要教育学生们去拼搏，不是消极等待，而要积极去为国家争得那种“无上荣耀和至高成就”；另一方面，国家也要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学条件，以举国之力为争得我们国家的这一殊荣而不懈努力。

### 对高科技的追求也要有血的奉献

为大义殉身，以及作出血的奉献，是家教中的崇高内容。这是做父母不忍心想也不愿去想的，特别是作为母亲，更要经历严酷的思想斗争。然而它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果把孩子培养成怕困难、怕见血、怕牺牲的苟且偷生的懦夫，他们永远不会成才。

有的父母认为，在革命时期需要有谭嗣同的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概和无数先烈“甘洒热血写春秋”血的奉献精神。而在今天是平时期，孩子们从事科技研究事业，哪还有那么多的风险？其实，这是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起码为人父母者可能思想准备不足。

我也有过这种思想准备不足的时候，差一点提出让儿子改变他所学的专业。做父母的每当想到孩子的成才，常常想到辉煌、荣耀、“光宗耀祖”等。其实，孩子成才的道路，不可能都是撒满了鲜花，天空也不总是那么晴朗，有坎坷，有泥泞，有风雪，有雷鸣闪电，有风险，有时还要作出血的奉献。这里没有丝毫夸张。然而，我过去却想得很少。下面请各位父母看看我们的二儿，当时剑桥大学的博士生金侠的艾滋病课题研究。

1992年我们去英国探亲，整个过程是愉快、欢畅、兴奋的，且收益颇丰。但有一件事，为我的欢快心情罩上一层阴影，留下几分忧愁和郁闷。

伦敦时间7月3日晚9点，我们正点到达希思罗机场。经过长达二十四小时的飞行，本来已疲惫不堪，在困顿与昏睡中，突然听到机上铃响，空中小姐报告伦敦到了。一睁眼，窗外一片灿烂。通明的灯火十分美丽地闯入眼帘。我先生和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当飞机着陆后，我迅速背上挎包、提起小手提包，同我先生说：“我先向前移动。”他笑了笑，很理解我急切想见到已别离三年的两个孩子的心情，说：“你先走吧！”在别人穿衣、解安全带、拿行李的过程中，我已经飞快地走到舱门前，成为排在最前面、第一个走下飞机舷梯的人。



自然，办完入关和一切手续，我又是第一个来到接客厅的门口、最早看见站在接客人群中自己亲人的人。我们冲出人群，怀着喜悦的心情和两个孩子拥抱了。就在这一瞬间，我明显地感到儿子和儿媳比在国内时瘦了许多。

还在汽车行驶的路上，我就急切地问：“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都瘦了？是学习累吗？”

他们没有直接谈学习累不累，儿媳说：“瘦了吗？我没有感觉啊！我一直是很瘦的。”

儿子说：“妈，您眼睛真厉害，我可真的瘦了。”

接着几天，我很注意观察，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去参观、游览的路上。我发现儿媳虽然瘦了，但气色很好，脸上透着红润，仍然是那么漂亮而有精神。而儿子呢？虽然没有失去人们惯称的“小帅哥”风采，但脸色较黄，嘴唇发白，牙龈也没有血色。

慈母的爱，急于弄清缘由，但又怕提出这个问题为刚刚开始欢乐的团聚气氛煞风景。所以，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沉默，谈别的话题。然而，却不停地暗暗思忖：儿子是不是贫血啊？记得我年轻时曾有一段时间血色素极低、牙龈与嘴唇发白，经诊断，结论是贫血。

那是由于国内处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不多，各类食品缺乏，又要照顾孩子而导致的营养不良。金侠的现状从外观上同我那时很相似。可是，英国并不存在食品缺乏导致营养不良的问题。是不是学习过于劳累了，而饮食节俭、“不顶硬”；是不是运动少了，整天处于学习室、实验室；是不是出国后生过病，没有彻底康复……我只是作多方面的猜想，但在一段时间里，不去问，也不说，让自己保持沉默。

可是，我这个人在任何一件事上，长期保持沉默，很困难。记得在国内一次组织生活会上，同志们说我“心地善良，性格透明，使人愿意交往”。同志们是在谈优点，而我却深知这同时也是我的缺点。心里一旦憋着事，不说就很难过，常常是一吐为快。关于儿子身体变化的缘由，虽极力抑制，但也常有一些不自觉的流露。

比如，到超级市场购物时，我问儿子：“英国食品价格高不高？比中国怎么样？”

儿子说：“如果单从人民币同英镑的汇率比较而言，英国的物价显得比中国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要高；但从实际收入看，以薪水相比较，食品在收入中的比例所占很小，你们当教授在中国月薪不过是数百元人民币，我在英国当博士研究生，月收入一千多英镑。因此，拿一英镑当一元人民币花，各种物品的价格就要比中国便宜得多。我们来买吃的，从不管多少钱一磅，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占月工资的六七分之一，而在北京却占工资的一半了。”每个周末我们都同他们一起去超市购物。从他们的实际表现来看，他们也确实从不在吃穿上算计。又如，看到儿子每周五下午去球队踢足球，我也借机问：“每周只有这一次体育活动吗？”儿子回答：“不，还有其他活动。”看来，我想的不少“缘由”都不是儿子消瘦的主要原因。实在忍不住了，在我们到达英国的十天左右，借儿子晚上去做实验，我同儿媳长谈一次，开门见山：“小三来英国后，得过病吗？”我问。“没有啊！一直很好。”儿媳笑了笑回答。“怎么我看他气色不好，很像贫血。”我说。“我也发现了，是不是抽血有影响。”儿媳率直地回答。“什么，抽血？”我吃惊地问。“研究艾滋病，需要与正常人的血浆相对照。”她停了停说。“当地没有卖血或献血的吗？”我问。“有，但是很少。”儿媳作了简短的回答，但紧接着又作了详细解释。

从儿媳的话中了解到，剑桥市只有十多万人口，是以剑桥大学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居民多为知识阶层，即属于白领阶层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收入不低，又很注意身体健康，真正穷人不多，卖血者很少。不像伦敦、纽约等大城市，血液来源多，血库存血多。而艾滋病研究需要的血液数量虽不是太大，但必须经常供应，源源不断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学者作奉献了。

儿媳还告诉我说：“剑桥大学医学院的艾滋病研究全靠师生献血，大概每两周要轮上一次。”“啊！全明白了，东猜西猜，一个也没有猜对。”我叹了口气说。“妈妈，又担心了吧！不要紧，小三他们老板（他的博士生导师），也和学生一样轮流抽血。一抽多年，血管都硬了，还在坚持。没事！”儿媳在安慰我。其实，她的担心也是不言而喻的。听到这些实情后，我忧心忡忡：“外国人体质好，不怕；儿子身体能顶得住吗？博士生读完还得好几年啊！”

有一天，我把自己听到的以及诸多的想法，向我的先生和盘托出，并说：“我们是不是建议儿子改一改博士论文课题，别再研究艾滋病，总抽血身体是吃不消的。”



我先生想了想说：“咱们孩子搞科学研究都很执着，一出国就研究这个课题，这个课题又很重要，已经快三年，要他转变研究方向，是不可能的。”事后，我也反复琢磨，“建议”确实不适宜，然而，每想起此事，却心绪不宁。

1992年9月12日至18日，儿子和儿媳借用自己平时积攒的假日，陪我们驱车千里去旅游，在苏格兰度过了愉快的一周。在英国的四大行政区，即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中，苏格兰仅次于英格兰，而居于第二位。参观很多地方，一直非常喜悦，我和先生一起还写了《苏格兰纪行》（见《英伦之旅》一书，已出版）。

海边小镇的住房是事先从旅行社租订的。英国的旅游业有一个自己的网络，可以提前在伦敦预约全国各地的旅馆、饭店和家庭式公寓房。我们住的就是家庭公寓。整洁、漂亮，还有几分古典美，十分舒适。但我有一个毛病，如果心里没事，睡得十分香甜；一旦有一点心事，就很难入睡，吃过安眠药，还继续翻腾。每想到我的“建议”提出不合适，而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就总是彻夜难寐。儿子听爸爸说“妈妈觉睡得不好”，他不知缘由，但深深地关切，使他在晚上还专门跑去小镇为我买一瓶“威士忌”来，说：“妈妈，这是出产威士忌酒的故乡，货真价实。晚上少喝一点，就可以入睡，比吃安眠药对身体要好得多。”儿子一直是学医的，又为儿子爱母之心所感动，当然，言听计从，入睡前照办，真的很快入睡了。

不过，直到回国后，每当忙起来，什么都不顾了，但稍一有闲，眼前就闪动着儿子消瘦的身影，特别那张略有苍白的消瘦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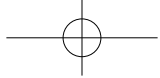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直到1995年春，女婿从国外回来说：“金侠上半年取得博士学位，下半年就应聘到美国的一个世界上很著名的艾滋病研究所做研究员了。”

我急忙问：“去美国还抽血吗？”

女婿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妈妈，您的几个儿子和女儿在国外都是搞高科技的。对高科技的追求，要有血的奉献啊！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奉献终身的。”

当时我听了想：好！给妈妈一个高尚的遁词，没有正面回答，可能他也根本没有问过金侠这个问题。

然而，事后想，女婿谈得很有道理，可能我心里的“结”也只能从这里解开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我找来大量有关艾滋病问题的书和材料看。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边看边想，似乎越看、越想，心里也就越亮堂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与估计，到 2000 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包括健康带菌者及已发病者）将达到几千万人。同时，妇女及儿童将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大陆感染者数目增加得很迅速，1993 年一万人，1995 年已达十万人。世界艾滋病日时曾提出“让希望照亮世界”的口号。可是，长期以来艾滋病却被普遍地认为是不治之症，是“绝症”。正如一份杂志的报道所说：“今日我们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下——这种现代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坐着喷气机到处旅行，并且集中力量攻击人类的免疫系统……到目前为止，这种病毒造成的疾病等于是对患者宣判死刑。”

面对这样一种危及万人生命的严峻情况，热爱人类、热爱生活的那些有良知的科学家，一旦选择这一课题，怎么能够不奋不顾身地去研究呢？

为人父母者，一旦有了殃及人类和祖国的毁灭性战争，无疑会义无反顾地将儿子送上战场。而在战胜这种已对全人类亿万人的健康造成损害，且有增无减的“病魔”中，怎能不支持儿子走上“战场”，并热诚地去讲科学家的奉献精神呢？人人都想使自己的子女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在孩子成才前，做父母的首先要懂得奉献，要懂得为人类造福，为国家献身，这才是更高境界的父母之爱！

后来，我看到儿子的日记，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金侠在日记中写道：

“吾辈爱祖国，报之以贱躯。即使我们碰得粉身碎骨，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用心血铸成的遗产。”

他还抄录了这样的话：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这段话已经不熟悉了。但经历过那种血与火年代的人，有哪一个会不知道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写下的这段千古名言呢！

上面是留学海外学子的一片赤子之心！母亲应当理解他们。我相信伟大的母亲——我们可爱的祖国，会更为理解他们的！





## 架起东西方文化交融桥梁的赤子

### 基因工程研究的一位“中国女骄”

深情地平等地同孩子讨论，解开他们内心的“情结”，不论对孩子的童年，还是成才以后，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家教方式。

现在国人每年送出海外留学的赤子多达几十万。孩子出国后，第一件事就是信心问题。这是初入异国他乡后很自然要产生的。一方面看到国外高科技的发展，看到那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较高的消费水平，看到一些人较高的教养与文明程度；另一方面闯入眼帘的又有着许许多多的看不懂、看不惯的光怪陆离甚至腐朽的现象。孩子们会有很复杂的感受，但首先不时地要想：在这里我们是否能够待下去，能否完成学业？会不会受到歧视？……如果能够受到重视，并让他做某些负责工作，当然会增强他们的信心，但这在进入异国他乡之初常常是不可想象的。

这时，社会的帮助、朋友的鼓励、弟兄的支持都会给予力量。而父母的那种温和的、耐心的，而又深刻地能够打动他们的谈话，相互交心，平等讨论，对增强他们的信心，有一种特殊的效应。从反馈回来的他们的一笑、频频点头，以及事后的行动，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认同与信心的增强。进而使他们自童年开始的祖国的教育，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种种观念又升腾起来：“中华民族是具有高超智慧的民族”，“是有千年文化底蕴的民族”，“这个民族所给予我们的聪明智慧会使我们赢得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我们东方人不是黄色的矮子”。于是，他们又满怀信心地去迎接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与挑战了。

上面的一切，不是空发议论，在 1995 年赴美到女儿金莹家探亲时，在我与海外中华儿女的接触中，就有这种深切的感受。

有一天，我正在女儿家中午睡，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我和我的小外孙。看看表，已经是下午 4 点。昨夜孩子哭闹，我没睡好，趁他午睡，打了一会儿电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脑，继续增补我先生和我合写的《中国教授眼中的美国》一书的内容。下午3点才躺下，外孙补觉，也为我“提供”了一小时的休息。按照美国的习惯，是先打电话约定好之后才能到别人家拜访，只有新到的华人，才不大尊重这一习惯。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女儿的房门没有“猫眼”。她上班后，不放心，曾多次叮嘱：“一定问清楚是谁再开门。”因为美国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入门抢劫是常常会听到的事。这一次，问罢方知，原来是女儿朋友的姐姐，曾来过。

她说：“顺路到这里，看看孩子。”

我问她：“今天为什么没有上班？”

她说：“是试用期，半日班。”接着，她谈了自己为什么来美国，以及金萤是怎样帮助她找工作的等，并一再表示对女儿的感谢。她说，自己已经到女儿所在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工作一段时间了，主要是在金萤她们的研究室做实验。自己的口语不过关，研究室多数是“老美”，有些话听不懂，还得金萤帮忙翻译，很过意不去。她还说，金萤不仅外语好，工作也好。她们研究室有一位大陆来进修的女生，还有一位从台湾来这里工作多年的博士后，只有她们的话，我能听懂。

我问：“大家曾谈到金萤吗？”

她说：“当然，谈得不少。总的印象是，老板（Niake 医生）对她特别器重，大家也认为她聪明伶俐、刻苦努力。”接着她又说，“工作起来爱拼命，有时实验搞不完，不吃午饭；经常晚下班，误了回家的班车。我对她说‘你简直是个工作狂’。”这位客人还说，“大家都很尊敬她，公认她是一位‘中国女骄’。”客人对女儿的评述，使我加深了对她留美后状况的了解。

我说：“噢！明白了，怪不得金萤下班总比别人晚些。乘学校的头班车，6点多钟就可以到家。金萤一般是乘末班车，7点多才回来。有时，孩子闹，又怕摔了，不能做晚饭，我就抱着孩子站在楼下的门口等。还好，门前的大路，来往车辆多，冬天黑得早，7点多已经很黑了，不过，有路灯，孩子在闪亮的灯光下看汽车，就不闹了。”

我边说脑子里边浮现着女儿从街道的转弯处，看见我们时匆匆跑过来的身影。

一次周六，也是女儿的休息日。她说：“妈妈，今天天气晴朗，咱们一起去我们工作室好不？昨天，有点实验没有做完，今天需要接着做。你和凯凯在大



厅玩，我在另一个房间做实验。”

我开玩笑说：“怎么，你又要加班？老板也不多给钱，你来这里还继续学雷锋啊！”

她笑了笑说：“不是给老板干，我做博士后是来学习的。妈妈，掌握高科技得拼命呀！”其实，我很理解自己的好女儿，她做事，从来有始有终。这是多么可贵的敬业精神啊！



金萤学而不厌，乐此不疲，这是假日在研究室

“好吧！再去看看你们的漂亮工作环境。”我说。

实际上，我们已经全面参观过她所在的医学院，并在我和我先生共同写的《中国教授眼中的美国》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掠影”。所以，这次去，我们直奔研究室。女儿的孩子当时只有几个月大，只能躺在小车里，我先是推他在走廊里玩。发现一位美国的女博士在加班，还有她们的那位老板也在加班。见我们来了，两人高兴地跑出来叫萤金（美国人的姓在后，名在前）。女儿出来为我们做了介绍。其实，在前不久召开的“Party”（一种聚餐形式的社交集会上），女儿已经将他们一一指给我看，但那只不过是一方相识。接着，两个人站在小车旁，弯下腰逗孩子，比比画画地说着笑着。女儿见我听不懂，翻译说：

“他们讲：‘这个小男孩，真可爱。脸白白的，还满头黑发。’”

“老板问：‘他的头发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么多！我的儿子生下来，为什么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是一个小秃头？’”

说完，他们都各自工作去了。我仍推着小孩车在走廊里面转。突然，发现挂在墙上的展示板中，有三篇女儿的文章。有的她是第一作者，有的是第二作者。我不认识英文，文中的内容不清楚，但几个孩子的英文姓名我都认得。心想：这是女儿什么时间发表的文章？怎么没有听她说过。这时，已经接近上午11点，孩子在小车里睡着了。我也到资料室去坐了坐，随便翻翻画报。中午，女儿的实验搞好了，我们到她们的医学院的大食堂，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这是一个大自助餐厅，想吃什么，随你挑选。

一到家，我就问女儿：“怎么，你的文章都挂在一个大展示板上？”

女儿说：“那是近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每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凡近期发表的文章，老板都给粘贴出来。”

女儿显得毫不满足，且高情远志地说：“在我们那些人中比较起来，包括与有些美国博士比较，我的文章发表的是比较多的。不过，用英语写文章，我的困难还不少。在这方面我不如几个弟弟。我的实验成果多，如果写作困难少些，还会发表更多的好文章。”这番话充分显示了我们家中那种“取乎其上”的精神。

后来，当我把她的小儿子带回国后，她又利用晚上，到专攻写作的英语班去学习。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已届不惑之年，但学习起来，仍乐此不疲。那种学习热情，还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她总是那么顽强拼搏，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我和我先生去美国探亲，女儿金萤告诉我们，自己已经有多篇科学论文发表在美国较有名的杂志上，如《血液》、《临床研究》等。（Blood——《血液》和J.ClinInvest——《临床研究》，这两个杂志是美国很有资望的专科杂志，是本领域里的一流杂志）。然而，她对自己好像还很不满意。

她说：“我和弟弟们还没有办法比，他们都在全世界超一流杂志《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文章。我发表文章的刊物级别就差一些了。在美国考核成绩或找工作，谈起科研成果，不仅是看数量，而且还看是在哪里发表的文章。”

我想：这大概也同穿衣服、选器物看名牌差不多。

接着，她又说：“弟弟一篇文章二十四分，而我的一篇文章才打八九分。在我们同龄人里，都说我不简单了。可是，我还得拼啊！”



我急忙劝说：“你能够做到这个份儿上也确实不简单，依我看已经够好了。”  
她说：“工作还想动一下，再提高一步。”

已经到了“四十而不惑”年龄的人，一般对任何事物的把握，都会审时度势，三思而后行，而对专业技术的把握则已趋熟练，甚至会游刃有余。我相信女儿能够很好把握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问世。

记得在美国期间，有几天女儿下了班常说：“这几天研究室的人们心绪不宁”；“老板说课题经费不足，需要裁人”；“今天，老板说，准备解聘三位”。

我问：“能有你吗？”

她笑了笑说：“不可能吧，我对那里很熟悉，老板找不到什么仪器或资料、数据，常要问我。可也说不准，美国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常常一个职业，甚至在一个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终身职业，终身单位，习以为常，甚至被笑称为“单位人”。特别是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而在美国，改换工作单位，甚至改换职业是司空见惯的事。今天在美国东部工作，明天又跑到西部。有时是老板炒人，也有时是自己找到更满意的工作炒了老板，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像女儿这样在一个研究室里做博士后、研究员，连续工作几年的现象，反而是不多见的。可是，在美国没有工作，就可能什么都会失去了。因为，汽车、房子……一般都是提前消费，分期付款。所以，没有工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有几分替她担心，在十几个人的一个小单位中解聘三人，比例不算小。

一天，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博士后的妻子，来家拜访。她是在女儿楼上的一个实验室工作的。

在交谈中我提起我的担心：“小萤他们研究室要解聘三人，不知能否有她？”

这位漂亮的年轻人，听到我的话，眼睛瞪得很大，魅力迷人地笑了又笑，好像听到什么奇闻似的说：“阿姨，您想到哪里去了，金萤是他们研究室的骨干、台柱子，大家有什么问题都问她。连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一有问题也来找她。解聘谁，也解聘不到她头上。”

果然，没过几天，老板对要解聘的几位都一一谈了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博士，另有一位华人女士，还有一个什么人，记不清了。

又过几天，老板将女儿找去征求意见。听女儿回来说，老板谈话的大意是：“解聘三个人的这一天，是自己心情最不好的一天。没有办法，课题费不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足，开支不够，不能不减少人。”但他又说：“金萤，你学习刻苦，工作杰出，什么时候也不能解聘你。人少了，希望更多地发挥作用。”

在1996年6月我回国前夕，又听到一个意外消息，老板说申请下一个新课题，要求两年完成。他又将女儿找去谈话，说自己手中工作比较多，希望她帮助管理研究室，女儿当时没有答应，说：“回去考虑考虑再回话。”

回到家女儿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谈到她的顾虑：“研究室有八九个人，多数是‘老美’，而且，学历都比较高。这么个群体，我怎么能管理得了，自己感到不能胜任。”她征求我的意见：“做不做？”

我明确表示：“要有胆量。老板一面裁人；另一面又提拔人。看来，他是要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效率，希望有一个助手帮忙，搞好组织管理。你已经来了四年，可能也是经多年观察，认为你能够做，才同你谈的。对自己应该有信心。为什么对美国人就不能领导？”

女儿听到我的意见，又给弟弟们打了电话，谈到她的顾虑，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弟弟们说：“姐姐要有信心，大胆接过任务干”；“别人想方设法要做个小老板（小单位负责人），都没有机会，现在人家让你干，怎么能够往外推？应当立刻答应”。

这样，她挑起了管理一间研究室的担子，而且颇为称职。据后来回国的她的同事和朋友说：“金萤在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一直干得很杰出，奋发努力”，“原来老板的课题快做完了，经费已接近用光，可能要回医院当医生了”，“又有一位新老板立刻聘任了她，仍然在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

最近女儿和儿子来电话都证实了这一点。

1995年女婿说：“金萤搞的基因工程是高科技里的高科技。”女婿的说法是属于“爱屋及乌”，对女儿业务的一种偏爱呢，还是果真如此？这我不清楚。然而，从女儿出国后的来信看，她一出国就和弟弟们一起瞄准了高科技，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信上曾说自己“学了很多世界性先进技术，我现在从事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是近十五年才发展起来，很先进，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学，以最大能力去掌握”。





女儿 1991 年去美国，已近十年了（现在，在我修改此书时，出国已经二十年了）。

“抗战”不过八年。而美国留学生常说：“我们是十年抗战。”我的长子金煜，1989 年年底去美国，从读书到获得博士学位，直至 1998 年正式工作，基本上是十年。女儿十多年也没有离开全世界著名的医学院（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而且一直在研究基因工程。



金萤（右一）和研究室部分成员在同事家里做客

她现在正想更上一层楼，但不是“独上高楼”，也不是去“望尽天涯路”，而是在考虑基因工程的科技转化，即实际应用问题。像女儿二十年如一日地对于高科技的这种“情有独钟”的追求，在留学生中，大有人在。然而，由于她已经不年轻，而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自然需要付出加倍的汗水和心血。她这种一旦瞄准高科技，锲而不舍去追求的韧性与恒心，使我这个做“母亲的母亲”的都为之动情和折服。

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很提倡韧性与恒心。他在同爱妻许广平的通信《两地书》中，曾谈道：“‘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在寄给陈 × × 的信中还谈到“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女儿的韧性与恒心，固然可佩，但她毕竟人已到中年。真希望在我们伟大祖国众多的年轻人中，能够涌现出千千万万的有韧性、有恒心、锲而不舍的社会脊梁。

### 世界地质大会中的一位代表

“海外学子热爱最伟大的母亲——祖国，祖国爱护海外赤子”，这是孩子成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才过程中或成才以后持续施以家教的坚强后盾。

“你不要坐错车！”这是离家数年的长子金煜回北京参加第三十届世界地质年会，趁会议间隙回家探望，走进家门后说的谁也没预想到的一句话。他大声说：“爸爸、妈妈我回来了！”换好拖鞋，走进客厅，就为我们表演了一个动作：他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姿势，而且学着别人很严厉的腔调说：“下去，下去！”儿子生就一副爱开玩笑的性格，一进屋就逗得我们开怀大笑。不过，我们还是不理解。

于是，我问：“你是学着谁的腔调讲话呢？”

爸爸也问：“那是谁的手势？”

“好！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金煜说。

从他的生动描述中我们才清楚，原来这是由于中国长期封闭的传统观念和警卫体制而造成的一个误会。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96年，第三十届世界地质年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此类世界性学术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应该说是我国的荣誉与骄傲。各国的专家、贵宾，以及国内的专家几千人云集在北京，引起了力主“科教兴国”的中央负责同志的很大关怀与重视。开幕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很多中央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李鹏总理作了重要报告，并有总理接见、照相等，规格相当高。这样相应地保卫工作也就加强了。会后，只见一辆辆漂亮的大轿车，早已等候在天安门广场。儿子会后直奔来时坐的专车。

不料，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很粗鲁地说道：“下去！下去！这是给外宾准备的车，你不要坐错车。”

儿子无奈只好说：“既然你是给外宾准备的车，我只好做一次外宾了！”

对方一把抓起儿子胸前的大会出席证，发现是美方代表，面孔一怔，但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却转头恼羞而去。

爸爸含笑说：“误解很可笑，也很难免。有些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著名的美国大学，竟能派中国人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作为他们的代表。”

因为，儿子在国内读大学乃至后来出国读博士，都没有离开岩石圈动力学。所以，他在美国攻读博士时，选择的专业方向是构造地球物理学，而所选作的博士论文课题，即中国西部岩石圈动力学，重点研究青藏高原岩石圈形成机制。金煜的导师 McNutt（麦克纳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才华出众的女



教授，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地质界，很有威望。她没有一点民族偏见，深知中国还很少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重要的新课题。为此，她坚决支持金煜对该课题的选择，并精心指导。当儿子不分昼夜、刻苦努力将课题完成时，她乐不可支。经过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们的评议，共同认为金煜的博士论文提出了青藏高原形成机制的创新观点，确定了青藏高原下面地幔缝合带、青藏岩石圈多重褶皱，等等。金煜的论文，在全球超一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面发表了。这样，他的突破与创新又得到全球同行的公认。可能基于这一情况，他才能够被选代表麻省理工学院来参加第三十届世界地质年会。

这里的关键是金煜的突破和创新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公认。

在大会期间，他所提交的会议论文，又被评委选中，决定请他在会上用英语作了学术报告，并博得好评。国内有些单位请他去作学术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愿意将日夜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最新科研成果，无私地交给祖国和人民。

如同其他的海外学子一样，儿子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所就读过的青岛海洋学院，后改名为中国海洋大学。为了推进海洋大学在科学研究上走向世界，金煜于1992年偕同导师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玛莎·麦克纳特前往中国海洋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商讨在中国开拓岩石圈动力学的研究与合作计划。

金煜作为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中国西部岩石圈勘探的副首席科学家，为进一步落实中外合作的科研项目，1997年又一次回国。他来不及回家看望父母，就直飞新疆。在新疆野外科学考察中，由于野外越野车陷在沙漠中，险些断水断粮，最后，多亏司机师傅放平了车胎才从塔里木沙漠中逃了出来。科考还没有结束，金煜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库尔勒飞到青岛。

他在母校为教师和研究生作了学术报告，并与研究生一起讨论毕业论文。

中国有一些带有“苦”字的成语，像“苦心孤诣”、“苦尽甘来”：前者是说，刻苦用心，可达到别人达不到的境地；后者则是说，艰苦困难过去，美好的日子就到来了。我觉得这两句话，比较适合金煜他们的课题进展的历程。

写到这里，有一个令我久久困惑、烦恼，甚至有几分义愤的问题，又涌上心头。就是在我们某些媒体报道和文艺作品中，海外赤子的形象问题。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作者、编导以及媒体，不去老老实实在地深入生活，真切地写作与宣传海外赤子在高科技领域的艰难求索的奋斗，以及他们时刻想着使祖国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金煜（右）偕同自己的博士生导师美国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玛莎·麦克纳特（左）愉快地游览中国长城

的科学技术水平名列世界前茅的高尚情怀。他们的忘我学习，刻苦钻研，努力拼搏，事业有成，并想方设法将高科技成果带回祖国的感人事迹，这些主流的方面，为什么竟然能够被某些号称代表人类良知的艺术家们放在视野之外呢？

比如，某个以留学生为主题的电视剧，其中只是作为配角写了一位学者，即某博士。但却不写他在美国是怎样勤奋学习的，不写他对高科技是怎样“孜孜以求之”，不写他的研究和成果，更不写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等，而只写了两件事：一是在餐馆打工刷盘子挣钱，二是出了车祸，人被撞死。关于“刷盘子”的事，留学生赴美最初几年，由于助学金的不足，为了学习能够持久，去打工是常有的事。但这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为什么不写点别的？而且，结局是那样的凄惨，被撞死了。

又如，另一部电视剧中，也写了“博士”。同样是许多剧中人物中的唯一的一位博士，也同样不去写他的事业，不去写他对高科技的努力追求，而是写他生活过分节支、攒钱买房子。当妻子和儿子从大陆赴美团聚时，他竟然卧倒在地，一命呜呼了。而人们打开厨房的壁柜，看到的是，从上到下、装得满满的全是方便面。这哪里是在写具有勤劳、智慧、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中的佼佼者？作者笔下给我们留的印象是：“苛刻”、“吝啬”，或者说是“人为财死”的



一个十足的愚儒。这是颂扬，还是讽刺？我没有调查，也无法肯定或否定是否有类似的原型。但即使有，又能在出国留学人员中占有多大比例呢？

过去，在革命年代，如果没有那批远渡重洋的留学生，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朱德、蔡和森、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一大批人，去留法、留德、留俄、留日等，苦心引进革命真理，很难出现继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今天，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在世界进入新世纪的知识经济竞争的大潮中，无数事实都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真理。而科技要“以人为本”，为什么看不到留学生向国内引进高科技的努力和深远的社会效益，特别是那一片宝贵的赤子之心呢？

祖国和祖国的人民应该理解海外学子攀登高科技高峰的艰辛、困苦，以及忘我的劳动，相信他们热爱祖国，会将高科技的成果带回祖国。这对于进入新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国与国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是何等重要啊！他们是祖国的骄傲，理应得到祖国和人民的爱护与尊重。这也是协同社会和祖国对海外赤子持续进行家教的父母的恳切呼声。

## 同中国地科院的学术交流

家庭教育在帮助子女实现自己的崇高愿望，在子女成才的过程中，可以给予一种其他任何方面都不能替代的特殊力量。

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往往在心灵深处埋藏着许多理想，包括一些崇高的愿望。这常常不是夸夸其谈、显露于外的。而要从各方面去帮助孩子，就应从各方面了解他，包括他们平素的一切琐细的需要以及其高尚的精神求索。

要了解孩子的这种精神求索，父母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精神境界，否则孩子看不到共鸣，是不会向你倾诉真情的。那种以本能的、利己之心去教育孩子，孩子会敏锐地感到是利己的、低俗的东西，难以向他们吐露什么“高尚”之心。正如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所说：“人的爱应该是大自然里的一种最高级的爱，而且在父母对子女的爱中，不应该具有父母的自尊、利己和虚荣的打算。”我想，这可算是至理名言了。

我们的长子金煜向我们吐露他要默默地为祖国的科技强大而作贡献，并且他认为别人是否知道并不重要，也不想得到回报。我们充分肯定与支持他的这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种愿望，而且将他的崇高愿望记录在“妈妈的手记”之中。鲁迅认为在家教中应提倡纯洁高尚的精神，这是一种力量，是“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转引自《中国妇女》1980年第11期）。

应中国地矿部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许志琴女士（留法博士，人称拼命三郎，中科院院士，地学界称赞她是“做学问不要命的主儿”），及中国岩石圈研究中心主任高锐教授的邀请，我的长子金煜于1996年第三十届世界地质大会期间访问了地矿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并作了学术报告。

当天大雨倾盆，从颐和园后面中央党校的深宅大院到颐和园东门大概有一里多路。爸爸陪同长子金煜一路寻找出租车，到颐和园东门找到车时，已浑身透湿。待到甘家口地科院门口，脱下旅游鞋拧袜子时，水哗哗地淌。最糟糕的是儿子防水的皮背包也从拉链处进了水，讲稿的纸张部分已浸湿，好在投影胶片防水，没有破坏。

学术报告由高锐主任和地科院副院长赵文津主持。会上儿子介绍了他和他的导师在国际上出名的一些工作。他和他的导师麦克纳特的理论学派，在国际地学界称为“Jin and McNutt”，也即“金与麦克纳特”学派。青藏高原的成因及中亚与青藏相关的形变，是世界大地构造学研究的焦点。从改革开放以来，全世界地球科学家为研究青藏高原全力以赴。由此也造就了一系列世界级著名科学家，其中包括三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一位英国科学院院士，一位法国科学院院士。

长子金煜报告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青藏岩石圈的多层次形变的理论与观测。关于这一课题，他本人的研究论文发表在1994年全世界超一流科学刊物《自然》杂志上。第二部分是关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在青藏上地幔的相互作用。金煜和导师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青藏高原岩石圈与印度板块的地幔缝合带、地壳缝合带是在雅鲁藏布江，后被世界地学界通过地震观测等方法所证实。这一创新的论文，发表在1996年世界地学一流杂志《美国地球物理学报》上面。他们的工作受到了世界地学界的高度评价，并作为美国地球物理年会的特邀报告。金煜的导师麦克纳特，在她被选为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主席时，所选用的三篇杰作中，他们二人1996年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赵文津副院长是中外地学界合作最有远见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他所





领导的青藏高原 INDEPTH 计划，每年平均投资五十万美元，为人类揭示青藏高原的秘密，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美国地球物理年会上，金煜同他就见过面，早在学术上有所了解。高主任和许所长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青藏高原讨论会上相识的。这一次，到地科院，同行相会，自然谈得很投机。各位领导都希望金煜能去地科院工作。儿子对此非常感激。他的母校原山东海洋学院、前中国海洋大学的管华寺校长提出：“如果海洋大学地学院能把金煜博士挖回国，将成为地学院的政绩。”儿子表示：“祖国对自己的器重，我将会终生铭记在心中，以海外赤子之心报答祖国。”

在这次地质部地科院的访问过程当中，儿子还和地科院专家一起，初步拟订了五万美元的青藏考察计划，并依据儿子的意愿定下来将他自己在美国编写的六个地球科学应用软件系统无私地奉献给祖国。这些软件就是：

#### 一、频率域岩石圈负载准相关程序

儿子作为第一作者和导师一起写的有关论文，发表在 1994 年的《自然》杂志上面。这是对 1985 年美国布朗大学岩石圈负载不相关理论的补充，是岩石圈均衡理论的又一次突破。

该程序还无偿赠给了墨西哥的科学家。

#### 二、横向不均匀多板块相互作用程序

儿子和导师的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地球物理学报》上面，并无偿赠送给法国科学家一套。

#### 三、岩石圈流变理论的有限元模拟

1996 年在青藏高原讨论会上，金煜首次提出了自己的论文。

#### 四、三维岩石圈应力场有限差分模拟及准板块相互作用理论

1997 年秋季，在美国地球物理年会上，金煜宣读了有关这一理论的论文。

#### 五、短波长，高频天然地震的广义泛涵程序

#### 六、盆地分析沉降二维差分程序

长子金煜在寄回《我家走出四博士》一书他的修改稿中，曾令人动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肺腑之言：“我们这些海外赤子对祖国母亲的贡献，是点点滴滴，默默无闻，时时刻刻的。我们从没有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回报，不过是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中国心而已。祖国知道我们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只要我们的默默奉献，能够使我们可爱的祖国科技强大，不再受外辱，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 重文化差异，紧抓发展机遇

教育子女成才的最大目的，应该是为国家、为人类作出贡献。

这就要求社会以及父母，对于成才后的反馈，即子女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所带给社会的成果和效益，给予特别的关注。这种成果常常开始不会很大，但往往是由小到大的。所以对于这类效益和成果，无论大小都应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尊重他们每一成果的社会效益，看重他们为我们抓住的每一个机遇，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会成为他们再创辉煌的动力。

我们的长子金煜，在 1996 年回京参加第三十届世界地质大会期间，与我国某单位约定第二年秋天联合进行中美青藏高原北边界地质科学考察。为此金煜回美后和导师积极准备，并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经费。1997 年 7 月费用批下，他立即急电该单位要 9 月进行野外考察。但该单位回电却说准备不足，希望推迟到下一年秋天（1998 年秋天）。这样回复的原因，从中方说可能是有道理的。

当我们听到儿子 1996 年在中国“约定”的中美青藏高原科考合作项目，次年夏就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也感到“快得意外”。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年轻的正在就读的博士生，说拿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就能拿到。金煜的爸爸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的评委，深知申请一个课题基金竞争之激烈，获得之不易。

岂不知在美国 MIT（麻省理工学院）并非一般学校，而且儿子和导师的杰出工作，已在美国科学基金会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这大概应属于文化认知方面的差异。

另外，按我们国内习惯，一般只要项目被批准了，钱就是自己的了，早一天晚一天开始实际进行都关系不大。哪里知道按美国的规定，基金获批的当年是必须启动的。何况美国是个非常动态的国家。

1997 年 8 月儿子的导师玛莎·麦克纳特新的任命到了，她离开麻省理工学院 9 月份去美国蒙特利湾海洋研究所任所长。而儿子金煜 11 月份又被聘为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的高级地球物理师，1998 年 2 月份上任。两个人相继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这一次中美合作的青藏科考，再“推迟到下一年秋天”（1998 年



秋天),这笔经费就会“泡汤”了。很明显合作项目有“胎死腹中”的危险。

对这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不了解,常会使中外合作发生误解甚至项目夭折。从大格局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们可能对外国有了较多了解,但失误往往是由于对细节的不了解所造成。而这种细节又往往是致命的。这也说明重视文化差异,深入了解对方,绝不忽视细节的重要意义。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开创独具特色的新道路的关键阶段,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随时都会遇到机遇和挑战。如果一个个的具体机遇都从我们身边溜走,从我们手上失去,我们怎么能成为挑战中的胜利者呢?在抓住机遇的问题上,我想我们应有极大的紧迫感和满腔热忱。

金煜为了挽救即将“命终于母腹中的胎儿”,做了很大的努力。最后是和他的母校中国海洋大学合作,充分运用这笔科研基金,完成了预定的科考项目。当然,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但同时也取得了的一系列的可喜成果。甚至可以说引起接力性的、连续扩张性的成果。

1997年引进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金煜和项目的合作伙伴中国海洋大学的同事们,于1997年去新疆,1998年合作伙伴们又去新疆,两次去新疆,他们历尽艰辛对青藏高原北侧进行了实地科学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石油物探局地调五处前线指挥部的密切配合。金煜在指导该项目时,还和前线指挥书记李久文在进行野外考察中,留下了友谊的合照。

在这个野外考察的基础上,2002年金煜和海洋大学姜效典教授的专著《岩石圈动力学》出版。金煜还将在麻省理工学院六年多编写的计算机程序赠送海洋大学教授及研究生,从而奠定了中国海洋大学岩石圈动力学实验室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验基础。该实验室的科研成果也陆续问世:2004年和2005年发表于《美国地球物理学报》(JGR)两篇,2008年发表于《美国地质家学会专辑》(GSA SpecialPaper)一篇。

这样,基金项目完成所需要经历的各时期,即野外科学考察期、实验室建立期、成果问世期,都一步一步地完成了。从而使此次中外合作的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一句话,从此在中国建立了“岩石圈动力学”的新学科。

从上面我们所谈到的一个中外合作项目的实现历程中,似乎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深思,这就是对新生的一代人才,特别是留学海外的人才,要有信心,要尊重。他们常常是既了解中国国情,又懂得海外,对文化差异有切身体会。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他们对抓住发展机遇有特殊的敏感性，会作出我们通常预想不到的中外合作的可喜贡献。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在我国已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认准人才所带来的成果及其社会效益，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伯乐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够慧眼识真金，辨认出人才，还在于他能够从人才的实践成果中考核人才。我们真希望国家能出现许许多多适应目前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既了解中国文化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伯乐。



金煜（右）1997年和石油物探局地调五处前线指挥书记李久文（左）在新疆库尔勒

## 孪生弟兄双双攻克高科技

### “鸡尾酒”配方发明者的得力助手

礼仪教育，绝不简单是只求得行为举止表面的合乎礼仪，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行为举止中反映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这是家教中的情操与品德教育的组成



部分，是成才所不可缺少的。一个不懂礼仪，没有德行的人，不能同周围的人携手共事、同舟共济、创造一个祥和的环境，相反还会伤人害己，会在无意义的摩擦中消耗别人，也消耗自己，成为集体中的不和谐分子。这种人很难成就大业，更何谈成才。

我家的四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学习尖子”。他们是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每人身上都有不同的骄气。西方著名思想家詹姆斯·穆勒说：“骄傲自满情绪是早熟儿童的大敌。一骄傲，多么天才的儿童也要毁掉。”为着“削傲”，打掉骄气，我们想尽办法，有时竟用一连串的“为什么”的问题难为他们，以使他们知道“学而后知不足”。从幼儿到出国后，我们都一再叮嘱他们：要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做事不要伤人，要和睦相处；小是小非不要与人相争，不要使人难堪；不得无礼……特别是出国后，我们常讲“中国是礼仪之邦”，你们与中外朋友相交讲礼仪，是带去了好的国风。所以，我们的孩子到哪里都能交到很多好朋友。他们愿意帮助别人，工作上勤于同别人协力。这种周边的“祥和”气氛，成了他们在科学上发明创造、事业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1996年的《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的封面上，刊有一位四十多岁年轻人的照片。黑色的西装、洁白的衬衣，配着红色领带，两手插兜，显得自然、朴实，而又潇洒。在那张戴有眼镜的“娃娃脸”上，透出一股诚实、冷静，而又聪颖、睿智，凝结着“深沉的平静和强烈的高超”的科学家的气质。他就是纽约市洛克菲勒大学爱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华裔何大一博士。我的儿子在何大一博士手下工作到2000年已经四年，是他直接负责的研究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有位记者在报道这一研究中心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位英国剑桥毕业的博士金侠，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

1997年3月22日出版的《海外星云》杂志第9期曾发表一篇文章：《何大一的华人助手们》，其中谈道：“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大一的荣誉与戴蒙研究中心全体科技人员的努力是不可分割的……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共八十五名工作人员……包括研究人员、实验人员及其他工作在内的二十一名华人，则是何大一的得力助手和向艾滋病冲锋陷阵的闯将。”

作者介绍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时，首先提到的是最早投身于何大一麾下的闯将、毕业于中国上海医科大学的曹韵贞教授，其次，谈到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何大一（左）、何大一的爱妻（右）、何大一的得力助手之一金侠博士（中）

学生物系并取得英国爱丁堡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的张林琦，紧接着介绍了我们的儿子金侠。文章说：“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金侠，三十四岁，他在研究艾滋病毒的人体体内免疫能力的变化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他对二百多位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进行追踪研究，其中十九例婴儿被发现受艾滋病毒感染，目前金侠正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还谈道：“以何大一为首的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华人科学家，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目前，曹韵贞、张林琦、金侠和陈志伟正在着手编著一本有关艾滋病最新动态的著作，希望在中国出版发行，以帮助中国的同行们共同战胜令人谈虎色变的艾滋病。”

任何做父母的看到子女在事业上的成就都是非常高兴的，我们也一样。

1996年7月全球出现一件轰动的事。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上，何大一提出一项实验报告，指出：他的研究小组发现，在病人感染艾滋病初期，患者服用将蛋白质酵素抑制剂与其他抗病毒药物多种混合在一起的类似鸡尾酒的药方，获得了显著的疗效。患者的病毒数量减少了，白细胞中T细胞的数量则增加，健康也因而改善。而将这种混合式的“鸡尾酒疗法”，用在刚感染到艾滋病毒头几个星期的病人身上，体内的艾滋病病毒（HIV）数量下降到无法侦测出来的程度。何大一在报告中指出，由于是感染初期，艾滋病毒尚未产生大量突变时，就对病毒展开攻击，体内的艾滋病毒能够得到抑制，患者健康状况的改善相当显著。这项发明及其实验效应，扭转了





世人认为艾滋病是不治之症的传统看法，为艾滋病患者带来了曙光，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

何大一博士谈得很明确，这项新成果是“他的研究小组发现”的。是他们的那个包括我儿子在内的十几人小组，共同不断地在竭尽全力、同心拼搏的结晶。何大一是一位非凡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很有远见、懂得群体力量重要作用的优秀组织者。他时时依靠群体，和研究小组的同事友善共事，同他们一起不分昼夜地工作。儿子荣获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博士一毕业，就得到何大一的赏识和肯定，被聘到这一研究中心工作。正是这个研究所，给了金侠施展抱负的舞台和机会。

何教授任命金侠为研究员，使其带技术员搞实验，还带有两个美国博士生，指导他们从事研究。后来，招聘人才，从考试、面试以及考虑是否录取，何教授都将“权”交给了金侠，然后，自己履行签字手续。在我国这叫“人事大权”，对这位金侠博士，何先生是何等的信任和器重啊！难怪介绍何大一的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还专门谈到“他的得力助手之一金侠博士”。

金侠在做“助手”中成长，现在已经到美国一个大学做副教授了。他在带博士生（美国和中国不同，助理教授就可以带博士生），而且手下有了自己的助手。可是，他仍和何大一博士友情深切、交往紧密、彼此礼让、携手合作，共创他们那个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的未来。

我国的家教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仪教育、德行教育。中国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唐太宗曾告诫自己的孩子：“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何必要论荣贵”，“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富封”，“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子，将如之何”？意思是说，做人可贵的是德行，而不是荣华富贵。你们已经有了“贵”与“荣”，必须注意德行修养，假如你们不听劝诱，违反礼仪法规，必受刑法制裁，那时我就爱莫能助了。

### 飞起来摘取医疗“王冠”的明珠

家庭是培育子女成才的摇篮，但为人父母千万不能满足孩子的早慧，不能让“神童”、“小天才”的赞誉声冲昏头脑。世界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五岁开始作曲并登台演奏，贝多芬十三岁作曲，舒伯特十四岁创作室内乐，施特劳斯六岁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演奏小提琴并创作歌曲，但他们的父母都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企盼他们高高飞翔，为此在培养子女成才上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世人为他们每位父母都可以写出动人的家教书。鼓励子女高飞，飞得越高越好，这是家教的战略思维。由于这种思维与眼光，以及家庭与社会的精心培育，“神童”、“小天才”一个个都成了誉满全球的大音乐家。

我家的孩子都很有出息，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神童”、“小天才”，都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我们自幼所灌输给他们的“取乎其上”、“高飞，再高飞”的思想，在他们成才道路上起了莫大的作用。我们的家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四个孩子同时上大学期间。像所有的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我们仅靠微薄的薪金维持一个多子女家庭，是需要克勤克俭的。但是，我们却时时感到幸福和欢乐，而从没有把孩子当作累赘。由于我们对孩子深深的爱，一直存在着愿他们高高飞翔的向往，总是做着将来他们会成为科学家的梦。我想对于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这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我不是算命先生，算不出究竟我们孩子中是否能够出现一个这样的人才。即使不是自己的孩子，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能够出现一批掌握高科技的大科学家，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以何大一为领导的艾滋病研究小组的成就，虽然从整个彻底战胜艾滋病的难关来说，还是万里征程中的起初阶段，但也不失为一种事业的辉煌。他们的研究小组已经开始起飞，去摘取医疗王冠的明珠。

纽约的血库存血多，不需要研究者自己轮流献血了。但儿子如果没有那一



何大一（左二）领导的艾滋病研究小组（金侠左四）和其他朋友



段“血的奉献”，不修完剑桥大学医学院的博士课，得不到学位，也不能获得同这里的“杰出的科学家”一起研究、突破、创新的机会，也难得在这种“辉煌”中闪现出自己的生命火花。这能否说，在英国那段“奉献”，是以鲜血的浇灌，为今天和大家一起培植含苞待放的“花蕾”做了准备呢？

之所以说“鸡尾酒的配方”是“花蕾”，因为这仅是全世界艾滋病研究的初步突破，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尚待解决。比如：“鸡尾酒疗法”，还不能为艾滋病末期的患者带来奇迹；而且这种疗法的费用很高，每个患者每年需要两万多美元。这样高昂的费用，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有少部分富人或有高额保险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众多艾滋病患者，是无力支付这笔庞大的医疗费用的，而这些地区患者竟占全球患者的百分之九十。这也就是说，这种疗法尚不是普遍适用的大众疗法。对于以济世救人为己任的医疗工作者来说，还不能是实现目标的理想手段。

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曾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包括儿子在内的艾滋病研究小组，还要走艰苦的、坎坷的、漫长的道路。好在时间还允许，这个已有重大突破的研究小组的成员，一般都是三四十岁。儿子也仅只走过三十六年的人生路程（这是我写该书第一版时的年龄）。在美国当副教授也才四十出头。“年轻”是他和他的伙伴、朋友们的可贵财富。当然，还有后来人，会一代又一代地积累和接替。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曾说：“我是踏着前人的肩膀前进的。”这不是中国旧政治的那种“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而是指接过前面科学家的火炬，以前代人已取得的成果为自己新起点的永不停息的世纪科学接力赛。目前的成果是结合了数以千百计的科学家和医生的共同努力才获得的。将来还需要更多人的合作以及经费的协调、支援，才能克服其余的障碍。

现在人类对于艾滋病是“绝症”的恐惧心理和绝望念头，已经在逐渐地淡化。相信今后何大一博士的研究小组和我的博士儿子一定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也相信儿子为科学、为人类作奉献的崇高目的，在全球防治艾滋病研究群体的共同努力下，会不断地攻关克难放出奇异的光彩。

金侠曾多次回国，将自己在国外的科研成果，以及小组的共同研究成果，带回祖国。

记得 1996 年夏天，在即将召开国际艾滋病研讨会前夕，儿子打来长途，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说大会在北京举行，他们要回国参加会议。一起来的还有何大一先生和研究小组其他成员，儿媳也回来。

我当时听了很高兴，似乎又要同儿子、儿媳“久别重逢”。电话带来了“空谷足音”的感觉。结果，儿子和儿媳会前、会后合起来在家居住也不到三天，其中还包括外出会朋友。但我们已经心满意足。因为，回国机会难得，这是两个孩子出国七八年后，第一次一起回国。回来参加国际研讨会，各国专家、学者居住五星级宾馆、要一起在会上、会下议论交流，而且各项议程和活动通常安排得很满。能够挤出时间，回家看看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次会上，在何大一先生总体发言基础上，儿子和小组其他成员，都在分组会上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就继 1996 年加拿大国际会议之后，又使东方及中国专家、学者更多人了解到他们在艾滋病治疗上的新突破。因为，是到中国北京参加会议，比起去加拿大的温哥华，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数自然多些。对于儿子来说，这又是将西方文化带回东方包括中国、促进科技交流的良机。

儿子和他的伙伴们，还不失时机、不辞辛苦地应邀在不同场合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留给祖国和人民。记得在大会期间，金侠打来电话说，他和另外两位他们研究小组的博士张林琦、陈志伟，应邀在北京有线电视台搞一次专题座谈。一部分时间，由他们讲述艾滋病的研究成果，另一部分时间，是回答一些问题，形式很活泼。我和他爸爸都想听听，急于要知道具体时间。儿子在另一次电话中告诉了我们具体时间。当这一天到来时，他爸爸早早打开电视机，我们一起守候在电视机旁。这个专题座谈会准时播出。儿子的沉稳而胸有成竹、条理清晰而通俗易懂的言谈，我们听着感到十分亲切。不论是他本人有准备地讲述，还是即席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儿子与同事陈博士及张博士都显得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他们谈到小组的科研成果，及其重大突破，使至今被认为“绝症”、“不治之症”的艾滋病，用“鸡尾酒疗法”，可以进行早期治疗。并一一分析研究中心之所以会发现这一重大转机的“缘由”，患者体内艾滋病病毒（HIV）数量的下降，以及 T 细胞的上升等（本文前面已提及，此处从略——作者）。同时他们也谈到治疗上的问题，如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医药费用的昂贵，会带来治疗上的困难，为此他们还科学地分析了怎样积极地预防，并根据艾滋病毒的特征，提出了在中国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张林琦（左）、陈志伟（中）、金侠（右）

儿子还列举了令人信服的数字，说明艾滋病患者在中国增加之快，病毒蔓延之迅速，并尖锐指出一定要杜绝一切不正当的性行为。儿子和张、陈二位博士还反复强调，祖国的繁荣富强需要有热爱祖国、素质较高、体魄健康的全体公民的奋发努力，绝不能让艾滋病毒在中国继续蔓延。

半个小时的播出，好像一晃就结束了。听完讲座，我们马上和儿子通电话，表扬他们“讲得好”。儿子说：“我们三人讲后，也异常兴奋和欣慰，因为，多年梦寐以求的要将自己在海外的科研成果、将西方的科学文化，带回祖国、传向东方的愿望，终于开始实现了。”

金侠这次回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与研究中心负责人何大一及同事共同和我国卫生部研究了艾滋病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应用问题。

金侠去美国后第二次返回祖国是在 1998 年，应邀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所办的一个研究班讲学。据他的老同学反映，他讲得很好，重点还是将美国关于艾滋病的最新研究成果带回祖国，介绍给来自祖国各地的同行。

金侠去美国后，第三次返回祖国是 1999 年。这次是去祖国的美丽宝岛台湾。1999 年 2 月下旬，研究组一行六人，从美国出发，由何大一教授带队，住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在台北市的圆山饭店，受到热情的接待。

他们此行主要是参加两个会议：一是第五届中国台北艾滋病国际会议；二是台中第一届认识艾滋病研讨会。在这两次会上，小组每个人都作了报告。重点是宣讲“鸡尾酒疗法”的突破，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研究的新进展。对于何大一等六人的报告以及参观访问台湾，有六家大报作了报道。有的报纸还将何大一和金侠的报告作了长篇报道并刊登了二人的照片。如当时《民生报》报道“何大一指出对抗艾滋病毒新方向，提高 T8 淋巴量，让患者产生免疫力”。在报道何大一教授的发言之后，又用颇长的篇幅较详细地报道了金侠的发言。

现照录如下：

“而在何大一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金侠博士指出，由猴子实验证实，T8 淋巴细胞可以控制艾滋病毒的量，由于人体和猴体基因九成九相同，淋巴细胞也一样，结果应可以印证于人体，对未来人类艾滋病患者免疫调解和疫苗研发及临床治疗，应扮演关键性角色。下月这项实验将在美国《实验内科学杂志》上发表。

“金侠指出，T4 淋巴细胞会被艾滋病毒感染，但是 T8 淋巴细胞会识别体内被感染的细胞，而把它杀死；由于人体无法去除 T8 淋巴细胞进行体内实验，了解两者的关系，只有在猴子体内进行。结果发现，若是去除 T8 淋巴细胞，病毒量会增加二十五至一千倍，反之则可抑制相同的量。

“金侠指出，正常人体内 T4 淋巴细胞和 T8 淋巴细胞的比例是三比二，人



金侠在讲课





体感染艾滋病毒后，一开始病毒量相当大，每毫升血液中有上百万至一千万个病毒，由于病毒复制得太快、量太大，T8淋巴细胞的量根本追赶不上，当然杀不完，而两者的比例也越来越悬殊，所以患者会在感染八至十年后发病，之后死亡。

“目前已有许多艾滋病患者接受‘鸡尾酒疗法’，病情控制不错，但是无法完全根除体内病毒。金侠指出：患者在早期采用‘鸡尾酒疗法’，可以将体内病毒减少，治疗两周至三个月，可以去除体内大多的病毒，若持续用药三至五年，又担心毒性太大。

“金侠指出，发现 T8 淋巴细胞可抑制病毒量后，可以早期筛检出患者，施以‘鸡尾酒疗法’，降低体内艾滋病毒量，再提高患者体内 T8 淋巴细胞量，让患者靠自己的免疫力抑制病毒。”

对于艾滋病研究，我完全是外行。不过何大一教授和我儿子金侠的发言引起如此重视，用这样大的篇幅报道，使我有一种猜测：这种关于 T8 淋巴细胞功能的研究，很可能是继“鸡尾酒疗法”之后，又一重大发现和突破。所以，记者在何大一先生的照片上方提示说：“中科院院士何大一指出，提高体内 T8 细胞量，是未来治疗艾滋病努力的方向。”又在儿子的照片上方提示说：“何大一艾滋病实验室中心金侠博士指出，人体 T8 淋巴细胞对控制艾滋病毒量有极大的作用，这项突破性发展下月将在美国知名免疫期刊中发表。”

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要有让子女“飞得越高越好”的战略思维，作为父母要首先“教育”和培养自己的自信心与踏踏实实帮助孩子成长的耐力。有人认为自己家境贫寒，没有文化，不可能也没有条件教育子女“高飞”。我认为去鼓励孩子自己高飞总还可以吧！这不需要那么多的附加条件。世界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父亲是一个鞋匠，母亲是洗衣工；引起欧洲乃至世界瞩目的杰出的政治家、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是一个小杂货商；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民间画师家庭；欧洲中世纪的一位科坛明星、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其父仅靠开一个小店铺维持生计。

我就不相信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出自现在中外的“贵族小学”、“贵族中学”的子女；也不相信现在的所谓“神童”，不去继续拼搏，持续“高飞”，而会成为诺贝尔奖得主。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我们的几个子女都是靠自己的本事，通过正常途径申请和考试出国的。身为两个教授的父母既无力以财力资助，也无其他办法，能够给予他们的只是精神鼓励。

金延在国内荣获博士学位后，想继续出国学习与掌握高科技。我们当然极力支持。不过，他遇到不少困难。大哥哥金煜大他几岁，大学毕业后先在国内工作，后出国进修，攻读博士，比较早出去了。孪生小哥哥金侠则是国内读硕士，出国读博士。而金延由于坚持在国内读完博士，成为弟兄中最后走出国门的一个。

当取得博士学位后，正赶上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工程委员会在全世界公开招聘国际研究员。1992年，全球申请者数百人，只录取二十人左右，所有学科都包括。而在中国他们决定只招一人。不论在哪一国招生，基本要求不少于四项：(1) 博士；(2) 毕业五年之内；(3) 有成就；(4) 有加拿大教授提名。四儿子金延申报后，很快接到录取通知。国内政审没有问题，单位出证明。随即加拿大又寄来一套办手续的完整通知材料（如聘任书）、签证申请支持文件、有关规章制度等。

但儿子去有关机关办出国手续时，第一次就遇到了麻烦。经办人大致翻看材料后，说：“有的材料上，只有签字，没有图章，需要补上。”儿子电话请招考教授补盖图章。加方教授很诧异，说：“每年对各国申请合格学生，都寄去这种材料，哪里也没有提出图章问题，唯独北京。其实，签字没办法模仿，图章很容易刻。”但教授还是尊重这里的习惯，无可奈何地寄回盖章材料。因为，是在材料上补章，寄去又寄回，耽误了不少时间。本来已经拖延，一天天接近就任截止时间。

接到盖有图章的材料送去后，更大的麻烦又来了。经办人这一次却仔细看了材料，但发现办出国的是“国际研究员”，于是说：“我们过去办的都是出国读硕士、博士，或者进修学者，从来没有办过国际研究员。”儿子很礼貌地对他说：“过去加拿大在中国没有招过，今年是第一次来中国招生。”对方却不客气地说：“过去我们没办过这种出国证明。国际研究员，既不是读书，又不像是招聘去工作，不知道怎么办。你的这个材料不能办。”于是，将材料递了出来。儿子反复要求，请将材料留下，“如果不知道怎么办，麻烦请示一下领导”。这才将材料留下。儿子又多次去问，回答都是一句话：“还没有请示领导。”这样，



与就任截止日期更近了。

正在这个时候，学校放暑假，我从海南返京。一到家先生就告诉我：“小四已经有一周没好好睡觉了，通宵看武侠小说。”

“为什么？”我问。

“又气又急，还没辙。”我先生简短回答。

“为了什么事情？”我又问。

“出国的事。”先生也似乎感到没有办法，只是简单地说了说。

我听后，很义愤。大约有一周时间，心绪烦乱，愤愤不平，好像大海的波涛，起伏翻滚。怎么也想不通：任何国家到中国招生，肯定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既然允许招生，被录取者就该给办出国手续，为什么要“卡”？

后来，朋友帮忙打听到经办人领导的可能办公地址。于是，我就下决心带着儿子直闯了，去找领导面陈。当我们去向经办人要材料时，他拉开抽屉递给我们。似乎材料一直沉睡在这里，从未上送。

吉人天相，我们贸然直闯，果真见到了有关领导。当我们向这位领导人陈述事情原委时，他是那样的耐心、一声不吭地听着。

听后，这位领导人非常热情地说“这是好事”，又面对儿子说：“国际研究员第一次在中国招生，录取了不仅是你家的大事，也是国家的荣誉。没办过这种手续，学着办嘛！什么都有一个‘第一次’。”

金延又强调了留学加拿大就任的截止日期。领导手拿着材料，反复翻看，当然，其中也包括“截止日期”的通知。

领导说：“这材料他们怎么不早转给我，如果过期办不出去，有多可惜，多遗憾。”

于是，他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大字“请从速办理”，还叫来秘书叮嘱“你立刻拿这材料，带他们去办。不然，又公文旅行了”，还请秘书转告经办人：“再遇到从未遇到的新事，要来商量，不能拖着不办。”

不知是见了领导的批语，还是听到了关于上司批评的转告，经办人的态度明显改变，立刻交给表格。

秘书非常尽心、热情，说：“就在这里填，你是第一次出国吧？”

儿子说：“是。”

秘书说：“好几张表，肯定会有不熟悉的地方，就地好问。”果然，儿子边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填写，边向经办人问了好几处。

秘书又耐心地叮嘱：“别着急，要填对，我在这里等着，不行再重填表格。”他一直在等，填完表看了又看，交给经办人。

经办人看后说：“填写合格，我下午去盖章，你明天取材料，接着就可以办理护照。”

秘书说：“这些材料经这里审查盖章，领护照后，再办签证就快了。一拿到签证后，立刻打国际长途，让对方寄机票。估计会赶在截止日期前到达。”秘书很善良，想得十分周详，尽心尽力。我们再次表示感谢，就告别了。现在有时回忆起来，我还想：领导身边的秘书，如果都像这样，简直是老百姓天大的福气。

后面的事，什么护照、签证就比较顺利了，在“截止日期”的前夕，儿子终于赶到了加拿大。

一个队伍里，后起直追的人，虽然辛苦，但脚步显得更强劲有力。因为，他要跟上前者，或超过别人，不仅要有更大的爆发力，而且要有加速度。儿子的同学、朋友、两个哥哥，一个个先他而出国，儿子为拿到国内博士学位，走在后面。他一心想补上这个差距，听儿媳说，他在国外拼命工作，当然，科研成果面世的“捷报”也频频传来。

1992年，儿子到了加拿大，职位是“加拿大国家科学与工程委员会国际研究员”，住在加拿大麦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经常做实验、搞研究的是麦尼托巴大学机械系实验室。他利用加拿大的高科技设备、研究经费、丰富的资料，于1992年至1995年，奋发努力，自强不息，不分昼夜地研究开发喷气发动机叶片所用的高温合金。结果出人预料，论文分别发表在最好的国际材料学学报（Acta Material）和最好的物理学学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面。他和他同行的科研成果，有的已付诸实践。其中由中国和加拿大合作研制的IC-6镍基高温合金叶片，已经投入生产。

儿子在加拿大课题做完，又奔赴日本搞课题研究，期间曾乘隙回家看看。我们见儿子瘦了许多。

我问儿媳：“他吃得怎样？”

儿媳说：“吃得很多，主要是工作太累。”

我对儿子说：“工作时，自己放松一点。”



他笑了说：“研究起来，非常有兴趣，放不下呀！”

我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呀！”

他说：“差不多。”他去日本前，我们反复叮嘱：“要注意健康。”

儿子同年又去日本研究课题了。从1995年至1996年，在日本的职位是“日本国科学技术厅客座研究员”，工作和居住在日本的高科技中心、人们称为“日本硅谷”的筑波科学城。他的研究单位是：日本国家金属材料技术研究所力学性能部。主要是研究开发新干线子弹列车所用高强度导电合金。科研成果同样令人满意，有关论文发表在最好的国际材料学报（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 A）上。该材料已由古河电工公司投入生产。

在日本做课题期间，儿子也为中国人争了气。他告诉我们：“在欢送会上，部长铃木先生说了不少好话，夸我努力，希望以后再招像我一样努力的中国人。”

接着，儿子又到美国搞课题研究。1996年至1999年在美国，职位为“研究助理”。研究的单位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物理系。居住与工作的地点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主要是研究计算机硬盘系统用的纳米级磁性粒子。有关论文已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在本书该题中开头所谈到那个“报喜”电话，具体内容就是这一次。

为了写好手头的这本书，我认为所用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因四儿金延考取的是国际研究员，七年来，在三个国家进行了科学研究。他走的地方多，我唯恐自己记忆有误差，专门与儿子通了国际电话，请他简述有关情况，用传真传回。当高兴地见到“传真”时，我想：材料专业，在十五年前（按当时算是十五年），是作为全球新兴科学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儿子的十八年，即国内读清华大学的五年，中国航空研究院当硕士和博士的六年和作为国际研究员的七年，像一辆快车，一直奔驰在金属材料研究的轨道上，不知停息地跑啊跑啊，而其探索和猎取的硕果，实在令人欣慰。

传真到达之日，正值国际母亲节的前夕，儿子在所寄资料的后面，写着：“妈，祝母亲节快乐！”手捧着寄来的科研成果索引，想象儿子的那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在全球超一流杂志和同一专业最好杂志上的论文，感到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即研究层次与高度上都是走在世界同类专业科研前列的。而其中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又是那么沉甸甸的。作为母亲，怎能不为此而激情满怀？这是儿子的心血结晶，是闪烁着灿烂光辉的、在母亲心中如同钻石一样珍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贵的结晶，见到这一切，想到这一切，怎能不快乐！应当说，这是母亲节儿子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 更高级金属材料的苦心探索者

培养子女高科技兴趣是家庭教育不可缺少的时代精神。

现代的父母不能再像古人那样，简单施以“道德为本位”的家教了，而应引导孩子探索高科技、掌握高科技，实践高科技，以高科技服务于社会。应该以此作为家教引导的重心。新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掌握高科技的“知识人”大量涌现，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时代的最强音。

我们的几个孩子都是钻研高科技的。他们于十年前（现在说已经是二十年前了）先后出国留学。当时可选的专业课目很多。如果为了早买房子、早买汽车、早发财，他们个个都会较早地办到的，而不需要在海外的这种“十年寒窗苦”。但是，他们没走那条路，而是尽量靠紧国内所学的专业，面向高科技，瞄准高科技，艰苦度日，甚至白天苦读晚上打工，而一步一步地在奔向高科技尖峰的陡坡上奋勇攀登。经过学习、探索、奋力拼搏，他们获得了成功。但他们现仍在继续研究和探索高科技，决心在祖国和人类的发展事业上作出新奉献。

我家的四个孩子中，就连最小的金延，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小四，都已经在高科技园里，驾驭他所研究的课题，一展宏图。

“妈妈，最近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在国际长途电话里，金延用愉快的声音传来的喜讯。电话中没有多说，因为他深知父母懂得在这种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分量，一句话就足为我们带来无限快乐。

我们激动不已，一时想不出好的祝词，只说一句：“祝贺你！”

我们深深懂得《科学》与《自然》是全世界公认的超一流科学杂志，是众多学者、专家无不梦寐以求的发表有创新性成果、有分量文章的荣誉“领地”。两个年轻哥哥金煜和金侠的科研成果，能够得到国际同行的赞誉，而分别发表在《自然》与《科学》上，我和他的父亲已经感到无限欣慰了。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家庭，时间相差没有几年，长兄带着第一个孪生弟弟“冲”了上去，先后在这种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我们认为“已足矣”，不应有再多的奢望。特别是不能向金延提出这一要求，增加他的思想压力。两个哥哥都是“洋博士”，





分别从美、英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弟弟是清华大学毕业，就读于中国航空研究院，拿到的是国内博士学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土博士。”他能够申请并被录取为国际研究员，而到加拿大、日本、美国去研究最新的高科技课题，已经是我们不曾想到的高要求了，文章会在全球超一流杂志上发表，这是完全超出预想的。

金延的老实、憨厚、谨慎，而又谦和的性格，同他取得事业上的成就，可能有很大关系。他的老实和憨厚里，融合着聪颖与智慧；他的谨慎与谦和，融合着精益求精与出类拔萃。

记得他小的时候，大约五岁，让他去买东西，告诉他“钱在抽屉里，你自己去拿”，他常常说：“爸妈给我，我不敢拿。”一次，去打酱油，他竟然提着空瓶，哭着回来，说：“爸爸，你给的五角钱，我用手攥着，可是，到合作社一看，没有了，丢了！”他爸爸和我没有批评，而是安慰说：“不要紧，给你钱再跑一趟。”孩子老实得自责不已，大人不能再“雪上加霜”。

读小学时，他一再提出：“让老师把我和小三分开吧，别在一班，同学总取笑我们，说是‘双棒’、‘两条小棒’。”从此，我们请求老师为他们分班学习。

他们的初中是在离家较近的 67 中学读的。高中按规定可以报考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那是北京市重点中学，离家远而且住校。我曾考虑，他只有十五岁，又太老实，易受欺侮，生活自理能力也较弱，而且报考人多，命中率小，只有一个孪生小哥哥报考就够了。由于爸爸、姐姐和哥哥的坚持，说“要锻炼小四，一定报考”，而报了名。没想到在全校初中的几个毕业班中只有十几名学生被录取的情况下，他和孪生小哥哥一起以高分考取。于是，他们二人同时去人大附中住校。可是，住校期间，“懒汉鞋”前面破出洞，“张嘴”了，他竟用铁丝串起来，继续穿，而不提出购买新鞋……他有很多老实得令人发笑的故事。

有一次，我说：“小四是不是太老实了！”

他竟然特别诚实地笑了笑说：“真的，太老实了，成不了大器。”

在旁边听着的大哥，感到我的说法不公平，忙说：“其实，小四最聪明。”

姐姐还特别强调：“只不过是老老实实，不露锋芒。”

他爸爸也从旁说：“可能将来最有出息的是小四，有一种老老实实的科学家素质。

你没看到分班以后，小‘孪生’在两个班都名列前茅吗？”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授予金延的三好学生证书

比他只大七分钟的小哥哥金侠，一点也不妒忌，反而讲：“爸爸说得对，在我们四个人中，最有出息的可能是小四。我们两个考试成绩虽然都在前面，但课外书他比我读得多，而且很多。”

小四坐在沙发上，开始是憨笑，后来，只顾低头看书。不知他是否把大家的评论和夸奖都听到耳里，看上

去不在意，好似心都在书上。

在北京的重点高中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毕业时，金延和金侠皆以优异成绩荣获三好学生证书。

后来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所谓工程物理就是核物理。这个系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的研究原子能开发利用的专业。核物理包括很多具体专业，他自己选择了金属材料作为研究方向。

研究金属材料，很多人听起来较生疏，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记得80年代初，我先生一次出差回来，与我谈起火车软卧车厢的同行者，那是一位去英国留学的博士。问起专业，是金属材料，具体是制造飞机的金属材料，再谈下去，论文题目是《航空金属的疲劳问题》。这位博士反复强调，他的这个课题对于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重要性。不过，当时我先生还是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回来告诉我，我也感到不好理解。大概是隔行如隔山吧，对于我们这些搞社会科学的人，什么金属材料，什么航空材料，什么疲劳问题，是有点太陌生而深奥了，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距离很遥远。没想到，我们的一个儿子竟然学起了这个专业。遥远的科学进入了我们的家庭。

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五年，令我们奇怪的是，每次考试成绩他都很好，但又读了许许多多的课外书。谁人不知，清华与北大的教学是“量大、质优”，吞下去，消化掉，已颇费时间了，他又怎能挤出那么多时间作课外阅读呢？

清华毕业后，他又考取了中国航空研究院攻读硕士和博士。该院的研究



水平和实验设备是国内一流的，导师颜鸣皋也是国内这一专业领域的权威。在名师指导下，他又迷上计算机和电子显微镜。导师关切地对我们说：“他有时不分昼夜地在电镜室中‘连续作战’，学习兴趣很浓，我一再叮嘱他注意身体。”

儿子一米八四的大个，魁梧的身材，可能为他提供了“拼命”的本钱。但近视度数飞快上升，配了一副又一副眼镜。可能正因为这种“拼”，他发现了来访的加拿大教授、一位国际著名的金属材料专家，在已发表的论文中电镜测度与分析上的误差，并在学术交流中，老实地当面陈述己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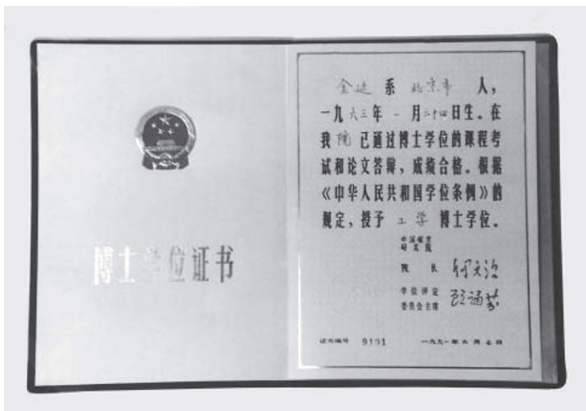
这种年轻人坦诚的有见地的发言，使这位教授感到惊异，不仅给予肯定评价，而且明确表示欢迎他到自己的门下攻读博士。当时出国已经很热，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老实的四儿却婉言谢绝。因为，他信守着对自己的博士生导师的承诺：“不读完博士不出国。”

他当时是公认的“科研做得好，文章出得多”的博士生，本可随时联系到国外奖学金，去接着读外国博士。可是，金延做学问，和他的人格一样，非常老实、信守承诺。他在世界著名的金属材料专家颜鸣皋恩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课，又攻读博士课，皆以优异成绩荣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对导师讲“信与义”的老实程度，也是在一般当代青年中比较罕见的。

“疾风知劲草”，在出国风潮的吹动下，他还那么老老实实在地遵守和导师的



金延清华大学学士学位毕业证书



中国航空研究院授予金延的博士学位证书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不成文的口头承诺，难怪一位年轻朋友说“金延是一个大好人”。做好人，才能做好学问，在金延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格魅力。

## 对祖国的眷恋与日同辉

### 祖国强大我们活得更硬气

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中华民族家教的优秀传统，也是子女成才的深厚根基。

爱国主义在成才的道路上能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激情，给人以爱憎，给人以方向。这种教育会使孩子获得“矛与盾”，可成为有效的把握战胜各种困难以及恶势力的武器。

我们在子女的身上，清楚地看到，在当代，爱国主义给予我家的孩子成才以更为强大而坚实可靠的力量。随着全球化，国际往来的增多，各国的互惠互利，更需要有“忠心报国”、以国家利益和全局为重的优秀人才。这是适应祖国需要的人才，人民需要的人才。我们体会，绝不能忘记培养子女热爱自己伟大母亲——祖国的宽广胸怀。其实，成才与报国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这一代“知识人”来说：祖国越富强，他们做事越有靠山，有根基；他们对祖国报效越多，祖国也就越强大。

四个孩子至今个个都非常爱自己的祖国，这也是自幼国家教育和家庭教育所释放出的“火树银花”吧！

“心系故土，爱我中华。”国内有些人，由于接触少，不了解海外赤子的这种心情。长子金煜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1997年荣获博士学位后，又做了半年博士后，就被聘到全世界著名的雪佛龙石油公司工作去了。

他是这个公司海外部招聘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去的留美博士。不久就作为该公司亚洲部成员，回来投资开发祖国的大油田，实现他远在山东海洋学院学习时的梦想。



老三金侠在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应聘到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中心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所属的爱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工作。这种专业疾病，他已研究二十多年，现已成为大学副教授。几乎每年都回国讲学，将研究成果带回祖国。

老四金延做国际研究员，成果已进入中加（中国和加拿大）合资的生产流程。现正他在做石油公司的管道检测软件。女儿做博士后多年，已成为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并在国内一些大学做兼职教授，传播她掌握的高科技基因工程。他们都在攻研高科技，以为祖国和世界作出贡献。在国外听一位家长说：“你们的孩子都比较‘正统’，可能是自幼住在中央党校大院里，这里出来的人不一样。”我回答说：“无论怎么不一样，大家热爱祖国应当是一样的。”长子金煜曾对我们说：“不少台湾学生和我们一样，都希望祖国强大。他们愿意和我们交朋友，平时关系很好。他们经常说：‘洋人看我们，全是黄皮肤。老板聘你，不分台湾还是大陆的。’确实是这样，祖国强大了，我们腰杆都硬。”

孩子对祖国的感情很深厚，也很真挚，这由来已久。老三金侠在国内读大学期间，曾作为协和医大选出的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去澳大利亚作学术交流。孩子从澳大利亚的来信，故土难舍、家国难离的亲情，跃然纸上。信中说：“能出来一趟是极大的幸运……这里不似香港那样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也不像祖国内地城市那样熙熙攘攘，而是到处透着现代化的气味”，“为什么中国就不是这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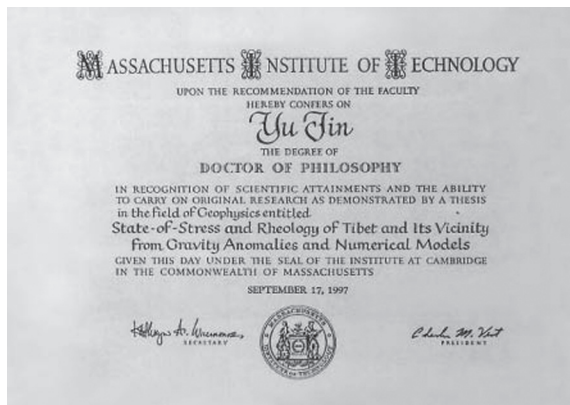
在金侠的《学习心得笔记》中，我还发现，他对祖国激情满怀地赞颂：“中华古国，文明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华夏之子足以自豪和骄傲的。《马可·波罗》那个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古代社会。那时，中国人是多么的文明和富有，而西方的基督徒们则显得那么的不开化。不幸的是，在近代，清政府卖国求荣，我们这么大的中原大国，竟屡遭番邦小寇的欺侮。从那时起，中国进入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了恢复中国的尊严，重振中华民族的骄傲，有多少有血性的中国人，呕心沥血，肝脑涂地。百余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抛头洒血而未竟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在世界的东方……建起一个光辉的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孩子对祖国的这种热情歌颂，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出自诚挚的肺腑。而这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金煜是雪佛龙公司海外部招聘的  
第一个中国大陆的留美博士

种胸怀的“炼造”，不是三年两载所能奏效的。

我们的孩子都很喜欢古代和现代的诗歌，有的孩子对古代诗词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长女金莹背诵很多、很熟。我记得很清楚，孩子们都喜欢关于爱国人物及其英雄气概的作品。比如，古诗词中的文天祥的《正气歌》，现代作品中的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文天祥这位和南宋岳飞先后齐名的民族英雄，一直都是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

经常从他们的嘴里能够听到“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他们很注意“浩然正气”。这里讲的“浩然”，是指正义、正直，爱国主义感情，崇高的民族气节，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精神。“沛乎塞苍冥”，是讲正气壮伟繁茂，充满整个天地人间，无处不在，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恶。一句话，这种磅礴于天地人间的凛然正气，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且还要千秋万世地传承下去。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诗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也都是他们经常熟诵的。

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一书中的话，他们记得很熟。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不记得教过孩子，可能是在学校里学的。我的长子金煜特别会开玩笑。他在山东海洋学院学习时，一次假期回家，翻看家人相簿后，抽出一张我年轻时穿着绿色连衣裙的照片。

他跟爸爸说：“我要带走。”

爸爸说：“不能带走哟，那是你妈妈二十多岁时的照片，你带在身上，会引





起误解的。”

金煜笑了，凝视着照片说：“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他又拉着长声、边笑边说：“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可爱的中国》，1952年10月版，第20、21页）

我说：“你胡说什么？年轻时照的，那个照片一点不像我，妈妈不可爱，不美，很丑！”

他和爸爸都哈哈大笑，他爸爸说：“这小子把方志敏的话，背得很熟。”

我说：“可真的，都是《可爱的中国》上的话，全焊到妈妈的身上了。”

儿子又开玩笑说：“祖国就是母亲，母亲就是祖国嘛！”

我们最小的儿子金延，还在读高中时，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但想到了我的母亲，也想到了周围的千百个母亲，想到了我最伟大的母亲——中华民族。我第一次感觉到实现‘四化’如此的必要。是啊！我们，炎黄的子孙，难道就忍心让我们的母亲在世界上永远是低着头、受他人凌辱吗？难道就不能为我们的母亲争口气吗？”

看来，在我们孩子身上的那一种对祖国的爱，以及浩然正气，很显然是学校、家庭、社会长期教育、培养、熏陶的结果，在心里已经深深地扎了根。

我国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父母以自己的言行亲自写下爱国主义的家教诗篇。在我家的大人和孩子们所熟读的有关岳飞的著作中，岳母为岳飞刺字的故事、岳飞和岳云两代英雄，以及他们的做人与家教格言，至今难以忘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还有那“心照明月”的高风亮节，“还我河山”的誓言，都深深地铭刻在儿女的心中。南宋的一位爱国诗人陆游，在他的炽热的爱国激情的促发下，创造了九千三百首爱国诗篇，即“六十年间万首诗”。他在临终前的教子诗《示儿》中，还写道：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就是说个人生死没有值得留恋的，可悲的是不能再见祖国山河的统一。等到战胜敌寇恢复了中原失地举国欢庆之日，家里举行祭祀时，千万不要忘记把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陆游的这种教育为子女留下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神。真可谓千古绝唱的家教诗篇！

诸如此类的古代与现代的爱国主义家教的史实比比皆是，都是家教的不朽诗篇。现代家教，绝不能忘记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祖国的财富，也是家教的瑰宝。

### 爸妈为我捎来一套《中国电影金曲选》

优秀文化的熏陶，是令子女成才，并持有高雅情操的生动活泼、沁人肺腑的家教方式。

家教不能靠棍棒，不能靠金钱，也不能只靠口头说教，应当尝试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各种方式。我们的几个孩子，从幼年开始，就爱听妈妈给唱歌，爱听爸爸给拉小提琴。稍大一些，参加校小提琴乐队、舞蹈表演、合唱团等。对这些正当的兴趣和要求，我们只有鼓励、支持，从不阻拦。就是孩子长大了，要歌曲选录音带，爸爸还挤出出国前的紧迫时间，骑着自行车，东买一盘，西买一盘，千方百计为孩子凑齐，带往国外。

1992年9月，我先生和我一起去英国探亲。我们出国前不久，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的金侠，来电话说，他还是很喜欢中国歌曲，不是现代通俗歌曲，而是民歌等过去经常唱的。最好“爸妈为我捎来一套《中国电影金曲选》的录音带”。因为我忙于打点行装、安排家务，买“金曲”的事，只好让他爸爸一个人去跑了。那时从中央党校进城不太方便，主要交通工具是骑自行车。记得他去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成套的。后来，不得不哪里碰到一盘，就买一盘。有时一次碰到几盘，我先生回来就很高兴。最后，差不多凑全一套带去了。当儿子知道带来了“金曲”，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连说：“好，好，好！”经常是，下了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边帮忙做家务，边听音乐。电影《上甘岭》的插曲、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他异常喜欢，所以，在我们住的英国剑桥的房间中经常传出：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还有《洪湖赤卫队》电影中王玉珍唱的：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优美的歌声在房间荡漾着。音响不能开得太大，因为英国有“扰民法”，打扰别人是不允许的。声音很轻，也很悠扬，有些“绕梁三日而不绝”的味道。

我边听边想。因为手里忙着家务，思绪很不连贯。但是，脑子里始终有一个问号：“这个孩子来英国已经四年，怎么对中国音乐还如此钟情？”其实在国内，还在他爸爸跑街到处买“金曲”时，我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想：一方面，可能因为金侠自幼喜欢音乐，在这一点上，超过哥哥、姐姐和弟弟。他学科学，需要用很大毅力，来克服音乐对他的“吸力”。正像他在中学日记里所写的：“真不知这是什么缘故。我太喜欢那些优美的音乐和歌曲了，以至使得我几乎要被她们从科学之神那里把我拉走。当我听到一支优美的歌曲时，便立即产生了共鸣，而其客观效果必然是将我的思路转移了。看来，要学好科学，对其他情趣要加以克制。”

从学好科学这个角度，对音乐情趣的必要克制，是完全对的，但这只是“情趣”效果的一个方面。我觉得音乐也给金侠不少东西，最重要的是，陶冶了他的性格和情操。他很沉静、多思，遇事显得成熟老练，而感情又十分丰富，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对亲人与朋友爱得很深。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可是，我觉得这和对音乐的爱好不无关系。因为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提炼、升华，是民族情感和节操的集中而激情的表现。因而音乐就成为文化修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音乐欣赏对性格情操培育的潜移默化之功，是别的文化课很难替代的。当然，任何优良品质的养成，条件都不可能是单一的，这里谈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孩子们的爱好应该是多样的、“博大精深”的，这样才能成长为有血有肉的各种人才。

另一方面，中西文化融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东接受一点，西接受一点，就可以在人的感情里融合在一起的。从一个民族来看，东西文化交流，也只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吸取别人的精华。根在中华，黄土地培养起来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的儿女，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

我认为优秀文化的熏陶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中华民族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祖国文化博大精深。孩子成才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诗词、歌赋、京剧、戏曲，如果有可能，从多方面培养他们的兴趣，会受益匪浅。学钢琴不一定成为钢琴家，学诗歌不一定成为诗人，学音乐不一定成为音乐家。然而，多接触一些，可以陶冶孩子的性格、情操，了解人生，爱我山河，以及热爱人民的事业等。

## 出国多年还那样淳朴

艰苦朴素精神的培养，是促使子女成才的美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其实，艰苦朴素是一种美，一种道德美、心灵美。不求奢侈和贪婪的人格，才是最高尚的美德。

正因为我和我先生有上面的共同认识，我们在孩子们的幼年，就很注意这方面的培养。在我们的几个孩子身上，都有一种艰苦朴素的习惯，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这聚集了社会和学校教育的能量，也凝结了家教与大人影响的魅力。

我的小儿子金延作为国际研究员出国两年后，曾回国探亲，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节前，我们的那个旧家房间里，暖气没有修好，很冷。我从柜子里，随手抽出一件旧毛衣，给他穿上。这还是他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穿的手织毛衣，显得很瘦、很小了。

穿了几天，我越看越不顺眼，对儿子说：“妈妈去给你买一件新毛衣吧，要什么颜色的？”

他说：“不用，我有，在阳阳家（儿媳家）。”

过了几天，他果真穿来一件厚毛衣，也显得很旧。我问：“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回答：“出国前，岳母给买的。”

我说：“那也已经两年多，该换一件新的了。”“不需要，有穿的就行。”他高高兴兴地回答。“中国毛衣最便宜，你没有人民币，我给你买。”我坚持说。我的话刚一落，他便开玩笑说：“人民币大大的有！”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这次过春节，金延是从加拿大回来，是去日本前。金延在加拿大是国际研究



员，到日本，是日本科学技术厅研究员。他还说：“妈妈你细看看，这是高级牦牛毛衣。”我说：“再高级也有几年了，起码得买一件换着穿。”“妈妈，我们留学生在国外，不比穿的，主要比谁又接触了什么高科技，或谁的课题做得好，谁在国际超一流刊物上比如《自然》、《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金煜哥哥已经在《自然》上发表了文章，我们在追。”

听他这样一说，我想：当代中国学子，不论是身居国内还是身居国外，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各种价值观、享乐观、消费观的相互撞击下，怎样自觉地保持这一艰苦朴素的美德，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是需要以健康心态去处理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看他讲得有道理，又执意不肯让我去买新毛衣，这件事就此作罢了。过几天，我们一起到他岳父家过年，他脱了棉衣，里面穿的还是那一件旧毛衣。他岳父家正好来了一位客人，是儿媳哥哥的岳父。这位客人也是中央党校我们的老同事，而且去“五七干校”前一直住在同一楼里，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伯伯。这位教授伯伯很注意了解国外情况，同金延谈得兴致勃勃。

他最后说：“出国多年你怎么还那样淳朴？”金延回答得很轻松：“也应该这样，不少留学生都是这样。”儿媳李阳很漂亮，然而，也从不给自己买一件高档名牌新衣。这和儿子的思路何其相似！可能这也是小两口很自然地情投意合的一个亮点吧！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儿媳说：“大娘的小女儿的旧衣服，已足够我们小宝宝穿了。”在国外他们已学习、工作和居住多年，而又都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收入不菲，但至今仍保持着崇尚节俭，崇尚勤奋，崇尚淳朴，崇尚热爱学习的美德。他们是知识领域“孜孜以求之”的探索者。他们并不以此为苦，而是以此为乐。这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代人，他们以自觉保持中国的传统美德而自豪和骄傲，生活得总是乐陶陶的。

在这一节里，我关于艰苦朴素谈了很多。有的父母可能会认为，你这样提倡孩子自幼到长大都要艰苦朴素，对孩子岂不是太刻薄了；也有的父母可能认为，现在条件好了，有钱就花嘛；还有人会认为，多花钱还会“扩大内需”呢！……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要的开支、需要花的钱，当然要花，而且可以多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生活搞得更方便和舒适些，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并不提倡做“苦行僧”。“扩大内需”当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这和爱节俭、反浪费不是一个概念。而且，我提倡的是一种艰苦奋斗精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金延、爱妻李阳、小女儿艾米

神，提倡引导孩子具备一种淳朴善良、勤劳节俭的好素质，而不是具有虚荣、浮夸，依靠别人劳动、不尚节俭的低级趣味的素质。这里关键是在于引导的方向和比较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做父母的自身苦乐观、价值观和社会取向的考验。从孩子教育、从儿子以及留学生们的朴实谈起，进而反对不比学习，只比吃穿，追求享乐而贪婪的恶习，更反对掠夺别人劳动成果的盗窃与抢劫，反对靠权势诈骗、勒索、搜刮等种种腐败现象。这正是今天的父母所该深思的。对今人与后人的这种提示和叮嘱，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已屡见不鲜。忘记就是一种背叛！

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曾说：“我觉得一切德行与美善的原则当然在于克制理智所不容许的欲望和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和增进靠习惯，而使这种能力容易地、熟练地发挥，则靠及早实践。”（《教育漫话》，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28页）

美国第三十六届总统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不许孩子谈论金钱。为了使孩子学会节俭，他每月只给他们很少的零花钱。肯尼迪成为总统后，报纸曾公布过他十岁时向父亲递交的一份正式请求，请求父亲将零花钱由每星期四角提高





到六角，但未获准许。是父亲没钱吗？不！约瑟夫是美国最大的五大企业家之一，先后担任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驻英大使。为防不测，他还给每个孩子存了一千万美元的委托金。他之所以这样约束孩子，主要是希望培养孩子的艰苦朴素习惯，不让富裕腐蚀孩子。

艰苦朴素历来是中国人的美德。逐渐消除不合理的欲望和追求，把艰苦朴素变为孩子的一种习惯，他们就会少受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把精力一心扎实地放在学习上、事业上。这就很容易养成事业上的艰苦奋斗精神，为成才提供一种排除诱惑的自制能力。幸福的人并不是能随意支配金钱的人，而培养孩子艰苦朴素，养成自制的习惯，才是使他们将来获得幸福的保证。

### 需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从小播下诚实的种子，春华秋实，这是家教使子女成才的重要保证。

只有老老实实在地做人，才能老老实实在地做学问。一个不诚挚不老实的人，没有办法在事业上付出真诚的努力。只有热爱科学、热爱科学真理，为维护真理而不怕伤害自己，才能成为一个有良知的真正科学家。而一味“唯上”，唯唯诺诺，不惜牺牲科学真理的人，不可能成为正直的、大有益于人民、大有益于科学事业的人才。我们一直很注意对孩子进行诚实、客观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教育。要他们不论对谁都应敢于直言；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在地做人，不迎合，不苟且。我们反复谈到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与高尚的科学精神。

我们的长子金煜，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一位国家科委访美代表团的团长，在麻省理工学院探索祖国科学未来发展方向的研讨会上，曾发生过一些分歧。

由于长子金煜的专业是研究岩石圈，研究地动，不免要接触一些导航技术。儿子在电话和书信中，曾两次告诉我们：“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和前不久发生的对南斯拉夫的战争，都是在我来美国后打起来的。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表现出绝对的制空权和制导权。其中，高度的导航技术，还导致了我驻南使馆被炸。”“控制太空、控制导航美国人已筹划很久，这就是 GPS 计划，也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儿子还说，他是中国人中最早接触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人之一。1991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年，金煜在南太平洋与美国科学家一起做科学考察时，每天使用的 GPS 卫星当时只有十四颗。GPS 卫星系统当时帮助大洋科考工区无人驾驶航行，但由于一个完整的 GPS 系统需要二十四颗卫星全天候地持续工作，因此，每天有一段时间 GPS 导航系统需要置换到美国海军的 TRANSIT 卫星定位系统，该卫星系统有六颗卫星。两种导航系统的二十颗卫星在海上相当完美的无人驾驶导航，使儿子对此高科技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记。儿子从此幻想中国何时能有自己的精确的卫星导航系统。当然，现在中国自己的北斗星系统已经在进行过程中。

金煜还讲：“目前美国早已完成了全部二十四颗卫星的部署。如果美国人说用导弹打我们家前院，我想不会打到后院的。”这是讲，当时，美国说的在科索沃战争中误炸了中国大使馆，如此精确的卫星导航系统还会误炸，这是很难说服天下人的。

正是由于儿子在大洋科考中对美国先进的导航技术的那种刻骨铭心，因此，在后来的一次 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与我国的一个科学代表团的座谈会上，他曾提出传统导弹导航与现代化 GPS 导航的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因为现在美国人用卫星罩住太空，差分定位已到了毫米级精度（指差分 GPS）。



金煜在海上考察船的船长室里



而当时赴美的是一位在国家重要科学部门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负责人，在麻省理工学院这个以科技至上的学府，却没有讲科技发展问题，而讲了许多美国人该如何在中国做生意。而且，他说儿子提出的 GPS 定位“已到了毫米级精度”是骗人的，说他本人很了解 GPS，精度是厘米，而不是毫米。

后来，还好，这位先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托人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打来电话向儿子道歉。但他不知当时在场的多少中国留学生为此而难过得眼泪在往肚子里流。多亏中国提出了“科教兴国”，中央负责同志还专程跑到麻省理工学院鼓励海外学子引进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振兴祖国作出贡献。现在，一批海外赤子已经将自己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倾注在孜孜不倦地引进高科技上面了。

要教育孩子诚实，做父母首先必须诚实，不应怕领导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而曲意隐瞒自己的见解。这不仅是我们区区小家所证明的家教真理，不少大人物的成才，也都经受过这种家庭教育。曾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父亲虽是一个小杂货商，但从小就教她说老实话，不要去说违心的话而迎合别人，对她说：“千万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看着别人做什么自己也想做什么，你自己要有主见，而且还要设法让别人跟着你干。”（《中外名人家教故事》，第 315—316 页）这种家教对她产生了终生的影响。作为一个政治家，人们公认她突出的长处是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因害怕不受欢迎而发表违心讲话。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父亲是大种植园主。一次，华盛顿在清理杂树时，把一棵果树砍掉，他诚实地对父亲说：“我不说谎。爸爸，怪我粗心，砍掉了一棵苹果树。”父亲不仅没有批评，反而鼓励了他的诚实。说：“你不说谎，我就原谅你了。因为，我宁可损失一百棵苹果树，也不愿意听你说谎话！”（《名人家教集锦》，第 146、147 页）这种鼓励孩子说真话的家教是很高明的。

## 为祖国的经济繁荣再攀高峰

鼓励孩子立大志，勇于走上世界舞台为祖国作贡献，是家教中父母意境的一面镜子。“立其志，坚其志，恒其志”是我国人民家教的优秀传统。

我家历来主张教育孩子，不要“夕阳西下”时去幻想，而要伴随着“旭日初升”去理想，去做，去实践。我们要求孩子志向远大，然而，不能够把志向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看成是纯粹的个人意愿，而应该看到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这是志向实现的坚固根基。老一辈无产阶级教育家谢觉哉教导儿子立大志首先要想到“时代的需要”。

今天的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今天是高科技的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体会，做父母的指导孩子树立志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要让孩子认识世界，走向世界，从中获得聪明才智，以便站在世界舞台上，为祖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这种认识世界的教育，其实，从孩子儿时的家教就开始了。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智慧的萌芽。所以当孩子们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怎么不是那样”、“伦敦在哪里”、“纽约在何方”等，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孩子的父亲和我，都热情而又耐心地回答，从来没有厌烦过。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在《儿时》中写道：“‘儿子’的可爱是无知……每天都在发现什么新的现象。”（《古今中外家教谈》，第94页）所以，从幼儿时启发他认识周边和世界，逐渐树立志向，是促使孩子智力发展的非凡的启蒙。然而，我们从不要求、规定孩子长大做个什么家，这要由时间来选择，由他们自己将来去选择。更多的是要他们多多学习，做个有大知识、大志气的人。因为，到了适当的年龄，孩子会自己去体验，去实践，去决定。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宏大的知识宝库。为父母者只要把自己的子女领入这个宝库中，教他们掌握寻宝的本领。那么他们对祖国文化宝库领悟得越多，就越能在国际舞台上闪光。在美国只要克服了语言障碍，借助那里先进的科研设备和雄厚的科研资金，结合祖国的文化传统，苦干若干年肯定能够有不错的表现。上面已经谈到，我们的四个子女，其中兄弟三人都在世界科学超一流刊物《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文章。姐姐虽起步晚，可也在医学界一流杂志《血液》上发表了文章。这种事例，在海外留学生中，不胜枚举。我们当然时时在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的优秀表现而感到骄傲。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我和他们的父亲，长期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环境之中，知识和眼界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孩子从来没有进行过“完善计划”、“系统工程”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专业较好，但普遍缺少管理方面的才能。在一个相对较窄小的专业领域，可以纵横驰骋。但面对更宽广



的领域，再想有大的作为就有困难了。

美国人则着重“完善计划”、“系统工程”。在美国，人们只是美国的某个大计划的一个小部件、一枚“钉子”。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可能也接受过父母所给予像我们这种有“缺陷”的教育吧！他们自我表现得很“牢固”，但却缺乏管理整个大计划的才能。这不仅是管人，而且要管钱，搞好资金运作。华人在美国能够运作的计划越大，自身就越有主动权，也就越有可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华人并不是不能在美国运作大项目，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排除白人优先的种族因素。就个人自身完善而论，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在实践中，正在学习补上这一课。

比如，我们的长子金煜，1997年博士毕业做了半年博士后，那时能运作的经费是十六万美元。1998年年初进入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第一个项目就超过了上千万美元。项目经费越高牵扯的方面越多，牵扯的人力资源面也越广。此时，靠“一招鲜”就不能“吃遍天”，而要提高自身的项目管理能力。

像金煜这样的一些海外赤子，就是这样通过参与、实践、探索、学习，才懂得了怎样从管技术开始，逐渐学会运作“完善的工程”、“系统工程”、管钱、管物、管人。而且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条件，站在世界大舞台上，为祖国的高



金煜（左二）在陕西省检查野外地震施工情况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科技和经济建设努力作出更大贡献，为祖国的经济繁荣再攀高峰。中国的富强，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心愿！

## 身在异邦，根在中华

### 科教兴国一定要坚定不移

理解子女，相互沟通，对于子女成才、家教的成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终生的。当然在幼儿或青少年时期，特别是起点阶段，父母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但不论在哪一个年龄段，都离不开理解和沟通。

我们的家有一个很民主的家风。人人都愿意交换意见，平等地交流看法。从总体上看，父母的意见孩子们是尊重的，也往往是正确的。但也有的问题孩子提出来，有的事情他们做了，由于不理解，父母有时也会发表不切实际的意见。不过，有时孩子据理力争，讲得有道理，我们也心悦诚服、高高兴兴地表示赞同。这对培养孩子们的自强、自爱与自尊心大有裨益。他们看到父母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从而更加珍重自己的人格。所以，出国后，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没有做过一次丧失人格、国格的事情。而我们的家庭，以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始终是和和美美、亲亲热热的。

1995年夏，我们去美国探亲，住在波士顿的长子金煜家。儿子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一天放学后，金煜对他爸爸和我说：“留学生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我做了山东海洋学院全球校友会的网主。”

我一听不假思索地说：“你最好不要参加这种组织或那种组织，集中搞好学习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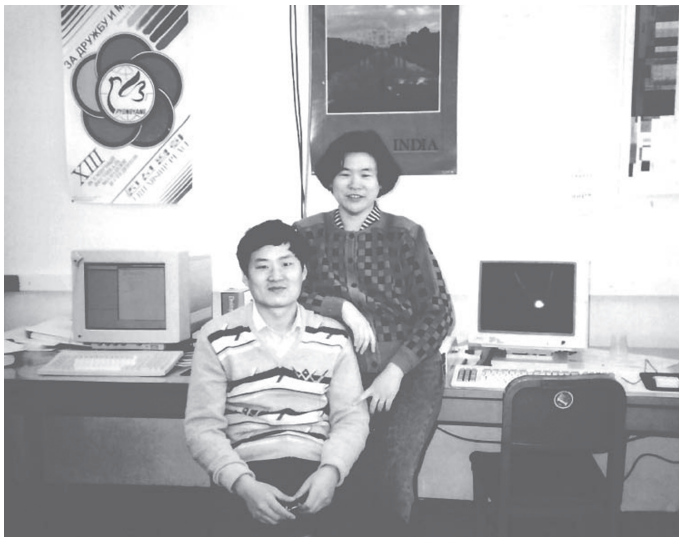
他思维敏捷地说：“妈妈是不是怕它和民运组织（以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和其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子为主，组成的各种名目的社团）有关，而打着自然科学旗号。”





我率直地说：“是的。”

他说：“妈妈放心！民运组织在留学生中没有多少市场，民运分子尽管有美国给的不少奖学金，但是学习不好，英语不过关，学不到什么，大家瞧不起。我们的研究会与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金煜和爱妻郝欣在麻省理工学院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爸爸一贯沉稳，问儿子：“你们的口号是什么？”

儿子说：“科教救国。”

我一听，又急了：“这和20年代丁文江提出的口号差不多。那不也是‘科学救国’吗？”

他爸爸慢条斯理地说：“你别急，听听他们的主张，恐怕不会同丁文江的主张一样。”

这时，儿子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坚定地陈述起来：“现在世界高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哪一个国家，如果跟不上形势，不注重高科技的发展，就要被动，就要挨打。科学技术不发展，教育不发展，国家就没有办法兴旺。弄不好就会衰亡。所以我们提出‘科教救国’，成立海外校友会有助于帮助国家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听完后，他爸爸说：“比起丁文江的主张，时代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沉默了，仔细想了想，觉得他们说的是有一定道理。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列强瓜分统治下封建腐败的中国，当务之急首先是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教育、科技都无从谈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的主张不合时宜，远离广大人民的意愿。而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今日之中国则完全不同。经济建设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留学海外的学子们以其所长，引进国外高科技，振兴中华，正是今日中国发展科学与教育之迫切需要，何乐而不为之呢！于是，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而且还为儿子很有见地而高兴。

1995 年，我国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

1998 年秋去美国探亲，儿子家已经搬到旧金山。我们又旧话重提。

我问儿子：“你们的海外校友会还存在吗？”

他说：“已经发展成全美国的了，网上通信。我已经将山东海洋学院（现名中国海洋大学——作者注）的网主给其他校友做了。我想：现在重点解决的问题，是高科技的现代应用，以及怎样向国内引进高科技。我们的口号已改为‘科教兴国’，与国内提法统一。”

金煜还又一次谈到当年他们成立全球校友会的意义：“我们成立海大（中国海洋大学简称——作者注）国外校友会的目的，是为了使海大的海外学者联系在一起，以便于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为海大走向世界作出贡献。海大校长管华寺指出‘海外学子生存不易，非常忙，海大没有希望占用他们很多时间为海大、为国家作贡献，海大随时欢迎他们回海大讲学，一天也行，一个星期也行，海大尽量为他们提供方便’。自海外校友会成立以后，校友们分别在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得克萨斯州等地接待了海大校领导的访问，并推荐了二十多位校友作为海大的客座教授。”

我们体会，父母一定要对孩子的心理、人格、兴趣、举止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绝不能“视人犹芥”，即认为孩子如同小草一样。

父母对孩子的理解和沟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接触。这种接触在父母与子女之间是不可缺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注意这一点，父母与子女之间常常会出现不愉快、不协调、顶撞、吵闹，以及感情与思想上的冷漠。会助长子女的逆反心理，严重时会使家人如陌路人。一句话，会出现畸形的家教。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告诫说：“如果子女和父母失去了经常的精神上的接触，这种教育是不正常的、畸形的教育，正如父母不经常关心子女，这种生活也是不正常的、畸形的一样。”（《家庭教育的艺术》，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6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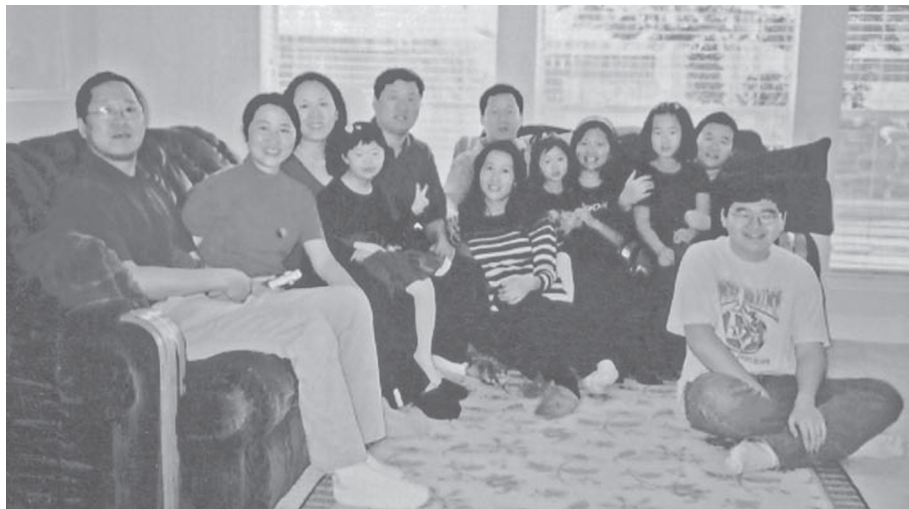
## 致力于高科技的应用

家教有持续性、连贯性的特点。

我们在上面曾谈到“家教应当是父母心目中永恒的主题”。这种永恒的心态，在现实中的实践，就是表现为持续性或连贯性。不仅是童年时期、少年时期，就是长大成才，父母也需要与社会相配合继续履行家教义务。

孩子们出国后，我们家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谈国情。国家现在都有哪些进步？还有什么问题？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与强大需要他们做些什么？这是我们每次出国或他们回国讲学与出差工作，都经常谈到的问题。孩子们都很爱听，也愿意问。

他们的父亲是谈我国国情的“行家里手”，是一个十足的“好教授”，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助手。因为他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教授，一直关注着国情，特别是我国当前的国情，很多方面他都了解得颇为透彻。我想可能是由于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爱读书、看报。有时他说：“看看报，休息一下。”可是一看就是一上午，哪里是在看报，明明是在“读书”，又看、又记、又剪报。第二，他有职业特点养成的惊人的记忆力。看过的数字、材料，事情本身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等，都记得一清二楚，十分准确。第三，他还很爱分析，也会分



在国外的孩子们都很爱听金教授的“国情课”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析。一旦孩子提出“爸爸你怎么看”，他总是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理直气壮，侃侃而谈。第四，在国内，他每天都要收听、收看三段新闻，晚7点钟开始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晚9点开始的香港凤凰卫视新闻、晚10点开始的《晚间新闻》。孩子们都承认爸爸是介绍祖国情况的好老师，教“国情课”的好教授。

这种同孩子们的交流，影响作用是很大的。对于他们强化爱国主义意识，考虑如何满足祖国的需要，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由于这种认同，对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很容易理解。由于他们的想法能够取得父母的热情支持，他们也获得了力量与鼓舞。

“来去自由”，这是我国对留学生的政策，比较宽松，又很有远见。

我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时，就发现孩子们很关心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希望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这现在仍是姐弟们在谈论科技应用问题的出发点和“主旋律”。

四个孩子在美国都是学习和研究高科技的。1995年，我在美国探亲一年，在几个孩子为庆贺我的生日而团聚到一起时，他们谈得最多的是高科技的应用问题；在日常通电话时，除一般生活情况，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论文中，除理论部分外，谈得最多的还是高科技的现实应用问题。

他们在读大学或读研究生期间，就自觉注意了“学有所用”。这恐怕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比那种盲目地去猎取学士、硕士、博士文凭，而毕业后“学非所用”，可能对社会贡献要大一些，对个人来说也不乏“安身立命之本”。当然，应该理解“学非所用”的出现，不只是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但是，在学习期间，个人自觉注意，并努力探索怎样将所学到的科学知识，应用于祖国的现实建设、应用于现实社会的经济生活，却是要有较高的立脚点，并需要苦心思索，不畏艰难，竭力去做的。

现代高科技的特点之一是民办性，应用的广泛性，因此，要思路开阔，想的不仅限于在哪一国的应用。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的应用从本性来说也不应受国界的局限。美国的电脑在中国得以广泛应用，日本汽车飞奔在各国的高速公路上，摩托罗拉的移动电话遍布全球等，数不胜数。

我应该坦诚地承认，子女们的“高科技应用意识”，不是来自家教。因为，我和我的先生，都是搞社会科学的，一个是党史教授，一个是哲学教授，对“高科技”的知识几乎是科盲，在探讨应用问题时，我们是门外汉，无言以



对。只是从孩子们的谈论中，能听出一些门道来，也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科技的角度。他们思考高科技的应用问题：来自他们在海外的研究实践；来自校内学习知识的踏实积累；来自阅读课外书，虽不能说是“博览群书”，起码有个广泛的阅读；来自信息高速公路所提供的丰富资料，等等。这种学习方法和思考，对高科技应用的探索，我不敢说一定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一些整天冥思苦想“毕业谁要我”、哀叹“我学的东西没有用”、惆怅“我的专业学得不对口”等的年轻人，在思考未来的大背景以及个人位置的选择上，我估计也是不无参考价值的。

美国西部的硅谷，是美国高科技的发源地，至今仍是美国高科技发展中心，也是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战略基地。环绕硅谷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形成了中小城市密集的高科技园，一度为美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次我去美国，子女们就酝酿攻读到博士学位或做完博士后之后，去西部工作。长子的决心特别大，他说：“毕业后我要到离家最近的西部高科技园工作”，“要学好高科技；用好高科技；把高科技成果带回国”。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998年5月应聘去美国西部加州，到雪佛龙石油公司工作了。

他在中国读大学，学的就是地球物理勘探；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盆地分析；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是大地构造模拟。总之，没有离开对地球的研究，没有离开石油勘探的老本行。最后，他终于到美国西部高科技的著名“园地”雪佛龙石油开发公司工作去了。

从家教的角度来说，我们从中看到了家教持续性的意义。对这种意义我国一代名人特别看重，比如，著名的翻译家傅雷，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译著。他还留给在海外留学的儿子傅聪一百二十五封动人的家教杰作《傅雷家书》。“在家书中，傅雷以他那融文学、美术、音乐、外语为一体的特有才华，流光溢彩的语言和模范的行为，为我们塑造了一位集父亲、朋友、导师于一身的现代父亲的形象。”（《中外名人家教故事》，第286页）这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好的父母伴随他对孩子的热忱的爱，永远不会忘记家教的持续性或连贯性的特点。





## 将回中国以最现代化方式开发油田

鼓励与支持子女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祖国赢得“积极的财富”，是现代家教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

家教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从胎教开始，直至垂老教子，一环紧扣一环。不论是在国内学习还是出国留学，也不论是成才前还是成才后，父母的终生家教，往往要伴随孩子走过漫长的岁月，它会在孩子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影响他的一生。



金煜（左）因在川东北天然气项目中作出的突出贡献，荣获雪佛龙亚太区总裁奖。

颁奖人为雪佛龙中国区总裁凯利（右）

美国雪佛龙公司属于全球性的大型的相当有实力和影响的综合性国际石油公司之一。在我 2000 年写书的前十年，该公司总投资额始终保持在三百五十亿美元左右，而在亚洲的投资额却增加了两倍，从 1986 年的百分之七增长到当时的百分之二十二。这说明该公司已经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亚洲，特别是东部。而中国更是该公司的投资重点之一。当时，雪佛龙公司在中国近海的两个





地区，即渤海湾和靠近香港的珠江口盆地获得石油勘探权。此外，雪佛龙公司还获得在中国多产油田，即胜利油田的深层勘探权。

当时，我们的长子金煜在雪佛龙公司的亚洲部工作。他的工作担子很重，同一位美国同事一起，从事以高科技综合分析各项勘探资料以确定油田打井的定点工作。公司当时已决定，几年内整个亚洲部移驻中国。同美国人一起来，他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国际合作中会更好地为中国的石油建设事业服务。比如胜利油田的浅层石油我国已经开采，但深层勘探还有困难。那么，就可以利用美国公司的技术力量，找油、打井，而产出的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成。这无疑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

最近，金煜作为雪佛龙石油公司驻中国的代表，已经在中国工作近三年，这几年和我国有关部门合作，创造出显著的业绩。他曾两次获奖。

儿子金煜现在在祖国商务开发的成果是川东北高含硫天然气项目。他是雪佛龙在中国的三个主要贡献人之一。项目合同签署日是2008年12月18日。媒体报道，投资数目是四百亿人民币。

雪佛龙集团的前任主席曾说：“雪佛龙的客户珍视我们公司的经营方式——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尊重东道主国家的人民、文化与环境，为他们留下一笔积极的财富。”这位主席的友好表示，现在已经成为雪佛龙石油公司驻中国代表的目标。长子金煜热情很高，又一次表示：“我们回中国将以最现代化方式开发油田”，“一定要留下这‘一笔积极的财富’”。儿子曾多次谈到他的这一心愿，我们都一直给予积极的鼓励与支持。

现在金煜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着，他已于2007年3月举家回国定居，只留下他的大儿子一人在美国读大学。

媒体已有如此报道：“北京是雪佛龙公司驻中国的总部。金煜是雪佛龙公司驻中国石油勘探与商务开发的地球科学家代表。自2007年3月19日驻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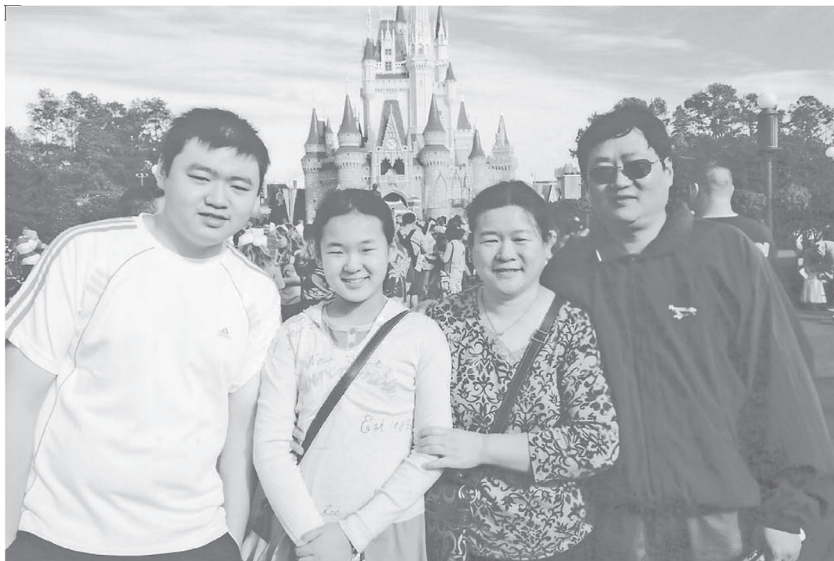
金煜如今又在忙于渤海湾石油勘探开发的评估工作，前景喜人。

值得庆幸的是，金煜的大儿子金潇在美国也考上了石油大学，这是由他申报的志愿，也是全家为之高兴的大喜事。而今他已经是四年级的大学生了。大家企盼着他能够以我国历史上司马迁的精神和他父亲一起奋发图强，建功立业。

司马谈告诫儿子，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继他写好《史记》。司马迁终于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金煜（右一）举家回国，妻子（右二）、女儿（左二）  
和现在美国读大学的大儿子金潇（左一）

写出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第一部通史，即洋洋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我想：我们的历史任务，可能还要更重一些。应该告诫子孙将以各种方式走上国际舞台，扬长避短，既掌握高科技而又熟悉本国国情，在国际舞台上，为祖国获得更大的荣誉与积累更多的财富。这应该说是现代家教不同于古代和近代家教的一个突出特点，现代的父母理应以此作为今日的“家训”或今日的“警世通言”，勇敢地担负起培养这种现代新人的历史重任。

### 真希望艾滋病毒在中国较少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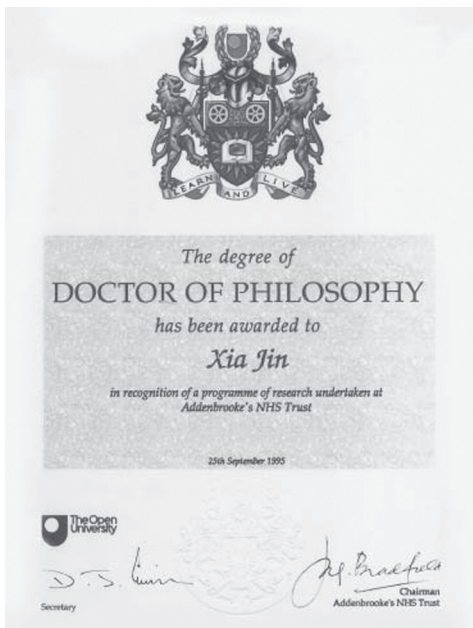
家教是否鼓励孩子的开拓性和创造性，是父母是否具有利他与忘我精神的鉴定。

一个爱学习与聪明的孩子，常常都有很大的开拓与创造的潜能。这种潜能如果有适宜的外部条件，比如社会和家庭的鼓励、支持与帮助，

它会磅礴地释放出来，并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开拓性与创造性的美好个性，从而使其成为动力非凡的创新人才。



然而，开拓与创造就是在前人成功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贡献。既然要“新”，要“创造”，要“开拓”，就难免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甚至是风险。这就会令爱子心切的父母，经受严峻的考验，是从个人得失出发，拉住孩子，让他停步，还是以忘我而利他的精神，勇敢地鼓励孩子前进。这两种心态对孩子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后者是供孩子仿效，并在忘我利他精神鼓舞下，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精神支柱。



金侠的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证书

我这个人很矛盾，两种心态都有过。有时由于爱子心切，怕孩子受伤害，常常从感情出发，利他忘我的精神不那么多；但我又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理智。在这方面要感谢我的先生，他是一个理智非凡的男子汉大丈夫，对我影响很大。一遇到感情脆弱的时候，他总是让我理智地想一想怎样对孩子成才与事业上的成功更有利，怎样才能使孩子成为心中永远装着他人，成为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才。这样，就把我从几乎滑到阻力的边缘上拉回，很理智地变成了助力。

金侠报考北京重点高中，我思想上有忧虑；读本硕连读八年制的协和医大我思想上有忧虑；“登峰”、报考剑桥大学我思想上有忧虑；研究艾滋病我思想上也有忧虑。主要是一连串的“怕”。报考重点高中，怕考不上，孩子自尊心太强，受刺激；报考八年制本硕连读医大，怕孩子考不上，名落孙山；报考剑桥大学怕考不上，耽误了伦敦大学的录取；研究艾滋病要抽血怕搞坏身体等等。后来，在我先生和孩子们的进取、开拓、创新、勇气十足的影响下，我多次挑战自我，决意做一个有理性、有智慧、有胆识的母亲，而不使自己成为一个头脑简单、胆小怕事的“性情中人”。

排除了来自母亲的阻力，增添了来自母亲的动力，使金侠犹如增添双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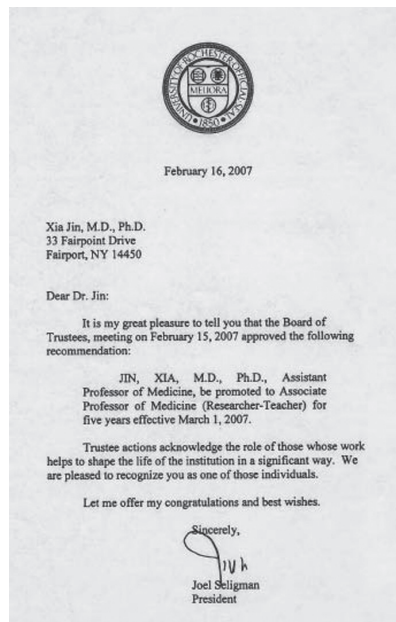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一往无前，奋力拼搏，笑迎困难，获得一连串的成功，从而将一个又一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捧送到父母的面前。

当接到金煜电话时，说和金侠要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一个要报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要报考英国剑桥大学，我当即表示，不要上那种顶尖级的大学，困难太大，分别报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就蛮好了。可是，孩子在笑谈中校正了我。几年后，“报喜飞鸽”来到欢唱：“你们的儿子分别荣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了。”

金侠于剑桥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又被美国著名的爱伦·戴蒙艾滋病研究所聘为研究员、攻读博士后，后来又就任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副教授。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内科系  
副教授任命书

可能正是由于我家有民主作风，尊重孩子的意见，“当参谋，而不当司令”，父母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致使几个孩子都有一种开拓、创新的个性。而且从言谈话语，以及举止中可以看出他们心中总是装着他人，他人的痛苦，他人的需要，直至如何挽救他人的性命等。这种胸怀，是他们的追求和内心深处的源头。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金侠对于艾滋病的研究，以及家教中所起的作用，最能鉴定我们的精神境界了。我们的孩子都比较喜欢创新、开拓。金侠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艾滋病研究”。他从一进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就研究这个课题，获得博士学位后，仍继续研究这个课题，当我2000年动手写该书时（第一版），他已研

究十多年（现在说来，已经二十多年）。研究这种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任何一个研究人员，都离不开抽取患者的血液，进行化验、分析，稍一不慎，就有被感染的可能。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手术过程中不慎割破自己的手指导致血液感染而魂上九霄的感人故事，在中国广为传扬。有的亲朋好友，听说金侠在英国研究这种课题，都反复叮嘱：“可让孩子小心啊！”有的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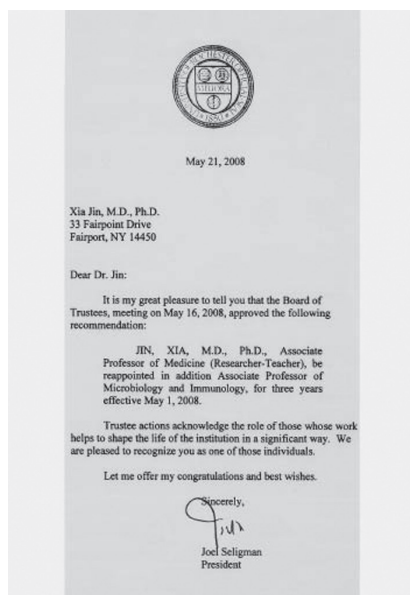


性提出：“怎么研究这种课题？改一改吧！”我虽然有过动摇，但没有转达。因为我也曾有过思想斗争过程，慢慢理解了孩子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一句话，这是一个能够挽救亿万人生命的新兴学科。孩子自幼培养起的开拓、创新的个性，不允许他接受这种好意的劝告，不会为保护自己而改变课题研究。还在1981年的日记里金侠就写道：

作为一个创造者，我们应竭尽全力。作为一个开拓者，我们应无所畏惧。即使我们碰得粉身碎骨，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用心血铸成的遗产，一串向前迈进的脚印。

“苍天”永远不会愧对他的骄子。儿子成功了！关于艾滋病的论文，答辩通过，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在全世界超一流杂志《科学》上发表；到世界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工作；又在全世界著名专家、研究所所长何大一先生的领导下，参与艾滋病的研究；现在金侠已经成为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副教授了。

关于艾滋病，他指导博士生、讲课、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作报告，等等，但从未间断研究。金侠虽已独立在罗切斯特大学任教，但与何大一先生联系仍十分密切。为使人类摆脱艾滋病“病魔”、拯救亿万人性命的高尚的共同目标，是他们“高风亮节”、友好合作、科技创新、密不可分的天然纽带。何大一先生和金侠多次往来于中美之间，研究在中国开展艾滋病的研究与医疗实践问题，用儿子的话说：“西方艾滋病流行很厉害，夺去不少人的生命，特别是年轻人发病多，病逝得很快，火热的青春一下就消失了。我们真希望艾滋病毒能在中国较少蔓延。”这些话掷地有声，久久地响在我的耳边。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微生物  
及免疫系副教授任命书





## 第五章

# 做父母，我们实现了双赢

### 有播种才有收获

父母与子女之间情谊无价。这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有谁的心里如果不闪烁这种珍宝的晶莹光辉，将事业与爱对立起来，那么，他所赢得的只能是“失败的家教”或千夫所指。

“你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真没想到，怎么会那样的爱孩子！”这是我的一个女友对我说的。类似的话别人也向我说过。我通常的回答是：“这是做母亲的天性吧。”“谁要是不爱孩子，就不该做母亲。”当我看到有的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子女时，经常感到义愤填膺，甚至认为，这样的母亲枉为人母，缺少人性，我为她们的孩子而难过。

2009年10月30日，我在《南国都市报》上看到一则惊人的消息：一个十九岁的女子，未婚先孕，生育后将孩子扔下二楼。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母亲能够做得出的残酷举止，引起众怒。一时间指责声、叹息声在众人间、在网络上开始沸腾。

我和我先生，一直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为了建立一个美好家庭，一辈子呕心沥血，我们也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幸福家庭。著名的教育家斯特娜夫人这样说：“狄德罗曾说：‘人类的义务是要把世界变成乐园。’而我却想说：‘母亲的义务是要把家庭变成乐园。’”这实际也是父亲的义务。





我们在孩子身上播下的爱的“种子”，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生根，孩子给予父母以深深的爱，而且时时在想着回报。这种爱的“回报”，被我们视为无价之宝。

我们的小三金侠平时话少，但对人感情很深，很重感情。他上大学时一次回家，正赶上我出差。他在日记里写道：“妈妈出差了，就爸爸一个人在家……那么大一套房子，一个人住，真是又冷清，又难以收拾呀。妈妈快回来吧！”

李生弟兄双双考上人大附中的重点高中后，平时都住校，只有周末回家与我们相聚。一次，小四金延在回校路上遇到一件事，颇有感触，回校写了短文《这件事教育了我》。上面写道：

“那天，是星期天的晚上，天是如此的黑，又是如此的冷。北风呜呜地吼叫着，仅仅几个小时，滚滚的寒流驱走了秋天的暖气，在北国的大地上发着淫威。

“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穿着温暖的厚厚的大衣，背着满满一书包吃的东西。当我看着车上有些人在寒风中瑟缩着的时候，我是这样强烈地感觉到了母亲拳拳的心。

“车进站了，一个抱着小孩的青年妇女，坐在了我的对面……小孩‘咿咿呀呀’的，尽管妇女怎么拍着、哄着，就是不肯睡觉，显然是由于冷的缘故……那妇女就脱下了她的棉背心、毛衣，一股脑儿地裹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慢慢地睡着了，他是很温暖的，而他的母亲却在凛冽的寒风中穿着单衣，心甘情愿地受着严寒的无情的折磨。

“一颗伟大的心在跳动着。这是多么伟大的品质，又是多么平凡的事情。这就是母爱，伟大的母爱！苏联文豪高尔基曾经在他的作品里，用热情洋溢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歌颂了它：‘正是伟大的母亲们，用她们的乳汁，哺育了人类。’”

也还是我的这个小四儿金延，1992年，在加拿大寄给我的生日卡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妈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您永远不会被忘记，  
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因为您永远被牢记着，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更深、更多的爱，非任何言语所能形容。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我是在海南接到的这个生日卡，看了好几遍，边看边激动地流着眼泪，还在电话里念给我先生听。

长子金煜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到旧金山湾区工作。他买了二百七十平方米的楼房，买了两辆汽车，为十四口之家的大团聚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又做了周详的安排，使我们过了一个异常欢乐的圣诞节，还拍了全家福。这是十多年来，我梦寐以求，而又不敢抱有希望的企盼。金煜和郝欣他们的四口小家，为我们的到来，为十四口之家的大团圆，从春忙到夏，从夏忙到冬。儿子金煜和儿媳郝欣为父母准备了全套新家具的房间。用儿媳的话说就是：“让爸妈来，好好享享福。”



金煜与爱妻郝欣，以及他们的女儿金安妮、大儿子金潇

我六十岁生日时收到了长女金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妈妈，下个月就是您的六十岁生日了。祝您生日快乐！很遗憾，儿女们都远在大西洋彼岸，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如果能的话，我一定给您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这个愿望大概要等到您下一个生日或下下个生日才可能实现吧。”



恰巧，我的六十一岁生日，正是在美国过的。当时，是住在女儿家。除在日本的金延和儿媳李阳因忙未到，其他儿女（包括儿媳）都到齐了。当我沉浸于金侠和儿媳王阳为我买的生日礼物——便携式笔记本电脑时，当我戴着大儿金煜和儿媳郝欣为我买的生日礼物——高级手表时，当我穿着女儿金萤为我买的生日礼物——名牌红呢大衣与皮靴，去参加他们为我在巴尔的摩市的中国酒店举行的生日晚宴时，所体验到的儿女们对母亲的深情，及其所带给我的内心欢乐，是任何一个母亲都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这是物，又“不是物”，因为这里蕴含着儿女对“母爱”所回报的一片纯真而又深沉的孝心；这是闪烁着金子般耀眼光芒的一片“爱母之心”。

我曾听到过一个令自己十分惊讶的悲惨故事：一个单亲的职业女性，出国探亲，看望子女，回国后，闷闷不乐。她同挚友说：“过去只顾忙工作，给予孩子的爱太少，孩子长大了，对自己感情不好，十分伤心，没想到‘职业女性’竟落得如此下场！”她总是想不开，没多久，竟寻了短见。向我讲故事的人说，这是真实的，确有其人、其事。我没有办法核实，姑且就以故事来思索吧！

我想：在搞好家教上，职业女性需要有更多的付出，会更辛苦，但再辛苦也不能在爱上“减负”，千万不能将工作和应该给予子女的爱，对立起来或分割开来。

在家教中，只有双方互动，才能够释放出这种人类最崇高、最纯真的爱。而作为家教的“园丁”即父母，需要播种“良种”，且辛勤耕耘，这才能收获亲情的孝与忠，以及无穷的欢乐，俗云“播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一点也不假！

人的生命很短暂，任何人的自然年龄，都是十分有限的。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活到百岁者究竟有几多？俗称“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多岁的老人，自古稀少。而今中国人的平均年龄虽已提高，但真正能够精力充沛地工作时间也只不过几十年。有谁会不珍惜这短暂的光阴、短暂的时间、短暂的生命呢？

然而，做父母的没有不在自己孩子身上花时间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这是现时的流行语言。我们暂且不谈前者，就是后者一项，已足以告诉我们，父母在子女身上所花的时间，正是意味着自己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我们在孩子身上所花的时间，比现在的某些人，不知要多多少倍。因为条件不同，现在一般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生活在那种倡导“人多好办事的年代”，计划生育观念不强，措施也不严格。这种“盲目”性，使我们的四个子女陆续来到人间，最后两个还是上帝赐予的一对可爱的小生命，即孪生弟兄。作为父母，我们对这四个小生命的每一个，都如获至宝，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许多时间与生命。我们视此为个人生命的延续和转移，愉快而又顽强地迎接着大自然的挑战。

作为母亲的我，在孩子们身上所花的时间，无疑要更多些。这也是很自然的。个人实实在在的经历与感受，使我对做母亲的姊妹们甚为同情。十月怀胎、哺乳、喂养、教育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常发病，什么乳腺炎、产后热、贫血症、脑缺血等我都经受过。由于白天、夜晚一起喂奶、带孩子，久而久之，失眠、顽固性头痛，长期缠绕着自己，痛苦异常。

虽然如此，在公众的心目中，我还是一个年轻健康的母亲。我二十八岁就做了绝育手术。因为产后必须上班，而当时家庭的经济状况，又无力请保姆，只好请来刚刚患过急性肝炎的母亲，来帮忙照看四个孩子。前面已经谈过，母亲的心血、劳累，我感恩不尽，永远铭刻在心。可是，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和照顾我母亲的身体，给小孪生兄弟哺乳，给大的喂饭；洗衣服、洗尿布；踏那笨重的缝纫机，做衣补衣；烧饭（后来我先生在“文革”中“靠边站”，学会了做饭，这项生活大事就由他承担，使我得到解脱，实在感谢）等家务事，占用了我不少时间。这都是生命的支付啊！至于子女长大后的家教，所花的心血就更难以计量了。

记得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时，长女金萤对我说：“妈妈一直为我带小女儿，我有些过意不去，有时给爸妈寄钱，心里才会安宁些，实在是想少欠些爸爸和妈妈的。”我告诉她：“欠与不欠是不妥的语言，我们不该去谈这些，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多少钱也买不回爸妈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呀！”她似乎很同意我的说法，在她那里住了一年，帮助她照顾我那刚刚出生的小外孙，我还学会了电脑，完成了《中国教授眼中的美国》一书的写作（已出版）。女儿对我一直非常好，为我创造了许多条件。

我们为孩子付出了时间与生命，而孩子们孝敬父母的纯真感情，使他们总想从多方面补偿。他们请父母出国探亲、参观访问、休闲旅游等，大笔花钱，



以及购物，赠送美元，这都是一种令我们十分感动的爱的补偿，使我们感受到收获的喜悦。然而，使我们更感到喜悦的是：孩子们学识的增多，业务的提高，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业绩。这是对我们失去的时间和生命的无穷无尽的补偿，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我们的长子金煜，在中国山东海洋学院获得学士学位，而后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接着又到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在那里他多年刻苦学习，不仅白天在校上课、读书、研究，晚间也常常加班加点，累得经常头痛。但“苍天有眼”，他终于在全世界超一流杂志《自然》上发表了文章（1994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知道《自然》和《科学》两杂志并列，学术地位远远领先于其他杂志，因此，公认这二者为全球的“超一流”杂志。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说：“《自然》杂志上的文章大都来自全球资深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中国科学界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很少。在这样的杂志上多发表文章才足以说明中国的科学研究达到世界水平。”（1999年2月28日《北京青年报》）可见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多么的不容易。

1998年秋，我先生和我一起去美国，当长子金煜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97年颁发给他的博士证书和该院博士后聘书，拿到我们面前时，我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心想：这庄重的证书、钢印、签名，都凝结着儿子数不清的心血和汗水啊！我有多少不眠之夜，暗暗地为他祝福，希望能够有这一天。金煜又将厚厚的精装的博士论文拿给我们看。我先生和我看了又看，虽然那是英文的，我们看不懂内容，但深深懂得它的分量和重要性，真是有点爱不释手。儿子深深理解我们的心情，又似乎早有所料，笑了笑说：“爸妈，我早已经为你们准备了复印件，还有论文，可以带回国去。”于是，儿子又打开他的文件箱，从中拿出博士证书与博士后聘书的复印件，以及又一本精装的博士论文，奉送给我们，并解释说：“博士论文一般是平装，只印六七本精装的，这是专门为爸爸、妈妈印的一本。”因为我们不懂英文，儿媳特意告诉我们：“在论文的扉页上，金煜写上了‘献给我亲爱的父母和爱妻’。”我先生和我都激动不已，像拿到价值连城的宝物一样，谨慎地将这些全部放在装有护照的提包里，唯恐丢失。

金煜于1997年荣获博士学位之后，在校做博士后半年，1998年欣喜地进入世界著名企业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任地球科学家。他曾参加多项美国国家科研基金项目的工作，是其中阿尔金山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还参加过多次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海洋和陆地地球科学考察，是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和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会的会员，同时兼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

金煜的科研成果除在国际超一流杂志《自然》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其他国际地球科学一流杂志上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外，还在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岩石圈动力学》专著，并在多次全球性专业会议上提供论文，大会发言，又多次回国讲学。

2007年，儿子令我们十分愉快地作为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地球科学家商务代表回到祖国，和我国有关部门共同合作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田。已经几年了，他日夜奔忙地实现着国际合作与报效祖国的美梦，这又给我和他的父亲带来了“做梦都要笑醒”的欢乐。

我们的二儿金侠，在人大附中毕业后，考取了八年制的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没有再经过研究生考试，直接获得该校硕士学位。一些家长和同学都十分羡慕，因为少经过一次研究生考试，就少一次被淘汰的“险情”。可谁又能想到他的“十年寒窗苦”呢？重点高中的两年，对孩子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接下来，又苦读八年。这十年寒窗，是异常艰难的岁月。前面已经提到，头两年在北京大学上医预班的生物课，要求很严，也很难。在半年之内，他就感觉到，如果没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在日记里，他曾这样书写当时的心情：

“似乎人大附中的椅子上还保留着余温，北大的冬天又送走我六个月的学生生活……好像一个人，骑车走在向上爬的山道上，尽管这道崎岖坎坷，但它是通达那边阳关大道的唯一途径。怎么办？退回去是安全的，可仍旧安安稳稳的，但仅此而已。骑车上山去，危险、艰难，但却可登及山顶，眺望锦绣山河，通达大道，任意驰骋。”

这以后，正像这里所写的，他遇到任何困难，也没有退缩过。他在协和医大毕业，得到硕士学位，又以高分通过托福与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获得英国奖学金，又一次读伦敦大学硕士课，着力准备申报博士。当他步入世界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前面曾谈到1992年，我和我先生去英国探亲时，看到儿子瘦得很厉害，我心里难过极了，暗暗想：在这种名牌大学学习真难，孩子能够坚持下来吗？可是，他终于坚持下来，并于1995年荣获博士学位。





这之后，他像长了金翅膀，从英国飞越大西洋，应聘到纽约市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做了博士后。令人未曾预料到的是，没有几年他已经成为该研究中心的骨干了。1998年我们去美国探亲时，他同我先生开玩笑说：“爸爸，你是博士生导师，我也是‘博导’。我手下有三个美国人，其中有两个还是哈佛大学毕业生。”

2001年至2007年金侠又展翅飞翔：2001年到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内科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兼任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系助理教授，同时兼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客座教授；2007年起任内科副教授；2008年起任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副教授；2009年起任台湾高雄医学院客座副教授。

金侠也和哥哥一样，在全世界公认的超一流杂志《科学》上发表了文章，以及其他著名医学杂志发表论文五十余篇，曾获得科研基金数百万美元，参与的科研项目达数千万美元；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供论文并作大会专题发言；又在芝加哥千人大会上作学术报告，被邀请来大陆和台湾多次作巡回演讲、作学术交流，并到大学讲学等。

我们的三儿金延，在人大附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中国航空研究院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攻材料专业。这个儿子的特点是，极为聪明而又老实憨厚。他的导师颜鸣皋是全国材料专业的著名专家，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美国耶鲁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面试时导师曾提出，希望金延读完他的博士，中间不出国，金延同意。后来，加拿大的一位教授来访，作学术交流时，颜教授主持会议，在加国教授报告之后，他让大家提问。金延平时通过电子显微镜研究材料，兴趣很浓，经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正是这样一种研究使他发现，这位当时在材料专业方面已被公认的世界著名专家的一篇论文中有问题，他当即斗胆提出。在场主持会议的颜教授，都为此而捏了一把汗。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加拿大教授，不仅没有表现尴尬，反而一再表示：“金延的发言有道理，是对的。”而且，会后立即让一位陪同的韩老师告知金延：“教授要为你解决奖学金，建议你去加拿大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突如其来的“青睐”，使金延来不及同导师商量，也没法与家人沟通。他非常单纯而又诚实地回答：“请韩老师转告，我已经同颜老师谈好，读完他的博士再出国。”他信守了承诺，果然是在颜教授的指导下，荣获博士学位，但却放弃了一次轻易到来的十分难得的出国机会。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数年后，金延博士生毕业，又以国际研究员的身份出国。家人都说：“小四后来居上。”因为，他不是直接读国外博士，而是取得中国博士学位后才出国的，出国时间虽然比两个哥哥和姐姐都晚，但取得博士学位他是全家第一人。而且在当时，他作为国际研究员的地位和待遇比哥哥、姐姐高。作为博士后级政府科学研究员，金延出国后，相继在加拿大温尼伯市研究航空发动机材料两年，随后去日本筑波市研究高速铁路导电材料两年，最终于1996年去了美国。他在美国匹兹堡市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做了几年研究员，目前参加一个公司制作技艺水平较高的现代科技软件，并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曾经有人问到，为什么他申请“绿卡”能够迅速拿到。去美国探亲后，我们才弄明白。因为他文章多，申报了技术移民的“一类绿卡”（具有杰出才能的外国人一类），其他留学生一般都报二、三类。当他打来国际长途，向父母报喜：“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科学》上发表了。”我们自然非常欢乐，由衷地向他祝贺。

我们的长女金萤，在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任博士后、学习与工作，前后十二年。这所大学的医学院位列世界前十，在全球医学界是颇负盛名的。她做基因工程的研究，也发表了十多篇医学论文。可是，她并不满意，常说：“我比不上弟弟们，我的论文没有在世界超一流杂志《自然》和《科学》上发表的。”我安慰她：“你已经不简单了，你和他们的阅历不同。”

长女金萤“生不逢时”，是属于现在国内普遍称呼的“被耽误的一代”。她上初小时就赶上“文革”。风华正茂时，高中一毕业，她就被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劳动，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种地、喂猪、教农业中学等，什么活她都干过。这种特殊经历，使她荒废了不少猎取知识的宝贵时光。多亏她聪明伶俐，爱好学习，还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好学生，使她在“文革”后恢复高考这个特殊机遇到来时，能够第一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大学（当时称北京第二医学院，现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她留全国甲级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做了外科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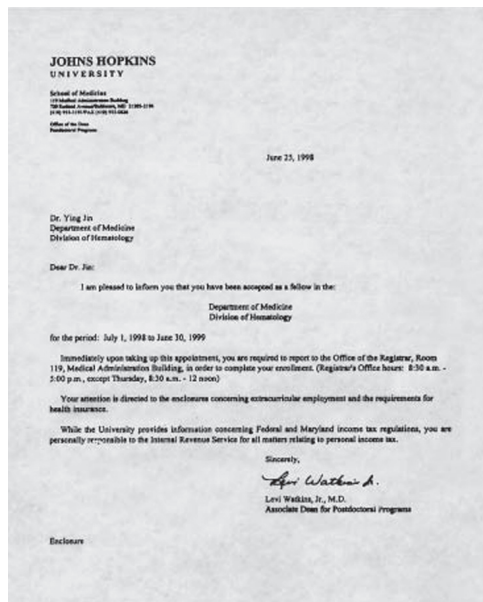
女儿1992年出国。出国后，她忘我地“打拼”，不分昼夜地攻读，拿下多门功课，成果显著。当我们看到她的博士后聘书，得知她在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这种世界名校接受并完成博士后训练，我们真的为她高兴，为她骄傲！

据我了解，中美医学院校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差异。中国和东南亚的医学



院校教育，承袭的是欧式系统，医学院校教育是五年制。而美国的医学院校教育是八年制，包括四年本科教育和四年医学院教育。医学院毕业后，直接授予医学博士。所以，一般来说，美国并不太重视中国和东南亚去的医学院校毕业生。但是，美国人强调注重能力与业绩。如果你到美国后不是转变专业或从事其他行业，而是在医学科研领域继续深造并做出成就，在完成博士后训练之后，根据你的业绩与科研成果可以拿到博士后证书时，一般就认可你为医学博士。金萤把日夜思念的女儿留在国内，横跨太平洋去美国拼搏，出国留学，刻苦攻读，做出的业绩，得到了认可，我这个做母亲的怎么会不为此而高兴？这是对金萤一直酷爱的医学专业洒下心血的确认啊！

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学的是俄文，见了英文好似文盲“一字不识”。乘金侠回国讲学之机，以及大儿金煜回国合作科研项目的一点空闲，请他们帮我作了口译与笔译。明白了聘书上面的中文意思，我分外高兴。在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血液科颁发的博士后聘书上写着：



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后聘书

亲爱的金博士，我很高兴地通知你已被接受为我血液科的博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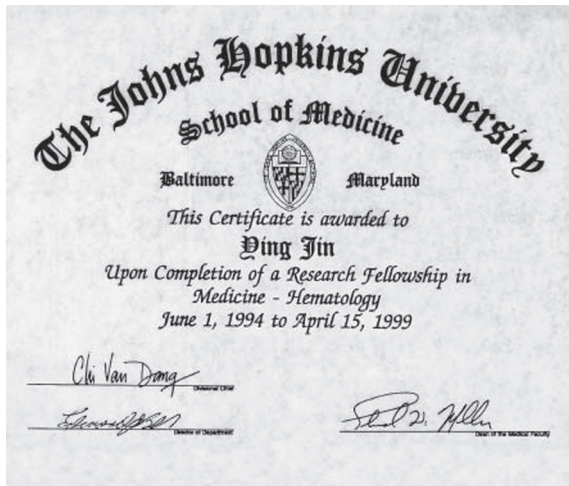
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血液科

下面是副院长、博士后项目负责人的签名。从另一个《科研项目参与人简介》文件的译文中，我还看明白了，金萤做博士后期间的工作表现、评价，以及重要工作责任。

文件中写道：“金萤博士，现职务博士后，已在此实验中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分子生物学家。她将负责该项目的 DNA 工程、排序、基因库组建。”



## 我家走出四博士



金萤博士后证书

几年后，又见到金萤的博士后证书，这带给她父亲和我以更大的快乐。

对于上面的证书、文件和有关的译文，我们二老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看了又看，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好女儿而自豪。当然，见到他的三个弟弟的博士学位证书，我们也异常喜悦，然而，弟弟们没有插过队，而她插队耽误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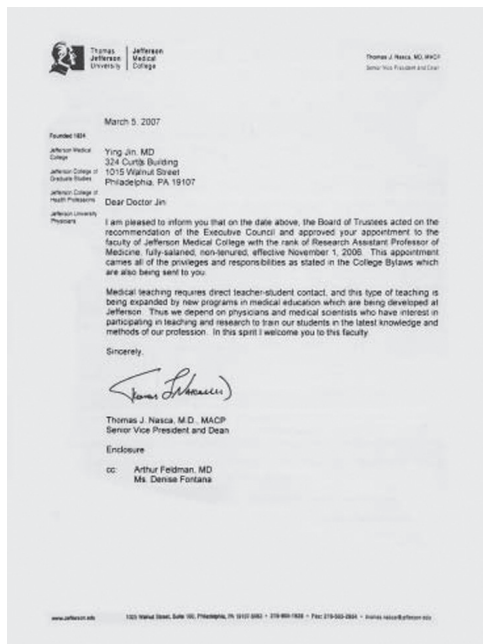
大学毕业后又工作十年，而且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又留在国内，不言而喻，她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心血、汗水和眼泪。

现在，金萤已被聘为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这使我们在庆幸中悟到女儿虽然困难重重，但还在继续攀登，我们怎能不为女儿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

她潜心研究现代医学的基因工程，已有二十年，登山的高度，不算太低了。但她仍在刻苦而又执着地追求。

我们对孩子们要求一直很高。然而，我想：毕竟年龄不饶人，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争“登上泰山”，亲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盛景。

而只要登到泰山的适当高度，比如中天门，能够尽情观览山峰的



金萤的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证书





神奇和秀美，云气层生，开阔视野，荡涤心胸，也就蛮好了。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适度，才能因材施教，获得累累硕果。

四个孩子的业务成长很快，在夺取世界高科技成果的艰难道路上，已经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然而，路还很长，从他们现在的业绩和顽强的精神来看，我们相信他们会继续拼搏、向前飞奔。这是令父母感到十分欣慰和骄傲的，也是对我们所失去的时间和生命的最大补偿。



四博士在美国过圣诞节：金萤（左二）、金煜（右一）、金侠（右二）、金延（左一）

## 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美梦成真，需要条件。谁知道这种条件得经过怎样的努力才能创造出来呢？不过，就是变为泡影的梦幻，也会起着“美意延年”的作用。因为有憧憬和企盼的人生才更有味道。对于我们来说，全家大团圆，就是这样的美梦，就是四个子女全都出国后，多年一贯的企盼。那么，就企盼着吧！

谁料，美梦竟然成真。1997年11月，国际长途传来了意外的好消息，长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子金煜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荣获博士学位，又做了不到一年博士后，被雪佛龙石油公司所聘，很快要赴任了。1998年2月，他又来电话说，已经搬到旧金山湾区，到雪佛龙公司上班了。

雪佛龙石油公司年薪较高，此时，儿子已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幢二楼楼的独门独院住宅，还买了两辆新车，一辆小轿车，一辆七人座面包车，是专为全家人到一起用的。没过多久，从旧金山打来长途，大儿金煜和儿媳郝欣先后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们：“新买的楼房二百七十平方米，外带一个后花园，门前是绿草坪，还有车库”，“新家具、新被子都买好了，已经和姐姐弟弟研究过，请爸妈来过圣诞节，全家到齐，来一个十四口之家的大团圆”。

8月份邀请信和办出国所需要的全部资料都寄来了，还有大孙子、小孙女在新居看书和玩耍的照片，十分可爱和幸福。我们急忙办理请假、签证、买机票等各项手续，一切顺利。

全家分开已近十年，梦寐以求的全家大团圆，就快要变为现实了，我和我先生的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迅速整理行装，于1998年11月15日下午3时，起程于首都机场。经过十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旧金山机场。当地时间是15日下午3时30分。

来接我们的是长子金煜全家，第一个看到我们的是长孙金潇。听到喊“奶奶、爷爷”，我往右边一扭头，见到我那白白胖胖可爱的大孙子，只离我们几步远在笑着。接着是儿媳、儿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从未见过面的已有两岁多的小孙女，被妈妈抱着。她圆圆的脸，剪着娃娃头，前额盖着黑发，脸上的每一部分长得非常匀称，一笑甜甜的，真好像商店摆着的那种特别讨人喜欢的典型的东方布娃娃。小孙女刚会叫爸爸、妈妈。儿媳说教了好几天叫“爷爷、奶奶”。我把她抱过来，只听得像声音停在嗓子眼里一样，轻轻地叫了声“奶奶、爷爷”。爷爷的发音不清楚叫作“伊伊”。我们大家都笑了。看看表，4点刚过，我们全家大团圆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我和我先生心里自然极为快活。

从旧金山机场起程，乘坐由长子金煜驾驶的舒适的新面包车，和儿子一家亲亲热热、有说有笑。特别是四个孩子（我们还从北京带去金莹的女儿和儿子）欢天喜地，热烈的大团圆之行，就这样自然地开始了。不知不觉已一个小时，到了旧金山湾区安提奥克镇的新家。从车库下车，右手是通向后花园的门，左前方是通向二楼楼的门。儿媳打开右手门说：“妈，先看看后花园。”我从门口





只向前走几步，一览花园，惊奇地说：“怎么这样大？没想到，好漂亮！”我们又进入客厅，上楼放好东西急忙吃饭、沐浴。接连十多个小时的长途奔波，已经精疲力竭，我们什么也顾不上看，就睡下了。

第二天，一觉睡到上午 11 点多才起床，早饭和午饭并成一顿吃了。我们这才使劲欣赏一下儿子的新居。

一幢有小花园的独立的二层小楼，二百七十多平方米。整个楼下是宽敞的客厅，进一个门，则是一套“通天”高的房间，坐在下面可见顶棚，四个大玻璃窗，加落地门，敞亮极了。有餐厅和放有电视、VCD 等的家庭活动室，再里面是儿童的玩具间。从室内楼梯上去，楼上是三个居室，一个小客厅，整套房子有三个卫生间，其中两个相当大。各个房间家具全是新的。原来，在波士顿时，儿子他们住的那栋楼起火，家具多数被毁。这是一种天然淘汰，也是一种“祸兮福之所倚”，因祸得福吧！儿媳最喜欢墨绿颜色。大客厅的长长的半圆形真皮沙发是墨绿的、活动室和楼上小客厅的绒布沙发也是墨绿的，放在各房间的乳白色的纯毛地毯上，显得格外庄重，再配有和这种主调相协调的家具、摆设，包括盆花，各个房间都显得敞亮、典雅、气派，而又十分漂亮。

楼前的绿草坪、小花坛，楼后的大花园和意大利柏树的整洁、漂亮，可算是儿媳的杰作了。在波士顿时，儿媳每天到公司上班，少有闲暇，而到旧金山后，因女儿太小，不能送幼儿园，所以她没有再找工作，在家照顾女儿。为迎接全家大团圆，儿媳除每天带孩子、做饭外，还开车去建材购物中心，购买了朱红色的、青色的、灰色的方砖以及鹅卵石等等。自己动手设计庭院。小花园的面积，有六百多平方米。沿围墙堆起的一周土台上，种有笔直的意大利柏树和“万年青”树苗，以及各种鲜花。接下来是儿媳亲手用一块块不同色彩砖瓦铺成的绕花园一周的散步小路。又花三千美元请人铺了一块水泥地，立有篮球架作为长孙的专用球场。此外还设有五颜六色的组合秋千——单人的、双人的、圆的、长的，以及滑梯等的小儿游乐园。看到家里、房前和花园的这一切，我那一高兴就说的口头语又脱口而出：“幸福生活万万年啊！”儿媳兴奋地喊：“金煜，妈妈又说‘幸福生活万万年’了！”于是，传来了儿子爽朗的笑声。儿媳对我说：“我们两人估计妈妈一到家就得说‘幸福生活万万年’。”我说：“昨天过于劳累，什么也顾不上说了。”

来这里前，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儿金煜和儿媳郝欣已为大团圆做了精心准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备，提供了如此优越的条件，积极帮助我们实现期盼已久的全家大团圆的美梦。

在旧金山家人团聚，是利用了美国人的两个节日，一个是11月最后一周星期四的感恩节，一个是12月25日的圣诞节。感恩节是美国特有的一个纪念日，大概是纪念17世纪移民美国，顺利定居而感谢上帝吧。感恩节在美国算一个大节，长子金煜放了假。

还在感恩节的假日，儿子和儿媳就开始为全家大团圆的圣诞节而采购有关的物品了。先是儿媳驱车，我们一起去选购圣诞树。圣诞树有专门的市场，品种繁多，大的、小的、天然的、人造的，价钱也相差很大，有三十多美元、四十多美元、九十多美元的，还有上百美元的。我说：“买一个最便宜的吧，这只是象征性的。”儿媳笑了笑，说：“妈妈，金煜说圣诞树一定要买个像样的，全家十年才团圆一次，很不容易。”看来，儿子、儿媳为全家大团圆，已经有过精心设计，连圣诞树都考虑到了。于是，我不再多说，高兴地服从他们的安排。儿媳选了一棵高大的圣诞树，造型很好看。晚上支起来，挂上小彩灯，颇有节日气氛。接着随儿媳一次次地外出，家里的圣诞树装饰得也日益丰富、美丽多彩了。

光阴似箭，一晃我们已步入老年。每天散步时，我们二老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还能来美国几次？”如果三年一次，大概也只有两三次了吧。因此，我们特别珍视这次全家大团圆。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次全家大团圆，因为住地分散，假日又有长短，到达的日子不一致。我们的长女金萤12月12日就到了圣荷西机场。女儿到来，对她的小儿子又背又抱，照顾得很好，可把我给解放了。此时，长子和媳妇花了不少钱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四日游。我们乘坐豪华旅游车，去了优山美地，如科罗拉多大峡谷、拉斯维加斯大赌城等。一路上，我们对美国西南部又多了较深的印象。

圣诞节的头几天，长子金煜放假了，里里外外忙着，悬挂彩灯。门周围、房子一圈、门口的树上，都挂满了彩灯，有白色的，还有红红绿绿的，非常好看。可是，第一次亮灯后，很快又不亮了。于是儿子又爬上爬下重挂，喜得老爸从旁帮忙。儿子嘴里还高高兴兴地唱着：“欢欢喜喜过个年啊！”儿子愉快的歌声，带给我们全家许多欢乐，家里充满了迎接节日的喜庆气氛。圣诞节头一天下午，另两个儿子金侠、金延全家到达。我们真是高兴极了。然而，金煜可



算是累苦了，一个下午两次要去不同的机场，分别接两个弟弟。我说：“这一天可够你累了。”而他却兴奋地说：“妈妈，我累得高兴，累得值得！”

圣诞节的前一天，儿女们终于都到齐了。节日的这一天，各家张灯结彩。儿子挂的彩灯一点亮，把这个家装扮得分外漂亮。圣诞节是洋节，美国人对其重视程度，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我们也入乡随俗，一起来过这个节日。不过，对于我们比洋人感到更为重要的是借这一节日假期，实现了难得的全家大团圆。圣诞节的早餐后，到院中拍全家福，摄像机一部、照相机四部，自动拍摄，照了许多张。年轻人又提出，再到室内照。总之，欢乐的一家，在室内外留下不少镜头。难得的十年一聚，有了凝固的、永恒的纪念。

晚上，摆开了中国式的圣诞大餐。餐桌上的菜全部是中国式的。金煜在中国餐馆订了十二道中国菜，加上自制的四道凉盘，总共达十六种之多，摆满长长的餐桌。打开一瓶茅台、一瓶五粮液，还有一瓶中国的红葡萄酒，开怀畅饮。酒助人兴，谈性颇浓，几个孩子都谈了自己在海外的感受和今后的打算。这场晚宴一直吃到深夜。



1998年的全家福（当时的十四口之家，现已十六口人）

在家人团聚的日子，晚餐多半是这样的。菜肴一般是出自大儿媳的巧手，姐姐有时也助其一臂之力，还加上从餐馆订的菜，餐桌上总是十分丰盛。不过，为了健康，酒换成了啤酒和金延在超市买的日本清酒，度数很低，但很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有味道。老爸喜欢看电视，在旧金山可以看到中文电视，而且能看到三个不同台的新闻。我们是边吃边聊。三个儿子和我在一起谈了很多，长女金莹因为需要照顾淘气的小儿子，有时来坐坐、谈谈，不一会儿，不得不又走了。儿子们无拘无束，在家人面前，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我听后感到，孩子们成人了，对什么都很有见地，事业上的成就可喜可贺。特别听到他们谈自己是怎样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我高兴得内心感到震颤和惊喜。每晚和孩子们在一起聊天，是我感到团聚中极其幸福的时刻。那每晚的谈话，我所听到的生动有趣的事，特别是子女事业上的成就，都一并写入该书。这使我深深感到庆幸，庆幸我们有一个多么幸福、温馨、和睦的大家庭。这正是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身心健康成长的摇篮，也是一幅美丽的、多彩多姿的背景画面。然而，画面的焦点可能就是那个难得的“和”字了，“家和万事兴”嘛！

这次全家大团圆，大儿和儿媳还不辞劳苦地为我们安排了几项有趣的活动。上面曾谈到，除已购置的小轿车外，这次为家人团聚又加添了一辆漂亮的全新面包车，于是全家出动不发愁。有时由于孩子晕车，不能远去，留人在家看护，就部分人出动，十分灵活。这几项活动中，游太浩湖和滑雪场，以及去“美而廉”，印象最为深刻。

太浩湖和滑雪场，地点距家三百多公里。太浩湖很大，汽车沿着环湖公路跑一圈，一个多小时，大约一百公里。湖水清澈，四周有茂密的绿树环绕，白雪覆盖的山头、绿莹莹的湖水相映成画，真是美不胜收。

在此地最大的滑雪场，观看我家滑雪最好的金侠和儿媳王阳从高高陡峭的山坡上飞速而下，另有一番情趣。当然，代价颇高。他们虽带有滑雪衣，但还要租滑雪板和滑雪鞋。租费二十二美元，滑一天门票五十六美元，半天三十六美元，玩一天开支当在百美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近千元。这在中国只能是富人的享受，而在美国已进入平民阶层。从陡坡山顶像飞燕般矫健的下滑者，为数也不少。我们在山下等待观看儿子和儿媳滑下来。

在他们下来前，见一位穿着红色滑雪装的白人妇女从半山腰滚下来，有人前去抢救；还有一位男人摔倒，可能是骨折，被担架抬上吊车往下送。这增加了我对两个孩子的担心。

当见到穿一身红色滑雪装的儿媳和穿着带有红道黑滑雪装的侠儿，从高山顶上下滑的熟练动作，矫健优美的身影，像两只海燕似的来到身边，我才感到



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了。为纪念这令父母和家人们骄傲的“双燕”的飞行，我们让他们缓脱滑雪装，和父母留下了珍贵的镜头。



金侠（左）、王阳（右）、父亲（右二）、母亲（左二）

去“美而廉”也很有趣。过了圣诞节后没有几天，我们全家十四口浩浩荡荡地到了当地华人办的自助餐馆“美而廉”。这里规模较大，有中餐、有西点，还有日本寿司。我最喜欢自助餐，因为它可以随意选择。大人十多美元，小孩从三岁算起四、五、六美元不等，全家一餐一百多美元。长子金煜还留给十多美元小费。这样的消费如在国内合人民币是相当贵了，而在这里却被认为是真正的“美而廉”。离家大约一个小时车程，出去一百多里吃顿饭，这在国内不可想象，而这里却很平常。这大概也是车轮上的国家和双脚走路的国家之间的差异之一吧！

总之，由于一年来在美国的三个儿子和女儿、儿媳们在电话中的反复商量，由于长子金煜和大儿媳郝欣对家人满怀深情的安排，使我们实现了近十年朝思暮想的全家大团圆的美梦，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趣味横生的别有深刻含义的圣诞假期。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儿女们的假日陆陆续续到期，各自回去上班了。全家都是搞学问的。儿女们又将继续在高科技的天地飞向蓝天翱翔了。我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先生和我已属“老骥伏枥”之辈，然而，作为教授的我们，还将笔耕不辍，也离不开讲台。我们也要回北京了。这次出来不能超过两个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党校旧住宅要拆掉，大家都已购买并将搬入漂亮的新居。全家大团圆好似刹那间过去了，真是“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不过，每个孩子都留给了我们祝福，他们由衷地说：“祝愿父母健康长寿，这也是我们做儿女的福气。”

## 妈妈的事业并没有苍白

尊敬的读者在浏览我的上述文稿时，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对子女的抚养与教育，付出那么多的心血和爱、精力与时间，个人的事业是否作了自我牺牲？”

现在，一般的看法是，一旦有了孩子，面对复杂的子女抚养、教育，以及烦琐的家务劳动，特别是还要使子女成才，那么，不是父亲作出牺牲，就是母亲。“反正总是得有一个人要牺牲，不可能两人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好像是得到社会认可的普遍观念。

不！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读者，我们不是这样。不是一半失败，一半成功，不是用两个人事业上的失败，换得了子女教育的成功；也不是以父母哪一方的失败，换得了对方和子女的成功，而是获得了双赢。一方面是家教的成功，四个孩子都已成才。这在上面已经写了很多。下边要写写另一方面，就是作为父母的我们二人，在事业上也是双赢。

首先，我的先生是一个赢家。他 1932 年生，比我大两岁。长期从事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自 1961 年来中央党校任教，从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担任了博士生导师。曾任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他是党史专家，是全国“文革”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在校外兼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副会长等。他是中央党校第一批被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评审组党史党建组的成员。近二十多年发表各种论文与文章”史稿》、《“文化大革命”论析》、《“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建国后三十三年》、《不平凡的七十年》、《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四人帮沉浮记》、《新中国编年史》，还有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有的著作已被外国学者翻译为日文和韩文，分别由日、韩两国出版社出版。

关于孩子的妈妈，我也可以老老实实在地告诉读者，同样是一个赢家。我 50 年代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毕业后，一直从事哲学课教学。由二十几岁的大学讲师 1961 年调来中央党校，在这里被陆续晋升为副教授、教授，任马哲史教研室主任。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曾被评为校级学习雷锋积



国务院颁发的金春明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专家证书

极分子、中央党校教学科研一等奖、优秀教学奖、哲学教研室先进工作者等。1991 年调中共海南省委党校任副校长、校委委员、兼行政学院副院长、《新东方》杂志主编，并长期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带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南省委员会委员。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我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同时，又发表文章和著作几百万字（个人专著与合著），如《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当代中国十哲》、《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中国当代哲学 40 年》、《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反对个人崇拜》、《英伦之旅》等。1988 年荣获中央党校优秀教学科研工作一等奖，1990 年荣获中央党校 1988—1990 年部门教学奖。

调任海南省委党校任副校长、兼行政学院副院长，我除行政工作外，还继续讲课，搞科研，并仍兼中央党校教授，培养研究生，奔波于京琼之间。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经历，似乎都可以撰写一部厚厚的个人传记。只因为都不是大人物，又不是名家，这种写作也就没有必要了。该书前面几章，在谈教育孩子过程中对我们自己的经历多少谈到一些，回答“双赢”的问题，我想已经足够了。

只是有些人把我这个母亲想得很“神奇”，经常有人向我先生提出：“你家振霞生儿育女，生了四个孩子，有那么多家务事，怎么什么也没有耽误？”还有人向我的亲戚、朋友发问，有人说：“李振霞怀孩子、生孩子、抚养孩子、给个个孩子哺乳，又教育孩子，业务怎么还那样好，真神！”



国务院颁发的李振霞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专家证书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自幼不是“天才”，也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的妈妈，而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人。我自己也反复想，可能还得归为那句名言：“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顽强不屈的精神。还有百折不挠的“不认输”的性格和非凡的毅力。鲁迅所讲的那种持续努力的“韧性”，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没有一点点夸耀自己的兴趣，也没有一点点盛气凌人的骄傲，只是为了老实地回答大家一再提出的关于我的问题。特别是为满足研究“李振霞家庭现象”的人们的追求，似乎还应多少交代一下“李振霞”。另外，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为了使全国带有孩子，而又艰难工作的亿万姐妹们，提高信心，争得“双赢”，好像也该谈谈自己。对于她们哪怕有一点点的启发或警示作用，我就欣喜万分了。

为此，以下几个问题中重点谈一谈孩子们的妈妈——我自己。

人们对我这个四个孩子的妈妈，提出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想：这是可以理解，而且是自然要提出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社会上有的独生子女的母亲，已为子女和家庭无可奈何地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更何况多子女母亲？不熟悉我的读者，很容易想象我是以个人事业的苍白，换得了对子女教育的成功。有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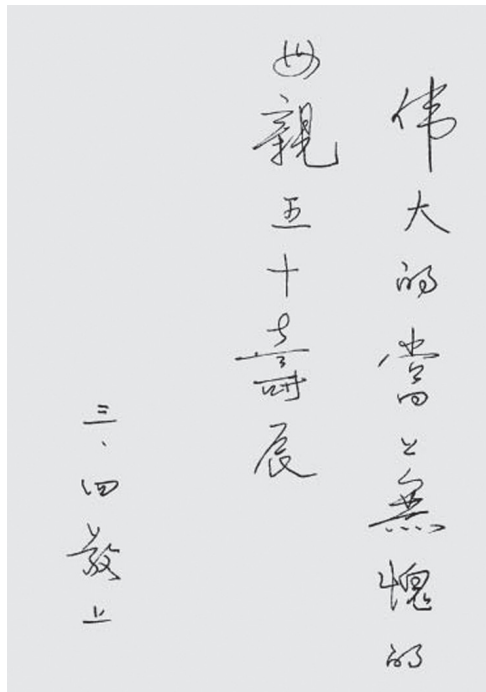
赢。这种想象错了！

在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长女金萤和长子金煜已经工作了，他俩每人订了一个大蛋糕，赶回来说：“要好好庆贺一下妈妈的生日，庆贺妈妈在家庭与事业上的成功！”我那两个孪生儿子还在读大学，将节省下来的钱为我买了一本相册，上面写着“伟大的当之无愧的母亲”——这就是孩子们心目中的我。

谦逊谨慎，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然，历史上也辅之有不少“毛遂自荐”的故事。但自我推崇对于我已毫无意义，自己的名誉、地位已应有尽有，而且组织上给予的大大超过了个人“需求”。况且，我已越古稀之年，已经不是需要到“人才交流中心”或“劳务介绍所”作自我推荐的年龄。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自己呢？为什么还要谈“双赢”？我是希望，国人亿万姐妹，都能够站起来，正确地处理事业和孩子、事业与家庭的矛盾，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妇女是半边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妇女都变为只是家庭中的贤妻良母，而以伴夫相子为己任，在事业上都是失败者，个个事业苍白，那么，祖国的建设，人类的进步，岂不是要塌掉了半边天？

言归正传，我还是谈自己吧！

还是在我二十周岁的那一年，已与我先生结为伉俪。不久遇到难得的机遇，在火热的夏天，经过三天考试，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在校学习期间，虽有妊娠反应，十月怀胎，又到千里之外的母亲身边分娩，可是，我还是拼命地赶上了功课，以优异成绩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而且，我和一位女友所读的书，大大超过学校规定的内容，因为我们晚上总是加班。在研究生部未搬进北京城里的原“段祺瑞府”著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而在西郊现人大地址时，我二人成了



作者五十寿辰孪生儿子金侠、金煜赠送的字匾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午夜 12 时才关门的研究生资料室的“常客”。于是读完了学校印发的苏联《副博士书目》，准备毕业时应考，获取副博士（苏联当时的副博士，在我国的今天是博士待遇）学位。遗憾的是，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一来，学位变成了“资产阶级法权”，于是，所有大学的学位授予权都被取消了。学士、硕士、博士都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中国的“无产阶级”通通不要了。但书并没有白读，总还是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

不到二十三周岁，我又一次回到大学讲坛，因为考人民大学研究生前，我已经是大学教师，那是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开始的。可是，这次有些不同，我被任命为沈阳师范学院哲学教研组组长。因为全校只有一个马列主义教研室，室内的哲学组相当于现在的哲学教研室，担任全校哲学课。这样，我们的那个十



我和我先生婚后双双到北京读书

多人的小组，就担负起全校的九个系科的哲学课，以及政教系的哲学专业课和哲学原著必修课。哲学教研组的教师多为本校的留校生，二十多岁的我竟成了这里的主讲教师，讲课任务相当重。有时，上午讲数理五个系的哲学课，下午讲文史四个系的哲学课。一天下来，头晕目眩，可是第二天还要讲政教系的原

著课，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人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又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下了班要忙家务，没有办法备课，只能熬夜至一两点，每天还要早起，为孩子哺乳。由于长期缺少睡眠，我从此得了血管性头痛病。

当时，我还不是心情舒畅地忙，而是在忍辱负重、顽强地工作。1957 年由于为同班一位女同学鸣不平，给生活作风不正派的党支部书记提出意见，而横



遭报复，我被扣上“攻击党的帽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一直蒙受委屈；1959年又因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有意见，又受到批评，进一步蒙受屈辱；1961年相信党当时宣布的“甄别”（平反）政策，提出对自己的不公正处分给予“甄别”的申请，谁知道党的政策很快就变了，批评所有提出“甄别”的同志是在刮“右倾翻案风”，我又一次蒙受屈辱。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上的打击，使我有一段整天在痛苦中挣扎，在愤懑中过日子。

此时，学校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窃窃私语：“背着处分，读完研究生课回来了。”而女人事处长竟公然在会上提出：“她五七年‘中右’，五九年‘右倾’不能给她提职、提级。”这一切都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对于一个常年受到群众赞誉、组织表扬，历年被评为好学生，而又从儿童团、少先队员、青年团总支书记成长起来的中共年轻党员的我，对此不能不感到有一种沉重得难以承受的压力。特别是我反反复复地想，自己所提的意见，没有一条是错的。甚至，有时夜不能寐，我一句一句回忆自己所讲的有关意见，越想越感到自己是对的，可是，却被批为“中右”、“右倾”，真是百思莫解。但这却又是当时中国政治的现实，使人无可奈何。自己整天讲哲学课，向学生讲述实事求是的原则，“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道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时，真理和正义是多么难以寻找啊！当听到别人的误解、讹传、不公正的评说，我的心情真像《水浒全传》上所说的“万箭攒心，日夜吞声饮泣，珠泪偷弹”。在上面曾谈到，我是一个女人，一般女人的弱点我都有。比如，我就很爱哭。只是不在人们面前哭，而是深夜蒙着被子，或者在无人的一隅偷偷落泪。

后来，我想：自己工作忙，家务重，不能陷入怯懦的哭泣；作为教师的我不能误人子弟，作为妈妈我要带给孩子们幸福和欢乐。于是，我下决心振奋精神，奋发拼搏。不是不提职、不提级吗？那么，我不去争，也不要，像唐代大诗人李白所说的“何惜阶前盈尺之地”，要“激昂青云”，做到清雄奔放，豪气逼人。你让我“万箭攒心”，我要来个“万夫莫当”。如元朝关汉卿所说的“此人使一条浑铁枪，有万夫不当之勇”。我虽然没有“浑铁枪”，但有聪慧的头脑、伶俐的口齿，以及锋利的笔，可以写，可以说，可以抵挡一切。我当时还想：太史公司马迁能够“忍辱含垢”（蒙受宫刑的屈辱和贬抑）埋头著史，我为什么就不能忍辱含垢，埋头备课、讲课？于是，我这个平时爱说爱笑的人，都很少与人讲话，咬紧牙关，昼夜埋头备课、讲课，并十分辛勤地帮助我母亲搞好





## 我家走出四博士

家务。

众目昭彰，众擎易举。1961年年初，在沈阳师范学院，评选全校优秀教师。我的教学得到各学科学生的赞扬，他们还派代表反映到校长那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也公推我为优秀教师，而且是全室唯一的一名。但这也难过人事处处长的那一关。后来，老校长亲自调阅档案，认为1957年对我的处分证据不足，不公允。这样，我终于被评为全校优秀教师。优秀教师的称号，可能有人认为算不得什么，可是对我却别有一番意义。它既是对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日夜辛劳的赞誉，也是真理和正义战胜邪恶的一点示意。当然这种战胜是十分有限的，是在某个小局部，而非全局。

不久，中央下令调一些干部入京，充实理论队伍，确定调我的先生进京。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到我校商量要调我同时进京。但校党委书记说：“她不能走，是教学骨干、优秀教师。除非省里为我们再调进一个差不多的，或者让她给我们培养起像她这样一个人再走。”省里将这个信息传给我们，我一方面对学校的信任，非常感激，另一方面又忐忑不安。心想：这不是要使我们这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家长长期分居两地吗？让我培养出一位主讲教员然后再走，谈何容易？这得需要多少年的光景啊！”后来省有关部门又多次找校方协商，我先生也去找校党委书记陈述困难，校领导一次又一次地开会，才终于放我离校进京了。

我是带着大学优秀教师的荣誉步入中央党校的，很快被分配到哲学教研室。当时的室主任由副校长、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兼任，还有几位副主任，也都是在全国哲学界颇有知名度的。其中，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在全室大会上曾多次谈道：“中央党校的教学任务少，很影响年轻人的成长。都是同龄人，李振霞同志在大学里开许多课，效果很好，可是，我们这里同龄的年轻人有的还没有上过课堂，以后得设法多分配任务。”

我很奇怪副主任怎么会这样了解情况，我来中央党校，从未向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后来才知道，去全国各地调人的中央工作组，有中央党校的人参加。去东北一路的是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揭星光，估计是对于调来的人曾作过分别介绍。可是，副主任在全室会上的话，没有为我带来轻松和愉快，而是增添了压力和不安。因为，来后听到同志们介绍情况，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实际水平离党校工作需要距离颇大。





大学培养的是年轻学生，而这里培养的却是党政高级干部。教学对象悬殊，自然对教课的要求也大不相同。这里教研室的许多同志的革命经历长，实践经验多，有的曾担任过地师级单位的领导工作，并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不少人就是中央党校毕业后留校的学员；教研室里的年轻人虽然任课少，但为此也给予他们许多读原著的时间，并听过不少领导人和名家的课，况且他们大都是从各大学抽调来的毕业生中的尖子。见到此情此景，我拼命学习和工作，要尽一切努力缩短和大家的差距，早一点适应中央党校教学工作的需要。

教研室领导很信任我，来后不久，就分配讲授工农干部班的课，而且分配到中央党校“空前”也是“绝后”的那种四年制的“秀才班”（1959班）做下班辅导工作。为纠正大跃进“左”的错误，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集中学习，给党提意见，“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教研室剩下的二十来位同志，党支部让我组织和领导学习。应当说，这一段时间比较受重视也比较愉快。

然而，好景不长。上面曾谈到党组织宣布受过不公正处分的同志可以申请“甄别”。可是，没过几天，气候就变了！毛主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一下子又把提出“甄别”的同志，打成“右倾翻案风”。由于自己也提出了甄别，又一次受到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的打击。从此不再受重用了。自己很难过，好像总也摆脱不掉政治上受打击的命运。然而，别人不重视，我自己自尊、自重，顽强地工作。为了做好工农干部班的讲课和“秀才班”的辅导，做到“有问必答”，我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一课不少地随“秀才班”听课，如杨献珍、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课，吕振羽、刘大年的历史课等。校方为学员安排的大批书目，我也一本一本地全部阅读。白天读不完，就夜里读。学员提出的问题，我尽一切努力回答，有时上门辅导个别人，有时集体辅导。

为了回答学员的一个问题，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一查就是一上午。我还主动参加教研室哲学原著备课会。如有北大教员和我校教员共同组织的列宁的《小逻辑》备课会，我抽出一切可能的时间去参加。由于准备认真，学员对于辅导很满意。特别是在怀着小李生兄弟时，挺着大肚子做辅导工作，学员异常感动。后来，虽经受了产假期间40℃高烧的乳腺炎和三个月腹泻的折磨，产假一满，我又准时上班了。这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仍刻苦学习，拼命工作，同志们说我“什么也不耽误，样样搞得好”，于是，1963年被评为中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中央党校校级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

1964年克服种种家庭困难，我服从学校安排去搞“四清”。1965年又一次去“四清”。两次“四清”，离家在外对孩子们异常挂牵，回肠思念。就是在这种对孩子牵肠挂肚的“四清”中，我还挤时间读了不少书，特别感到雷锋的“钉子精神”的可贵。第一次“四清”我是在队部工作，做我们工作队那位女队长白力行同志的秘书。第二次她当了东北旺分团的团长，仍让我做她的秘书。

“四清”后，我拿了一个写有“李振霞是好同志”的鉴定回到中央党校。然而，在我看来，比给别人印象更为重要的是，我见缝插针，读了不少书。每次放假回校，我的背包里都装满满的书回工作队。我借工作之闲暇，挤时间阅读。有时是利用别人闲聊的时间读书，有的是深夜读书。白天秘书的“书写”任务较多，然而，晚上有三个小时，即晚10时至凌晨1时，是我的“幸福”读书时刻，没有任何人打扰。



作者李振霞后来一直在书的世界“遨游”

我们的女队长白力行同志很好，非常尊重我的习惯。我们住的是老乡家的一间半房。虽然睡在同屋，但这位队长有失眠与头疼病，晚10时固定要吃安眠药就寝。于是，在老乡放有许多杂物小小外屋半间房里，我就开始进入书的世界了。两期“四清”，在两处雷同的小小“学习室”中，我读完了《列宁全集》的前十卷，

还有马、恩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又看了一些后来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的闲书，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陆游诗选》等。那是一种“定时不定量”的学习。第二次“四清”只有几个月，因为中央党校开展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工作队全部返回。回来后，虽然仍在哲学教研室，但被抽到由艾思奇直接领导的批“合二而一”的写作组。自己也写了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至今，每当想起这件事，还感到愧疚，一方面对不起自己所



尊敬的杨老，另一方面也白白浪费了光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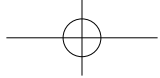
“文革”的十年，所造成的灾难与破坏，为整个国家和每个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就是在这种异常而不幸的时期，在我们的这个家“围起了一块小小的平静乐土”，孩子看书，我们只要不开会也看书。《鲁迅全集》的主要部分是在这中间读完的。“文革”后，又重购两套新书，即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套《列宁全集》。我们很爱这两套书，一有时间就读。而且，随着来中共海南省委党校上任领导的列车，这两套精装书也全部随我来到了这美丽的宝岛。

## 新腾起，新生命

“文革”结束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粉碎了，举国上下，万众欢腾，人们欢庆又一次大解放！而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日升月恒的大解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给了人们思想理论上明辨是非的一杆秤。实践证明是错的，就要拨乱反正，改正过来；实践证明是对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转折，使共和国获得新生，又开始了生命的新征程。祖国大地，春意盎然。而知识分子心灵上的春天，所迸发的能量令人惊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给我个人的是发自肺腑的呐喊：“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回来了，我不再蒙受委屈，不再忍辱负重了！”我长期认为，对于自己不公平，似乎看不到公理，这时一下子感到“天理昭昭”，“公理终于战胜了强权”。

心灵深处又回忆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心在流泪、流血。1957年号召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就是给一个党支部书记、证据确凿地提出意见，都不容许，一次又一次挨整，并受到处分。据现仍在人民大学工作的老同学说，我是属于第一批被平反者。当中央党校组织局的同志拿出档案，即三张纸的所谓材料给我看，并即刻销毁时，我百感交集，非常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

组织上对错误批评给予平反后，一下子心上像搬掉了三块大石头。摆脱心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灵枷锁，去掉那些沉重的心理负担，走起路来也轻盈许多。做起工作，像长了翅膀一样：再高处，也敢飞；再苦、再累，也不在话下。从此，又有了新的腾起、新的生命，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做着真正是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宣传反对个人崇拜，大量发表拨乱反正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议”上有了结论，宣传反对个人崇拜是合理合法的。而我们的讲课，是在这之前，而且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即1977年秋，中央党校刚重新开学复课时。教研室集体讨论如何在全校大课上讲授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时，有的同志不同意单列“反对个人崇拜”的讲题，而认为正面讲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更为稳妥。而一些同志和我则认为必须讲，因为十年“文革”的大灾难，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将毛泽东当作神，搞个人崇拜。

当时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后来的副校长韩树英同志思想很解放，是积极主张讲这个专题课的。最后教研室决定，我和另一位女老师方文一起备课，在全校分两个课堂宣讲。我们还着重批评了毛泽东本人认为“个人崇拜还应该有点”、“马恩也搞个人崇拜”等看法。

刚巧，我们上大课的前两天，华国锋同志在大连检阅海军。有的报纸全版套红，用大字标题宣传，还高调突出乐队高奏东方红、全场热烈欢呼等场面。似乎又出现了一个大救星华国锋，而决定祖国前途命运的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好为讲课增添了十分现实的针对性。我们满怀激情的讲课，博得学员普遍好评。部主任王冰说：“学员反映非常好……”这之后海军司令部、全国妇联干校等许多单位请我去讲课。

《红旗》杂志等报刊约我们写文章，我们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如《彻底清除个人崇拜的影响》（《红旗》杂志1980年第24期）；《反对个人崇拜和承认领袖的作用是对立的吗？》（《工人日报》1981年8月7日）；《历史与合力》（《红旗》杂志1981年第22期）；《需要搞点个人崇拜吗？》（《工人日报》1980年12月25日）；《试论维护领袖权威和个人崇拜的原则界限》（1982年7月《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1辑）等。黑龙江出版社还约我们写书，我们也完成了，书名《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反对个人崇拜》，并公开出版。

这是一次成功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讲课。当时，没有电脑打字，我们手写的书稿需要请人帮助誊清，当时请的一位是在“文革”中因对毛主席有意见



而被打成“反革命”的金连举同志。

他对我说：“越抄我越怕，书中批评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实际上，也批评了现在的华主席。李大姐你被打成反革命可怎么办？”

我告诉他：“我们决心学习司马迁秉笔直书了！”

他的顾虑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还在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在我们写书期间，江西一位女教师，就因为批评毛主席、怀疑华国锋而被用竹签子穿上下腭与嘴巴不让讲话，并处以死刑。所以，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讲这个问题确实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真是得有点舍死忘生的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发表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与著作外，我还与人合作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发表了拨乱反正的著作与文章，如《只有深入反“左”，才知退是为进》（《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2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在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的》（1982年4月《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探索》一书）；《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1983年9月发表在《开创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局面》一书）；《解决经济工作问题的一把总钥匙》（1980年6月27日《工人日报》）；《提倡思考问题之风》（1980年8月19日《工人日报》）等。我还参加了韩树英主编、教研室一些同志参与撰写的荣获全国一等奖的《通俗哲学》的写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的写作（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与另一同志合著《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等。1983年我被评定为副教授时，公开出版的著作与文章已达一百多万字。

粉碎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进入新的层次。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反思，又向前推导，在更宽广的领域和更长的时间步入了历史的沉思。我对于自己长期所从事的哲学教学与研究和中国哲学的过去，也冒风险地久久思索：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究竟是怎样的？20世纪以来著名的哲学人物有很多，为什么只能研究和宣传毛泽东一个人？难道现代中国的哲学园地只有一朵鲜花吗？李大钊的哲学地位为什么不能予以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有的文章中为什么仍说陈独秀是“两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有人还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继续证明他是叛徒；对于胡适、梁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漱溟、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的批判有哪些是科学的、合理的，哪些是过火的、不正确的？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如此等等，脑子里有种种问号，有许许多多解不开的结。于是，除完成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任务外，我整天在图书馆看书，经常是一天三个班，班班在图书馆，上午、下午还加晚上。

那个时候，孩子们已陆续考上大学，住校了，摆脱掉许多家务负担。我下决心，在图书馆中“认识”这许许多多的哲学人物，解开如何认识和评价他们，进而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一个个组结。于是，我读了《李大钊选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瞿秋白文集》，金岳霖的《论道》、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冯友兰的《心理学》、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对过去出版的那套供批判用的几十本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选辑》，我对照着被批判者的每人原著，反复阅读，大胆审视，从而发现中国现代哲学史在整个中国哲学中，国内外研究都十分薄弱。用张岱年老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片处女地”。我总的印象是，有一个亟待开拓的新领域，这就是中国现代哲学史。这样，我就向哲学部领导提出到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专攻中国现代哲学史。给我一段研究时间后，我保证可以开出这门中央党校从未开过的新课，并争取申报硕士点，带研究生。这几乎是“出师表”、“请战书”了。当向几位哲学部的领导同志提出自己的要求时，由于有的是老哲学教师，很敏感，认为这个想法有突破，会在中央党校开出一门从未开过的新课，从全国来说，也进入了对中国哲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贡献会是很大的，从而积极支持。

开拓新领域的愿望并非我一时的冲动，而是在图书馆中大量阅读、反复思考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说这是一种学术冲动，那是在有较好学术积累的基础和强烈的责任感之上形成的，具有相当科学性的理性冲动。

后来中央党校成立了研究所，调我去负责筹备现代哲学研究室。当时，真是感谢组织，给了我更多的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时间。在几年内，我埋头于中央党校的图书馆，那里好像我的世外桃源。像苦读经书一样，我狠啃中国现代哲学家们的原著。为了找全他们的文章，需大量翻阅很少有人问津、落满灰尘的过期书刊。每当下班回家，我常常是带回两只“黑手”，给我先生看。

他同我开玩笑说：“好，我要抓黑手了！”接下来又说，“你怎么干什么都那么钻，那么执着？”





我说：“老毛病。”

由于读书越读越有兴趣，我常常忘记休息。读书过程发现过去那许多批判“文辑”上的文章，很不实事求是。我想：不能一味责备写批判文章的专家、学者，因为那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左”的错误占统治的时代撰写的。同时，我也深深感到，需要让人们了解被批判的哲学的本来面目，还这些哲学人物以“公道”，应当对他们做出客观的、历史的评价。我想：对历史秉笔直书，是一种文德、史德。粉碎“四人帮”后，为蒙受委屈的同志政治上平了反，而在哲学史领域，也应拨乱反正，为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平反。

开拓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也是要冒一些风险的。自己深感力量单薄，对这个学界的新领域，很不熟悉。这个领域需要一批勇敢的开拓者，而且不是一个人。我自己只是这众多研究者中的一员，靠勇气，靠良知，靠全身投入，为这个新领域添一块砖、加一块瓦。而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带给我的那种“言必信，行必果”，但又不能“急功近利”，而要“励精图治”、“纵横捭阖、深谋远虑”等好的影响，以及长期的革命毅力的教育和培养分不开的。

因知勉行，苦尽甘来。我终于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依据自己的学习心得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即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自1919年至1949年，曾出现过十四次影响较大的哲学论争。在这种哲学论争的大背景下，每位哲学人物都有着自己的位置。对于论争的主题，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讲得比较科学，而在另一个问题可能讲得亏理；有人恰恰相反。但总览各次论争会发现，这里没有句句是“真理”的神，也没有“金口玉言”的君王。作为哲学家、学者，他们的观点和理论都是可以分析的。

于是，作为一家之言我撰写了自己的专著，即《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在撰写专著时，我给自己规定上午、下午及晚上都写作。晚上看完新闻，出去散步一小时，回来至少写上三个小时。脚和腿到晚上一齐肿，做医生的女儿金莹回来看了看心疼地说：“妈妈，不能这样写了。下肢微血管循环不好，会出大毛病。每晚要用热水泡脚。”我感谢女儿的关怀，但我只听了她话的一半，每晚泡脚，不是不写，而是边泡边写。我的好友管培月来看我，见桌下有水盆泡着脚，对我说：“老李晚上可不要再写了，你是家里的台柱子，一旦累病，不得了。”我笑了笑，表示感谢，照样按自己的章程办。终于在1982年12月实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现了规划，拿到了成果，由红旗出版社出版我的专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上、下两册，五十六万字）。为论证自己的观点及其由来，我又和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我的挚友管培月同志一起编选了八十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四册），其中收集了我在专著上谈到的所有哲学人物本人的代表性作品和文章。还编了一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文章的论文选（一册）。另外，我还与我的几位好友一起编写了《中国现代哲学史大事记》，全书三十三万字。因为作者中有人工作较忙，我承担了全书十万字的撰写任务，并统改全书。这近一百六十万字的共八本书，红旗出版社作为全国第一套中国现代哲学史系列丛书于1987年年底全部出版。

当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后，特别是出版了《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等八本中国现代哲学丛书后，我深深感到“学而后知不足”。我认为，在十四次论争这种从纵向进行历史的、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拓宽纵向的研究，并开展横向研究，以及点的研究。从而又设计了两个横向：一是1949年前；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而点的研究就是对中国现代主要哲学人物进行研究。

我正准备着手这项计划时，1985年在广东召开了有外国学者参加的中国哲学史年会。小组会我有一个发言《中国现代哲学史是急待开拓的新领域》。小组同志公推我到大会发言，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我极力推辞。回想起来，要感谢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同志。他坚持让我上大会，说：“你的发言有新意，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于是，我作了大会发言。发言获得出乎意料的强烈反响。

一散会，中文讲得很好的日本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授坂出祥伸和筑波大学的一位不会中文的教授来找我面谈，坂出祥伸说：“你的发言我们感到很好，现在，据我所知，不仅中国、日本，还有西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都认为应当即刻开垦中国现代哲学的这块处女地。”第二天晚上，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杭州大学等校的教授，到我房间告诉我：经初步交换意见，“希望由你牵头组织一个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基地就设在中央党校。因为这一段哲学史和党史关系密切”。

我们这些人都十分谨慎，何况又涉及开拓一个新领域、新学科这样重大的问题，当场难以表态。我表示回去请示领导。回校后，将广州会议的情况、大家的要求、我的发言原原本本向校长高扬与副校长韩树英作了汇报，得到了他



们的大力支持。他们都对以中央党校为首开辟一个新学科十分感兴趣，并让我将自己会上的发言全文，加上一篇会议简况，包括大家的要求，写好一并交校报发表。

关于广州会议大家提出组织学会一事，有了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我和我的几位助手孙琰、阮青、管培月、范鹏一起行动起来。这里需要特别感谢熟悉中哲史界的傅云龙同志。在他的出谋划策、热心帮助下，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筹委会组成了。中国人民大学长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老教授石峻先生提出大会下发我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专著和一整套系列丛书共八本，被筹委会通过了。我提出中国现代哲学史著作较少，还有吕希辰同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专著和袁伟时同志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卷，也一并下发，会议也通过了。经过几次讨论，大会的议程定了下来。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研讨会，1987年底在中央党校如期举行，开得十分成功。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委员高扬到会，并讲了话，欢迎全国的专家学者来党校开会，祝愿对中国现代哲学史这个新领域的开拓获得成功。副校长、哲学专家韩树英到会并讲了话，陈维仁副校长也参加了大会。全国著名的哲学家、中哲史专家多人到会。其中有的正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如梁漱溟、贺麟、张岱年等老先生都亲自到会，冯友兰先生因病不能到会而让人送来贺信。此外，全国著名的哲学家任继愈、邢贲思、方克立等也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出人民大学的著名教授石峻先生为会长，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还有北大、人大、社科院等单位的副会长。因为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西藏外都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常务理事、理事，分布于全国各地。这样一来，开拓中国现代哲学史这个新领域，就有了一支有组织的力量。研究会成立后的第十个年头统计：召开了十次学术研讨会，接待十二次外宾；出版三本论文集与三部中国现代哲学史专著。这时，由我牵头，刘洪璋、付云龙、孙琰、阮青参加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硕士点申报也被批准了。这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现代哲学史硕士点。从全国来说，也是第一个。

在中央党校校史上，还第一次开出了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课程。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按原计划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的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纲要》包括的时间是从1919年至1949年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这时，我又向后延伸，开展了1949年以后课题的研究，申报了“八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当代哲学40年》。

有了研究会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就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干了，提供了组织全国的著名专家共同开拓前进的舞台。这样，作为“八五”国家重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与最终成果一一问世：

一、《当代中国十哲》，1991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共三十三万字，李振霞主编，统改全书，并撰写其中的一部分。该书1992年，曾被评为中国图书金钥匙奖优胜奖。华夏出版社送此书去新加坡参加了全世界的版权交易会，并成为“八五”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阶段性产品。

二、《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计九十七万字，李振霞、傅云龙主编，统改全书，并撰写其中的一部分。该书为“八五”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阶段性产品。它历史地、客观地评价了二十七位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哲学观点。

三、《中国当代哲学40年》，1997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全书二十五万字，李振霞主编，副主编王炯华、毛卫平。主编统改全书，并参与其中部分撰写。该书为“八五”国家重点课题结项专著。

除此之外，本人还撰写数十篇哲学论文，个人专著与主编、合写的著作几十本。1983年评选副教授统计，共有一百多万字；1989年评正教授时统计又增加二百多万字。合计三百多万字。当今，使用电脑写作的年轻人，可能会感到，作为教授三百多万字的成果何足挂齿，然而，在中央党校同时期的这一批教授和副教授中，我是科研成果最多的一个。

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妈妈，克服了许多别的男同志和女同志所未遇到的超常的困难，而奉献给社会的心血。当然，近十年又有了新的飞跃，特别是1996年学会电脑打字后。至今，我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合计已达六百多万字。我所得到的组织、同志和社会给予的荣誉也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想。1963年，中央党校评选学习雷锋积极分子，我是其中一个。这之后因为“四清”、“文革”等影响，党校二十年没有评优。

1983年，又开始了评优工作。在这一年，哲学教研室评了两个先进工作



者，一个是教师，一个是资料员，我则作为教师中选。

1988年中央党校评教学和科研奖，两项合并评选，而且是全校统一评定，我估计命中率较低，心想如果能够被评为三等奖，就心满意足了。但后来全校统一评定的结果，我竟得了一等奖。在这之后，又在全国优秀读物评奖会上和我先生一起获奖。在他主编的二十一万字的党建专著中，关于哲学和党员的世界观问题，我写五万字，即全书的四分之一。该书获得“优秀党建读物奖”，这应该也可以算作我们毕生比翼双飞的又一次成功吧！

其后，1990年中央党校评定优秀教学奖时，我正任马哲史教研室主任，哲学部党总支宣传委员，而且已决定调海南省委党校任副校长，故自己主动提出，“不再参加评定，请将这一名额给予别人”。可是，大家说：“这是反映1988年以来的教学情况”，除我自己没有投票，到会的又以全票赞成，后经校方批准。于是，我这个四个孩子的妈妈，又荣获了中央党校的教学奖。一次一次的评优，自己都有份儿，我由衷地感谢中央党校的同志和领导对我的鼓励，感谢他们对于一个不叫一声苦，咬着牙默默克服各种困难的四个孩子母亲的理解。

当今，生四个小孩已经是一种错误，因为，提倡独生子女。而我们年轻时是生活在倡导“人多热气高、力量大”的时代。我提出做绝育手术，医生开始不肯，而且反复告诫我做绝育会后悔。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一旦经过深思想定后，很难改变。医生在我的要求下不得不为我做了绝育手术。我母亲知道后，对来看我的女友边哭边说：“这回我的唯一的女儿要短命了！”而现在医院却动员独生子女的母亲产后做绝育，时代是多么的不同啊！我生最后一胎（孪生），是60年代。而到八九十年代，我这个多子女的母亲不但不受歧视，还能得到如此多的理解，学术造诣得到那么高的评价，对同志们的这一深情，我激动而又感慨万分。写到这里，我要由衷地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对我的厚爱，我还要由衷地对关心我的同志们道一声：“谢谢！”

祖国最南方的南海之滨，耸立着两块人人看到都十分喜爱的巨石，一块刻着“天涯”，另一块刻着“海角”。火红火红的四个大字，辉映着那蓝天白云、碧绿的海洋、细细的沙滩，令游人流连忘返。这就是论陆地面积最小，而加海域则在全国省区中面积数第一的海南省。1991年，命运之神使我来到这方热土，来到我非常喜欢的这一美丽的宝岛。





## 我家走出四博士

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使生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黑龙江，而又在历代王朝的“风水宝地”首都北京这一第二故乡成长起来的我，年过半百，又飞向祖国南疆？原因很多，但是，概括起来，可能要首推我们伟大祖国改革开放的魅力。经济特区一个个地建立了，而海南省被确定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要求“海南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海南”，需要有无数的智慧的舵手，驾驭远航的风帆。这就需要为海南省培育出许许多多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领导人才。而在省内培养干部“四化”的最高学府，要算是中共海南省委党校了。当然，也还有各种大学。

海南省委组织部长来中央党校寻求领导支援，要选调干部。我先生和我在挑选中一起幸运“入围”。听人说，组织部长表示：“如果两人能够一起调动，金教授去海南省委党校任副校长；海南大学的副校长中，还缺少一位搞社会科学的。李教授在大学教过书，可以出任那里的副校长。”部长对我们已经摸得很熟。他还说：“如果金教授暂时不能来，就让李教授去任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表示不能同时支援二人。这样，经过反复商谈，最后决定只能由我去省委党校赴任，我先生仍留中央党校任教，但可任海南党校的兼职教授。家中也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可以。于是，我愉快地先只身飞向天涯海角，走马上任了。

当然，这里有工作需要的考虑。晚年为党的事业作出新的奉献，让生命的火花再度点燃，会更好地报答祖国和人民从儿童团那种童年时期开始对我的培育。但我这个人向来不是那么“纯粹”，还不属于毛主席所讲的那种大公无私、毫无私己之心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所以，我在处理问题时，也难免“大公而有私”，也经常想到自己。

对于海南之行，老实说，也有不少关于我的家和我自己的种种考虑。我的先生曾得过肺部肿瘤，做过大手术，取出一叶肺和一条肋骨。术后，康复很好，只是抗温差的能力削弱很多，每年冬天都多次感冒。而感冒是百病之源，我为此有很重的心理负担。

而我呢？是一个老气管炎，天一变冷，常常咳嗽，严重时还要变为肺炎。这是我的健康体魄中薄弱的一环。海南则看不到冬天，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整个美丽的海岛，不但气候温暖，而且空气清新，污染很少，湿度适宜，有利健康，是一个治疗冬季常发病的大医院，是一个美丽的“地上天堂”、“四季大



花园”。

另外，海南又是最大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试验宝地。它还面向当时全球正在腾飞的，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海南还有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即背靠沿海第一批开放的经济特区，离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都不远。对于搞社会科学的人，谁不想对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事物进行研究，而做出新的建树呢？然而，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给我带来这美好的机遇。



作者只身飞向天涯海角

当然，我也深知，只身“南飞”，会困难重重。但有组织，有群众，有我本人的毅力，以及爱闯、爱开拓、爱接触新鲜事物的性格，自己感到似乎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于是，按着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的1991年1月26日前报到的通知，我于24日起程飞往这别有一番情趣的新天地。

可是，报到不久，遇上了春节。我事先不曾了解到省委党校的习惯，寒假与节假相结合。一到放假，人们一般都要回乡下老家团聚、祭祖，正月十五前食堂停火。我尚未搬入新居，住招待所，难以起火。“民以食为天”，我要断炊



## 我家走出四博士

了！校长李克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实践经验多，理论素养高，为人又正派。他让我报到后飞回北京，欢度春节，组织报销一切费用。可是，从1952年入党，当时只差一年就四十年，党性的长期培训，使我不能不对他婉辞说：“调动所运的书、衣物，以及机票已经让组织花不少钱，我不能再破费，飞来飞去了！”他尊重了我的意见。

然而，“每逢佳节倍思亲”，接近年关时，我难过极了，思念我那长相厮守的先生，思念我那已经出国留学和尚在国内就读的亲生骨肉。这时，我的思想和情感上都有了反复，心想：我怎么这样贸然地“闯荡江湖”？离开中央党校的那种干部教育的最高学府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到一个举目无亲，环境陌生，远离故土，步履维艰的异地他乡，来“浪迹天涯”。

人们都说，男人成功的一半，是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我们的李克校长背后就有一个好妻子。她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坦诚、憨厚、豁达、正直，和校长一样心地善良的大姐姐。她体态略胖，但穿起衣服看上去很神气。她为我安排了丰富的家宴，欢度春节，解脱了我的几分思亲之情。

又过了半个多月，回乡的海南同志陆续回来了。不少人来看我，并谈到我特别愿意听的农村和山区的情况。而且，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一直在想：海南怎么有这么好的人民？接触到他们，使你感到淳朴、善良、温厚、勤勉。他们不要任何回报地帮助有困难的人。我对门住的副校长，在我来到前，将楼上的处于脑栓塞晕死过去的已退休的老校长深夜送往医院，并跑前跑后，救了他一命。发生在海南同志中的这样的事例很多。我来到这里，才亲身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深情。我在海南曾摔倒，左手骨折；得过高烧39℃的重病；还得过咳血的肺炎。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种种困难，他们都热诚和亲切地一个一个地帮助我克服。可能也正是这种“彩云托日”或“众星捧月”吧，使我在海南心情愉快地工作，直到六十岁按全国所规定的统一退休年龄退出领导岗位。四个孩子的妈妈在更大的困难中，不仅没有使自己的事业变得苍白，而且又放射出有活力的异彩。

宝岛魅力无穷，一年四季总是春。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树是绿的，人是淳的。来到这里，不能不使人总想一件事，就是为这片可爱的乐土，无私地奉献芳心，使它美丽无垠。

这样一来，我每天都感到有做不完的事。休息很少，忙了这样，又忙那样：



第一，继续完成中央党校的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任务。

前面曾谈到，我已离开中央党校，到海南就职，令人感动而又意外的是，接到中央党校寄来的优秀教学奖的奖状和奖金三百元。几百元并不算多，可是，它在我心里却是沉甸甸的。同奖状与奖金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份有中央党校各位校长签名的特聘我继续兼任中央党校教授的信件。虽然两地有教学任务，辛苦地奔忙于京琼之间，但得知我所带的研究生取得学位后，奔赴广西、南京、宁波等地，有的还身居重要领导岗位，我心中获得了无限的慰藉和欢喜。

第二，狠抓海南省委党校的教学管理，提高质量与纪律。

海南省委党校，以原区党委党校为基础。区党委党校位于五指山区，教学力量薄弱，也不够正规，虽已迁入省会海口，但难以适应建省后的需要。尽管校长与副校长做了许多工作，使省委党校在校舍建设和教学力量增强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但要建设一个各方面均较完善的省级党校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党校建设中心环节的充实教学力量、完善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难度是相当大的。

我到后不久，曾连续发生不该发生的事端。如上课时间已到，却不见教师，学生坐等教师，一等一上午。据教务处说，这种事过去也时有发生。教务处没有办法，只好临时找来录音给大家听。

我感到真是天下奇闻，坚持让不准时来上课的教师本人作检讨，发通报，订纪律，而且以更高的名义即校委的名义下达。事情办了，大家说好。得到校长和各位校委，以及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全力支持。从此，再没有发生上面那种奇特的事件，教师们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纪律越来越好了。

为提高教学质量，我想方设法去听课。因为会多，不可能每次课都去听，但还是竭力多挤时间。听课后发现好的及时表扬，有问题的一起商量帮助改进。主管教学的校长去听课，教员紧张，但有促进作用，认真备课，教学质量提高很快。而对于我本人，不厌其烦地听年轻教员的课，感到很累，尤其天热，睡不好时。但见到教学质量提高，我总是有一种“苦中有乐，乐在其中”的感觉。

第三，创办《新东方》，将海南省委党校的影响推向社会。

在我未来之前，海南党校有一个内部校刊，名叫《新东方》。虽经过前任多方努力，总是不能公开发行，走向社会。通过找领导，又借回中央党校指导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研究生论文和答辩之机，我多次跑这件事，终于使《新东方》杂志有了国内外刊号而公开发行。

我像哺育一个可爱的婴儿一样爱护《新东方》。在京跑报批一事时，我拖着骨折受伤、打着夹板的手，去挤公共汽车。90年代初，在我的脑子里花钱坐小轿车，尽管回去可以报销，但好像是一种奢侈，而现在“打的”已普遍化了。

校委决定我作为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兼《新东方》杂志的主编。我作为终审，每期都要审稿。有时，上午听课，下午开会，晚上审稿。时间一久，老毛病慢性胆囊炎发作起来，影响整个肝区疼痛。坐在那里审稿有困难，我就在灯下站着审稿。见《新东方》越办越好，我内心有着无法形容的喜悦。

第四，提高科研能力，让党校同志独立出书。

我到海南省委党校了解情况后，发现这里的教师过去只是和外校同志合作出书，形不成独立写作的群体和能发表专著的独立撰稿人。到任后，遇到的第一本书是教育长牵头的《奔向小康》。他约我一起去出版社。社长竟提出：“这本书由李教授终审才会出，否则不能出。”教育长请我答应。尽管刚刚到来，工作千头万绪，我还是答应了出版社的条件，多次审阅，终于成书。

教育长为科研开了一个好头。他后来被调到海口市的重要领导岗位（现已任省级领导职务）。我校科研处长继续领导写书，如组织大家写作《基本路线管一百年》等书籍，他们请我统稿，我照样支持。见同志们独立撰写书稿和文章的能力日益提高，科研成果更多地推向社会，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

第五，建立电脑室。

到任后，发现办公楼一个房间放有十多台电脑。每台上面盖着一块蓝布，窗子大打开，任潮湿的海风吹拂。而海南天暖，人们习惯一年四季开着窗子，这些在当时并不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却没有发挥作用，只好在风尘中一年四季接受洗礼。

经人介绍，我亲自找了海南省政府机关的计算机专家王肃强同志。他又找了另外两位朋友，对电脑一台台“会诊”，提出的结论是：

(1) 得开发利用；(2) 需设专门电脑室。我打报告建电脑室，校委每人都签名同意。因为党校当时经费紧张，按着“少花钱，办好事”的原则，一个小小的现代化电脑室建立了，并从此开始启动。

第六，带海南各级党校校长去各特区参观学习。





海南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出岛工具少，长期比较封闭。有许多县级党校校长还从未出过岛。1991年冬，省委决定，由省委党校正、副校长分别带队，组织各市县党校校长和省党校的部分同志外出参观。我们几位校长先后带队出发。有人带队去东北一线，有的是西北一线，有的是西南一线等。我负责的队伍是特区一线，共有二十多人，由省党校配面包车渡海北上。

这一路看了很多东西，大开眼界，但也遇到险情和旅程的困难。经努力，终于都克服了。一路参观了汕头、珠海、厦门、深圳等特区与当地党校，也看了当时广州的“四小虎”——顺德、东莞、中山、南海等，同志们反映颇受教育，圆满归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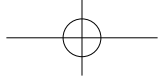
第七，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会议成果引进党校，扩大教师队伍的视野。

从1987年至1998年我一直任中国现代哲学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1998年又当选为会长。为此，我接到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函较多。一般都是主办国家和单位给予经费。于是参加了在俄罗斯、新加坡以及中国澳门等地举行的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我都作了学术报告，论文有的已被收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凡开会回来我都向全校作报告、发表文章，以使海南党校教师更多地了解世界，拓宽视野。

第八，继续搞好个人的教学与科研。

1991年1月来到海南省委党校后，我不断排除社会的诱惑与校内的不安定因素。我的心情经常保持平和，继续讲课和搞好科研，还作《新东方》主编，每月一刊，篇篇终审。

此外，本人还继续写书与撰写文章，以及完成主编、合著、统改著作的任务。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阶段产品和最终产品都是1991年来省党校后出版的，如《当代中国十哲》、《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中国当代哲学40年》。此外，我还参加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汪家镠主编的《干部思想道德建设》读本写作，等等。1991年来省党校后，我发表的文章有：《中国大陆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加坡国际研讨会论文）、《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澳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现代化：传统与国情》（俄罗斯国际研讨会论文）。此外，论文还有：《对群众路线丰富内涵的思考》、《尊重唯物论的楷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真理标准讨论前的历史沉思》、《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胡耀邦直接领导和具体组织真理标准讨论不是偶然的》、



## 我家走出四博士

《略论当前文化建设的几个特点》等。

90年代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选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给予特殊津贴。津贴数额不多，但却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海南省社会科学界的专家是从1992年开始授予的。海南省委党校前任校长李克同志和我，都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应当说，这是我们这代人搞社会科学的所能够获得的最高奖励了。

也是在同一年，我又被海南省政府授予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同一时期，我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南省政协委员。



## 后 记

我激情满怀地书写了我可爱的四个孩子的成长历程。这里也涉及我和我先生的部分人生经历。这是一种“风雨兼程”的人生，却不是尴尬的人生，所以，我以喜悦的心情仔细地回首往事。对于几个孩子来说，他们曾是母腹里的胎儿，是喷薄欲出的朝霞，是东方的旭日。而今，他们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我和我的先生，历经毕生拼搏，已是走向古稀之年的老人。摆在我们面前的记录着这老老小小沧桑的小书，能带给读者一些什么呢？这就要恳请读者来评说了。我能够告诉读者的只是一件事：你们所看到的，不是臆想的家庭，不是编撰的小说、戏剧，而是活生生的一家人的真实故事。从一落笔，我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写真情实事。我想，真人、真事、真实的经历、真切的情感，陈述起来，才会给人以真实的感受。为了实现这一规则，实践我内心对读者的承诺，我做了很大的努力。

中国有句俗语：“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没有家人的帮助，我的书是写不成的，让我把所有感谢的话，都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吧！

真希望时钟慢慢地走，地球一点一点地转，给予我的晚年更多的时间，让我从容地做完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天天紧张张张，总想“拨回”钟摆，“按住”时间！可是，时间是这样的无情，一去不复返。

“抽刀断水水更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些诗句是多么豪迈，把自然和人都看透了。我还是不要做梦了，毕竟自己已年事较高，还是学学诗人，现实一些吧。

我希冀自家的那种求实、负责、认真，以及一丝不苟的家风，永远传承下去。在我把本书稿的每章、每节、每个题目逐一反复推敲、认真改了一遍，且附加好照片后，分别通过电子邮件寄送给我的四个宝贝儿女。四个儿女都同样



## 我家走出四博士

认真、细致地做了修改和校对的工作，并附有补充的照片。特别是我的长子，他身为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驻中国的地球科学家商务代表，工作异常繁忙，只好先交由我的大儿媳修改，而他借春节假日来三亚过节之机，顾不上休息，又亲自和我一起修改书稿中的有关部分。我的先生则不厌其烦地又一次帮我将全书审阅了一遍。有了这样好的家庭，以及这样好的家风，对于该书的再版我很放心。我想：待书送到读者手里时，带给我的不仅不是愧疚，相反，会是极大的惬意。

我还希冀在合理的教育理念的传播中，能出现一种合力。让这种“合力”，能够为扫除当今部分未成年人身上的厌弃学习、行为不端、道德沦丧、“网瘾”缠身等恶习擂鼓助威，为孩子们的心里充满阳光，充满着爱而贡献力量。在工作的接触中，我发现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他们的成员正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特别是该书的编辑潘炜，他不辞辛苦地一次又一次同我联系；而出版社的领导又一次接一次地召开会议、定选题、作论证，敦促该书面世。他们的辛劳，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这不是我的几句感谢的话，就能够将他们的博大胸怀与追求抒发出来的。还是让我们共同打造“合力”，实现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望吧！